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 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



## 引 论

### 一、本书写作的动机与目的

毛泽东，现代中国革命之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主要缔造者和领导者。他的理论与实践不仅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而且影响到世界历史的进程。毛泽东作为 20 世纪的一位巨人，他的理论，不论正确与错误，他的实践，不论成功与失败，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都成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的历史遗产。他的影响广泛而深刻地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正是由于毛泽东的这种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对他的研究历久不衰。

对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是整个毛泽东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与现实最为切近，最有意义。毛泽东在 1937 年把整个中国现代革命分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大部分，并比做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毛泽东上篇文章做得很好，他自己也满意。下篇文章开头较好，但整个来说并不成功，他自己也不满意。1956 年，中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怎么搞？没有经验。毛泽东进行了大胆的艰辛的探索，先是进行了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大试验”，后又进行了“文化大革命”的“大演习”。他提出的理论和思想，他进行的一次又一次的大胆试验，不论正确与否，成功与否，对我们当前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有直接的借鉴意义。近几年来国内国际事态的发展更显得研究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性、紧迫性。

科学研究是探索性的工作。唯有新的探索才有兴味。晚年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确有许多值得我们去思索的问题：

为什么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上篇文章做得很好，而下篇文章没有做好呢？为什么像毛泽东这样的领袖人物在晚年错误愈来愈严重，陷入了悲剧呢？

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很大成绩，是成功的。毛泽东并不满足，认为基本上是抄苏联的，缺乏创造性。他要探索自己的道路，搞得更好些。这完全正确。可是，就是在此之后却发生了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严重错误，反而没有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搞得好，这是为什么？有什么经验教训？

1957 年，毛泽东总结了国际国内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可在实践上，反而不如以前处理得好。以前虽然也有扩大化的错误，但远没有 1957 年反右斗争扩大化那样严重，把大量的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当作敌我矛盾，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这是为什么？在后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在“文化大革命”中，文件上也写着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而实践上依然是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乃至敌我颠倒，这又是为什么？

1958 年，毛泽东在许多会议上的讲话中发表了不少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尊重群众的言论，有些思想发前人之未发。可是在实践上却陷入了主观主义、唯心论、形而上学，如何解释这个矛盾？他自认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从群众中来的，集中了群众的经验，是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的，可实际上却脱离了群众，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这种矛盾又如何解释？

人民公社化运动明显地违背了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也承认人民公社生产关系前进的

远了一点。可是在 1959 年庐山会议上，他却“不怕批评者用马克思的唯物史法宝来打他”。他为什么不怕？他是如何理解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一原理的？

在 1959 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并错误地指责彭德怀等人犯了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的提法对不对？究竟谁犯了经验主义？

1963 年 5 月，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的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是“左”的文件，可毛泽东为这文件写的前言《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则是正确的，如何解释这一矛盾？在此前后，毛泽东提出要不厌其烦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共中央发出学习毛泽东四篇哲学论文的指示。同时，全党从中央到地方，有几百万干部到农村、工厂搞“四清”，与工人农民“三同”，搞调查研究，照理讲对形势的认识应当比较符合实际，可事实上，却越来越脱离实际，最后竟得出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错误结论，这是为什么？

毛泽东头脑中“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错误概念是怎样形成的？是哪些国际国内、主观客观因素促成了这一概念的形成？

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除了领导上的主观错误和反革命集团的利用外，有没有社会原因？如何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如何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否定“文化大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一面提倡学习马列（而且也确实组织干部群众读马列的书），但另一方面，在实际上又严重背离了马列？为什么一面提倡学习哲学，批唯心论，批形而上学，而另一面在事实上又唯心论泛滥，形而上学盛行？这中间有什么教训值得我们记取？

如此等等。

这些问题一直在我的脑中翻腾着，弄清这些问题是我所追求的。弄清这些问题，对于经历过这一段历史的中老年人和广大干部来讲，是极为有益的，可以从中吸取深刻的经验教训。

促使我写本书的又一动机是想帮助青年朋友了解毛泽东的晚年。现在二三十岁的青年，对毛泽东知之甚少，即使知道一点，多半也是感性的、片面的。有一些人，受“非毛化”思潮的影响，对毛泽东产生了极其片面的、错误的看法，持全盘否定态度。近几年，也有少数青年，由于某些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对毛泽东晚年反官僚主义、反特权、主张搞“大民主”等思想发生兴趣。有的甚至以此为自己的错误行动作辩护。因此，帮助青年朋友全面地、正确地认识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是一件很有现实意义的事。

国外学者对毛泽东晚年思想的研究一直比较注意，写出了一些有份量的著作，如英国的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著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在国内，学术界对晚年毛泽东的研究则刚刚开始。1988 年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毛泽东晚期思想研究”课题组召开了第一次“毛泽东晚期思想”学术讨论。有的刊物也发表了一些研究文章。近几年相继出版了《毛泽东的读书生活》、《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毛泽东的艰辛开拓》、《晚年毛泽东》、《走向神坛的毛泽东》、《红墙内外》、《毛泽东轶事》等论文集、回忆文

集和纪实文学。但总的看来，晚年毛泽东的研究，虽然极其重要、极有意义，但仍很薄弱，亟待加强。笔者愿为此效一点绵力。

## 二、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阶段的划分

研究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毛泽东的晚年从何开始？

一个人的一生大致可分为少年、青年、中年、老年等不同阶段。一个思想家哲学家的思想发展过程可以根据发展过程中呈现的特点区分为不同时期。研究者们又习惯于把青年阶段的思想称为早期思想，把老年阶段的思想称为晚期思想或晚年思想。但早期与晚期的划分又非仅仅以年岁为标界。

毛泽东的晚年或晚期从何开始？由于论者标准不同，开始期也就不同。

大多数论者主张以毛泽东集中思考的主题为划分晚期的标界，具体说，以毛泽东集中思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为标界。按照这种标界，毛泽东晚期的上限从1956年开始，以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问世为标志。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还对“毛泽东晚期思想”的含义作了规定：“毛泽东晚期思想是毛泽东晚年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提出的并付诸实践的思想和理论，主要是关于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理论。这些思想和理论已经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实践证明，这个体系基本上是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的，但其中也包含着某些正确的思想。”这种规定是否全面、准确，在此姑且不论。这里想指出的是毛泽东晚期思想从1956年开始与这种“规定”有矛盾。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我以为他的思想过程大致可分四个时期：一是早期，即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以前的思想。二是形成时期，即从1920年12月基本上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起至1937年抗日战争前夜。三是成熟与展开时期，从抗日战争开始至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问世。这中间有两个高峰：延安时期以《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为主要内容，建国以后以《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主要内容。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最为光彩的时期。四是晚期，从1957年反右运动至逝世，这是他理论与实践从高峰走向低谷、错误越来越严重的时期。

以正确为主还是以错误为主作为区分晚期标界的观点是不可取的。但毛泽东晚期思想之所以构成他一生中的一个特定阶段是同他晚年失误越来越严重这一点相联的。说到毛泽东晚期思想，一定会使人联想到他晚年的失误。在“毛泽东晚期思想”学术讨论会上与会者对“毛泽东晚期思想”内涵的规定也说明了这一点。对《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评价学术界虽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大体上是一致的：这两篇著作基本上是好的，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正是基于这种理由，我认为把它们归到晚期欠妥，而且也与论者所规定的“毛泽东晚期思想”的内涵相矛盾。

我认为，毛泽东的晚年或晚期始于1957年反右运动，这是他从高峰转向

走下坡路的开始。但研究毛泽东的晚期理论与实践，又不能从反右运动开始，而必须从 1956 年初开始。理由是，毛泽东 1957 年反右运动开始后的主要错误（如阶级斗争扩大化、经济建设中的急于求成等）与 1956 有联系。

关于毛泽东晚期思想的阶段划分，“毛泽东晚期思想”学术讨论会上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可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1956 年到 1962 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这段时期的特点是，毛泽东由正确转向错误，提出了一套极左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第二阶段是 1962 年到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这期间，毛泽东的“左”倾冒进思想遭到挫折，党内外的不同意见有所发展，加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分歧激化，毛泽东认为这些都是修正主义的表现。因而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试图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反修防修”。第三阶段是从 1966~1976 年，毛泽东对形势估计越来越严重，认为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办法已不能解决问题，必须发动自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从而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另一种意见认为，上述的第一阶段应分为两个阶段，1956 年~1957 年，以“十大关系”、“两类矛盾”、“双百方针”等为标志，主要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1958 年~1962 年，则是以“三面红旗”为标志，提出一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也有同志不赞成把 1957 年反右派斗争以前的一段划入晚期思想。

笔者认为，从 1956 年开始到 1976 年毛泽东逝世的二十多年，大致可分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6 年~1957 年，这是毛泽东一生中由高峰走向低谷的转折年代。毛泽东为寻找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可贵的探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结合国际国内的经验教训，提出一些十分可贵的思想，将自己建国以后的思想推向一个高峰。但受到国际事件的影响，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估计，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开始由高峰往下滑，而未能继续上升。

第二阶段，1958 年~1960 年，这是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大试验”阶段。这一阶段开始时，他的急于求成思想和平均主义、空想思想急剧膨胀并付之实践，致使高指标、共产风、浮夸风刮遍全国。严重“左”倾错误是他搞起来的，起来后，又是他首先觉察的。他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前提下花了很大的气力来纠“左”。但在 1959 年庐山会议上，当彭德怀等认真起来纠正“左”的错误时，却又遭到他的严厉批判，致使高指标、共产风再起，直至 1960 年底，大跃进的试验不得不中止，进入调整时期。这一阶段，毛泽东的“左”的错误是严重的，但还能自己纠正，在纠“左”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好的思想。

第三阶段，1961 年~1965 年，是调整阶段。经过三年挫折，毛泽东头脑变得冷静起来，提出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由于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纠正“左”的错误，严重困难的局势比较快地得到扭转。在 1962 年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对我国社会的阶级斗争形势和党内的政治状况作出了错误估计。他将自己的主要注意力转到“反修防修”上去，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日趋严重。这一时期，毛泽东注意从哲学上总结经验教训，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教育和对现行哲学体系的改造。

第四阶段，1966 年~1976 年，即十年“文化大革命”阶段。这一阶段毛泽东晚年“左”倾错误发展到了极端，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把自己领导建立起来的党组织和国家机器打碎、重建。他虽然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

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反革命集团也有一定揭露和批评，虽然也纠正过一些极左的错误，但却始终维护“文化大革命”。他已不可能自己起来纠正自己的错误，也无力结束“文化大革命”，陷入了悲剧。

我认为，这样四个阶段，比较符合 1956 年以后毛泽东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实际过程，也与这一时期我国社会发展呈现的阶段大体相一致。

### 三、毛泽东晚年思想的复杂性

毛泽东晚年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复杂性。这种复杂性表现在许多方面。

第一，正确与错误交织并存。一个正确的认识需要经过实践与认识的反复多次才能完成，中间错误和挫折是难免的。从世界范围来看，社会主义还在实践中，试验中，从中国来看，历史更短，经验更少。毛泽东在寻找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过程，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一次又一次的试验，提出许多理论、观点、意见和设想。有的基本正确，但不够完善；有的基本错误，但也包含有片面真理；有的原来基本正确，但发展过程中，过了头，走向反面，变成谬误。1956 年～1957 年，毛泽东批判斯大林的无矛盾论，强调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这是应当肯定的。但毛泽东过分夸大了矛盾，过分夸大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不适应，导致不断改变生产关系的“左”的错误。1958 年，毛泽东提出将“工、农、商、学、兵”组织成一个大公社的设想带有空想的性质，应予以否定，但其中包含的在农村发展工业、将工业与农业结合的设想是合理的。当今我国农村乡镇工业即滥觞于此。毛泽东在 1956 年告诫全党要警惕形成“贵族阶层”，这是非常深刻的。在以后他注意反对官僚主义、反对特权这也是很好的。但他没有注意从制度上解决问题，而且过分夸大了党内的阴暗面，到了 1964 年底认为党内形成了一个与工人农民相对立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这样一来一个本来很可贵的思想逐渐走向了反面。他在 1957 年提出的“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的论断是不符合当时的实际的。但他提出的“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的论点是正确的。他对“修正主义”有严重误解。但他提出“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有战略思想，不失为一种天才的预见。这种复杂性，要求我们对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不要简单化，既不要作简单的肯定，也不要作简单的否定，而应做具体的分析。再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并非一开始错误思想就占主导地位。

第二，理论与实践的复杂关系。一种是理论正确，实践也正确。从总体上来看，这种情况，在毛泽东的晚年不多，但从局部来看，还是有的。如，1958 年在纠正共产风时，毛泽东提出要保留和发展商品生产、利用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不能搞一平二调等。又如，1961 年初，他提出搞一个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另一种是理论上基本正确，实践上没有能贯彻，或贯彻得不好，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如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关于“双百”方针。还有一种情况是，理论上错误，实践上也错误，不过，在毛泽东本人看来，这并不错误，而是正确，结果是形成了错误理论与错误实践的恶性循环。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是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与阶级斗争的实践。毛泽东的阶级

斗争扩大化的实践，引发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又反过来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实践，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是“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因此，对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不可简单化，需要具体分析。既不能因为理论上、文件上有某些正确的话，就肯定其实践也正确，也不能因为实践上犯错误，反过来就简单否定其理论，认为其基本理论也错误。

第三，个人因素与集体因素的复杂性。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不论正确与否，都不纯粹是他个人的，而是代表了党与集体。不能认为，正确的是属于集体领导的，错误的是他个人的。也不能认为，错误只是毛泽东一个人，其他领导人则是正确的。事实上，1957年的反右斗争，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的庐山会议错误批判彭德怀，196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毛泽东虽负主要责任，其他的领导人也有责任。毛泽东是中共中央主席，早在1943年3月22日，中央书记处决议，主席有最后否决权。毛泽东在晚年个人专断日趋严重，许多重大决策未经充分讨论就由他个人作出，破坏了集体领导原则。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有许多错误确实是属于他个人的，或主要是他个人的。不过这种个人因素和集体因素的关系仍是十分复杂的。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1966年5月16日通知，是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毛泽东作了重大修改。这一文件表达了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主要责任在他。但这一文件形式上是由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得到了中央的赞同，中央也要负责任。至于“文化大革命”如何搞，中共中央未作讨论。从在京中央领导人对聂元梓等人1966年5月25日的大字报态度看，他们是不赞成“四大”方式的。6月1日，毛泽东在杭州未同其他中央常委商量就个人决定广播聂等人的大字报，用“四大”搞“文化大革命”，这责任属于他个人。可后来，这种方式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又得到了确认。总之，在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他个人的因素与集体的因素是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的，既不能因他是第一把手，又有个人专断的缺点，就把所有责任都归于他，又不能因为许多理论、决策在形式上是集体作出的，或集体确认的而为毛泽东开脱主要责任。这里要指出的是，本书在涉及毛泽东的缺点时，有时还涉及到其他同志，这种涉及只是一种历史的再现，是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历史上发生的一些事，决无要故意贬损那一位同志。

第四，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的关系，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是在国内与国际条件相互作用下形成的。国内因素是主要的，这是不待而言的。但也不能忽略国际因素。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提出中国在十五年内主要工业品的产量上赶上英国的设想，明显受到赫鲁晓夫提出的苏联要在十五年内主要产品产量上赶上美国目标的影响。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错误更明显地与国际形势变动有关。

第五，现实因素与历史因素复杂关系。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主要来源于中国社会的现实，但也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有密切的关联。人民公社化运动既是中国现实社会中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的产物，又受到中国历史上农民的平均主义、乌托邦的大同思想的影响。毛泽东一方面激烈地批孔，批传统思想中落后、保守的东西，另一方面他本人又深受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如果说毛泽东对中国历史、哲学、文学的渊博知识和精湛造诣曾是他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极重要的条件的話，那么到了晚年，毛泽东对中国历史、哲学、

文学的酷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视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成了他身上的一个负担。

总之，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矛盾体系，因此，在研究方法上切忌简单化、片面性，必须注意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 四、本书的写作态度与方式

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是一个具有很强政治性的课题。笔者所持的态度是尊重历史、实事求是。这一条说来容易，做起来颇难。

首先是如何对待毛泽东晚年的失误。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理论工作者要批评自己崇拜过的领袖在晚年所犯的错误，这在感情上是一件痛苦的事，在政治上也要冒点风险。但作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严肃的科学理论工作者，又不能像剥削阶级的史学家那样搞“尊者讳”，掩饰毛泽东晚年的失误。现在出版的一些著作，对 1956 年以后的毛泽东的理论，大多只讲其正确的一面、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面，而较少讲（有的只是轻轻地一笔带过）他失误的一面、偏离马克思主义的一面。这样的著作读后使人感到，你讲的毛泽东正确的理论，确实没有错，但与历史实际一对照，就发现了问题，你讲了毛泽东在理论上有那么多发展、贡献，可在实践中却犯了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错误。这种回避的做法，不能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不是一种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列宁说：“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就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

毛泽东也常说：错误是难免的，错误有两重性，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因此，我认为，毛泽东晚年正确的理论、思想固然是宝贵的财富，他的错误理论、思想同样是花了巨大代价换来的宝贵遗产。

与回避错误相反的另一倾向是：有极少数人，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以善意的态度批评毛泽东晚年的失误，而是站在敌视毛泽东的立场上，全盘否定毛泽东。他们往往采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尽量夸大”的方法。他们批评毛泽东的错误，并不是要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以避免重犯类似错误，而是为了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种态度当然是我们所坚决反对的。

对于毛泽东的错误，我们是要批评的。但首先有一个立场问题。我们只能站在党的立场、人民的立场去批评。其次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无论是对成绩还是对错误，一是一，二是二，既不夸大，也不缩小。如前所说毛泽东的晚年思想是同他的错误联系在一起的，但决不等于说，研究毛泽东的晚年思想只是研究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对于毛泽东晚年思想中的正确的、合理的成分必须加以充分注意，否则会犯在倒洗澡水时连婴儿一起被倒掉的错误。再次，不仅要指出错误之所在，更要分析产生错误的原因，从中引出必要的教训。

---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3页。

在写作方式上，本书采用历史与逻辑一致的原则，全书分探索初始时期（1956～1957）、“大试验”时期（1958～1960）、“调整”时期（1961～1965）和“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四章。每一章又按历史的顺序分若干问题。这样做的一个好处是能比较清晰地再现毛泽东晚年思想理论发展的轨迹，揭示毛泽东晚年思想理论发展的动态过程。但这样做，弄不好也可能发生前后重复，因为他有些理论前后变化不是很大。凡遇到这种情况，一般在前面讲得较为充分，后面只是略为提及。本书对历史的叙述，既有宏观的勾画，又有细节的描写，以期引起读者的兴味。本书对于一些重大的问题，虽然有的为一部分人所熟悉，但为了保持历史发展过程的完整性，还是做了必要的论述。

毛泽东的理论有很强的实践性。本书写作中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既讲毛泽东的理论、思想、观点，又要联系他的实践，分析他的理论与实践的复杂关系。这样做不仅可以使人完整地了解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更主要的可以从中总结出有益的经验教训，作为当前的借鉴。

本书采用述与评相结合以述为主的方法。为了让读者尤其是一部分青年读者比较客观地了解毛泽东的思想，本书主要的篇幅用于客观的叙述，在叙述过程中略作一些必要的分析、评论。至于叙述是否真的客观、评论是否恰当，对毛泽东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思想活动和心理状态的分析是否符合实际，有待于日后实践的检验和读者的明鉴。

一个政治家、思想家的理论与实践是一定时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产物，这是没有问题的。否认这一点就会陷入历史唯心论。但也应看到，一个人的性格、气质会对他的思想与行为有一定的影响。有时甚至有重大影响。否认这一点，就会把历史唯物论的运用简单化，就不能显示出一个政治家思想家的个人特色。毛泽东在1915年11月9日给黎锦熙的信中说：自己“性不好束缚”。“性不好束缚”确是毛泽东一大个性特点。与毛泽东不同，周恩来在1922年3月致谌小岑、李毅韬的信中说：自己“天性富于调和性”。

“天性富于调和性”确是周恩来的一大个性特点。毛泽东、周恩来两人在青年时代的这种个性的不同，对他们两人后来一生的思想和行动都有影响。本书在写作过程中试图对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做一点个性性格与气质的分析。在毛泽东的个性特点中除了“性不好束缚”及由此引申为“奋斗”、“挑战”、“自信”等之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性格是：厌恶特权，向往平等。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民主革命时期，又长期辗转在农村，进城后一直保持着农民的生活习惯。他生活俭朴，粗茶淡饭，厌恶等级、特权，希望尽快废除等级制度，实现平等。毛泽东这方面的性格对他晚年的思想和行动有重大影响。

本书的大部分资料是笔者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起用心搜集所得。笔者也充分引用了近几年来在刊物上、书籍中披露的材料及研究成果。关于“双百”方针的历史过程的叙述，不过是对几篇文章的综合。对于一些重要事件的历史叙述主要参照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

---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0页。

周恩来：《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致谌小岑、李毅韬》，《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1页。

至于其他一些重要的参考书和文章则在书中注释里提及。

本书动笔于 1988 年秋，草稿成于第二年夏。1989 年春夏间我国的政治风波和同年秋冬东欧诸国的剧变使我对毛泽东晚年的思想有了新的认识。1990 年春，对草稿作了初步修改。7 月，打印了 10 多份，分送一些同志审阅。1991 年苏联解体，更使我思想受到不小的震动，又有一些新的看法。1991 年寒假，再次对稿子作修订，成了现在的样子。

毛泽东晚年思想所涉及的面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广泛。在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美学、新闻、科学、军事、外交等诸多方面，毛泽东或发表了精辟独到的见解，或提出了令人深思、富有启发的问题。笔者才疏学浅，主要从哲学上对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作一初步探讨。对于本书存在的缺点错误，敬请同行与读者批评校正。

## 第一章

### 社会主义探索初始时期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

1956 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进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1956～1957 年是一个转变的年代，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工作由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主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主。

历史上的重大转变，对站在历史前列、指导历史前进的政党和个人来讲是一种考验。因为是转变，所以社会的发展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新任务。在重大的历史转变关头有两种可能：一是先进的政党和杰出的个人，顺应新的情况，根据新的时代的要求，及时地提出新的历史任务和完成新任务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成功地实现转变；一是未能正确认识新的情况、新的问题，未能提出适合新情况的新任务及完成新任务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跌了跤。

1956 年，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及时地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课题，为实现转变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由于国际、国内出现了没有料到的新情况。毛泽东开始偏离了原来的正确思想，陷入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在此以后，他的“左”的思想日趋严重，最后导致发生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悲剧。所以 1956～1957 年，既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过程中的转变时刻，也是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由辉煌胜利的高峰向晚年的悲剧的转折年代。

#### 第一节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初探索

##### 一、以苏联为鉴，走自己的路

中国原是一个生产力极不发达，经济、政治、文化十分落后，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新民主主义革命后，中国能不能搞社会主义，这在国内国外是有不同认识的。有人认为，中国生产力落后，还不具备搞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毛泽东不同意这种意见。他在 1949 年 3 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各种经济状况，提出党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了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由之路，批评了在这个问题上“左”、右错误倾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所建立的新社会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性的社会，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便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但由于当时面临着解决土地问题、镇压反革命等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也由于出于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策略考虑，在那时并没有宣布开始搞社会主义，相反，公开则说，搞社会主义还要 10～15 年的时间。

1952 年，在取得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一系列胜利和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后，毛泽东开始酝酿和制定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他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

改造”。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依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通过互助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合作社、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合作社等形式，逐步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通过加工定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方式和步骤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和平改造，以赎买的形式解决民族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从 1953 年开始，一方面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方面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全面改造，创造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的新经验。

毛泽东预计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实现总路线。实践的结果，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到 1956 年就基本完成了，只用了三年多时间。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虽然存在着“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的缺点与不足，但总的看来是成功的。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是正确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解决了一个无产阶级在总人口占少数，而农民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巨任务。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是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毛泽东对这一历史性的胜利感到喜悦。他曾说过：1949 年那样的胜利，并没有使我感到高兴，到了 1955 年，当我看到那么多农民参加了农业合作社，接着是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开始高兴了。

毛泽东是一个永不满足的人，不断革命是他的基本信条之一。在 1955 年 11～12 月，他感到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即将在握，于是便将自己的注意力由社会主义改造转向社会主义建设，研究经济问题。

毛泽东是教条主义的敌人。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同党内照抄照搬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进行长期的斗争，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革命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他亦希望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搞得比苏联快一些，好一些。

从客观上讲，这时也有了这种可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期，我们党没有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因此，在这方面只能照抄苏联的办法。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缺乏创造性。经过几年的实践，毛泽东和我们党开始取得一点经验，同时经济建设中存在的矛盾也有所暴露，对苏联经验中的缺点与不足开始有所认识。正在这时，苏共于 1956 年 2 月召开了“二十大”，公开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启开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解放思想的闸门。苏共“二十大”无疑有助于中国共产党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胆地独立地寻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为了替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作准备，刘少奇从 1955 年底至 1956 年初，分别听取了中央一些工业部门的汇报，并提出了许多意见。薄一波在向毛泽东汇报时谈到这一情况。毛泽东对此很感兴趣，说：这很好啊！你给我组织一下，我也很想听一听。于是从 1956 年 2 月开始，他和中央政治局及国务院的一些领导同志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听取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边听、边议、边总结，对我国经济建设进行了一次系统的调查与研究。这时毛泽东的身体并不好，“可是几乎每天都是起了床就听汇报，听了汇报就上床休息，

只有吃饭算是一点闲暇时间。他自己把这叫做‘床上地下，地下床上’。”在汇报的基础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又进行了几次讨论。最后由毛泽东集中概括了集体智慧，形成《论十大关系》。对于十大关系的思想形成过程，毛泽东在1958年2月18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说过：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三十四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步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的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

《论十大关系》，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国的经验，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

毛泽东对《论十大关系》是满意的。他曾多次谈到这一著作。1958年3月10日，他在成都会议上讲：1956年4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他在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谈话中又说：全国解放初期，我们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所以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只能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1955年基本上完成三个改造，在年底和1956年春，找了三十几个部的人谈话，结果提出十大关系，提出了多快好省。1960年6月13日，他在《十年总结》的一开头就写道，“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他认为，《论十大关系》“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

说《论十大关系》“开始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的估价，显然是过高了。这反映了那时毛泽东对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艰巨性、复杂性估计不足。事实上，在那时，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认识还是很初步的，还有一个很大的必然王国未被认识，还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从现在的眼光看，《论十大关系》无论在经济体制方面还是在政治体制方面，都还没有完全冲破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形成的模式（“原则和苏联相同”）。尽管《论十大关系》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它确实是毛泽东建国以后至逝世时的最好的论著，也是列宁逝世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最优秀的文献之一。1975年7月，邓小平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说：《论十大关系》“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sup>①</sup>邓小平的这一评价是正确的。《论十大关系》至今仍有理论指导意义。

## 二、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的诸矛盾

毛泽东在错综复杂的中国社会矛盾中抽取出十个问题，也就是十大关系，他们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关系。这十大关系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十大矛盾。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曾说过：在科学研究中，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另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海森堡也说：提出正

---

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

确的问题，往往等于解决了问题的大半。其实，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同样也是如此。毛泽东从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中抽象出这十个问题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正反两方面的实践证明，能否正确处理上述矛盾，是直接关系到社会生产力能否发展、经济能否繁荣、人民生活能否改善、社会主义优越性能否发挥、人民政权能否巩固的大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提出十大关系的意义就愈发显示了出来。

毛泽东提出正确认识和处理这十大矛盾的基本思想是：“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毛泽东提出的十大关系，前五种关系大体上属于经济问题，后五种关系大体上属于政治问题。1958年3月10日，他在成都会议上说，在十大关系中，前五条是主要的。在这里我们着重介绍他对前五种关系的论述，至于后五种关系我们将在后面的有关部分分别给予介绍。

在国民经济的复杂关系中，毛泽东首先注意的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问题。他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要优先发展，这是已经确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忽视了农业和轻工业，结果市场上货物不够，生活品不够，货币不稳定。有鉴于此，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他认为，适当增加轻工业、农业的投资，注意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一可以满足人民的生活，二可以为更多更快地发展重工业提供积累。所以他说：如果你是真想发展重工业，那你就要注意农业和轻工业，如果你假想发展重工业，那就打击农业和轻工业。他的这种分析是很辩证的，强调重点，并不是可以离开非重点孤立去发展重点，并不是可以忽视非重点，而是要在注重重点的前提下，适当解决非重点，这样非重点方面发展了，反过来可以促进重点方面的发展。这是重点与非重点的相反相成，对立统一。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上述思想，把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提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的高度来认识。在以后，他进一步提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实行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提出按农、轻、重的秩序安排国民经济。

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轻工业，结果市场十分紧张，人民买不到生活的必需品。这不仅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而且引起了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不满，成了一个极严重的政治问题。

关于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工业的布局极不平衡，大约轻工业和重工业的70%在沿海，只有30%在内地。建国初期，为了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况，为了有利于备战，必须大力发展内地工业，将新工业的大部分摆在内地。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也由此产生忽视发展沿海工业的片面性。对此，毛泽东指出：最近几年，对沿海工业估计不足，对它的发展不那么十分注重了。这要改变，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

地工业的迅速发展。所以，这也是一个对于发展内地工业是真想还是假想的问题。如果是真想，不是假想，就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

时至今日，我国各地经济发展仍极不平衡。如何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不够发达地区的关系，是有关国民经济的全局问题，也是有关国家备战、国内安定、民族团结的政治问题。六七十年代，由于在国际形势的估计上出了偏差，大搞三线建设，把许多新建的工厂摆在山沟沟里，造成了财力、物力、人力的浪费，造成了数千亿资金的浪费，同时又忽视了沿海工业的建设。自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注重了沿海工业和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总之，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只顾一头，放弃另一头。沿海要加快发展，沿海可以带动整个国家的发展。沿海要支援内地，内地也要支援沿海，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而国家则要更多地支援内地的发展。

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国防不可不有，因为还有敌人，我们还受敌人包围。我们还没有原子弹，在今天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但国防建设不能离开经济建设孤立地进行，国防建设是以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为基础。因此，加强国防建设的可靠办法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有更大的进步。他指出：你是真要想，十分想要原子弹，那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

忽视国防建设，忽视国防现代化，国家的安全与独立就没有保证，世界的和平也会受到威胁。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和党中央始终注重国防工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我们独立自主地搞起了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但另一方面，国防建设又是以经济建设为基础，没有现代化的工业和科学技术，就没有现代化的国防。国防建设是很费钱的，若费用过大，又势必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正确处理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首先要对国际形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看不到帝国主义想消灭我们，看不到帝国主义仍是现代战争的根源，不重视国防现代化建设，不保证必需的国防经费，是十分危险的。但若夸大了战争的可能性，以为战争就在眼前，国防开支过大，也是有害的。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正确分析了国际形势，决定裁减军队百万，适当降低国防费用，注重军工与民用结合，将一部分军工企业转向民品生产，将先进的军工技术运用于民用技术的开发，取得了显著的成效。1991年，军工企业产品中民品产值已达其总产值的60%以上。

关于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问题。毛泽东认为，在处理这三者关系时，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不能只顾一头。随着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工人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要逐步有所改进。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需要逐步调整。他特别讲了国家、合作社与农民的关系，注意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他批评苏联的义务交售制等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极大地损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在处理国家与生产单位关系上，他主张要给工厂以独立性。他说：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他还从哲学上对统一性与独立性作了说明。“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比如我们现在

开会统一性，散会以后有人散步，有人读书，有人吃饭，这就是独立性。如果我们不给每个人散会后的独立性，一直把会无休止地开下去，不是所有人都要死光吗？个人是这样，工厂和其他生产单位也是这样。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他在 1956 年 4 月 28 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企业的独立自主”问题。他说，列宁所说独立自主，应搞到如何程度，请大家注意研究。他用一种“不是很准确的语言”讲，叫做要有点“独立王国”，如果因为反高岗的“独立王国”而把一切独立自主都反掉了，没有一点“独立王国”，那个事情也很难办。他承认：中央、省市和工厂的权益究竟应当各有多大才适当，我们经验不多，还要研究。毛泽东在 1956 年就提出企业相对独立性的问题是很宝贵的。企业是整个国民经济有机体细胞，不给企业以相对独立性，把一切束缚的死死的，企业就失去了活力。企业失去了活力，整个国民经济也就失去了活力。如何把统一性和独立性统一起来，这需要探索。

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由于受苏联的影响，也由于为了更好地集中使用有限的财力进行基本建设，我国建立了中央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为了克服过分集中的弊端，毛泽东指出：解决这个矛盾，目前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他认为：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做到既统一、又独立，既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他在 4 月 28 日的会上说：中央与地方分权的问题也要研究。适当集中是必要的，但过分集中就不对，不利于调动各方面的力量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从原则上讲是容易的：既统一，又独立。但如何才能做到既统一，又独立，却是不容易的。从我国实践看，在中央放权，扩大地方自主权时往往出现中央放权过多，失去控制，地方投资急剧膨胀，导致基建规模过大，于是不得不进入调整，不得不强调集中，收回某些权。如何建立起中央与地方之间既统一、又独立的经济体制是一个仍未能很好解决的老问题。

毛泽东是辩证法的大师。他以矛盾的观点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问题。他说，世界是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十大关系就是十大矛盾。他在分析矛盾时十分注意方法论，他对十大关系的分析充满了唯物辩证法。

他在分析矛盾时既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总结自己的经验，又善于吸取苏联的经验教训，全文贯串了从实际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科学精神。

他在分析矛盾时既注重矛盾的主要方面，又注意矛盾的非主要方面，注意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相辅相成，将重点论和两点论结合起来，丰富了《矛盾论》中关于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理论。

他提出用“兼顾”、“结合”的方法来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某些矛盾，使矛盾着的对立面达到和谐统一，有助于防止片面性。

他分析矛盾和处理矛盾的根本方针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由于历史条件局限，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经济关系的分析还是初步的，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但从总的方向看无疑是正确的，它为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

### 三、“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

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在世界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今天有极个别的人企图否定它的正确性、必要性，是完全错误的。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上依然存在着少数地下工厂、地下商店。1956年11月30日，全国工商联主席黄炎培给毛泽东写信汇报情况说：自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大部分工商业者的表现是好的。少数人消极，白天社会主义，夜里资本主义，还出现地下工厂，地下商场等。据估计，上海有一百多个地下工厂，比较大的地下工厂有五十多人。12月7日，毛泽东约见民建、工商联负责人黄炎培、陈叔通等谈话。他说：上海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合作工厂做衣服要三个月，袖子一长一短，扣子没有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他说：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二十年、一百年也不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他认为，私人开厂，可以满足社会需要，定息也有了出路。当然要看条件，有原料，有销路。他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早了。他说：只搞二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足。类似这样的话，他在1957年3月8日同文艺界谈话中又说到：苏联新经济政策，三年两年就结束了，何必这样匆忙呢？我们已搞了三年，再搞七年，不行再延长它二三年。苏联是太急了！直到现在还影响他们的物品，消费资料不足，市场也不热闹。

在毛泽东12月7日谈话后，刘少奇在同月29日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2次会议上也说：有一些资本家，他们每年分的定息很多，有分到百把万元、几百万元的，一家子一年用不了这么多钱。如果他們要盖工厂，是否准许他盖呢？可以的。这个问题，过去没有研究过。最近，毛主席在工商联会议上说，要使地下工厂变成地上工厂，承认它，加以管理，只要它不违法。刘少奇进一步解释说：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补充嘛！又说：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作比较。看你的花生好不好，看你的猪肉好不好。最后他说：关于这个问题，现在要通过什么决议，颁布什么法律，还为时过早，需要积累经验，还要看趋势。

1957年4月6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时的讲话中又说：大煤矿国家开办，小的，合作社、私人都是可以开。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工业、农业、手工业都可以采用这个办法。我看除铁路不好办外，其他的都可以采取这个办法。有些私人办的小学，也可以让他办下去。大概工农商学兵除了兵以外，每一行都可以来一点自由，搞一点私营的。文化也可以搞一点，这样才好百

家争鸣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外汇不够，如有些人向香港或外国贷款办工厂等，付给一点利息，可以挖掘一些潜力。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1956年下半年和1957年上半年，私营工商业、个体手工业和小商小贩有所发展。从事私营企业和个体手工业的大约有70万人，从事小商小贩的大约有60~70万人。

毛泽东关于“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很新颖的。这说明，他当时采取的是求实的态度，并没有想一下子消灭资本主义。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占优势的条件下适当发展一点资本主义，不仅无害，反而有益，可以起补充作用。当然，他把允许私人办工厂，发展私人经济看作只是一种新经济政策，他还没有能像我们今天这样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与经济结构的高度来认识这一问题。正因为这样，他的上述见解并不稳定，不过是迸发出的一时的思想闪光，在他以后的言论中再也见不到了。1958年4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继续加强对残存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指出：对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原则上不允许继续存在；对个体手工业户，加以改造，吸收他们参加合作社；对小商小贩，应把他们组织起来。在此以后则不仅不允许私营企业存在，而且在农村，急于割私有制的尾巴，企图尽早取消农民的自留地，取消自由市场。

我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证明：在生产力还没有高度发达、社会主义经济还不能完全满足社会全部需要的时候，个体经济和私有经济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如果硬要消灭它，其结果：一是物资不足，人民需要不能满足，反过来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二是势必出现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地下建筑队等等地下经济。所以在现今的生产力条件下，在社会主义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应当允许一定数量的个体经济、私有经济以及外资企业的存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城乡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有较大的发展。它们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但由于放松了对它们的监督、引导、管理和限制，其消极作用也不可忽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同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有所不同，它们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在满足市场需要、解决劳动力就业、积累资金等方面有积极作用。但它们本身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私营经济是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个体经济会产生资本主义。因此国家应从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社会的、教育的等多方面对它们进行监督、引导、管理，限制它们的消极方面，决不能放任自流。至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度才算合适，这也是需要研究的。

#### 四、扩大民主，学习西方民主的某些形式

斯大林的重要错误之一是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斯大林的错误也表明，苏联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还不完善。毛泽东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认为，资产阶级民主，特别是初期，有那么一些办法，比我们现在的办法更进步一些。我们比那个时候不是更进步了，而是更退步的。1956年，我国基本上消灭了剥削制度，大规模地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有可能也有必要扩大

---

见《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93页。

见刘少奇的《要防止领导人员特殊化》（1956年11月10日），《党的文献》1988年第5期。

人民民主。鉴于苏联的教训和我国情况的变化，民主政治建设成为毛泽东和党中央在 1956 年经常考虑的问题之一。毛泽东在中共“八大”期间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代表团时说：我们社会主义必须想些办法来扩大民主，当然没有集中和统一是不行的。保持一致，人民意志统一，对我们有利，使我们在短期内实现工业化，能对付帝国主义。但是也有缺点，缺点在于使人不敢讲话，因此要使人有讲话的机会。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考虑这些问题。在此之前，周恩来在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应该是：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专政的权力虽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但这个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苏联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所以我们要时常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意义。”他又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那是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1956 年 11 月 10 日，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也说：“我们小孩子的时候曾经听说：华盛顿在革命之后，作了八年总统，又退为平民。这件事对我们很有影响。……这样的办法，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参考一下。也可以退为平民？资本主义国家中有些人当过部长，当过总理，结果又去当教员，当教授，当律师，当经理，当校长。（毛泽东插话：我们如果那样，就叫受处罚。）艾森豪威尔当过总司令之后，又当过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然后才去竞选总统。马歇尔当了国务卿之后，又去当红十字会的会长。当然我们不一定完全照那样办。但恐怕有些东西，资产阶级的有些制度也可以参考。”

在列宁逝世之后，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无形之中形成了共产党的领导人终身制。毛泽东想打破这种终身制。1956 年夏，他在北戴河会议上曾讲了国家主席和党的主席连任期数问题。他提出，国家主席连任不得超过两届，他不再作下届主席。党的主席将来在适当时候也可以实行这种任期制。毛泽东的这种意见显然是吸取了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任期制。他的意见得到与会者的赞同。他曾想从党和国家的领导位子上退下来，搞理论研究。中共“八大”前夕，9 月 13 日，他在谈中央领导机构的设置时说：“我是准备好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在“八大”期间，他对外国代表就说过：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你们看，这次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戏的则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八大”通过的党章中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名誉主席是为毛泽东不当党的主席后设的荣誉职位。

1957 年 4 月 30 日，毛泽东在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谈话时表示：到二届人大，一定要辞去国家主席，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他援引瑞士七人委员会总统轮流当的例子后说：我们几年轮一次总可以，逐步采取脱身政策。他嘱托黄炎培、陈叔通二老透露消息。以便有所准备，打通思想。不料黄、陈二老思想不通。第二天即“五一”节，他俩给刘少奇、周恩来写信，披沥直陈，希望毛主席再任一届国家主席。他们的主要理由是：国家并未根本巩固，台湾尚未解放，国际两大阵营尚在剧烈斗争，“在此期间，最高领导人还是不变动为好，诚然要强调集体领导，但短期过程中全国人民还

认识不清楚，集体领导中突出个人威信，仍是维系全国人民的重要一环”。刘、周阅后将信转给毛泽东。毛于五日对陈、黄的信写了批注。批注说：“国家的根本巩固，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国家已经推不动了。”“我仍存在，维系人心的个人威信不会因为不连任而有所减损。”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制定的宪法没有规定国家主席任届的次数。毛泽东提出：可以考虑修改宪法。主席、副主席连选时可以再任一届。但他坚持不再连任，理由是：“（一）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加上人民共和国主席任期已满八年，可不连选；（二）按宪法制定时算起，可连选一次，但不连选，留下四年，待将来如有卫国战争一类重大事件需要我出任时，再选一次，而从1958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员资格，在必要时，我仍可以做主题报告）。这样，比较做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现在杂事太多，极端妨碍研究问题。”他要求将陈、黄的信和他写的批注，印发给全体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党的全体八届全国代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全国人大所有代表及政协委员。

毛泽东不再连任下届国家主席的直接理由是为了摆脱杂事，专心研究一些问题，而更深一层的因素是考虑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他不再连任国家主席及关于国家主席、副主席可连任二届的建议，我以为很可能是参照了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不连任三届总统这一点的。毛泽东在1956年就作出不连任下届国家主席的决断是可贵的、明智的。1959年二届人大时，他提议由刘少奇任国家主席。（顺便指出，不少外国作家写的毛泽东传记认为，毛泽东在1959年辞去国家主席是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受挫而在党内的压力下不得不做的，这种看法完全是一种无根据的臆断和猜测。）但关于不做党的主席的设想，由于各种复杂的因素未能付之实践。因此，毛泽东在世时未能取消党和国家领导人职务终身制。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关于在民主政治建设时可以学习、参照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某些具体制度、形式和方法的意见是大胆的、新颖的。

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是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斗争中逐步形成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持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又对它不断地修正、补充，使之完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比起封建专制来是巨大的进步。资产阶级民主虽然标榜是全民的民主，其实它不过是资产阶级少数人的民主，而对广大无产者劳动人民则是专政。列宁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斗争时着重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的阶级实质和虚伪性，指出无产阶级民主制与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根本对立，强调无产阶级民主主要比资产阶级的民主高出千百倍。列宁这样说，有其理由。但由此也带来一定的片面性：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民主之间批判地继承的一面注意不够。

民主是有阶级性的，是具体的、历史的产物，世界上决没有超阶级的、抽象的、适用于一切时代的民主制度。无产阶级民主是同资产阶级民主根本对立的，但无产阶级民主又是从资产阶级那里学来的，由资产阶级民主发展来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可以而且必须继承、借鉴、利用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中某些具体的制度、形式和方法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坚持反对对资产阶级民主盲目崇拜，反对用资产阶级民主来代替无产阶级民主。我们也反对对资产阶级民主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承认学习、借鉴资产阶级民主的某些具体制度、形式和方法的可能性、必要性。

1956～1957年，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进展之一是：根据我国具体的历史

条件和我国革命的特点,毛泽东和党中央在 1956 年提出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毛泽东专门讲了党与非党的关系。他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他又讲过:我们搞两个万岁,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1956 年 5 月 3 日,周恩来在传达毛泽东的《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讲话时说: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缺点就是一党制,它使民主少了,集中多了,不容易听到不同意见。这本身就包含着它的阴暗面。一个党,就是一个鼻孔出气,呼吸就不舒适,会使思想僵化,社会停滞起来。毛泽东、周恩来的话看来很平常,但却很深刻。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有意识地继续保留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一大特色。它既不同苏联的一党制,也不同于西方的多党制,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这种制度,有利于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以便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如何不断修正、补充、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这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需要始终注意的一个重大问题。1956~1957 年,毛泽东和党中央在这一方面作出了可贵的探索。遗憾的是这种探索很快为反右派运动所中断。“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党又开始了新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

## 五、向外国学习、洋为中用

毛泽东把“中国和外国关系”作为十大关系的最后一个问题加以论述。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们越发感到他这样做的意义之重大。

他说:“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毛泽东这里说有些国家的领导人主要是指苏联领导人。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在对外关系上,较多地只注意同资本主义国家作斗争(这是完全必要的),而未能敢提出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未能在同资本主义侵略、渗透、颠覆作斗争的同时,学习资本主义国家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又由于大国沙文主义,苏联人常常瞧不起其他国家,因而不能向其他的国家、民族学习。这样,苏联在处理对外关系上陷入了片面性,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脱离了整个世界科学文化和经济的发展。毛泽东公开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确实是要有一点勇气的。

依据辩证法的两点论,毛泽东指出: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习,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习,但必须是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照抄,机械搬运。学习外国的东西,是为了研究和发展中国的东西。

建国以后,在向外国学习问题上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方面是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另一方面则对西方资本主

义国家的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针对这一情况，毛泽东指出：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应采取有分析有批判地学。要学他们的长处，不要学他们的短处、缺点，要将普遍真理的东西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对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朽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总之，世界在进步、发展，我们要注意批判地吸收外国的东西，特别注意吸收社会主义世界的东西和资本主义世界的进步的人民的東西。

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自然科学、技术、管理经验，这是没有多大争议的。但西方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等有没有值得我们可以借鉴、学习的，这在当时是有争论的。十月革命后，苏联对西方的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社会科学采取完全排斥的态度，只是把它们看成批判的对象。这种态度也影响到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毛泽东在 1956 年提出不仅要向苏联学习，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而且要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遗憾的是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

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不同，文学艺术与一般的哲学社会科学又不同，因此，在如何学习外国上也应具体对待。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对如何学习外国、特别是如何学习外国的艺术作了精辟的说明。

根据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毛泽东指出：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作曲、唱歌、舞蹈都应该是这样。他特别强调，世界各民族的艺术，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无论东方西方，各民族都要有自己的东西。艺术与自然科学不同。剖肚子，割阑尾，吃阿斯匹灵，并没有什么民族形式。艺术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他批评有些人不了解这一点，批评有的人否认自己民族的艺术，盲目崇拜西方，以为一切都是西方的好，搞“全盘西化”。他说：全盘西化，有人提倡过，但是行不通。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

他指出：艺术要有独创性，要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中国的艺术，既不能越搞越复古，也不能越搞越洋化，应当越搞越有自己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因此，我们学习外国的艺术，学习它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技术，其目的就是为了创造中国民族自己的具有独特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社会主义新艺术。他反复讲：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不要学了外国的，就对中国的没有信心，丧失民族的信心。要学习外国的东西，要做到中外结合，首先要做到中外精通。当然，要把中国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结合起来，是不容易的，要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一些不中不西的东西，非马非驴成了骡子那样的东西。毛泽东也反对保守主义。他说：作为中国人，不提倡中国的民族音乐是不行的。但是军乐队总不能用唢呐、胡琴，这等于我们穿军装，还是穿现在这种样式的，总不能把那种胸前背后写着“勇”字的褂子穿起。民族化也不能那样化。他批评清末西太后盲目排斥外国的东西。

清末的洋务官僚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企图维护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统治。在此以后，一些守旧派也不断重弹“中体西用”的老调。毛泽

东说：“‘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

不应该分中西”。这一解释，简洁明了，从新的角度批判了“中体西用”。基本理论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马克思主义产生在西方，是普遍真理，我们必须接受，但这个普遍真理又必须同各国的具体的实践相结合。西洋的一般音乐原理要学习，但也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样可产生很丰富的表现形式。

总之，“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1964年，他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八个字概括对待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的方针。

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是十分适时的，这表明他在当时确实是要打开国门的。但由于国际环境的局限，也由于后来思想上“左”的东西的滋长，向外国学习的口号不怎么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要把对外开放作为一个基本国策，并取得显著的成效。在对外开放过程中也有少数人借机鼓吹全盘西化，盲目崇拜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丑化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丧失了民族自信心。这是应当加以认真纠正的。

---

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毛泽东著作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52页。

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毛泽东著作选集》，下册，第752、753页。

还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多次谈到中国革命胜利后要利用外资的设想。他在中共“七大”所做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在讲到中国工业化时专门讲了利用外资问题。详见《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336页。建国后，他明确提出“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为辅”的建设方针。他想尽办法，利用矛盾，打破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禁运。50年代，他尽力争取苏联的援助。70年代，他抓住时机，打开中美、中日关系大门。80年代以来对外开放，正是对毛泽东力争外援、利用外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 第二节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 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形成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毛泽东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提出的指导我国科学和文化工作的重要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下简称“双百方针”）的形成和提出有一个过程。

“百花齐放”是在戏曲问题的争论中提出的。中国戏剧丰富多彩，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戏曲，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在反对封建旧文化时将中国戏也列在反对之列，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阐述了对待中国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的正确方针。1942年毛泽东为延安平剧（当时北京称北平，京剧也就称为平剧）研究院成立作了“推陈出新”的题词，更具体地指出了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戏剧的态度。但全国解放后，争论又起。有人主张全部继承，不愿批判继承和改革；有人则认为京剧是封建主义，应全盘否定。在1950年11月召开的全国第一届戏曲工作会议上，有人提出戏曲应“百花齐放”。周扬认为这个提法很好，向毛泽东报告了。1951年4月3日，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毛泽东为建院题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八个大字。1956年4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双百”方针时回忆说：“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后来存人要我写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一题词实际成了建国初期戏曲工作的指导方针。这里的“百花齐放”还只涉及到各种戏曲形式的同时并存、互相争妍的问题，并没有涉及到文艺界、科学界及整个学术界的问题。

“百家争鸣”是毛泽东在1953年就中国历史问题研究而提出的。1953年，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成立。委员会主任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历史研究工作的方针。他说：要百家争鸣。据历史学家黎澍回忆：在1953年或1952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出面约请历史学家翦伯赞、邵循正、胡华三人合作写一本《中国历史概要》的小册子，准备提供给苏联大百科全书备用。书稿出来后，请示毛主席如何解决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他回答说：把稿子印发给全国历史学家讨论，实行百家争鸣。后来，又指示：“中国历史很长，建议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研究所，把中国史分作三段来研究：第一所研究古代，止于汉；第二所研究魏晋到鸦片战争前；第三所研究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三个历史研究所合办一个杂志，定名《历史研究》，方针是百家争鸣。”

如何编写中共党史，这不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在苏联，斯大林主持编写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该书成了斯大林时代联共（布）党史的定本。毛泽东虽然曾对联共（布）党史作过很高的评价，但他不赞成斯大林搞定本的做法。1955年9月或10月间，当时的中宣部长陆定一向毛泽东请示关于中共党史编写问题的意见，他回答说“百家争鸣”，而且表示不赞成写一本统一的党史教材。这个意见出乎人的意料，

---

见陈独秀的《答张謇子（新文学及中国旧戏）》（1918年6月15日）和《（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1919年1月15日）。

引自龚育之、刘武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出》，《光明日报》1986年5月21日。

转引自《晚年毛泽东》，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第334页。

以致于黎澍在听陆定一传达时怀疑自己听错了，反问陆说：“党史也百家争鸣吗？”陆肯定回答：“是的。”

毛泽东反对用行政手段去处理学术上的是非问题，反对以个人是非为是非。1955年底，在中国讲学的一位苏联学者在参观孙中山故居时对我陪同人员说，他不同意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孙中山世界观的评论。当时，有的单位认为，这种说法影响“我党负责同志的威信”，提出是否应向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此事。1956年2月29日，毛泽东在致刘少奇、周恩来等的信中说：“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中国古代有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破除了对孔子的迷信。但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渐渐形成了以马、恩、列、斯及毛的言论为是非之标准的教条主义学风。有关单位向上请示是否就苏联学者的意见向尤金谈这一事，就反映了教条主义学风的严重存在。

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也鉴于苏联在这方面的教训。在苏联曾发生过利用行政手段干涉学术争论从而严重阻碍科学发展的事。其中最典型的是李森科用行政手段压制遗传学中的摩尔根学派。1948年，当时的苏联农业科学院院长李森科把遗传学中的摩尔根学派当作“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反动的伪科学”加以粗暴批判。在大学中，只准讲米丘林学派，不准讲摩尔根学派。全国解放后，我国生物学界曾盲目学习苏联，称：米丘林、李森科学派是社会主义的，摩尔根——孟德尔学派是资产阶级的，在生物学中大批摩尔根学派，严重阻碍了我国遗传学的研究与发展。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报刊揭露和批评李森科压制学术争论的学阀作风。毛泽东注意到苏联的这一教训。1956年4月，他看到一份当时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宣传部长哈格尔3月3日的谈话纪要。哈格尔谈了在学习苏联科学上的教条主义的错误。4月18日，毛泽东给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批写道：“此件值得注意，请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科学院及其他有关机关负责同志参加。陆定一同志回来，将此件给他一阅。”在以后，毛泽东曾在一些讲话中将李森科用行政手段压制学术争论作为一个反面例子告诫大家。有个单位的同志向中宣部请示，要中宣部对某个学术问题先作一个结论再去进行学术批评。为此，陆定一向毛泽东请示。他说：让马克思来当中宣部长，让恩格斯当中宣部副部长，再加一个列宁当副部长，

也解决不了那么多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就是要百家争鸣。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的会议，在会上还没有提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过，陆定一在会上发言中已说到：学术性质的问题、艺术性质的问题、技术性质的问题，应该放手发动党内外知识分子进行讨论，放手让知识分子发表自己的意见，发挥个人的才能，采取自己的风格，应该允许不同学派的存在和新学派的树立（同纵容资产阶级思想的自由发展严格区别开来）。他们之间可以互相批评，但批评时决不要戴大帽子。在建国初期，受教条主义的影响，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贺诚提出以苏

---

见《晚年毛泽东》，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第334页。

毛泽东：《致刘少奇、周恩来等》，《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0页。

见于光远的《双百方针提出三十周年》，《人民日报》1986年5月16日。

联的巴甫洛夫学说改造中国的医学，错误地认为“中医是封建医，西医是资本主义医”。同年2月，中共中央在颐年堂开会，陆定一在会上向中央报告了有关遗传学、医学和史学研究工作的争论情况和他的意见。陆认为：各门科学，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可以有学派的。学术与政治不同，只能自由讨论，不应该用戴“政治帽子”和“哲学帽子”的办法，打倒一个学派，抬高一个学派，只有罗马梵蒂冈教皇做过这种蠢事，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是这一类蠢事。这种蠢事阻碍科学的发展和学术的繁荣。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指示》，指示说：“在讨论学术性问题的時候，应该提倡实事求是的自由辩论，反对强词夺理、少数人（不论是党员或者非党员）的垄断和滥用行政方法去解决问题。”指示还没有使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在会后的讨论中，陆定一又谈了对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争论，再一次讲不能同意“巴甫洛夫医是社会主义的，西医是资本主义的，中医是封建的”这样的说法，不能同意“摩尔根、孟德尔是资产阶级的，李森科、米丘林是社会主义的”这样的说法。在讨论时，有人讲到毛泽东的“百花齐放”题词所起的作用和成立历史研究委员会时毛泽东提出“百家争鸣”的情况，建议在科学文化问题上要贯彻这两个口号。

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总结发言，其中的第五点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这是两千年以前人民的意见。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

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又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他开放，这就叫做百家争鸣，就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两千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們也需要这个。他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说。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他正式宣布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科学和文化工作的指导方针。

5月26日，陆定一在中南海怀仁堂向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医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系统阐述“双百”方针。他说：我国要富强，除了必须巩固人民的政权，必须发展经济，发展教育事业，加强国防以外，还必须使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得到繁荣和发展。缺少这一条是不行的。要使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得到繁荣的发展，必须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他以戏曲方面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效果和春秋战国时代学术方面“百家争鸣”来说明这一政策的正确和必要。他解释说：“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他指出：我们所主张的自由是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所主张的自由不同，是人民内部的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人民内部的自由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领域中的表现。

他提出，在人民内部，不但有宣传唯物主义的自由，也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两者之间的辩论，也是有自由的。这是因为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想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来解决，是不会有有效的，只有经过公开辩论，唯物主义的思想才能进一步克服唯心主义的思想。他还分析了实行“双百”方针的条件：社会主义改造已在各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知识界的政治思想状况有了根本的变化；国内虽然也还有阶级斗争，但是国内的敌人已经大大削弱了；全国人民政治上思想上的一致性大大增强。他说：党中央现在着重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就是要我们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方面，也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繁荣我国的文学艺术而努力，为使我国的科学工作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努力。陆定一在讲话中总结我们党在领导科学和文化工作方面的经验，谈了正确对待批评和反批评，正确对待古代和外国文化。他希望知识分子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的重要性。陆定一的报告将“双百”方针公诸于全社会。

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出的“双百”方针，得到了知识界的热烈欢迎，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科学文化部门的思想空前活跃，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春天景象。

## 二、“发展科学文化的必由之路”

在贯彻“双百”方针过程中受到来自右的和“左”的两方面的干扰。

有人从右的方面来理解“双百”方针。这种人在反对教条主义、反对行政干涉时走向另一极端：不加分析地否认过去的成绩，怀疑以至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指导。有人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家之言，争鸣不一定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应当自由发表各家学说。毛泽东认为，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刊于《文艺报》1956年第23期，以本刊评论员名义发表）是这方面的典型。

钟的文章认为，从1956年11月上海《文汇报》讨论中国电影开始，电影界打破了沉寂，电影的锣鼓敲响了。文章从电影上座率低、大部分收不回成本入手，揭露电影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文章指出：绝对不可以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和影片的观众对立起来；绝对不可以把影片的社会价值、艺术价值和影片的票房价值对立起来；绝对不可以把电影为工农兵服务理解为“工农兵电影”。文章认为，建国以后对过去的中国电影传统加以全面否定，对演员重视不够。文章指出：电影领导工作必须注意符合电影的创作和生产的规律，必须充分尊重艺术家的风格而不是“磨平”它，要改善电影演员工作的条件，培养、锻炼电影演员。这篇文章固然有片面性，对新中国电影事业取得的成绩没有充分肯定。但它指出的缺点则是存在的，作者的态度也是善意的。毛泽东将钟惦棐的文章列为右的典型是错误的。不过，这并不能否认当时确有右的错误倾向的存在。

有的则站在“左”的立场看待“双百”方针，对它持怀疑以至反对的态度。毛泽东认为，陈其通等四人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刊于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是这方面的典型。该文认为，在过去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越来越很少有

---

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民日报》1956年6月13日。

人提倡了；在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的斗争中，一些人反对文艺应为政治服务、文艺应有高度的思想性、文艺应作为教育广大人民的武器；真正反映当前重大政治斗争的主题，有些作家不敢写了，也很少有人再提倡了；文学艺术的战斗性减弱了，时代的面貌模糊了，有些小品文失去了方向，充满着不满和失望的讽刺的文章多起来了；自从提出“百花齐放”后，有许多人热衷于走捷径去改编旧的，甚至有个别人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稍加整理就冠上自己的名字去图名求利。这篇文章对“双百”方针提出后我国文艺界状况的分析和估计是片面的。文章中所说的现象和问题确实或多或少存在，但并不是文艺界的主流，更不能将这些归之于实行“双百”方针的结果。毛泽东认为：这几个同志对党忠心耿耿，但文章则不堪领教。他们是以卫道的君子的面目出现的，但教条主义的方法、宗派主义的情绪是达不到卫道的目的。毛泽东指出：他们实际上是怀疑“双百”方针的。

《人民日报》在发表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后，对该文是否正确一直没有表态。毛泽东对此很不满意，认为；这样会给读者造成一种错觉，以为陈其通等人的文章代表了中央的精神，而实际上这篇文章是与中央精神相对立的。当时苏联赫鲁晓夫不赞成“双百”方针，以为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所以《真理报》不登陆定一的文章，却登了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台湾的报纸则登了钟惦棐的文章。对此，毛风趣地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各人喜欢各人的东西，气味相投。教条主义就是喜欢教条主义，机会主义就是喜欢机会主义。

毛泽东在1957年多次提到上面两篇文章，批评“左”右两种倾向。他认为在这两种倾向中“左”是主要的。1957年2月27日，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讲话中说：在我们的许多干部中间，实际上不赞成中央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不是我的话讲过头了？我说高级干部中十个有九个不赞成或者半赞成，或者不甚通。真正通的，真正认为这个方针是正确的少数，所以很需要做工作，做说服工作。正因为如此，在1956年底和1957年春，他在党内外的许多会议上阐述党的“双百”方针。首先，他指出，“双百”方针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虽然消灭了剥削制度，但依然存在着各种社会矛盾，而各种社会矛盾必然会在科学文化中得到反映，要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有人怀疑“双百”方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怕放出“毒草”，怕引起思想混乱。针对这种顾虑，毛泽东生动地说：中国六亿人口，是个小资产阶级的王国，是个大王国。农民有五亿，手工业者一千多万，小商小贩、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大概有五千多万人，这是一个客观存在。你要这些人都不发表意见，统统口上打个封条，只有吃饭时开一下，吃了饭就封起来，那怎么行呢？我说口有两个作用，一为吃饭，二为说话，把它堵住那是难办到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是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批评。但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分析，要有充分说服力。他又说：单靠行政命令的办法，禁止人接触错误思想，禁止人接触不正常的现象，禁止人接触丑恶的现象，禁止人接触错误思想，禁止人看牛鬼蛇神，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当然我并不提倡发展牛鬼蛇神，我

是说“有一点也可以”。某些错误东西的存在是并不奇怪的，也是用不着害怕的。这可以使人们更好地同它作斗争。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

第二，他指出：“双百”方针符合辩证法，符合真理发展规律。他说：“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据此，他反复说明：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它将引导人们的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他指出：在哲学里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是对立统一的，一讲哲学就少不了这两个对子。苏联现在不搞对子，只搞“单干户”，说是只放香花，不放毒草，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中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存在。事实上，无论那个国家，都有唯心主义，都有形而上学，都有毒草。苏联那里的许多毒草，是以香花的名义出现的，那里的许多怪议论，都戴着唯物主义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帽子。为了提高辨别香花、毒草的能力，他劝大家不仅要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还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需要读一读。他批评道：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你不研究反面的东西，就驳不倒它。

第三，依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毛泽东指出：

“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他以科学史上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等为例，

说明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因此，他认为，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问题，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轻率地作结论。他反对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和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和另一种学派，主张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讨论。

自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后，报刊上不断发表科学家、艺术家谈“双百”方针的文章。4月29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教授遗传学家李汝祺的《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毛泽东对李文极为重视，建议《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为李文重新拟了题目《发展科学必由之路》，还代写了编者按语。按语道：“这篇文章载在4月29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

---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0页。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8页。

想和措施都应当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毛泽东对“发展科学必由之路”的精辟概括，再一次指出“双百”方针符合科学发展的规律。

第四，毛泽东将“双百”方针推广为进行一切工作的方法，领导国家的基本方针。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方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他尖锐地提出：领导我们国家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方针，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他认为，“放”，有百利而无一害；“收”是错误的，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因此，他主张放的方针，认为当时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过多。采取放的方针有利于国家的巩固和文化发展。毛泽东的这一见解是深刻的，表现了他博大的气魄和胸怀。我认为，实行放的方针，实质上是采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是非问题，是施行最广泛的人民民主。有人认为，只有学术问题可以自由讨论，政治问题不可以自由讨论。这种意见是很错误的。若政治问题不可以自由讨论，那人民当家作主从何谈起。只要在宪法、法律的范围内，政治问题、学术问题都可以自由讨论，都应自由讨论。这种自由讨论，既可以批评，又可以反批评。那种以为对批评者进行反批评是收、是压制不同意见的观点也是错误的。

第五，毛泽东指出：实行“双百”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在贯彻“双百”方针过程中，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可以不可以批评，也有人担心会削弱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针对这些问题，他在党内外会议上多次说明：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虽然已经被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但仍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所以不发生马克思主义可以不可以批评的问题。事实上，唯心主义者不是每天都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抱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不愿意改变的人们，不是也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批评。马克思主义是在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而且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

在1957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了《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共三十个问题），供参加会议的同志参考。毛泽东在这份材料上作了若干批注。在有人认为“党校有特殊性，不能容许非马列主义的思想争鸣”这个问题旁边，他写道：“似乎不

---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26页注释。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5～416页。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1页。

很对，何必怕争鸣？”在有人认为经典著作不许怀疑这个问题旁边，他批道：“不许怀疑吗？”在党的政策是否允许争论这个问题旁边，他写道：“为什么不允（许）争论呢？”在党员在理论上怀疑或反对马列主义的个别原理是否允许，如果根本怀疑马列主义的哲学、经济学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可否留在党内这个问题旁边，他批道：“前者是肯定的，后者是否定的。”在“如何克服马列主义教学中的教条主义”这个问题旁边，他写道：“就是允许批评、争论”。他的批语虽然十分简洁，但鲜明地显示出他是以科学的态度而非宗教式的、教条主义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

在这次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鼓励人们鸣放。一次，他在自己家里主持分组会议，冯友兰在会上讲了自己对继承问题的看法。散会时，毛泽东拉着冯友兰的手说：“好好地鸣吧，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你写的东西我都看了。”

毛泽东还正确指出：世界观问题，精神上的东西，不能强迫人们相信，也不能强迫人们不相信。比如强迫人不信教就不行，强迫人要信这种教不信那种教是不行的。强迫人相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行不行？也是不行的。精神世界的问题，只能靠耐心细致的、说理的方法去解决。他的这一见解应当为马克思主义者牢记。马克思主义要靠灌输，不进行宣传、教育、灌输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职责。但这种宣传、教育、灌输应是循循善诱的，充分说理的，切不可用行政手段强迫人信马克思主义，切不可把马克思主义当做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接受。若这样，也许一时似乎见效，但终久是不行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就是最好的证明。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就字面讲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它们，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其他的人也可以利用它们。但“双百”方针决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而是坚定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毛泽东说：“统一物的两个互相对立互相斗争的侧面，总有个主，有个次，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而且对毒草、对错误思想必须进行批判，决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他又指出，所谓香花和毒草，各个阶段、阶层和社会集团也有各自的看法。他根据我国的宪法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主张，提出了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在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这两条。”这六条是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

---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11～412页。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松堂全集》第1卷，第150页。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0页。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3页。

正确的政治标准，它们对任何科学艺术的活动也都是适用的。毛泽东的这一意见对吗？我以为是对的。至于如何掌握这六条标准，这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另外，违背这六条标准的言论和行动是错误的，但并不就一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行，更不能等同于反革命言行。混淆了两者的区别，就会犯扩大化的错误，把人民内部的是非问题当成是敌我问题。

总之，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出的“双百”方针无论从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看，还是从理论上讲，都是正确的，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是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有利于国家巩固发展的方针。

### 三、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经验教训

1957年夏季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使“双百”方针的贯彻受到严重的干扰和损害，在形式上，“双百”方针没有被废止，但实际并未认真执行。在1961~1962年的调整时期，曾一度纠正违背“双百”方针的错误，使情况向好的方面变化，但很快又被“左”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所中断。“文化大革命”中，这一方针更是“名存实亡”，林彪、江青一伙搞文化专制主义。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尤其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双百”方针才得以贯彻。

毛泽东提出了“双百”方针，可是在他生前，这一方针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原因何在？教训是什么？我以为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对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形势作了主观主义的估计，接连不断地搞政治运动，搞大批判，这是最根本的原因。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结果把大量非阶级斗争性质的问题说成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把学术性质的争论说成是政治问题，把属于人民内部的是非问题当成敌我问题。在1957年，把帮助共产党整风而“鸣”“放”出来的许多意见视为“右派”向党进攻，当然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言。看来，要贯彻好“双百”方针，首先要对阶级斗争形势有一个正确的估计。估计过头了，阶级斗争气氛搞得浓浓的，那就使人成“寒蝉”，很难“争鸣”，只能搞“大批判”。当然要是看不到阶级斗争，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就会放弃必要的思想斗争，任错误思想自由泛滥，这同样不利于“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

第二，对“双百”方针的阐述上存在某些不足。毛泽东讲百花齐放，但他又常常把放出的“百花”简单分为“香花”与“毒草”两类。至于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香花与毒草是属于认识问题，还是属于政治问题，是人民内部的是非问题，还是敌我问题，对此，他没有展开论述。可在实际生活中却往往把香花与毒草当成政治问题。毛泽东承认，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他又讲，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在1957年，有人认为“百家争鸣”很危险，共产党只有一家，其他九十九家把共产党包围了怎么办？他说，用不着害怕，因为在社会科学里，在世界观这方面的问题，不是什么百家争鸣，而是两家争鸣。这百家里头，按其性质分类，可以分为两家争鸣。这表明，他是带着强烈的阶级观点看待百家争鸣的。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科学文化方面的学术争论，最后往往扣上“政治帽子”和“哲学帽子”，或者是“无产阶级的”、“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的”，或者是“资产阶级的”、“唯

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陆定一说：毛泽东提出的“百家争鸣实际上是两家争鸣”的话，“对科学和艺术部门来说是不对的。照此去办，科学和艺术部门只能是一言堂，而且会使‘政治帽子’流行起来。对科学和艺术中的学派、流派，乱贴政治标签，用简单化的办法来区分何者为资产阶级的，何者为无产阶级的，是不科学的，也就无复‘百家争鸣’可言”。

由于历史条件所限制：毛泽东及整个理论界对“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学术上、艺术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政治上的民主、自由之间的关系；如何正确认识实行双百方针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巨大促进作用；如何估计实行双百方针将会遇到的阻力，如何才能克服这些阻力，以及如何为实行双百方针创造条件等等”问题，没有能展开深入的研究与说明。

第三，习惯势力的作用。共产党是执政党，这就有可能使一部分领导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养成了利用行政手段解决学术上的争论的习惯，并且还形成了“有权就有理”的坏俗见，结果许多争论最后是领导人说了算。由于这种情况，许多争论者也希望由领导人作出谁是谁非的判断。

第四，不能正确处理来自“左”右两方面的干扰。在贯彻“双百”方针过程中必然会遇到来自“左”右两方面的干扰。在这方面：一是要正确判断“左”右两种干扰那一种是主要的，是“左”的，还是右的，若搞错了，就不能实行好“双百”方针；二是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反“左”时要防右，反右时要防“左”，防止忽“左”忽右，走极端；三是对错误倾向的批评也应是说理的，而不应是粗暴的、扣帽子的，应允许被批评者进行反批评，切忌只讲一种意见。

在本节结束之前还应指出：虽然在1957年以后，“双百”方针未能很好贯彻执行，但毛泽东对一些非意识形态方面的纯学术问题仍然是采取不加干涉、自由讨论的态度。如关于逻辑方面的争论。他虽然日理万机，但很感兴趣，一直关注着争论情况。1956年，周谷城教授在《新建设》2月号上发表了《形式逻辑与辩证法》，提出在认识活动中“辩证法是主，形式逻辑是从；主从虽有区别，却时刻不能分离”。周不同意当时流行的“辩证法是高级逻辑，形式逻辑是低级逻辑”的说法，由此引起了争论。争论中，周谷城是少数派，毛赞成周的观点。但他不公开加入这一争论。1958年周编了一本有关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论文集，写信请毛泽东作序。毛泽东在回信中说：“两次热情的信，都已收到，甚谢！大著出版，可资快读。我对逻辑无多研究，不敢有所论列；问题还在争论中，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适宜。作序的事，不拟应命，可获谅解否？”又如，关于《兰亭序》的真伪问题。《兰亭序贴》自唐太宗李世民认定为东晋书法大家王羲之真迹以来，虽有人提出过异议，但似乎成了定论。郭沫若根据南京附近新出土的东晋《王兴之夫妇墓志》和《谢鲲墓志》发表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刊《文物》1965年第6期），论证《兰亭序》的文章不是王羲之的原作，并从字体上否定《兰亭序》系王羲之所书。郭文发表后，南京市文史馆馆员高二适写

---

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历史回顾》，《光明日报》1986年5月7日。

于光远：《双百方针提出三十周年》，《人民日报》1986年5月16日。

毛泽东：《致周谷城》，《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44页。

了《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不同意郭老的意见。高将自己的文章寄给报刊，但未能发表，后给了章士钊。章将高文转寄给毛泽东。毛在 1965 年 7 月 18 日复信章表示：“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郭沫若在文中提到康生、陈伯达，故毛在信中说及康、陈二人。并随即给郭老去信，提出：“笔墨官司，有比无好”。

后高文在 7 月 23 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笔墨官司，有比无好”。确实，只有通过争论，学术才能繁荣，科学才能发展。

---

毛泽东：《致章士钊》，《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602 页。

毛泽东：《致郭沫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604 页。

### 第三节 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

#### 一、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在肃反中所犯的严重扩大化错误，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1956年6月28日，波兰的波兹南发生了严重骚动。同年10月，匈牙利发生更为严重的政治事件。这样社会主义社会长期潜藏着的社会矛盾一下子充分地暴露出来了。在1956年底和1957年春，我国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性的游行请愿和其他类似事件，比以前有了显著增加。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共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双百”方针提出后，思想界在鸣放中出现了混乱，有人要收，有人要放。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件，国内外议论纷纷。客观的现实表明：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已迫切地摆到共产党人的议事日程上了。继《论十大关系》之后，毛泽东进一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初步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

毛泽东十分注意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方法论，反复说明，应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他这样做是有鉴于苏联的教训，是为了纠正斯大林的形而上学。

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斯大林在思想上有形而上学，没有理解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的著名论断。他一方面片面强调对立面的

斗争，否认对立面之间有同一性，而另一方面则在同一地方，他又看不到其中包含着对立。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离开了辩证法。他片面强调，苏联人民政治上道义上的团结一致是苏联社会发展的动力，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看不到苏联社会依然存在着矛盾。斯大林的这种无矛盾论影响了苏联的整个理论界。1940年苏共中央机关刊物《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就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矛盾的问题展开讨论。编辑部对这场讨论所作的结论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完全适合，也就是说它们之间矛盾的消灭。”在实践上，由于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

不承认矛盾仍然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进步的动力，因此，就不能自觉地主动地揭露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结果使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等各项制度凝固化，使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失去活力。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哲学上的形而上学是导致他思想僵化、政治上犯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

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存在着矛盾，如果领导机关执行不正确的政策，那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

斯大林对自己的错误作了改正，但这种改正是不彻底的，因为他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问题提出，还没有认识到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社会主义社

---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问题的来稿综述》，《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40年第8期，引自《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问题》，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108页。

会向前发展。毛泽东称斯大林的这种辩证法为“羞羞答答的辩证法”，或“吞吞吐吐的辩证法”。

斯大林逝世后不久，苏联理论界围绕着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又展开了讨论。这次讨论与1940年的讨论有很大不同。这次讨论实际上是对斯大林时期盛行的无矛盾论的批判。在讨论中顽固坚持无矛盾论的理论工作者是极少数。但也应看到，形而上学的思想是不轻易退出苏联意识形态。苏联《真理报》在转载《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章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1956年4月5日发表，文章的基本观点是毛泽东提出的。）删去了文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的论述，就是证明。

斯大林的形而上学也影响到我国。在我国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关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在1957年3月16日的一次座谈会上讲：对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很多同志实际上没有懂，对这个方针，十个部长大概九个反对。

正是针对以上情况，毛泽东在1956～1957年在党内外的许多会上反复申说：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要求学会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他指出：“关于辩证法，列宁说过‘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解释和发展。解释和发展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要解释，我们现解释太少。还要发展，我们在革命中有丰富的经验，应当发展这个学说。’”

他认为，对于许多人说来，承认这一规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问题 and 处理问题又是一回事。“有必要在我国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中，进行解释，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

为了纠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无矛盾论，为了正确处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各共产党工人党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在1957年召开的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专门讲了关于党内团结的辩证法，批评了无矛盾论。他说：“无论什么世界，当然特别是阶级社会，都是充满着矛盾的。有些人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找到’矛盾，我看这个提法不对。不是什么找到或者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盾。没有一处不存在矛盾，没有一个人是不可以加以分析的。如果承认一个人是不可加以分析的，就是形而上学。”

“总之，对立面的统一是无所不在的。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观念，关于辩证法，需要作广泛的宣传。我说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我建议，要在各国党的政治局会议上和中央全会上谈这个问题，要在党的各级地方委员会上谈这个问题。”在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规模最大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上，毛泽东侃侃地谈论辩证法，这是绝无仅有的，其意义也是多方面的，显示了他是一位辩证法的大师。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提议，莫斯科宣言中写上了应对干部和群众进行辩证唯物论教育的内

---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5页。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2页。

毛泽东：《党内团结的辩证法》，《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8页。

容：“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如果不用辩证法和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问题，就会产生片面性和主观主义，就会使思想僵化和脱离实际，不善于对事物作恰当的分析，就会犯修正主义或教条主义的错误，就会在政治上犯错误。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干部和广大群众，是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迫切任务之一。”

矛盾是客观存在的，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动力，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对矛盾的态度是大胆地揭露它，正确地分析它，处理它。毛泽东说：“要学会这么一种领导艺术，不要什么事情总是捂着。人家一发怪议论，一罢工，一请愿，你就把他一棍子打回去，总觉得这是世界上不应有之事。不应有之事为什么又有了呢？可见得是应有之事，你不许罢工，不许请愿，不许讲坏话，横直是压，压到一个时候就要变成拉科西，党内、党外都是这样。各种怪议论，怪事，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

## 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既然充满了矛盾，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存在不存在基本矛盾，如果有的话，它是什么？这是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时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

苏联理论界在五十年代中期讨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时，有些人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有局部的、暂时的矛盾，没有基本的矛盾，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这一提法本身就没有根据。有些人则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基本矛盾，但对基本矛盾是什么，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人认为，全体人民无限增长的需要和物质文化资料生产在各个时期内达到的水平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有的人则认为，生产资料的平等关系与由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按劳分配原则的作用所产生的社会不平等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也有的人主张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毛泽东对苏联理论界争论的情况大体上是了解的。他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演中和在1957年11月18日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发言中都说到了，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哲学界在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上有所变化，产生了许多篇谈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的文章。为了纠正斯大林在这一问题上的错误，也为了澄清苏联理论界在这一问题上的混乱，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作出了明确规定。他说：“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他又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他认为，即使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阶级消灭了，但“还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搞得不对头，就要把它推翻。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舆论）要是保护人民

---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4页。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6页。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3页。

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规定为一般的社会基本矛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在人类认识史上第一次科学地分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从而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使整个社会科学奠立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之上。列宁进一步发挥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但在哲学上或经济学上，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没有明确使用过“社会基本矛盾”这一术语，更没有将这两对矛盾明确规定为社会基本矛盾。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小册子中，只讲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而没有讲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他也没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看成是贯串整个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受斯大林的影响，苏联的哲学教科书都只注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忽视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这种状况直到五十年代才有所改变。因为这时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对什么是经济基础、什么是上层建筑作了论述。即使是这样，他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仍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毛泽东批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很少涉及上层建筑。所以我认为，毛泽东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规定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思想的发展和对斯大林错误的纠正。自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发表后，“社会基本矛盾”已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而且也成了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常用的术语。八十年代以来，我国有的哲学教科书竟将“社会基本矛盾”概念弃之不顾。有的人只承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而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排除在基本矛盾之外。这些见解和做法，显然是不可取的。

毛泽东初步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性质、特点和解决的根本方针。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在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的，而只有靠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总的来说是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总的来说也是适合经济基础的，它们之间的矛盾、不相适合的方面是次要的，居第二位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比起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因此，一般说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不再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而是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它们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解决。否认它们之间有矛盾是不对的，过分夸大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是不对的，以为需要通过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来解决它们的矛盾或以为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无法解决它们的矛盾更是错误的。

毛泽东还具体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相矛盾（即不相适应）的种种表现。他指出：在所有制方面，社会主义所有制内部，不仅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之间有矛盾，而且全民所有

制内部、集体所有制内部、集体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之间也有矛盾；在生产 and 交换方面，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建立起来，逐步寻找比较适当的形式；在分配方面，积累和消费的比例究竟多大合适，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得合理。《论十大关系》中的前五个关系，实质上就是讲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关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毛泽东认为主要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国家机构中的某些官僚主义作风和国家制度中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基本矛盾大体表现为三种情况：一是属于旧的生产关系、旧的意识形态的残余；一是属于刚刚建立的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本身的不够完善；一是属于社会基本矛盾所固有的、内在的矛盾。社会基本矛盾是活生生的，不断变化的，因此，毛泽东强调，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解决各种矛盾。“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和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总根源，为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指明了方向。从今天的眼光看，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论述还是初步的，但他的开创性的历史功绩是不容否定的。即使在今天，他的基本思想也没有过时。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依据。

1957年以后，毛泽东过分夸大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的一方面，过分夸大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矛盾的一方面，没有看到新建立起的生产关系中有超过现有生产力的地方，没有注意到新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新的生产关系要求相对的稳定性，从而导致不断进行生产关系的变革，不断进行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革命，陷入“左”的错误。防止这类错误再次发生的关键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作出合乎实际的分析和提出正确解决的方针、政策。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就会使现存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僵化，凝固化，使社会主义社会失去活力；过分夸大了矛盾，结果不仅不能正确解决矛盾，反而使矛盾变得更加尖锐，复杂，妨碍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基础的巩固。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适用于一切社会的基本矛盾。它们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表现是什么？对此问题的回答，国内外学者众说不一。在苏联有人主张：社会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急剧增长与生产已达到的发展水平两者之间的矛盾。也有人主张：个人的社会地位（作为所有者）与他参加生产管理（作为共同的主人）之间的矛盾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国内有人主张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有人则认为：社会化水平更高的生产力或其发展趋势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体结构及程度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也有人主张：社会化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规模、程度、形式及其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究竟如何

表述好，均可讨论。我主张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表述为：现实的社会化的生产力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形式及民主政治的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一表述突出三点：（1）现实的社会化的生产力。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也是不断变动的。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能抽象地谈论社会化的生产力，而必须具体地考察现实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2）公有制的形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公有制采取什么形式这是自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来一直在探讨研究的问题。（3）民主政治的具体形式。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社会上层建筑的核心。社会化的大生产要求民主政治。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采取什么具体形式，什么具体制度，这也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来所碰到的一个重大问题。我认为，上述三者的矛盾处理好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其他事情就好办了。社会主义各国发生的问题无不根源于没有能处理好上述三方面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就是为了解决这三者的矛盾。

### 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已不再表现为激烈的阶级斗争，而是大量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因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了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生活的主题。如果说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是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理论基础，那末关于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理论则是他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主体。

在复杂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和政治斗争中，始终存在着敌、我、友三者的关系，而这三者又都各自存在着内部的矛盾。革命的进步阶级或政治集团要想取得政权并巩固政权，必须正确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以及自己内部的矛盾。在历史上，一些有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虽然提出过有价值的思想。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历史上的剥削阶级政治家、思想家还不可能对如何处理敌、我、友三者的矛盾以及自己内部的矛盾作出科学的分析和理论概括。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作出了科学分析，并依此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了阶级斗争的策略。他们所制定的策略涉及到如何处理无产阶级与同盟者农民的关系问题，与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关系问题和如何处理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矛盾的问题。但他们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所以他们主要研究的是敌对阶级之间对抗性矛盾，而对非对抗性矛盾谈得较少。十月革命后，虽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依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但人民内部的矛盾也逐渐明显地暴露出来。因此，与马恩相比，列宁较多地谈到无产阶级专政下人民内部的矛盾，如：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苏维埃政权与人民的矛盾，工人、农民与专家的矛盾，民族矛盾等等。但列宁所关注的中心，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不在这方面。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他只是说：“对抗消失了，矛盾存在着。”斯大林比列宁更多地谈到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提出苏联社会有两种矛盾，一种是内部矛盾，即无产阶级与农民之间的矛盾，一种是外部矛盾，即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他还提出结合内部的矛盾（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矛盾）和结合外部的矛盾（无产阶级和富农的矛盾）的概念。他指出：处理结合内部的矛盾应当竭力缓和斗争，用协议和互相让步的方法来调节这一斗

争，无论如何不要把它导向尖锐化的形式，导向冲突。在农业集体化完成后，斯大林宣布剥削阶级已经消灭，苏联社会中只剩下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照此说来，人民内部矛盾已居首位。但几乎在同时，他又犯了肃反严重扩大化的错误。斯大林认为，苏联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向苏联派遣暗害分子、间谍、破坏分子和杀人凶手，企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斯大林指出这一点并没有错，错误在于他过分夸大了敌情，认为在我们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组织中都在某种程度上碰到了外国代理人的暗害、破坏和间谍活动，认为外国代理人不仅打入我们的基层组织，而且窃取了某些重要职位。他错误地提出：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残酷。结果，在肃反中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大批干部、党员、革命者和一般公民打成外国代理人、人民的敌人。斯特朗在《斯大林时代》一书中称1936~1938年为“大疯狂”时期。据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报告，参加1934年苏共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因“反革命罪”遭逮捕，这次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中有83人被处决。据有的资料讲，在军队中，5名元帅中有3名被处决，15名兵种元帅中有13名被处决，85名军长中57名被处决，195名师长110名被处决。斯大林把许多忠诚党的事业的人看成是外国间谍、代理人、反革命分子。他把自己的一些亲属（如他妻子的哥哥及夫人，他妻子的姐姐及丈夫）和加里宁、莫洛托夫这样一些领导人的妻子也投入监狱，监禁流放。斯大林肃反严重扩大化无疑是应当批判的，但也要作历史的分析。斯特朗在“大疯狂”这一章的最后是这样写的：“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临到苏联的时候，世界各国看到苏联希特勒第五纵队是相对地少，而它却曾推翻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霍华德·克·史密斯评论道：‘如果俄国不曾清洗掉几千个文武官员，无疑红军在两个月内就已崩溃了。’这是别人的判断，我不完全同意这个看法。但是我知道苏联人民之所以忍受了那些疯狂的年代，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在准备着决死的防御战，相信他们已在同一个隐藏的敌人进行搏斗，并且相信每消灭一个叛徒就可以在以后挽救成千人的生命，乃至整个国家的命运。就是这种在黑暗中同高踞领导地位的敌人作着斗争的感觉，使这些年代具有梦魇的性质。”斯特朗的这一段文字，并非无可商榷之处，但有助于我们全面看待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

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在肃反工作所犯的触目惊心的错误。毛泽东在1957年2月27日的讲话中说：斯大林在很长时间内把这两类矛盾混淆起来了，本来是人民内部的问题，比如讲政府的坏话，不满意政府，不满意共产党，批评政府，批评共产党。但是批评有两种，有敌人批评我们，有人民批评我们，这应该分别。在很长时期内，斯大林是不加分别的。有一些在苏联做过很长时间工作的人给我讲，那是不加区别的。只能讲好话，不能讲坏话，只能歌功颂德，不能批评。谁批评了那就怀疑你是敌人，就有坐班房的危险，就有杀头的危险。

总之，马克思、列宁还不具备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学说的客观条件。到了斯大林时，已有了可能，也有必要，但由于他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也由于缺乏经验和紧张的国际形势等客观原因，没有能做到，因而犯了错误。

1956~1957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内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人民内部矛盾明显地突出起来了，成了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已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历史课题。同时，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和建国初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积累了一定的正确处理两类矛盾的经验。所以在这时，既有必要，也有可能系统地论述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

1956年12月4日，毛泽东在致黄炎培的信中明确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基本思想。他写道：“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间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同年2月27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讲演，系统阐述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学说。在此以后，毛泽东又在许多讲话、谈话中进一步说明这一学说。许多人对人民内部还存在矛盾不理解，毛泽东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总题目。大谈特谈，习以为常，也就见怪不怪了”。

毛泽东关于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要点如下：

1. 敌人和人民是历史范畴。它们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要具体分析。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敌我之间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前者是對抗性的矛盾。后者，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對抗性；在被剝削阶级和剝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對抗性的一面外，还有非對抗性的一面。

2. 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反革命，否认这一点，会犯右倾错误。但不多了，过分夸大敌人，会犯“左”倾错误。

3. 在社会主义社会，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在社会矛盾中大量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主题。当时有人提出：现在是人民内部的斗争为主，还是阶级斗争为主？毛泽东说：一定要讲为主，要讲也可以，似乎那个意思就是讲阶级斗争为主恐怕好一点，舒服一点，讲人民内部的斗争为主似乎就不太妙。而我恰好换了个位子，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就是这个题目，叫做如何

---

毛泽东：《致黄炎培》，《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14~515。

毛泽东：《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7页。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形势》，《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9页。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又说：人民内部斗争很突出，共产党八大做了结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了，现在突出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的斗争。他在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地党员干部会上的讲话，中心议题是如何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批评照搬过去处理阶级斗争的方法来解决所面临的人民内部的新问题

4. 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前者用专政的方法解决，后者用民主的方法解决，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指政治思想方面的矛盾而言。针对不同方面的问题，毛泽东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方针：如，在经济方面，兼顾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三者的利益，做到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在民族关系方面，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克服地方民族主义，实行民族平等，民族自治，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在科学文化方面，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党派关系方面，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等等。毛泽东还说及法律、法规、行政命令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方面的作用。他说：“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

5. 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在一定条件下敌我矛盾可以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对抗性矛盾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不当，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也可以转化为对抗性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往往交织在一起，不易分清，容易混淆。而国内外的敌人往往利用人民内部，挑拨离间，兴风作浪，企图实现他们的阴谋。

6.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产生人民内部矛盾的总根源，人们认识上的正确与错误是产生人民内部矛盾的认识根源。

在讨论人民内部矛盾时，往往容易忽略了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正确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正确解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大力发展生产力，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础和前提。如果社会基本矛盾处理不好，生产力不能得到应有的发展，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得不到满足，那社会矛盾就会尖锐化起来。反之，如果社会基本矛盾处理得好，生产力不断得到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的需要不断得到满足，那各种社会矛盾就比较缓和，也较容易处理。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毛泽东首次系统地论述了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学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但也应指出：自从1957年以后，他在理论上坚持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亦这样），而另一方面，在实践上却严重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相当一部分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加以处理。如何解释这一矛盾现象？我认为，造成这种矛盾现象有多种因素：

第一、如前所述，毛泽东虽然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作了论述，但这种说明是理论上的，而不是法律上的。他提出的分清言论行动是非的“六条”标准也没有错。但在反右派

运动中实际上把这六条当作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中共中央在 1957 年 10 月 15 日发出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不过是把“六条标准”具体化）则就错了。到后来发展成凡是同毛泽东相左的言行都说成是反对毛泽东、反对毛泽东思想，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出任何批评也都说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甚至将凡是批评林彪、江青一伙的人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这样，人民与敌人成了一个极不确定的概念，“昨天的功臣”，忽然之间变成了“今日的祸首”。昔日的战友，转眼成了“走资派”、叛徒、特务、“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

第二、对阶级斗争形势作了主观主义的夸大估计，改变了人民内部矛盾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占主要地位的看法。对阶级斗争形势过分的估计，必然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所以尽管在每次运动中，党的文件都写了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而实际上差不多每次运动都混淆了两类矛盾。

第三、忽视了法制建设。毛泽东虽然提出了不能用过去搞阶级斗争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实际上他自己以及整个党又沿用过去的方法来区分敌人与人民，即不是通过法律程序由司法部门来判定某人是否是敌人，而是由党委、甚至支部（在实际上有的单位又往往是支部书记）来判定谁是敌人，是专政对象。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群众专政”，结果一些群众组织随意抓人，关押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吸取了这一历史教训，运用法律武器，依法打击极少数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真正严格地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理论与实践是不同的；理论转化为实践有一定的条件，有一个过程。我们不能因为毛泽东在实践上没有能正确区分和处理好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就在理论上否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学说的正确性。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每次指导运动的文件都写上了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话，就否认在实践上犯有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错误。

#### 四、如何对待闹事

如前所述，从 1956 年秋至 1957 年春的半年间，我国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性游行请愿和其他类似的事件，比以前有了显著的增加。在农村，少数合作社社员闹退社。如何对待少数人的罢工、罢课、游行、请愿等一类“闹事”，成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在 1957 年春的一些讲话中多次分析了发生少数群众闹事的原因、闹事的性质，提出正确对待闹事的态度和处理闹事的方法。

他指出，发生少数人闹事的主要原因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和工作中的错误；另一个是对工人、学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再有是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坏人的利用。他认为：有些领导者官僚主义十分严重，没有民主，一百年也不能解决问题，这样就逼出一个大民主来，于是乎罢工、罢课。对这种反官僚主义，我们如果不允许，我看是不对的，应该允许，虽然宪法上没有罢工的条文。他不同意将闹事说成反革命，说成是要造反。他说，我们并不提倡罢工、罢课、我们提倡反对官僚主义，用批评的方法来解决。但是如果这办不到，对严重的、顽固的官僚主义者，用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等方法应该是允许的。他说：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等是克服人

民内部矛盾、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补充方法。他认为，少数人闹事要完全避免是不可能。六亿人口，一年有一百万人闹事是正常的，六分之一。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

毛泽东不赞成闹事，但既然闹事发生了，那就不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要草率收兵。他说：“对于少数人闹事，第一条是不提倡，第二条是有人硬要闹就让他闹。我们宪法上规定有游行、示威自由，没有规定罢工自由，但是也没有禁止，所以罢工并不违反宪法。有人要罢工，要请愿，你硬要去阻止，那不好。我看。谁想闹谁就闹。想闹多久就闹多久，一个月不够就两个月，总之没有闹够就不收场。你急于收场，总有一天他还要闹。”“这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把问题充分暴露出来，把是非搞清楚。使大家得到锻炼，使那些没有道理的人，那些坏人闹输。”又说：“对闹事的人要做好工作，加以分化。把多数人、少数人区别开来，”“除了大规模的真正的反革命暴乱必须武装镇压以外，不要轻易使用武力，不要开枪。段祺瑞搞的“三一八”惨案，就是用开枪的办法，结果把自己打倒了。我们不能学段祺瑞的办法。”

闹事是社会矛盾激化的表现，因此，应当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将坏事变为好事。

根据毛泽东多次讲话的精神，1957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指示说：“由于国内的敌我矛盾已基本解决，人民群众和他们的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显露出来了。”这是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的矛盾。一般他说。

应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解决，“不需要采有罢工罢课游行情愿这一类方式。采取这种方式，一般地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指示批评了有的领导者不了解或者不愿意承认官僚主义和工作中的错误是造成闹事的主要原因，而且往往混淆了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用类似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指示指出：为了防止罢工罢课一类事件发生，根本办法是随时注意调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关系中的存在问题。首先是克服官僚主义，扩大民主，其次是加强群众中思想工作。

今天的情况和1956~1957年时有很大不同，但少数人，“闹事”仍难以避免。毛泽东关于闹事的一系列论述，对我们仍不无启发。

## 五、警惕形成贵族阶层

毛泽东认为，匈牙利事件的发生，除了阶级斗争没有搞好，帝国主义挑拨插手外，从共产党自身来讲，主要是领导的教条主义、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业化方针的错误。因此，在匈牙利事件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十分注重正确处理领导与群众的矛盾，反对官僚主义，警惕出一个脱离群众的贵族阶层。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说：“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矛

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他在1957年2月27日的讲演中又说：过去我们跟人民一道反对敌人，现在敌人不在了，就剩下我们跟人民，他们有事，不向你闹，向谁去闹呢？向蒋委员长去闹吗？他到台湾去了。只有向工厂的厂长、合作社的社长闹，向乡政府、市政府、向人民政府闹。毛泽东的这些话实际上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在社会主义社会剥削阶级基本消灭后，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中，领导和群众的矛盾明显突出出来了，成了主要矛盾。

关于反对官僚主义、警惕出贵族阶层，刘少奇发表了很好的意见。他在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11月10日）的最后一部分，专门讲了防止领导人员特殊化的问题。他说：“鉴于若干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国家的领导人员有可能（也不一定啰）成为一种特殊的阶层，特殊的‘统治阶层’。”为了说明这一问题，他引用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国家有一部工人成了工人贵族阶层的论述。列宁讲过，英国这样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用剥削殖民地得来的利润的一部分收买工人，使这一部分成为工人贵族，脱离下层工人，不愿意革命了。刘少奇认为：“如果我们不注意，让其自流的话，在我们这些国家，也可能产生一种新的‘贵族阶层’。在工人阶级里面可以产生，在共产党里面也可以产生”。从刘少奇的报告可以看出，中央政治局常委们曾讨论这个问题。在报告里，他提出要采取措施，防止“贵族阶层”的出现。他说：“在教育问题上，毛主席讲，在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教科书里都要有进行这种教育的内容。在干部中间要用整风的办法进行教育。要批判特权思想、站在人民头上的思想、社会沙文主义的思想、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思想、官僚主义的思想。”

刘少奇提出：“以加强人民群众对领导机关的监督，订出一种群众监督的制度，使我们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接近人民群众。”“国家领导人的权力应该有一定的限制，什么事情他有多大的权力，什么事情不准他做，应该有一种限制。”

他进而指出：我们国家领导人员的生活应该接近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要过分悬殊。一些特殊待遇，也可以叫特权，应该取消。当时实行配给制，猪肉、花生米等供应紧张，一般人花生米买不到。刘少奇说：而我们是买得到的。这些事情我们不注意，不知不觉地享受了这些特权。人民没有提出来还不要紧，你们这些人有功劳，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吃点花生米算什么。一闹起事情来，一上马路，这个问题就大了。因此，这些特权，原则上应该取消。

就在这次报告中，刘少奇还引了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民主的一些办法比我们现在的办法更进步，提出资产阶级的有些制度也可以参考。关于这方面的详细情况，前面已论及。确实，在如何防止领导人员特殊化、加强对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和搞好廉政建设方面，可以借鉴资产阶级的某些制度。

关于领导与群众的矛盾，刘少奇也有许多精辟的论述。1956年12月4

日，他指出：“脱离群众是根本性的错误，是十分危险的错误。波匈事件就是脱离群众的结果。”1957年2月24日，他在同中共石家庄市、地委干部谈话时说，各方面提了很多矛盾，主要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从这次提的意见来看，对付敌人的意见不提了，而提的是人民内部的矛盾，都是批评领导，对领导提意见，一切问题集中到领导。由此可见，国家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集中到人民群众与领导者的矛盾。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突出了。阶级的矛盾降为次要的矛盾了。这是新情况，这是好事，因为敌人被消灭了，阶级矛盾在国内基本解决了。同年3月4日，刘少奇在中共河南省委部长、市委书记会议上讲：敌人消灭的差不多了，人民内部矛盾突出起来了，这是国内政治形势的一个基本特点。农民对社长不满，说合作社这样不好，那样不好，斗我们乡干部。工人斗厂长，意见提不完。学校也是这样，意见提不完。……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主要的表现为领导机关和人民的矛盾，更确切他讲是人民和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的矛盾，这个矛盾不是一时解决得了的，以后会长期有的，到共产主义也会有的。3月24日，他在湖南省委干部会上也讲了类似的话。他说：社会主义社会里面还是有矛盾，这许多的矛盾集中表现为人民群众同领导的矛盾，更确切他讲，就是跟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矛盾。分配不公也好，学生不能升学也好，什么事情搞得不好，都怪你们领导不好。归根到底，人民内部的矛盾表现为人民群众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矛盾。4月27日，刘少奇在上海市的党员干部大会上讲话中又说：“人民内部的矛盾，现在大量的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问题上。更确切他讲，是表现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这个问题上。”他认为，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人民群众与领导者的矛盾又是人民内部矛盾中的主要矛盾。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1957年3月25日）中说：“社会主义社会虽然消灭了过去的矛盾，但是它本身包含着新的矛盾，由于国内的敌我矛盾已基本上解决，人民群众和他们的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显露出来了。”4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审阅的题为《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社论，该社论着重谈了人民群众和他们的领导者之间的矛盾。社论说：“我们党和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必须通过各级领导者到人民中去贯彻执行。人民群众在生产中和生活中的很多方面是受着这些领导者管理的，而且他们的很多要求和需要也要通过这些领导者才能满足。因此，我们社会中的许多矛盾，往往通过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集中表现出来。”

领导与群众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中最普遍的一对矛盾，渗透在一切单位和部门，涵盖了所有的人。领导与群众的矛盾实质上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基本矛盾在人与人关系上的表现。领导者是国家的、集体的、全局的利益的代表者，也是群众的利益的代表者。领导者一般比较能从长远的、根本的、整体的利益上去看待问题。因此，领导与群众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但由于领导者主要从事领导管理工作，一般不参加生产劳动，因此，比较容易忽视群众的切身要求和各种具体情况。而群众则往往较多地从局部的、当时当地的情况去看问题，比较注重眼前的和个人的利益。领导与群众这一矛盾处理得好，从整个社会来讲就安定团结，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就

得到发挥，社会发展就迅速。从某一单位的生产、工作来讲，亦是这样。

有人担心，把领导与群众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的主要矛盾，是不是会导致群众把矛头引向领导？我认为用不着担心。首先这一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承认它是主要矛盾，那就能自觉的认识这一矛盾，正确处理矛盾，使领导者注意警惕自己的领导正确与否？工作作风、工作方法对不对头？有没有脱离群众，对群众的政治思想教育如何？这样，工作中就能立于主动。承认领导与群众的矛盾是要有一点勇气的。毛泽东曾在 1958 年成都会议上多次讲：“苏联强调一致，不讲矛盾，特别是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苏联现在敢于说人民内部矛盾，但不说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不承认这一矛盾，就陷入盲目性，就潜伏着引发更大的更尖锐的矛盾。这种教训国际国内都有。从以上可以看出，毛泽东及党中央对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搞特殊化等问题甚为警惕。在 1957 年的整风运动中，反对官僚主义被列为第一项内容。

为了防止脱离群众，形成贵族阶层，毛泽东在 1957 ~ 1958 年，大力提倡干部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参加劳动，打掉官气，要求中央和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委员每年要有四个月的时间到下面去调查研究，接触工人、农民，军队干部要下连队当兵，接触战士。1963 年，毛泽东又强调，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为了防止出少数人的“高薪阶层”，毛泽东提出：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和国家干部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

为了防止干部由人民的公仆变为骑在人民头上的官老爷，毛泽东十分注重广大群众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1945 年 7 月，黄炎培等五人访问延安。黄炎培对毛泽东说：在历史上，真所谓“其兴也忽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他希望中共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建国以后，毛泽东一直在注意这一问题。“三反”“五反”、整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至“文化大革命”，从毛泽东的主观愿望来讲，都是为了跳出这周期率。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主张用自下而上的方式发动群众揭发党和政府的黑暗面是错误的，应予以否定。但其中发动群众对广大干部、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实行民主监督这一精神还是合理的，不应否定。官僚主义者，以权谋私者，蜕化变质者，最害怕的是人民群众。用大民主的方式进行群众监督不可取。用怎样的方式来实行广大群众对干部的民主监督呢？这需要加以总结、研究。

为了防止出贵族阶层，毛泽东很注意干部子弟的教育问题。早在 1952 年，他就批示：“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

---

黄炎培：《延安归来记》，国讯书店 1945 年 7 月版，引自《毛泽东访问记》，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0 年 12 月版，第 116 页。

毛泽东：《致周恩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437 页。

书谈话时（1959年12月～1960年2月）他又说：“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警惕，如果我们及早注意是可以解决的。”1964年，他在同王海蓉谈话时又讲了相类似的话。1967年毛泽东还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讲了《战国策》上触蓍说赵太后的故事，告诉干部不要溺爱自己的子女。他说：《触蓍说赵太后》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毛泽东建议大家读《触蓍说赵太后》这篇文章。

可以说，警惕党内形成一个脱离群众的“贵族阶层”是毛泽东晚年经常思索的问题之一。但由于对政治形势的错误估计，过分夸大了党内存在的阴暗面，他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误。1964年12月，他认为，党内已形成了一个与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尖锐对立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进而又提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这样，一个十分深刻的思想因脱离了中国社会实际而变成了谬误。同时，毛泽东主要是想通过阶级斗争来防止出“贵族阶层”，而忽视了从制度上加以研究解决。

总起来说，1956～1957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暴露还不充分，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还缺少成功经验，因此，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论述还是初步的，还有待于以后进一步补充、修正、完善和发展。令人遗憾的是，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认识未能沿着正确的方面继续发展，而是将本来是正确的理论作了过分的夸大从而陷入了迷误。

#### 第四节 “反右运动”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 一、“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

斯大林在农业集体化完成后就宣布，苏联社会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已经解决，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依据苏联的经验，毛泽东在1955年也认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在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亦将基本解决。1956年9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八大”，总结了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明确宣布：“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八大”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说：阶级斗争虽然没有完全结束，“但是，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中共“八大”标志着我国开始进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以前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主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为主上来。

中共“八大”贯彻了《论十大关系》的基本精神。“八大”所做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今后主要转向建设的结论，完全反映了毛泽东的思想。在“八大”期间。9月18日，毛泽东在接见英国共产党代表团时谈了他对斯大林犯错误原因的看法。他说：在斯大林时候，阶级斗争没有了，社会进入了没有阶级的社会，反革命更少了，但是斯大林的思想仍停留在旧社会时。我认为，这样才能解释他的错误。9月22日，他在接见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时又说：苏联在阶级消灭以后当国家机构的职能丧失十分之九时，当阶级斗争已经没有或已经很少的时候，仍找对象，大批捉人杀人。客观形势已经发展了，社会已从这一阶段过渡到另一阶段，这时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人民已经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生产力，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的时候，但是在思想上没有认识这一点，还继续进行阶级斗争。

这就是错误的根源。毛泽东的这一分析大体上是正确的。二十年后，人们完全可以用同样的话来说明他晚年所犯错误的主要根源。

那末，毛泽东既然认识了斯大林犯错误的根源为什么又重蹈斯大林的覆辙呢？他又是怎样重蹈斯大林的覆辙呢？“八大”开过后一个月，发生了匈牙利事件。这件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人们往往将苏共“二十大”与匈牙利事件连在一起讲，其实，这两件事对毛泽东和中共领导的影响是不完全相同的，甚至可以说是具有重大差别的。苏共“二十大”对毛泽东和中共的影响主要是：解放思想，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批判教条主义，防止阶级斗争扩大化，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匈牙利事件的主要影响则是：使毛泽东脑中刚刚松弛了的阶级斗争这根弦又重新开始绷紧起来，不仅批评教条主义，还要批评修正主义。毛泽东在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说：“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

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清敌我，这很危险。”他的这一分析不无道理。从当时公布的材料看，在匈牙利事件中旧时代的反动分子在国际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猖狂进行阶级报复，屠杀共产党人。镇反不彻底确实是发生匈牙利事件的重要原因之一。帝国主义在匈牙利事件中的活动，“是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以后对于社会主义阵营一次最严重的进攻。”匈牙利事件给了共产党人十分有益的教训：“尽管我们一贯主张而且继续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应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帝国主义者还是时时刻刻都想消灭我们。因此我们无论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敌人同我们之间的严重的斗争。”这些话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国际上的阶级斗争会影响到国内。1957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讨论思想动向问题、农村问题、经济问题。从毛泽东在会上的两次讲话中可以看出，他所关注的主要是思想动向问题、阶级斗争问题。毛泽东根据下面反映上来的情况指出：从1956年下半年开始，少数社员闹退社，党内外刮起一股合作化没有优越性、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的歪风；受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的影响，在一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中有各种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怪议论，有些人想复辟；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对坏人坏事的斗争，是长期的，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他还认为，党内干部中少数人也是动摇的，过不了社会主义关，苏共二十大及匈牙利事件把党内的蚂蚁引出了洞。他提出，要准备出大事，准备出全国性的大乱子，甚至准备再回到延安去。“如果我们搞得不好，历史走一点回头路，有点回归，这还是很可能的。”为了避免出大事，他认为必须反击歪风，打的办法是说理，对重大问题要作好充分准备。书记要管好报纸，亲自写文章。他敏锐地觉察到1956年下半年以来，有一股右倾机会主义的风在地面之上云层之下流动，党内外有一股反社会主义的逆流。他要全党提高警惕，这是正确的。问题是他对这股逆流估计太过头了。

匈牙利事件后，毛泽东头脑中的阶级斗争这根弦虽然有所绷紧，但他对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一点并没有改变。1956年12月8日，他在同全国工商联二届一次委员会代表大会部分代表座谈时说：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都是为建设扫清道路，都是方法问题。要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加以改变，把政府、意识形态、法律、政治、文化、艺术这些上层建筑加以改变，但是还没有解决基本问题。目的不在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一个新的生产关系，目的在于发展生产。7年来发展了一些，但是很少，吹牛可吹半天，实际上只有400万吨钢，明年只有500万吨钢，再5年只有2000万吨。

我们国家6亿人口，比日本、法国可以超过，但赶上美国1亿吨钢要40~50年才有希望。请大家把目标转向这个方面。

1957春天，毛泽东在一系列会议和座谈会上大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3页。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

1958年3月25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在1957年1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我当时的注意力在思想动向方面”。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3页。

和“双百”方针。他讲话、谈话的基本思想是：过去我们做的工作是以阶级斗争为主，不是以建设为主，现在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主要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向自然界开战，搞建设，学科学。

3月17日，毛泽东在天津党员干部会上讲：在过去，我们几十年，主要的工作就是阶级斗争工作，还不是建设工作。现在阶级斗争这件工作基本上结束。所谓基本结束就不是完全结束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我们“八大”上面说了。我们党要求搞建设，要学科学，要学会当教授、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医生，跟自然界做斗争，要把中国这个面貌加以改变，政治面貌改变之后，必须使经济面貌加以改变。

3月18日，在济南山东省机关党员干部会上又讲：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城，八大作了结论，这个结论是合乎情况的。他也再次说明，所谓基本结束，就是说还有阶级斗争，特别表现在意识形态一方面。只是基本结束，不是全部结束，这一点要讲清楚，不要误会。这个尾巴是拖得很长的，特别是意识形态这一方面的阶级斗争。他还说：社会主义社会、资本主义两种制度谁胜谁负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社会主义基本上胜利了。但是还没有最后胜利，还没有巩固，最后胜利还要有一个时期，大概两三个五年计划。

3月19日，他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作了同样内容的讲话。他在这次讲话的提纲中明确提出：现在处于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讲话中他又说：这个世纪，上半世纪搞革命，下半世纪搞建设。这个世纪还有40年，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

4月30日，他在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谈话时最后说：过去作的是阶级斗争，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都是如此，是人与人开战，人打人，人内部造反，花了几十年的精力，如从鸦片战争算起，已经百余年了。阶级斗争以后还会有的。现在进入另一种战争，就是向自然界开战。现在学建设的新战争，要从头学起，能不能学会，肯定可以学会。”“总的说来，是新的时代和新的任务，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了，向自然界开战。”

毛泽东在2月27日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中虽然已隐含着上述思想，但还没有明确讲到现在主要任务是向自然界开战。6月19日，该讲话在《人民日报》公开正式发表时则明确增补上了类似的话。

总之，毛泽东在1957年春关于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还没有全部结束（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是长期的）的论断是正确的，它既不同于阶级斗争熄灭论，又不同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毛泽东明确提出党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为主转到向自然界开战为主是十分必要的。但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使他改变了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看法，陷入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

## 二、“反右运动”与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变化

如前所述，毛泽东在1957年1月认为，对社会上存在的一股反社会主义的逆流应当加以反击，但他并不想搞一场政治运动，而较多的是想通过政治思想教育、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解决。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事实上，整风在此之前早就开始了。自1956年提出“双百”方针后，尤其是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后，党内外各界人士向共产党提出了大量的批评与建议。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约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他说：“需要造成空气，没有种空气是不行。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目，分析各方面的矛盾”。他说，统战工作中的矛盾，几年不得解决，如有职无权等，现在可解决了。关于学校实行党委制问题，他说，现在看来恐怕不合适，要改一下，这个问题要研究。

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指示说：两个月来，“大多数的批评是谈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对错误的批评要进行反批评，不应听任错误思想流行，但要研究回答的时机，并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有充分说服力。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中央统战部在5月分别召开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座谈会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国务院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一些高等学校的党委也相继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当时，虽然有些人对向共产党提意见还有顾虑，但由于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国内民主空气高涨，所以多数人还是敢说话的。陈叔通说：现在的争鸣气候好像是“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罗隆基则续上两句：“一片整风声，三害除多少。”5月22日，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上就研究如何帮助共产党整风时，龙云说，过去几个大运动都是共产党整人，现在是不是测验大家的思想，以便以后整人？他认为不是的。现在时机不同了。大家知道，共产党想办法改正错误，共产党是执政党，怎么会出尔反尔，开这样大的玩笑，让大家把思想暴露出来，然后再整风。翁文灏则说：目前最主要的是鼓励民革成员大胆“鸣”“放”。《人民日报》报导了统战部召开座谈会的发言。从报导中可看出：座谈会上的气氛是活跃的，也有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发言的主要问题是：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参加政府工作有职无权问题，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问题，高等学校是否应实行党委制问题，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两面性问题，定息是不是剥削问题等。

当时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一书中写道：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两个座谈会上，党外人士对党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其中大部分是正确的、很好的，有的批评可以是切中时弊。如张奚若5月15日发言，批评党内滋长骄傲情绪，主要表现是：好大喜功（误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大），急功近利（强调速成，把长远的事用速成的办法去作），鄙视既往（轻视历史继承性），

一切搬用洋教条），迷信将来（认为将来一切都是好的）。陈叔通在5月16日发言中提出：“矫枉必须过正”是否永远都是金科玉律，值得怀疑。希望领导上认真总结一下，是保守思想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的损失大，还是盲目冒进造成的损失大。刘斐、杨明轩提出，党政要分开，不能以党代政。熊克武等提出，要发扬民主，健全法制，抓紧制订民法、刑法和各种单行法规。还有人提出应重视和发挥党外人士、工商界和知识分子作用，办大学要

依靠专家学者，建立规章制度，使党外人士、私方人员有职有权，……等等。

李维汉接着回忆道：但是，在座谈过程里，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大肆散布反党反社会的言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猖狂进攻，掀起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他列举六个方面的内容：（1）他们错误估计了形势，攻击共产党的领导，胡说什么“现在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形势非常严重”，共产党已经“进退失措”；（2）他们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制度，没有优越性，诬蔑我国国内“一团糟”；（3）他们全盘否定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绩，否定历次政治运动；（4）他们反对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粮食统购统销等根本政策，他们反对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鼓吹资产阶级的新闻路线，提出私人办报，办新闻社；（5）他们攻击讲优点和成绩的人是歌功颂德，造成一种只许讲缺点错误，不许讲优点成绩的空气，而且把官僚主义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把宗派主义说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物和代名词，把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6）他们反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否认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本质区别，不承认资产阶级分子有继续改造的必要性，公开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公私合营企业，叫嚣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应当指出，李维汉的这种概括是指整个反右运动中反映出的问题而言的，并非全是依据5月座谈会上发言。

李维汉讲：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并没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的，不是“引蛇出洞”。两个座谈会反映出来的意见，我及时向中央常委作了汇报。那么毛泽东反右思想是怎样形成的呢？李维汉说，五月中旬，汇报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时，已经放出了一些不好的东西，什么“轮流坐庄”、“海德公园”等谬论都出来了（按：这些话，报上的报导中没有见）。毛泽东警觉性很高，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们自己头上，决定把会上放出来的言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并且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当我汇报到有位高级民主人士说党外有些人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泽东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李维汉说：在这次汇报之后，我才开始有反右的思想准备。及至听到座谈会的汇报和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之后，毛泽东在5月15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学习。

罗隆基的“马列主义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的话给毛泽东很强烈的刺激和很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多次谈到罗隆基的这句话。1957年10月9日，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讲：罗隆基说，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怎么能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他这个话不对。他说他是小资产阶级，其实他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是要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10月13日，他在最高国务会上又讲述过类似的话。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他一开头就尖锐批评了党内存在的修正主义，然后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

---

详见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831～834页。

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9页。

毛泽东：《坚定地相信群众大多数》，《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85页。

党的领导，对于右派说来都是假的，切记不要相信，不论是民主党派内的右派，教育界的右派，文学艺术界的右派，新闻界的右派，科技界的右派，工商界的右派，都是如此。”右派“不过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在整风运动中。“毒草共香花同生，牛鬼蛇神与麟凤龟龙并长，这是我们所料到的，也是我们所希望的。”“党内外的右派都不懂得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和党中央下了反击右派的决心。但这篇文章党外人士并不知道，所以许多人在5月15日以后继续大胆鸣放。

这里应当指出：从《人民日报》的报导中虽然可看出有些言论是错误的，甚至有的确有怀疑、摆脱共产党领导的倾向，但从整个报导看，很难得出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结论。毛泽东根据什么材料讲“猖狂进攻”就不得而知了。

还应说明，在反右派运动中一些当作典型的右派言论不是在5月15日以前“放”出来的，而是在5月15日以后“放”出的。民盟副主席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是在5月21日“放”的。他说：“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他在这次发言一开头就说：在整风运动中，“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民主精神，已经得到极大的效果，这在中国政治史上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都是一件新鲜事。”“就我接触到的朋友来说，大家的看法基本接近，都认为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缺少的，党是可以从政治上领导科学的。”他认为“鸣放，并不影响共产党的领导，而是愈益提高共产党的威信。”

民盟副主席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是5月22日放出的。他说，有人提出要党提出保证，在他们对党进行批评以后不致在将来受到打击报复。罗隆基认为，要毛主席出来讲话保证，那是笑话。但他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個具体方案，这就是由有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核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这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方面的人士。他认为过去的“五反”、“三反”、“肃反”虽然有很大成绩，但也发生了副作用，使人不敢讲话。过去运动中受了委屈的，要给他们“平反”，就可以使他们减少同党和政府的隔膜。他在讲平反委员会前，先讲了这次争鸣是健康的，大家虽然提了不少意见，但并没有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鸣”和“放”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根据党中央的整风指示，集中批判三个主义。他说：通过这次整风”，“党加强了，民主党派也提高了。”

又如，《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党天下”是在6月1日会上，亦即是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的最后一次会上放的。储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意见”为题发言说：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拥

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他认为，这个问题的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上。他说，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一点。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储安平说，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他又说：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个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去了。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这样的安排可以不可以研究？最后他说：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期对国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其限度。因此，他认为党群关系的协调，党外人士的安排，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中共中央在5月14日发出的关于报导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批评的指示中说：“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导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导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近来我们许多党报，对于一些反共的言论加以删节是不妥当的”。前面所引用的都是5月14日以后的《人民日报》报导。我相信，这种报导，对“反动言论”是不会有删节的。

高等学校中的鸣放，开始在教师中间进行。5月19日，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在大饭厅墙上贴出第一张大字报，从此学生参加进来。大字报骤增，各种意见蜂起，有的人无所顾忌地发表错误的、甚至反动的言论。学校中也出现了辩论会，但没有停课。

6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从此，开始了全国性的反右派性运动——一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

据李维汉回忆：对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的某些负责人在一开始就表示不满，提出不同意见。黄炎培6月15日表示，不要树敌过多，要把可能拉过来的人拉过来，而不要把这样的人推到反党这一派那里去。陈叔通6月中旬说：不能因为对党提了意见就作为右派。党的某些领导人没有掌握好这一点，现在问题很严重。邵力子说，现在有许多问题处理的方法太硬，得人心很难，失人心很易，表示对民革中央的反右派斗争要来个沉默抵抗。

史良表示不赞成把揭发右派分子的材料登在报上，担心这样做运动搞得很大。6月下旬，李济深表示他要在人代会上发言，提出不要骄傲自满，困难很多，还要努力。这表明，反右运动一开始就受到党外的爱国民主人士的

抵制、反对。不过，对这些忠言，毛泽东和党中央并没有听进去，反右斗争继续升温。

毛泽东在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7月1日）中把民盟和农工民主党在百家争鸣和整风过程中提意见说成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反人民的”，认为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伯钧）、罗（隆基）同盟”。毛泽东对形势的这种估计和判断是不符合实际的。

应当说，当时中国的春季总的来讲并没有形成黑云乱翻的局面。有没有阴雨天？肯定是有。有没有黑云？肯定也是有的，但并非毛泽东估计的黑云乱翻，不过是在晴朗的天空上飘过几团乌云而已。章伯钧、罗隆基两人长期有隔阂、矛盾，很难说有“同盟”。至于把两个民主党派向党提意见打成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反共反人民的性质更是错误的。

由于对形势估计的错误，过分夸大了右派的势力，反右斗争严重地扩大化了。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讲，右派只有极少数，大学生中只有百分之一、二、三，教授、副教授中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有的单位机械执行上级指示，按百分比分配右派，抓右派，硬在没有右派的地方抓右派。结果全国共划右派55余万人。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半数的失去了公职。相当多的人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少数留在原单位的，也学非所用，给国家和个人都带来了不幸。

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毛泽东虽然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但事实上无法做到。

1978年9月，中共中央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复查，把错的改正过来。全国改正的共有54万余人（其中有些人是从宽处理的），维持原案不予改正的只有五千余人（其中不少人有其他问题）。

对反右派运动怎么看？1980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在批转中央统战部的《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中说：复查结果表明：“1957年确有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确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分子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猖狂进攻，对这种思潮进行批判，对这种进攻进行反击是完全必要的。1957年的反右斗争，在全国人民中间澄清了根本的大是大非，稳定了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个方面。但是随着斗争的发展，反右派斗争确实扩大化了，把一大批人错划为右派分子，误伤了许多同志和朋友，其中不少是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打击面宽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大批人处理得不适当。许多同志和朋友因而受了长期的委屈和压制，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这是又一个方面。中央认为，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两个方面，才是历史地全面地看待这场斗争，只看到一个方面，而否定另一个方面，是不符合实际的。”中共中央还指出：属于改正的情况大体有三种，（1）一部分是出于

---

1957年6月29日，毛泽东认为，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北京大约400人左右，全国大约4000人左右。十天后，又提出：右派骨干名单扩大一倍，北京约800人，全国约8000。9月，八届三中全会时，已划右派6万余人。他讲：最多15万人。55万右派是毛泽东没有想到的。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96页。

善意，提出的许多批评意见，现在看来是有利于改进工作的，把他们划为右派是完全搞错了，当然必须改正。（2）一部分人在涉及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问题上，发表了一些错误的言论，但不是根本立场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把他们划为右派也是错误的，也应改正。（3）还有一些确实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但是考虑到他们同向党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在程度上和情节上有所不同，也考虑到他们后来确有转变，在这次复查中，也给他们改正过来。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应当承认，在当时社会上确有一股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的右的思潮。这从5月份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中也可得到印证。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在5月15日的座谈会上说：目前有些批评，不够实事求是，有否定一切的现象。他认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不能光讲坏处，好处一点不说。如现在对北京大学的批评，坏的地方说得很详细，好的地方一点也不说，这是无法令人信服的。针对有人提出的取消学校党委制，他认为，党委制有它的好处，学校中的党委制无论如何不能退出。5月22日，陈劭先在民革中央小组的扩大会上讲：现在各地都“鸣”“放”，有放的好的，有放的不好的。今天帮助共产党整风，应本着爱党的精神，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从报纸上看，有些人在发表的意见中。有摆脱共产党的领导的想法，他认为这是不好的。他说，不要把整个共产党都说成是宗派主义的，那样就说不到长期共存了。他认为，一方面要大胆地“鸣”“放”，一方面也要防止反党倾向。我认为，马寅初和陈劭先的发言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他们在说这些话时并没有了解到毛泽东在5月15日写的文章的内容。卢郁文（国务院的秘书长助理）在5月25日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的发言中说：拆“墙”是两方面的事，并且不同意有些人只许批评中共，不许批评批评者的主张。他还说：在提出批评和建议时不要忘记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民主，要区别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警惕摆脱党的领导的思想。后来，卢郁文收到匿名信，辱骂他“为虎作伥”，是“无耻之尤”，并恫吓他“及早回头”，否则“不会饶恕你”。这从另一方面说明，确有一些人借共产党整风之机反对党的领导。

在鸣放过程和整风过程中确实出现右的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否认这一点是无视历史事实。对这些言论进行批评、反击是必要的。但当时把许多不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错认反党反社会主义，结果极度夸大了极少数极少数右派分子的势力。从当时的国内情况看，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是高的，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是充满信心。民主党派的大多数负责人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是心悦诚服的。他们批评共产党不是想搞垮共产党，不是想取代共产党的领导，而是希望共产党领导得更好。虽然受苏共二十大、匈牙利事件和国际帝国主义掀起的反社会主义浪潮的影响，国内有极少数人要求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打着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号下批评马克思主义。但从当时的客观形势看，没有必要划一大批右派分子，而是可以通过正面的思想教

育和对确实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批判来提高全国人民的觉悟，击退极少数人的进攻。

反右斗争严重扩大，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是由于受匈牙利事件的影响，毛泽东过分夸大了资产阶级的力量，低估了各民主党派和广大知识分子的进步。他又采用对敌斗争的“引蛇出洞”和“放长线、钓大鱼”的策略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如前所述。毛泽东在1957年1月就认为，社会上、党内外有一股反社会主义的逆流，要打退这股逆流。但他并没有打，他明白，经过解放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知识分子成了惊弓之鸟，没有一定的气候是不轻易鸣放的。所以毛泽东在2至4月间的讲话、谈话中虽然也讲阶级斗争没有完，有毒草就得批评，虽然也批右的言论，但总的基调是轻松的，阶级斗争气息不浓，是鼓励大家鸣放，认为现在是放的不够。他这样做，用他后来的话说，是“有意识要缓和一下”。为了让人们把大量的“毒素”吐出来。他一再向干部打招呼：要硬着头皮听，让人把话讲完，统统倒出来，而不要急于批评。他认为，共产党整风，就是主动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1957年大量的“右派”就是这样主动引出的。错误的实践在未被认识到错误之前，反过来又会影响到理论上的错误。反右派运动的一个严重后果是使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认识出现了严重的失误。这主要表现为重新恢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反右派运动以前，如前所述，毛泽东反复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已基本解决，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说基本结束，就是还没有完全结束，特别是在思想方面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在反右过程中，他的认识起了变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发表时加进了：在我国，“被推翻的地主阶级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到了7月，他写道：“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他还认为：“和城市一样，在农村中，仍然有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斗争，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取得彻底胜利，这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到了这年十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时就提出，对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提法，仍应回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按：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会议讨论过程中，不少人认为应坚持“八大”的观点。在全会的最后讲话中，毛泽东作了结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

---

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5页。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9页。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1页。

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夏季的形势》，《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8页。

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他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他批评“八大”决议上关于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说法是不对的。

毛泽东的这一“左”的错误理论埋下了日后进一步犯阶级斗争扩大化，以至发展到搞“文化大革命”的根子。

### 三、对知识分子的错误估计

1957年的“右派”言论绝大部分是从知识分子中鸣放出来的。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错误是同他对知识分子的错误估计直接相联的。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是重视知识分子的，认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他同党内一部分干部中存在的恐惧、排斥、轻视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斗争。由于对知识分子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大批爱国的、进步的、革命知识分子来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积极参加革命。毛泽东本人也很注意同文化人交朋友，深得文化人的尊重与信赖。建国初期，我们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也是正确的。取得了好的效果，不仅调动了国内的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而且吸引了一批在国外工作的高级知识分子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为了适应由阶级斗争为主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主的新形势，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于1956年1月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系统论述了知识分子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关系，正确地分析知识分子的现状，批评了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错误，提出了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和政策。他指出：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经过建国以来的一系列运动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在分析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时指出：在高级知识分子中，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缺乏政治觉悟或者在思想上反对社会主义的落后分子约占百分之十几。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占百分之几。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到会讲了话，他批评了一部分同志轻视知识分子的错误。他指出：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单靠我们老粗是不行的。这些话是聪明的话，要向广大干部讲清楚。现在打仗，飞机要飞到一万八千公尺的高空，超音速，不是过去骑着马了，没有高级知识分子是不行的。现在我们看出这件事，就可以开始主动。要有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要有更多的普通知识分子，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接近世界水平，然后赶上世界水平。这次会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

虽然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讲了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但这种认识并不牢固。1957年12月13日，刘少奇在关于统一战线政策方针的若干问题的谈话中，在讲到对知识

---

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5页。

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2页。·99·

分子的估计时说：“八大起草报告时有不少人不同意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认为这样提把知识分子划到资产阶级方面不策略。……难道你们不是”。当时有这种估计：似乎多数知识分子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同意是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也还是资产阶级，性质一样的，只不过小一点。”刘少奇的这些话说明：在“八大”时不承认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所以在“八大”政治报告中也不可能重述全国知识分子会议的论断。政治报告只是说：“由于我们党做了长期的有系统的工作，我国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同工人农民结成了亲密的联盟，并且有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变成了共产主义者，加入了我们的党。”“八大”政治报告的这种模糊的说法，实质上是认为，多数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而“继续贯彻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

匈牙利事件后，毛泽东及党中央十分注意知识分子动向。毛泽东对知识分子中间出现的怪议论颇为警觉。他虽然肯定大多数知识分子是爱国的，愿意为人民服务的，对我国抱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但同时又说：“我们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因此他强调的是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他在1957年1月说：“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安排很多，改造很少。”后来又讲：“资产阶级和曾经为旧社会服务过的知识分子的许多人总是要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总是留恋他们的旧世界，对于新世界总有些格格不入。要改造他们，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不可用粗暴的方法。”有时他把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对立起来，他说：“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他认为知识分子最容易翘尾巴，但是决定大局的不是知识分子，而是劳动者，是无产阶级。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主要整的是知识分子，结果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受到压抑和打击，向科学进军也大受影响。

在1961~1962年，“左”的知识分子政策曾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1962年3月，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广州会议，对知识分子进行“脱帽加冕”，即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宣布他们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但是，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把一批长期在党内从事理论工作、文艺工作的知识分子打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则不仅把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且把建国以后共产党领导下培养出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也看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认为解放后的十七年，学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一统天下。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给知识分子摘去资产阶级的帽子，宣布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毛泽东把大多数知识分子当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与他在知识分子

---

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40页。

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40页。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9页。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8页。

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6页。

毛泽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毛泽东选集》第452页。

阶级属性标准上的错误有直接关系。

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是一个阶层。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他们中的大多数同一般的体力劳动者一样是受雇于资本家阶级的，是受资本家剥削的。马克思把受雇于资本家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的教师、演员、作家等称作为“纯粹的雇佣劳动者”、“生产劳动者”。马克思是以知识分子在生产关系的地位来判定其阶级属性的。在民主革命时期，作为革命家的毛泽东是依据知识分子所依附的阶级来判定阶级属性的。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把广大的知识分子列为小资产阶级范畴，在解放战争时期又将和体力劳动相近的、不剥削他人而受人剥削的脑力劳动者列为劳动人民，把广大的知识分子看成是民主革命动力之一。1957年，毛泽东从政治上和世界观上这两方面分析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他指出：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是爱国的，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有少数知识分子不欢迎社会主义制度，但他们是爱国的；只有极少数的（占总数的百分之一、二、三）对社会主义国家抱敌对的情绪，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毛泽东的这种分析与1956年周恩来在全国知识分子会议上的分析相一致的。从世界观上来看，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看，他认为，赞成而且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的是占少数；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也占少数；大部分属于中间状态，赞成而不熟悉。毛泽东的这种分析大体也是符合那时的实际情况的。问题是他把世界观作为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标准。如前所引述的，他认为从旧社会过来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他们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因此，他们属于资产阶级范畴。他又认为，没有必要区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两者的世界观没有区别。这样一来，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却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显然是错误的。拿世界观作为划定人们阶级属性的标准是不科学的。按照这种标准，不仅在知识分子中，就是在工人、农民中，真正熟悉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也是极少数，但我们决不能就此将绝大多数工人农民划为资产阶级分子。我认为，只能按照知识分子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和他们的政治态度来确定他们的阶级属性。在社会主义社会，知识分子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关于划分知识分子的标准，在党内是有不同的看法的。从李琪（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在1962年11月给彭真的信中可看出：有一部分同志不赞成以世界观作为划分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标准。李琪提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划分成分，确定一个人的阶级属性，主要看他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作用和政治态度，即为谁服务，而不是根据意识形态。如果只用意识形态来划分阶级，就会把许多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人划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从而使政策脱离了实际，脱离了人民。”李琪的意见是正确的。关于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标准问题未能展开讨论，正确的意见没有得到发表与传播。

毛泽东讲过知识分子最无知识，但我们不能由此就认为他反知识、反知识分子，否认知识分子在现代建设中的作用。毛泽东把广大知识分子定为资

---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2、443页。

李琪：《关于划分知识分子的阶级成分问题》，《李琪文集》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654页。

产阶级知识分子，但他同时也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离不开知识分子，所以他提出，对知识分子要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他认为，知识分子要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通过与工农群众相结合，通过自己的工作实践，在思想感情上，世界观上来一个彻底转变，转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他向全党提出了建立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部队的历史任务。他说：“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真正经过改造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

毛泽东在 1957 年对知识分子估计的错误是一个带有原则性的错误。这不仅挫伤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创造性，而且影响到他本人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看法。“文化大革命”从学校开始，这是同他对知识分子的错误看法相联的。在否定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错误时，我认为要注意：（1）在 1957～1966 年间，毛泽东和党中央对知识分子政策虽然有“左”的错误，但总的来讲还是对的。（2）毛泽东提出的知识分子要学习马克思主义、与工农相结合、改造世界观等思想是正确的，不应否定，在今天仍然是需要的。

#### 四、反对教条主义与反对修正主义

从 60 年代开始，反修防修成了毛泽东的头等大事。而他的反修思想可以说萌发于 1956～1957 年。

列宁逝世后，在斯大林领导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教条主义盛行，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深受其害，同它进行了斗争。中国革命是在同国际共运中的教条主义斗争中取得胜利的。苏共二十大，揭了斯大林的盖子，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批评教条主义的潮流。中国共产党也认为，斯大林的错误是属教条主义性质的，有必要批评教条主义。1956 年 4 月 6 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写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一文说：我们“必须从苏联共产党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中吸取教训，继续展开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我们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带着教条主义的习气，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一条绳子上面，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精神”。“从提高人民群众的自觉、鼓舞人民群众的生气勃勃的首创精神、促进实际工作和理论工作的迅速发展等方面说来，破除教条主义的迷信，现在仍然是必要的。”

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是有所保留的：不同意全盘否定斯大林，不同意在未同兄弟党打招呼前就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批评斯大林，不同意“和平过渡”等。苏共二十大后，尤其是匈牙利事件后，国际上出现了一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逆流，一些国家共产党的党员退党。根据这一新情况，毛泽东在批评教条主义的同时，提出要批评修正主义。

他在 1956 年 11 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我看有两把“刀子”，

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杜勒斯就拿出来耍了一顿。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我们中国没有丢。他接着又说：我看列宁这把刀子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以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基本上丢掉了。

毛泽东的批评有合理的一面，即不能全盘否定斯大林，全盘否定，到头来否定了苏共的历史，否定了自己，为反动派所利用。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写成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章提出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文章说：“斯大林的错误的一个严重后果是教条主义的发展。各国共产党的队伍在批判斯大林错误的同时，展开了克服教条主义的斗争。这个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一部分共产主义者由于对斯大林采取了否定一切的态度，由于提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口号，因而帮助了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这种修正主义的思潮无疑是有利于帝国主义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进攻的，而事实上，帝国主义也在积极利用这种思潮。我们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文章指出：在借口反对教条主义而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们中间，有些人索性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之间的界限，否认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界限，否认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界限。这篇文章重点显然是在批评修正主义，但文中还没有公开明确提出：修正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

1957年春天，毛泽东在许多讲话、谈话中批评了国内的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如3月10日，他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中说，“目前思想偏向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特点是否定一切，教条主义则把凡有怀疑的都一棒子打回去，肯定一切。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都是片面性，都是用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去片面地孤立地观察问题和了解问题。”他认为，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如前所讲，那时，他把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作为否定一切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典型，把陈其通等人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意见》作为教条主义的典型。他虽然两种倾向都批评，但重点是在批评教条主义，批评教条主义怀疑“双百”方针，批评教条主义用粗暴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他尖锐地指出教条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就在3月10日的座谈会上，他说：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即2月27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所谈的问题，本来在心里积累了很久，去年已经讲了几次，后来又看了些事情，看了陈其通、马寒冰他们的文章，想到会有人以为他们的文章是代表中央意见，因此觉得有好好谈的必要。1957年的整风主要整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在2~3月时，毛泽东把整教条主义当作反对主观主义的重点。他在3月8日同文艺界的谈话时说：整风整主观主义，重心放在教条主义。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也说：整风的目的就是要批几个东西：一个是主观主义，主要是教条主义；第二是宗派主义；还有一个是官僚主义。

总之，毛泽东在2~3月间虽然也批右倾思潮，认为前年反右倾，去年反“冒进”，反“冒进”的结果出了一个右倾（主要是指社会主义建设上），但总的倾向则以批评教条主义为主。正是因为这样，当时知识界认为是争鸣的春天。现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有关批评修正主义的文字是在发表时增补进去的，最初的讲话中并没有。

到了5月中旬，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修正主义比教条主义更危险。他写道：在共产党内，“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克服了这种片面性，他们就会大大进步。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应当受到批判，不批判教条主义，许多错事不能改正。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他认为，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一些工作中的错误。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他们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区别，他们混同反映社会主义国家集体经济的新闻事业与反映资本主义国家无政府状态和集团竞争的经济的新闻事业。他们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他们赞成民主，反对集中。他们反对为了实现计划经济所必需的对于文化教育事业（包括新闻事业在内的）必要的但不是过分集中的领导、计划和控制。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兄弟。”从此以后，他重点转向批判修正主义。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参加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他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讲话中指出：我们需要同时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这两种错误倾向，“而在目前，反对修正主义的倾向尤其是迫切的任务。”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提议，莫斯科宣言中写进了“在目前条件下，主要的危险是修正主义，或者说右倾机会主义。”“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

如何评价“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的论断。我认为，在苏共二十大后、尤其是匈牙利事件之后，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确实有右的东西，有修正主义，这是不足为怪的，是很自然的。毛泽东提出在批判教条的同时要批判修正主义，提醒人们警惕修正主义，这也是正确的，表明他有很高的警觉性。他关于产生修正主义国内和国际根源的论断是精辟的。但他把修正主义作为当时的主要危险则是脱离了当时实际的。毛泽东所指的修正主义，主要是指铁托、赫鲁晓夫。铁托在批评斯大林的错误时，确有过头之处。赫鲁晓夫的某些言论确有不正确的地方。但他们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是应当肯定的。从总体看，他们并非是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修正主义者。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看，批评斯大林的教条主义还刚刚开始。对几十年间形成起来的教条主义要扫除掉是不容易的，教条主义仍然是主要的思想障碍。毛泽东把

修正主义视为主要危险，一方面反映了他对斯大林教条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严重影响估计不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本人对马克思主义有教条主义理解的地方。

“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的论断所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支配了毛泽东的整个晚年，直到去世。毛泽东是教条主义的敌人。他同斯大林的教条主义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他喜欢创造性。但他的思想又未能完全摆脱列宁以来逐渐形成的传统，即把一切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左的言论行动都视为修正主义。他本人不迷信任何教条，可是无意之中他把自己的言论当作教条，把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当作是正宗，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而把他人不同的理解与解释视为旁门左道。在 1957 年以后，他实际上把自己当成判定谁是马克思主义、谁是修正主义的判教者。

任何时候都有左右两种倾向，因此，应从两方面作战，而不能只反一种倾向。一般说来，反右时，容易出“左”，因此反右时要防“左”；反“左”时容易出右，因此反“左”时要防右。至于何种倾向是主要的，这要依具体情况而定不可有任何主观性、随意性。列宁讲过，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我们可以说，修正主义是对教条主义的惩罚。1989~1991 年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剧变可以说是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惩罚。

## 五、“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在 1957 年 10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说：“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简称“四大”）在 1957 年整风运动后传了下来，到了 1966 年成了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导致社会长期动荡不安。

“四大”并不是在整风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在整风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匈牙利事件后，国内有少数人主张搞大民主，认为小民主不过瘾。毛泽东批评这种主张缺乏阶级观点，认为是错误的。但他对大民主、小民主的讲法很欣赏，认为大民主、小民主的说法很形象。因此，他也常用大民主、小民主的讲法。他认为，民主是个方法，要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他说，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这种大民主是用来对付阶级敌人的。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那些不肯改正的死官僚主义者，但不能用大民主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小民主，小小民主，只能用和风细雨，不能用急风暴雨。3 月 1 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大民主就是群众运动。匈牙利搞大民主，时间不长，可是要三年才能恢复元气。所以还是搞小民主好。搞大民主，我们在座的相当多的人也受不了。十天后，他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座谈时又说：现在搞大民主不适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提出只能用小民主、小小民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总之，毛泽东在开始时不赞成用大民主。但他讲，对大民主也不要怕，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在贯彻“双百”方针过程中，在整风过程中，有的人主张大鸣，大放，

向共产党提意见。以后学校、机关又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发表意见。大字报出现后，有人很害怕，毛泽东则认为，怕大字报是没有根据的，群众可以用大字报进行反击右派。“大字报、座谈会和辩论会，是揭露和克服矛盾、推动人们进步的三种好形式。”到后来，他进一步认为：“四大”“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四大”这种形式，“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提高群众的责任心。”他又说：“四大”是“群众创造的一种新形式，跟我们党历史上采取过的形式是有区别的。”延安整风，也出了一点大字报，但没有提倡，后来“三查三整”没有采用这种形式，因为那时金鼓齐鸣，在打仗，阶级斗争那么尖锐，如果内部这么大闹就不好了。现在情况不同了，于是就出现了“四大”这种新形式。“新的革命内容，它要找到新的形式。现在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它找到这种新形式。这种形式，可以很快普及，很快学会，几个月就可以学会。

在毛泽东看来，“四大”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好形式。他说：“我们党有民主的传统。没有民主的传统，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又说：“我们的民主传统今年是一个很大的发展，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有，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四大”这种形式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左派可以用，右派也可以用。他说：我在今年2月27日的讲话中，并没有讲什么大鸣，大放，大辩论，没有这个‘大’字。”“感谢右派，‘大’字是他们发明的”。既然资产阶级可以利用“四大”向无产阶级进攻，那毛泽东为什么还提倡“四大”呢？他认为：“四大”，“归根结底，对无产阶级有利，对资产阶级不利。原因是，百分之九十的人不愿意国家乱，而愿意建成社会主义。有人怕：四大”，一是怕乱，一是怕下不了台。他认为，要坚定地相信群众大多数，人民中大多数是好的，他们不是要把国家搞乱。“四大”有利于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不应当怕，不会下不了台。“四大”之中最重要的是“大字报”这种形式。可以说，没有大字报，也就无所谓有“四大”。毛泽东说：“大字报是个好东西，我看要传下去。孔夫子的《论语》传下来了，‘五经’、‘十三经’传下来了，‘二十四史’都传下来了。这个大字报传不传下去呀？我看一定要传下去。”“大字报是没有阶级性的，等于语言没有阶级性一样。”“无产阶级可以用大字报，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大字报。我相信，多数人是站在无产阶级一边的。因此，大字

---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形势》，《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4页。

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7页。

毛泽东：《坚定地相信群众大多数》，《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80页。

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7页。

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8页。

毛泽东：《坚定地相信群众大多数》，《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85页。

报这个工具有利于无产阶级，不利于资产阶级。”他在《介绍一个合作社》（4月15日）的短文中又写道：“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应当永远使用下去。清人龚自珍诗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大字报把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冲破了。”

总之，毛泽东把“四大”看作是适合于社会主义时期的新的革命形式，认为“四大”有利于揭露矛盾，解决矛盾，有利于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有利于改进工作，克服缺点，有利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十年“文化大革命”，“四大”发展到极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四大”写进了宪法。“文化大革命”后，在总结历次经验教训时，普遍认为，“四大”从来没有起过好作用，“四大”从宪法中删去了。

究竟如何看待“四大”？我认为，毛泽东对“四大”的评价有过头之处，但其中也有合理因素。“四大”尤其是大字报是揭露社会矛盾，克服官僚主义（尤其是死官僚）的一种有效手段。有的时候群众的一些问题通过正常渠道无法得到反映，无法解决。而当群众的大字报一贴，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但“四大”也有很大局限性：一是很难正确分析矛盾，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二是容易为坏人或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容易助长无政府状态，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所以把“四大”看作是革命的新形式是不妥的，“四大”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因此将它从宪法中删去是有理由的。

总之，毛泽东认为，在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基本完成后，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现在的主要任务已由人与人之间的阶级斗争转向自然界开战，由革命为主转向以建设为主，提出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他的这些思想是正确的，适时的。他认为，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这也是对的。但受匈牙利事件的影响，他头脑中一度放松了的阶级斗争弦又绷紧起来，过分夸大了实行双百方针过程和整风过程中出现的右倾思潮，错误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的反右运动。反右运动严重扩大化的错误实践又推动了他的理论进一步向“左”的错误方向发展，重新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当作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他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提出要批评修正主义，这也是对的。但他把修正主义当作主要危险则是错误的。他正确地指出了“四大”在揭露矛盾，发扬民主，调动人民群众方面的积极作用，但忽视了“四大”的局限性，错误地把“四大”看成是适合新的革命内容的新形式。

---

毛泽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47、448页。

《红旗》杂志，1958年创刊号。

## 第二章

### 大试验时期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曾说过：“这两年我们做了个大试验。”毛泽东所说的“大试验”是指1958年提出并实行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1957年反右整风之后，毛泽东头脑中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膨胀，先是轻率地发动大跃进，继之又在全国搞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在试验过程中，毛泽东虽然用了很大的力气纠正某些极左的东西，但“左”的指导思想并没有得到根本纠正。到了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等同志的批判，并在全党开展反右倾。到了1960年冬，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大跃进不得不停止，认真纠正“左”的错误。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在独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大试验”。毛泽东在生前一直认为，这试验虽然有错误，但基本上是成功的。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基本上予以否定的评价。

在大试验的过程中，毛泽东发表了大量的有关哲学问题的讲话、谈话。认真剖析毛泽东“大试验”的理论与实践，从哲学上总结大试验的经验教训是一件颇为有益的事。

#### 第一节 大跃进中的唯物论与唯心论

##### 一、由批评“反冒进”到“大跃进”

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一穷二白”。如何迅速改变这种“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如何使社会主义制度获得一个牢固的物质基础，这是摆在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艰巨的历史任务。在1955年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出现后不久，毛泽东已开始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如何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问题。

1955年9月、12月，毛泽东为《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了两篇序。两篇序之间的时间间隔虽短，但却反映出毛泽东思想上的重大变化。第一篇序言的中心是批判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保守，批评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所谓“反冒进”。他在第二篇序言中则认为：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已解决，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面的速度也已解决。因此，原来“那篇序言已经过时了，只好重新写一篇。”他说：现在提到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问题。“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在写第二篇序言之前一个月，即11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业十七条》，规定1967年粮食产量达1万亿斤（1990年我国粮食产量达8158亿斤）。

---

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二》，《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1、223页。

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二》，《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1、223页。

随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以农业发展的战略构想为动力，强调在各项工作中反右倾保守，提前实现工业化，迅速建成社会主义。他指出：“八大”的准备工作应以这一内容为中心，迎接“八大”，开好“八大”。毛泽东的这一战略思想为党中央所赞同。第二年1月14日，周恩来在全国知识分子会议上的讲话中公布了这一设想。他在报告一开始就说：“党中央决定，把反右倾保守思想作为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要求全党在一切工作部门中展开这个斗争。”在这次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毛泽东讲话的重点不是知识分子问题，而是讲两种领导方法，是讲慢一些、差一些的领导方法，还是快一些、好一些的领导方法。他讲话的主要锋芒是批评右倾。但同时也指出：计划一定要建筑在有根据的基础上，不然又要搞成盲目性。现在有些同志头脑已经有些发热，不敢实事求是，怕右倾机会主义帽子难听。

反右倾保守的结果，出现了急躁冒进。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较早觉察到经济建设中冒进的危险，接连提出防止冒进。他在1956年5月11日召开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明确说：“事情开始做，不要急。反保守右倾从去年八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6月4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会议，讨论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预算，议定了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和过大建设规模、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稳步前进的方针。10日，刘少奇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确认了4日中央会议提出的方针。在6月12日召开的国务院会议上，针对有人不同意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思想，周恩来再次作了说明，指出：去年12月以后冒进就冒头了，现在已经不是预防冒进而是需要反对冒进了！“如果冒进继续下去，又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今天的需要和可能。不能向群众泼冷水，但也不能把少数积极分子的要求当成群众的要求。”6月20日，《人民日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发表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毛泽东对这篇社论十分不满，不赞成反冒进。他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讲，社论送给他看，他批了“不看”二字。他说：“骂我的，为什么看”。尽管如此，经过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同志的努力，冒进的错误得到了纠正。中共“八大”坚持了既反右倾保守又反急躁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后，毛泽东的注意力曾一度转到国际国内的政治问题方面。反右斗争高潮过后，他虽然错误地重新肯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他的注意力仍转回到经济建设上。1957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开始批评反冒进。他说，过去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他想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速度，搞大跃进。

毛泽东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思想还受到赫鲁晓夫的启发。赫鲁晓夫在1957年5月声称在最近的将来（最迟不超过1961年）苏联要在牛肉、黄油和牛奶的人均产量上超过美国。1957年11月6日，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宣布：在以后的十五年中，苏联不仅能够赶上、并且能够超过美国目前的重要产品的产量。毛泽东受到鼓舞，找英国进

---

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59页。

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后，《人民日报》在一些社论里使用“巨大的大跃”、“很大的跃进”等语言，见10月27日、11月13日、12月12日等社论。

行比赛。他在 11 月 18 日的莫斯科会议上讲，赫鲁晓夫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毛泽东的这一设想得到中共中央的赞同。1957 年 12 月 2 日，刘少奇在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词时公开宣布了这一设想。他说：在十五年内，苏联能够在许多重要的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上赶上或超过美国；在同样的时间内，我们应该在钢铁以及其他重工业产品上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表明，毛泽东的大跃进思想明显受到赫鲁晓夫的影响。

毛泽东从 1956 年的反冒进中感到，他的大跃进、高速度的指导思想在党内外有相当一部分人不甚赞成。为了排除阻力，毛泽东反复批评 1956 年的反冒进。他在 1958 年 1 月召开的南宁会议上讲：1955 年 12 月，我写了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个人崇拜也好，是偶像崇拜也好，不管什么原因，全国各报纸、大小刊物都登了。发生了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1956 年 6 月一篇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他又说：由于反冒进，我就不敢接近部长了。在三中全会上，我讲去年吹掉三条，没有人反对，我得彩了，又复辟了。我就有勇气再找部长谈话了。这三年有一个曲折，右派一攻（注：指 1957 年整风时有人提出，经济建设中主要危险不是右倾保守，而是冒进，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他提出，以后不要提“反冒进”这个词。他认为，“反冒进”是政治问题，是一个时期内的方针性的错误。他承认党内反冒进的人，心是好的，要搞社会主义，忧国忧民。但他又把反冒进的思想方法说成是资产阶级的方法。他批评反冒进的讲话，使南宁会议空气紧张。周恩来等同志不得不作检讨。

在三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又不止一次地批评反冒进，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反冒进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有两条路线，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的好，还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的好。他认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已基本形成。

同年五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这是一次大跃进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的主题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做的创造精神。他继续批评右倾保守，批评 1956 年的反冒进，批评不赞同冒进的所谓“观潮派”和“秋后算账派”。刘少奇在会上代表党中央作了工作报告。根据毛泽东的思想，他指出：整风反右的胜利，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形成了一个共产主义的思想大解放，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跃进。他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形成的过程和条件。他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基本点概括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问题；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会议一致同意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创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

---

见《人民日报》1957 年 12 月 3 日。

路线。”抽象地看，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并不错，它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普遍愿望。总路线基本点所包含的一系列并举的方针也是正确的。但仔细分析，便可发现，总路线忽视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八大二次会议提出：7年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

大跃进并不是毛泽东个人一时心血来潮的奇想，而是当时全党全国普遍存在的急于改变“一穷二白”落后面貌思想的产物。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后，全国热气腾腾，出现了跃进的大好形势。7月5日，刘少奇在视察石景山发电厂时对工人说：你们谈得很好，我听了很高兴。这样做下去，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大有希望，不要几年就好了。现在苦干几年很有必要，不然过不了关。苦干几年，就不那么穷，那么落后了。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2年3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15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15年，7、8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不计上下班，干完数算，有这股劲，我看7、8年就行。又说：一是党的领导，一是大家努力。好好干，大有希望。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多数可以看到共产主义。

在毛泽东批评了反冒进后，周恩来再也不提反冒进。1957年6月，他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1956年的经济建设“采取了跃进的步骤”，“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了一个跃进的发展”。这是在党和政府的文件中首次使用“跃进”一词。在1958年，他积极支持大跃进。他提出：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可以跃进，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跃进？他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可以大跃进。据薄一波回忆：“有一次毛主席见到我们，问我们大跃进是谁发明的？还很风趣地说，要颁奖章。总理笑了笑，没有说话。同志们讲是周总理在一个报告中提出的。毛主席很赞赏。”据卫士长李银桥回忆：一次毛主席在颐年堂接待客人，客人走后，毛泽东回菊香书屋，一位中央负责同志和毛泽东边走边谈，议论着形势和工作。这位负责同志说：“主席，现在×××他们提出大跃进口号，我看这个提法很好。”“噢，大、跃、进？”毛泽东琢磨着。“《人民日报》上登了。”“嗯，这个题目很好。拿来我看看。”这位负责同志把报纸找来，请毛泽东看。毛泽东认真看了一遍，认为“这个提法很好”。总之，大跃进是普遍存在的急于求成情绪的反映。邓小平在总结这一历史经验时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就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

八大二次会议后，急于求成的冒险主义迅速发展。6月21日，冶金部根据各协作区对钢铁工业“大跃进”的设想向中央报告，1959年的钢产量可超过3000万吨，1962年可达8000至9000万吨。毛泽东批转了这一报告。6月22日，毛泽东在薄一波的《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上批示：“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两年到3年，两年是能的。这主要的是钢”。

---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的决议》（1958年5月23日）。

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第71页。

李银桥：《走向神坛的毛泽东》，中外文化公司1989年版，第222～223页。

正是依据这些设想,毛泽东提出 1958 年的钢产量比 1957 年的 535 万吨翻一番达 1070 万吨。

在农业生产方面,也出现了明显的不切实际的高指标。6 月初召开的华东地区农业协作会议提出:今明两年华东地区的粮食产量要达到平均每人每年 1000 斤到 1500 斤(1957 年全国平均每人粮食为 406 斤),并认为在今后三年到五年内使粮食增产到每人平均 2000 斤是完全可能的。这种高指标是同浮夸风、说假话相联系的。一般人认为,粮食增产不可能很快,充其量每年只能增产 10%。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 1958 年 8 月 1 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 5 期上表了《驳“粮食增产有限论”》。文章说:过去广东粮食每年平均增产不过 6%,大丰收的 1956 年增产也不过 10%,可在今年仅春夏的粮食产量的增产就达 60%。文章认为,广东今年全省实现亩产粮食 1000 斤的指标是完全可能的;广东一年三造,水稻亩产达 1 万斤也是可能的。

1958 年夏天,报纸上不断刊登“高产卫星”的消息。《人民日报》于 1958 年 8 月 1 日报导河北省长风社早稻亩产 15000 斤;8 月 9 日报导福建省花生亩产 4200 多斤;8 月 10 日报导安徽省高丰社早稻亩产 16000 多斤;8 月 12 日报导福建省花生亩产 8275 斤;8 月 13 日,以通栏套红大字报导湖北省“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 36900 多斤”,同时又报导福建花生亩产 10500 斤。“卫星”比着放,谎活比着说,反正我要比你高。8 月 14 日《人民日报》报导福建花生亩产 12271 斤;8 月 17 日报导,还是福建出现了花生亩产 13241 斤;8 月 22 日报导安徽中稻亩产 43075 斤 9 两;8 月 30 日报导湖北中稻亩产 43869 斤 4 两;9 月 5 日报导广东省中稻亩产 60437 斤,并刊有新华社记者摄的“13 个人站在水稻上压也压不倒”的照片;9 月 18 日报导广西中稻亩产 130434 斤 10 两 4 钱。读者如有兴趣可查看《新华半月刊》1958 年第 19 号上刊登的《今年农产品高产纪录统计表(1958 年 10 月 10 日)》。这些报导在今天看来是多么荒唐可笑。

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在党报上大量报导这些假的“卫星”,败坏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而且还在于党中央的许多领导竟相信这种天方夜谭的高产记录。当时主管农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在《论我国今年夏季的空前大丰收》(《人民日报》1958 年 8 月 11 日)中说:今年夏粮增长达 69%,夏季丰收证明,我国粮食增产速度不仅可以是百分之十几、百分之几十,而且可以成倍地增长。1958 年确实是个丰收年,但粮食的产量却是被大大地夸大了。面对丰收的景象,面对虚假的产量数字,毛泽东在 1958 年 8 月视察河北、山东农村时提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也写道:“在克服右倾保守思想、打破了农业技术措施的常规之后出现了农业生产飞跃发展的形势,农产品产量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更加促进了农业生产飞跃发展的形势。”

1958 年 8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正式作出了两个重要的决定:一是 1958 年的钢产量比 1957 年翻一番达 1070 万吨,号召全民炼钢铁;二是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这次会议后,一个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力主要标志的“左”倾冒险的试验在全国城乡迅速地开展起来了。

---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7 册,第 278 页。

《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1958 年 8 月 29 日)。

由于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的批评反冒进（据有人不完整的统计，1958年达13次之多），使得中央领导核心中没有人能像在1956年那样起来抵制他的非常明显的冒进。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曾说过：那次反冒进的人，这次站住了脚，如恩来同志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也会站住脚的。恰巧是那次批恩来他们那一部分的人，这次取他们的地位而代之。在1955年以前，毛泽东“既反对盲目冒进的主观主义，也反对保守主义的主观主义”他甚至还说过，“必须注意防‘左’。防‘左’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机会主义。”但1955年以后，则一个劲地批评反冒进，一个劲地反右倾保守，再也不提反对冒进的主观主义，再也不提防“左”，结果出现了“大跃进”、大冒进。在北戴河会议上曾设想1959年的钢产量要比计划中的1958年的1070万吨翻一番还多，达3000万吨，粮食产量要达8000亿斤至1万亿斤。1960年的钢产量为5000万吨，粮食为1.3万亿斤。到1962年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时钢产量要达8000万吨至1亿吨，粮食达1.5万亿斤。工业生产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52.9~57%，农业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8.5~30.7%（《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修改稿）》）。毛泽东在9月5日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说工业了不起，可难啦，什么科学可难啦，这也是迷信，就不要信那些。十五年赶上英国，现在可以二年基本赶上（指总产量，而不是按人口平均）。9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在武汉对王任重说：“许多事情看来怪得很，要就没有，或者很少，要就很多很多。过去九年粮食增加得很慢，老愁粮食不足，可是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几千亿斤。今年翻一番，明年还可能翻一番，这样我们的粮食就多得不得了。钢也一样。过去九年搞了几百万吨，今年几个月就可能增加几百万吨，……你看怪不怪。”

这里有一个问题，1958年的打破常规的高指标是怎样提出的？是根据对现有经济状况作出科学的分析基础上提出的，还是光凭主观的意志、愿望、直觉、老经验提出的？看来是后者。农业生产上的高指标完全是凭虚报的产量而提出的。工业上的高指标完全是凭个人感觉、意志提出的。这里不妨以钢产量的指标变动为例加以说明。1957年我国钢产量为535万吨，1958年的成都会议通过的1958年的计划指标是，第一本账（即公布的必须完成的）为625万吨，第二本账（即不公布的争取完成的）为700万吨。这已是够大跃进了。但有些人还不满足。这年5月，华东地区提出，1958年华东的钢产量达600万吨。根据各地汇报，冶金部推算1959年的钢产量可达3000万吨。6月的一天，冶金部长王鹤寿向毛泽东汇报，说今年钢产量可达900万吨。毛泽东说：干脆一点，翻一番，何必拖拖拉拉呢？他问王鹤寿，翻一番行不行？王鹤寿认为，行，上得去。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王鹤寿说，当时我以为搞小土群能上去，“我确实认为行，并不是认为不行，故意说行。主席对这事很慎重，曾经几次问我。”于是8月的北戴河会议正式作出翻一番的决定。不过，毛泽东当时心中也无把握，不踏实。他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因为1958年的时间已过了大半，截止到八月底，只生产450万吨钢。他感到翻一番的目标很可能完不成。这次会议决定1959年的指标为2700万

---

毛泽东：《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94页。

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05页。

王任重：《毛主席在湖北》，《七一》杂志，1958年第5期。

吨，争取达 3000 万吨。到了同年 12 月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感到 1959 年钢的指标太高了，改第一本账为 1800 万吨，第二本账为 2200 万吨。在 1959 年 4 月的上海会议上，毛泽东仍然感到指标过高，降为 1650 万吨。到 8 月的庐山会议最后定为 1200 万吨。钢的指标的确定不是建立在对国民经济和钢铁工业现状的科学分析基础上的，而是凭主观的需要，当感觉到指标太高，无法完成，只好一降再降。应当承认，1958 年冬至 1959 年夏，工业上过高的指标有一定的压缩。但庐山会议错误反右倾，结果“左”的思想又再度滋长，1960 年的指标仍打得很高。计划 1960 年工业总值生产比 1959 年增长 29%，钢产量为 1840 万吨，比 1959 年增长 38%，煤产量为 4.25 亿吨，比 1959 年增长 22%，粮食产量为 5940 亿斤，比 1959 年增长 10%，棉花产量为 5300 万担，比 1959 年增长 10%。到 6 月，发现指标过高，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作十年总结，指出：一些同志的思想方法有点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指标高了，完不成，要下决心改。他说：奉劝省、市、自治区的同志们，在各省公布数字的时候，总是要少一点。要做的多一点，说的少一点。直到 1960 年冬，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无法搞“大跃进”。大跃进的冒险试验不得不被迫中止，转入调整时期。

大跃进搞得轰轰烈烈，除去浮夸部分，工业（主要是地方工业），生产有较大的发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钢铁、机械、交通等基础工业的建设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据 1964 年统计，建国以后到 1964 年为止，在新建设的大中型企业项目中，属于 1958 年以后开工的，在许多重工业部门都占三分之二以上。在从 1950 年至 1979 年新增的生产能力中，1958 年至 1960 年三年中新增的，炼钢占 36.2%，炼铁占 32.7%，采煤占 29.6%，机制纸占 33.8%，棉纺锭占 25.9%，但总的来看，大跃进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使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如积累与消费、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社会购买力与商品可供应量等）严重失调，使人民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大跃进”的最直接最明显的后果是出现了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不得不作出大幅度的调整。1958 年大力批判“马鞍形”[即所谓的跃进（1956）——保守（1957）大跃进（1958）]，而结果不得不得来一个更为严重的马鞍形。粮食产量 1957 年为 3900 亿斤，1958 年为 4000 亿斤，1959 年为 3400 亿斤，1960 年又降至 2800 亿斤，直到 1964 年才达到 3880 亿斤，接近 1957 年的水平。钢产量 1958 年为 1070 万吨（合格的好钢为 800 万吨），1959 年为 1387 万吨，1962 年降至 667 万吨。社会总产值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平均每年增长 11.3%；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则为—0.4%。年人均粮食 1957 年为 406 斤，1962 年为 329 斤，1965 年为 365 斤，还没有达到 1952 年的 395 斤的水平。人祸加上天灾，农业生产严重破坏，人民吃、穿、用非常困难。人的体质普遍下降，不少人患浮肿病，有些地方发生非正常死亡。据 1988 年《全国统计年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 1956 年为 20.50‰，1957 年为 23.23‰，1958 年为 17.24‰，1959 年为 10.19‰，1960 年为—4.57‰，1961 年为 3.78‰，1962 年全国经济状况好转，上升为 26.99‰。河南省人口波动更大。河南全省人口自然增长率 1956 年为 21.85

---

《全国统计年鉴》1960 年的全国总人口为 66207 万人，比 1959 年 67207 万人减少 1000 万。1961 年为 65859 万人，比 1960 年减少 348 万。这两年的全国总人口数与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相矛盾。依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推算，1960 年全国总人口变为 66900 万人，比 1959 年减少 307 万人，1961 年全国总人口应为 66457

‰，1957 年为 21.90‰，1958 年为 20.46‰，1959 年为 13.95‰，1960 年为—25.59‰，1961 年为 5.13‰，1962 年为 29.47‰。这一全国性的人口波动并非其他原因，主要是由于经济波动引起的。

面对严重的局面，毛泽东的心情是很痛苦的，为了渡过难关，他在 1960 年提出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据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卫士们回忆，有时他一天只吃一盘马齿苋。他上大学的女儿李纳与其他人一样饿饭。他本人也两腿浮肿。他 7 个月没有吃一口肉。周恩来劝毛泽东为了党的利益吃一口肉，毛泽东回答说：“你不是也不吃肉吗？大家都不吃。”党中央领导同志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大跃进的主观动机是美好的、善良的，尽快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有什么不好。问题是违反了客观规律，结果适得其反，不仅没有加快建设速度，反而严重阻碍了经济建设的发展，不仅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反而带来了灾难。这一教训是深刻的。

为什么会出现今天看来近乎荒唐可笑的“大跃进”呢？这是需要从多方面加以探讨的。

## 二、大试验与群众路线

从认识论上讲，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明显地脱离了中国的实际，脱离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是主观主义的产物，可就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大讲哲学，大讲群众路线，大讲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而且有些讲法颇为深刻，发前人之未发。毛泽东的哲学理论与实践发生了明显的矛盾，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值得研究。

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写道：概念的形成过程，判断的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试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如果我们的同志不懂得这一点，那就一定会到处碰钉子。”他要求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党委的委员，除了生病的和老年的以外，一年一定要有四个月的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去作调查研究。他要求干部以真正平等的态度深入群众，深入实际。

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讲：我们要尊重辩证法，首先要尊重唯物论。我们的思想不是天赋的，而是后天形成的。现在的多快好省概念是积累许多经验才形成的。苏联的经验，建国以来的经验，还有根据地的经验。他又说：尊重唯物论就是要先跟人民，比较正确地、比较完整地反映人民的意志、人民的思想感情、人民的要求，然后制成比较完整的体系和路线。离开了客观实践就不可能制造成理论体系。这次大会所制定的总路线是从群众中来的，是从实践中来的，决不是某个人突然想出来的。两年后，他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又说：“我们这些人的头脑是一个加工厂，无非

---

万人，比 1960 年增加 250 万人。笔者对《全国统计年鉴》和许多著作、文章中所说的 1960 年全国人口比 1959 年锐减 1000 万和 1961 年又减少 348 万表示怀疑。

《中国人口》，河南省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59 页。

是把全国各地的经验集中起来，作成如成都会议决议、北戴河会议决议那样一些产品，在全国加以推广。”确实如此，像“苦战三年改变面貌”的口号，首先是由河南省提出的，当时指的是农村。毛泽东赞赏这一口号，得到推广，但仍然是指改变农村面貌，后来又推而广之，指改变全国面貌，1958年钢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是毛泽东在六月提出的，他问冶金部长能不能做到，回答说可以，又问了许多人，也都说可以，于是他也就相信了。这种形式上的群众路线，使得毛泽东搞的大试验显得是“有根据的”，是“反映了群众的要求的”。

尊重辩证法，首先要尊重唯物论，尊重唯物论辩证法，首先要尊重人民群众。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是很深刻的，将唯物论、辩证法、历史唯物论有机地统一起来。人脑是个加工厂，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只能来之于群众，要完整地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这也是正确的。毛泽东注重认识的来源、认识的原料，但他忽视了“加工”这一点。同样的原料，由于“加工制作”的不同，可以制成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产品”。因此，我们不仅要注意认识原料的来源问题，更要研究对原料的“加工制作”，这是认识论问题中最为复杂的一部分。这就是要注重认识主体的研究。一个人的立场、观点、方法、情绪、意志、知识水平和结构等等都直接影响到对原料的“加工制作”。

群众的意见是形形色色的，有正确的，有比较正确的，有错误的。共产党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群众的要求、愿望、情绪，但又不能仅仅依据群众的要求、愿望、情绪来制定自己的政策。群众也会犯错误。因此党必须对群众的要求、愿望、情绪作出严格的、冷静的科学分析。否则就要犯尾巴主义、经验主义的错误。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不过是反映了人民群众中一时的过急的情绪，或者叫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毛泽东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脱离了部长、省委书记，脱离了六亿人民。他自以为大跃进、人民公社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反映了人民的要求。其实，正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才是真正地脱离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损害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毛泽东对群众路线的误用不仅表现在将群众路线变为尾巴主义，而且还表现在把群众运动绝对化，试图用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搞现代化的经济建设。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毛泽东对人民群众伟大历史作用所作的经典式的至理名言。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同样需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需要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需要贯彻群众路线，这是毫无疑问的。毛泽东提出的在中央的统一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也是正确的。它有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办工业的积极性，以加快我国工业化的速度和农业技术改造的速度。根据毛泽东的思想，成都会议发出了《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1958年3月23日）。问题出在毛泽东没有注意到，现代化的经济建设与搞政治革命有不同的特点。他是凭过去的经验，企图通过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搞经济建设，实现大跃进。为了实现钢产量翻一番，开展一个全民炼钢铁运动。结果9千万人上阵，从城市到农村，从机关到学校，到处都砌起了土高炉。毛泽东讲：“发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群

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他一再批评一些同志不愿意在工业方面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错误。1958年9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关键在于大搞群众运动》的社论说：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是我们一切建设事业高速度发展的基础，是我们党领导各项工作的根本路线。要完成1070万吨钢的任务，关键在于形成一个真正全民办钢铁的群众运动。毛泽东和党中央指望通过大搞群众运动实现大跃进的奇迹。在生产手段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在有些工程建设上（如农田水利建设）可以采用类似群众运动的方式、大会战的方式进行。但总的来讲，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程，用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是很难奏效的。

毛泽东十分爱护群众的积极性。他批评反冒进、不允许反冒进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反冒进是向群众泼冷水，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毛泽东对群众运动中出现的问題往往采取原谅、迁就的态度。他在1959年说：去年放的“卫星”有的有好处，有的未放起来就掉下来了，为什么去年不去更正呢？一更正就会给群众泄气。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在庐山会议上听到彭德怀等同志指出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时就坐不住了，认为这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否定革命的群众运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在7月31日的常委会上说：1958年大跃进很有必要，但同时也必定带来各种不协调。不用反冒进就好了。……刮共产风，比例失调，是在群众运动中发生的。群众兴高采烈，叫下马，血淋淋的，群众想不通。气可鼓不可泄，人而无气，不知其可以。他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材料写了一个语气极其激烈、尖锐的批语。他想用马克思对待巴黎公社、列宁对待俄国1905年革命的态度来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错误辩护。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一般不宜搞群众运动，但并不是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可以不贯彻群众路线，可以不依靠群众。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亿万群众的事业。如何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建设积极性，并以适当的形式去组织和实现这种积极性，这是一个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

### 三、大跃进中的主观主义与实事求是

总路线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过分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大跃进是主观主义的产物。但这并不是说，毛泽东在理论上主张主观决定客观、意志决定一切。相反，如前面提到的，他在理论上是主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是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正确认识这一矛盾对把握毛泽东晚年的认识论思想至关重要。

毛泽东在1955年12月写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中说：“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这里

---

见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18页。

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序言二》，《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4页。

毛泽东把右倾保守当作主要倾向加以批判是脱离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反映了他的急躁情绪。但从纯粹的哲学理论上讲，毛泽东讲的是全面的，既反对脱离客观条件片面夸大主观能动性的唯心论，又反对忽视主观能动性的机械论。毛泽东敢想、敢说，富有浪漫的气质。他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的按语中曾说：“将来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种种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于现在的农作物的高产量。工业、交通和交换事业的发展，更是前人所不能设想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也是如此。”从发展看，在未来要使农作物产量几倍、十几倍、几十倍于现在，这不是不可能的。但就现实而言，要使农作物产量在短时间内实现几倍、十几倍、几十倍的增长，则是脱离实际的一种幻想。1958年的许多高产“卫星”，就是依据这一幻想制造出来的。而这种“卫星”的出现，似乎又反过来证明毛泽东在1955年预言的“正确、伟大”。

1957年10月，他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批评反冒进，提倡多快好省，但同时也指出：我们要的是“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好省”。

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许多唯物论的言论。他在3月25日的讲话中说：唯物论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我们主观世界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主观反映客观是不容易的，要有大量的事实，在实践中反复无数次才能完成。他又说：我们很多同志不注意研究理论。究竟思想、观点、理论从哪里来的呢？就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客观世界所固有的规律，人们反映它，不过是比较地合乎客观情况。任何规律都是事物的一个侧面，是许多个别事物的抽象。离开客观的具体事物，那还有什么规律？所谓盲目性，就是对客观的必然性不认识，因而也没有自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逐步的，不可能一下子就认识。不了解客观世界，就是客观世界的奴隶。他还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说明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他说：完整的体系只能在后来完成，而不能在事先或初期完成。在成都会议上，他一方面鼓动大跃进，但同时也感觉到党内有虚报、浮夸的问题。因此，他也说：建设速度是个客观存在，凡是主观客观能办的，就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去办，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现在有股风，是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有些高指标，没有措施，那就不好。总之，要有具体措施，要务实。务虚也要，革命的浪漫主义是好的，但没有措施不好。他又说：我很担心，我们的一些同志在这种热潮下，可能被冲昏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他提出，要把过高的指标压缩一下，计划指标要切实可靠，要留有余地。他告诫大家：“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既然已有虚报、浮夸的台风，为什么又不去挡呢？因为毛泽东认为，当时的主要危险是右倾保守，若公开去挡，就会给群众泼冷水。

1958年4月，他在武汉会议上讲，今后《人民日报》不要轻易宣传什么化了。有些地方稀稀拉拉地种了几棵树就算绿化了，这怎么行。除“四害”不要轻易宣布“四无”，将来变成“四有”城怎么办？做事要留有余地，宣传要留有余地，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有真有假，没有假的不可能，要打折扣。他提出宣传工作要务实：一要深入，二要细致，三要踏实，不要光宣传指标。

这反映毛泽东虽然头脑已经很热，但还是有冷的一面。

在五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再次升温。毛泽东大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提倡敢想，敢说，敢干，要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都爆发出来。抽象地讲，这也没有什么不对。但他在提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时忽视了科学态度，在提倡敢想、敢说、敢干时忽视了实事求是的精神。结果破除了科学，破除了起码的常识，陷于浪漫的幻想和盲目的蛮干。他说，过去的不少人认为工业高不可攀，神秘得很，认为“搞工业化不容易啊”，总之对搞工业化有很大的迷信。我是不迷信工业高不可攀。原来提出十五年赶上英国，但到了1958年5月，他认为，只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我国七年就能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十年赶上美国。在大跃进中，人民群众中创造了许多“豪言壮语”。其中有一则说：“让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毛泽东认为这两句话很好。他说，高山嘛，我要你低头，你还敢不低头。河水嘛，我要你让路，你还不让路！这样设想，是不是狂妄？不是的，我们不是狂人，我们是实际主义者，是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者。确实，这两句话富有诗意，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改天换地、重新安排河山的气概，毛泽东的说明也富于浪漫的色彩。但要真正到“让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则是有条件的，而不是无条件的。在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可以让河流改道，可以移山填海，移山造地，但在当时的中国却是难于做到的。

毛泽东在1956年就指出，中国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他在1958年进一步解释说：“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一穷二白。这是很对的。但他在克服一种片面性（把“穷”“白”单纯看成是坏事）的同时，却走向另一种片面性，片面强调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面，忽视了“穷”与“白”带来的困难，忽视了改变一穷二白面貌任务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犯大跃进冒险错误的重要哲学根源之一是夸大了精神的作用，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毛泽东认为，经过反右整风，经过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空前高涨，由此必然出现大跃进。1958年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其中第二条说：“在运动中要防止‘见物不见人’的偏向。即只看到现有的物质条件，看不到伟大的群众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人民日报》1958年6月21日《力争高速度》的社论说：高速度是总路线的基本精神，是总路线的灵魂。加快建设速度的条件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究竟想不想快，要不要快。“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有着非常伟大的作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开动人民的主观能动性的钥匙。”

在大跃进中，有的农民提出“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这一口号，作为群众的一种豪言壮语，是无可多加指责的。但这一口号，不符合唯物论，不能提倡，而应加以教育纠正。可《人民日报》却加以肯定和提倡，并大批所谓条件论。8月3日，《人民日报》在《年底算账派输定了》的社论中说：“国民经济的发展，主要的不是决定于这种或那种条件，而决定于人，决定于广大的人民群众是不是鼓足干劲，是不是力争上游，是不是事事

多快好省。群众说得好，‘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地的产是人的胆定了的。”“条件论者可以休矣”。8月13日，《人民日报》又在《祝早稻花生双星高照》的社论中说，早稻亩产36900斤和花生亩产10500斤的“卫星”，“又一次生动地证明：‘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解放了的人民可以创造出史无前例的奇迹来。”8月27日，该报又以“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为标题，发表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派往山东省寿张县了解情况的同志写的报导。有的理论工作者发表文章，批评所谓的“条件论”，论证“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这句话不是“主观唯心论，而是完全符合辩证唯物论的。”（见《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8日曙光的《立足现实，大胆想象——谈客观可能性与主观能动性》）。有的人还公开提出，客观规律可以人为地消灭和创造（见1958年《理论战线》第9期德麟的《发挥上层建筑的力量，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

在大跃进时期，公开起来抵制、批评唯心论的理论工作者屈指可数。杨献珍在1958年11月19日的座谈中说：“大跃进中，一些人也冲昏了头脑，他们说，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杨献珍指出：“不讲条件就是唯心主义论。”。第二年6月12日，他在一次谈话中又说：“有的地方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胆量等于产量，思想等于行动，这到底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弄虚作假总不能算作唯物主义吧！”他指出，去年的浮夸风把我党多年培养起来的实事求是传统作风冲垮了，这比丢在地里的粮食损失还大得多。

在民主革命时期，弱小的红军为了战胜强大的白军，弱小的人民革命力量为了战胜强大的国内外反动势力，毛泽东特别强调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能动性。从前面所引的他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的第二个序言中可看出，他在社会主义时期依然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在1958年夏的北戴河会议上，他对惠能和尚发表了一通评论。他说：唐朝佛教《六祖坛经》记载，惠能和尚，河北人，不识字，很有学问，在广东传经。主张一切皆空，是彻底的唯心论。但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跃进。惠能敢于否定一切。有人问他：死后是否一定升西天？他说不一定，都升西天，西方人怎么办？他是唐太宗时的人，他的学说盛行于武则天时期。唐朝末年乱世，人民思想无所寄托，大为流行。从毛泽东的这一番评论中多少可看出他当时的思想倾向。

据卫士李银桥回忆，1958年毛泽东与李达在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上发生过激烈争论。一次，毛泽东与李达在武汉会面，谈话中李达说，武汉大学的学生搞调查时看到一些口号不符合唯物主义观点，如：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毛泽东则以为：“这个口号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一重性是讲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有道理的。另一重性。如果说想到的事都能做到，甚至马上就能做到，那就不科学了。”李达则说，这个口号现在不能谈两重性，谈两重性，在现在的形势下就等于肯定这个口号。两人争了起来。争论中，毛泽东举红军长征的例子，说明精神力量的作用。红军就是依靠这种精神力量克服了按常理无法克服的困难，终于夺取了胜

---

杨献珍：《关于规律的客观性和主观能动作用问题》，《杨献珍论文集》第2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5页。

杨献珍：《坚持实事求是作风，狠批唯心主义》，《杨献珍文集》第2卷，第184、185页。

利。他还举了各种发明创造，都是因为有了“敢想”。想飞就终于发明了飞机；想日行千里，就发明了汽车火车。李达坚持说，肯定这个口号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这是错误的。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是无限大的。李达认为：“现在人们不是胆子太小，而是胆子太大了，头脑发烧。主席脑子发烧，下面就会不得了，就会烧到40、41、42，这样中国就会遭难，主席信不信？”毛泽东则回答说：“你说我发烧，我看你也有些发烧了，也有华氏百把度了。还是我在成都会议说过的那句话，头脑要热又要冷。”从纯粹的理论讲，毛泽东不会反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有限的”，李达也不会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作用。但就对“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这一口号是肯定、还是否定来说，真理在李达一边，而不在毛泽东一边。从争论中也可看出毛泽东当时的思想倾向。

党的报刊登载的许多高产卫星，不少人是相信的，甚至有的科学家也受了骗。在有的报导中，不仅有省、地、县的干部参加“验收”，而且还有农业科学家参加“验收”。有一位不是搞农业的著名科学家受了高产卫星的迷惑，在《中国青年》发表短文论证高产的可能性。这位科学家认为，农业生产的最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能。若把每年射到每亩地上的太阳能百分之三十作为植物的利用部分，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转化为可吃的粮食，那稻麦的产量不仅是现在的亩产两——三千斤，而是二千多斤的二十倍。

这位科学家的这种理论推算虽然可以启发人们的思想，在遥远的未来，

也许可以变为现实。但在1958年，在今天，以至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只是一种科学幻想。但这位科学家的文章引起领导者们的注意。

陶铸的《驳‘粮食增产有限论’》就提到这一短文。毛泽东对这位科学家的文章也很感兴趣。1958年10月27日，毛泽东在参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跃进展览会时见到了这位科学家，并谈起短文。这位科学家说，“我不懂农业，只是按照太阳能把它折中地计算一下，至于如何达到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而且现在发现那个计算方法也还有错误。”毛泽东笑着回答说：“原来你也是冒叫了一声”，“你的看法在主要方法上是对的。”1959年4月上海会议期间，李锐曾问毛泽东，为何轻信亩产万斤粮，毛泽东说：“×××在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说是太阳能用了百分之点几，就可亩产万斤，因此就相信了。当然，毛泽东相信亩产万斤，决不是仅仅受了一位科学家文章的影响。但从中我们也可看到，1958年大跃进的出现有很复杂的原因，有很深的社会根源，不能简单归之于毛泽东个人。

大跃进是毛泽东发动起来的。大跃进起来后，浮夸风、高指标愈演愈烈。对虚报、浮夸，毛泽东持什么态度？1958年8月，毛泽东在视察河北、河南、山东三省农村时，县社干部的说假话已十分严重。如有的社长说，每亩麦棉保证1千斤，争取2千斤。有的讲，试验田的玉米计划争取亩产2万5千斤，水稻取亩产4万斤，而过去一亩只产二三百斤。从报中看出，毛泽东听了很高兴，感到粮食吃不了。那么毛泽东真的相信粮食亩产几万斤？那又不是。1958年8月13日，他去天津新立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同志和社领导汇报

---

李银桥：《走向神坛的毛泽东》第238～240页。

《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中国青年报》1958年6月16日。

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78页。

说，亩产 10 万斤。他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他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领导同志说，“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有的同志为了证明亩产 10 万斤，让小孩往水稻上站。他摇头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 10 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在湖北省，当时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试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信”。王任重又说，这是省农村工作部长亲看验收的。毛泽东还是摇头：“靠不住，谁验收也靠不住。除非派军队站岗放哨，单收单打，看住人不往里掺假才算数。”外国朋友问他，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置之：“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

在 1958 年 11 月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就批评徐水县把猪集中起来，让参观的人看的做法，提出要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浮夸。在同年 12 月召开的武昌会议上，他讲：世界上的事，没有一项没有假，有真必有假，没有假的比较哪有真的。现在问题的严重不仅在下面作假，而且在我们相信。中央、省、地委的领导相信就危险了，要有清醒的头脑，对于下面报上来的成绩要打折扣，三七开，打三分假，七分真，可以不可以，至少有一成假，有的是百分之百假。当时有人估计 1958 年粮食产量是有 9 千亿斤，毛泽东讲，最多 7 千 4 百亿斤，把 1 千 6 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其实这也是大大夸了的，实际只有 4 千亿斤，可在 1959 年 4 月 14 日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关于 1958 年国民经济发展情况的公报中却说 1958 年粮食总产量达到 7 千 5 百亿斤，比上年增长了一倍）。他提出，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中，要把作假这个问题单写一条，不要同工作方法写在一起，以期引起大家的注意。

他感到许多干部头脑太热，订的指标太高。为此，在武昌会议上，他提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勿务虚名而获实祸。他说：现在要减轻一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 5 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 1 千 9 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多，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铅、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很多人，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 5 千万人。广西死了人，×××不是撤职了吗？死 5 千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搞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明年 3 千万吨钢，究竟要不要这么多，搞不搞得出来？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下面的干部，有些人听不进·139 去，无非骂我们右倾，不要怕，硬着头皮让下面骂。他还指出：现在名声很大实力很小，这一点要看清楚。现在有的外国人吹的很大，许多报纸尽是大话。不要外国人一吹，就神乎其神，飘飘然了。

在 11 月 23 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热衷于搞翻番的同志说：你们说服我是可以的，你打通我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通我才能通。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准备作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

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他指出：破除迷信，现在有一些人把科学也破除了。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学一定要保护。他还指出，经济工作要越搞越细密，越深入，越实际，越科学。他从哲学上、思想方法上讲了冷热结合的问题。他在12月1日写的一篇文章中说：“同志们，可能性同现实性是两件东西，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虚假的可能性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东西，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头脑要冷又要热，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意做分析，只爱热。同志们，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斤斗，这些人应当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头脑。另一些人爱冷不爱热。他们对一些事看不惯，跟不上，观潮派，算账派属于这一类，对这些人，应当使他们的头脑慢慢热起来。”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从理论上讲是正确的，在当时也起了一定的降温作用。但是，从总的看，毛泽东本人是爱热不爱冷，而且对冷热标准的看法也有很大的主观性。因此，武昌会议虽然唱了个低调，降低了北戴河会议订的1959年的指标，但会议并没有提出反对冒进，而是继续搞大跃进。1959年钢产量为1800万吨，粮食产量为10500亿斤，棉花为1亿担。正因为这样，武昌会议后，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风、命令风，不仅没有停止，反而继续发展。1959年2月2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我们搞经济建设还是小孩子，无经验。向地球开战，战略战术，我们还不够成熟，要正面承认这些缺点错误。又说，关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问题，我不甚了解，要研究。究竟如何使主观符合客观法则？列宁说，俄国的革命热情与美国的求实精神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客观法则要研究它，认识它，掌握它，熟练它。斯大林对这个问题讲了很多，但不照着去做，不按比例。毛泽东自以为在作翻案文章，开始找到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法则。中国有句俗语，“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毛泽东作为旁观者对斯大林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可作为当局者，他实际上不仅没有改正斯大林“讲得很多，但不照着去做”的毛病，而且在1958~1959年间犯的错误比斯大林更大、更严重。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了两种主观能动性的观点。他说：凡是经过努力可以办得到的事情就要努力办到，如果不去努力就叫保守。不能办到的就不办，一定要它办到就是主观主义。主观能动性有两种，一种是脱离实际的，就是主观主义。一种是符合客观规律的，符合实际的。凡是违反客观规律的就要受挫折。毛泽东对主观能动性的这种区分是必要的，是针对现实生活中的主观主义而发的。

为了纠正农村工作中的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风和命令风，毛泽东于4月29日向全国的省、地、县、公社、大队、小队的干部发了封信，就包产、密植、节约粮食，播种面积、农业机械化、讲真话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在信中说：“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

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信的最后写道：“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

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

6月13日，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领导同志讨论经济问题。他说：一些指标，定得那么高，使我们每天处于被动的地位，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指标都是我们同意了，都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性不认识。讲了多少年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就是不讲综合平衡。明年指标切记不可定高。会议把1959年的钢指标降为1千3百万吨。

以上事实表明：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6月，毛泽东发热了的头脑变得稍为冷静了一些。与党内多数人相比，他唱的是低调，是总的高调中的低调。他头脑中的主观主义与实事求是打架。他在纠“左”时发表了一些很有见解的思想。

#### 四、大跃进与好大喜功

“成绩有两重性，成绩能够鼓励人，同时会使人骄傲”。作为辩证法大师的毛泽东虽然能认识到成绩具有两重性，但他本人并没有因此而避免成绩带来的消极作用。由于一连串的伟大胜利而滋长起来的骄傲自满，是他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重要思想原因。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面对国内外强大的敌人，一直小心谨慎，戒骄戒躁。在全国解放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强调了不要因为胜利而骄傲，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在进入北京时，他又提醒自己和全党，防止胜利冲昏头脑，“决不当李自成”。建国之初，由于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他小心谨慎，强调向苏联学习。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出来后征求苏联的意见。苏联很认真地对待这件事，经过专门班子研究后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认为工业每年增长20%、农业每年增长7%的速度过高，过快。建议工业每年增长14~15%为宜，提出要注意发展农业，大力发展手工业、小工业，注意克服冒进情绪、局部观点和依赖思想。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成功的，但毛泽东不满足，决心探索一条新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于是产生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著作，希望比苏联搞得好一些，快一些。

毛泽东在分析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时曾指出：在胜利面前，他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犯了错误。但毛泽东未能吸取斯大林的这一教训。他过于自信了，不谨慎了，总以为自己的决策是正确的，是可以实现的。他本人自然不会意识到自己的骄傲情绪在滋长，但党内外一些感觉敏锐的人已在1956~1957年时就有所觉察。

中共“八大”，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胜利之时召开的。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在为毛泽东代拟的中共“八大”开幕词中说：“即使我们的工作取得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

---

毛泽东：《党内通讯》，《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812、813页。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5页。

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在“八大”的讲坛上发出的这一番话应当说是很及时的，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鼓掌。但也许正是因为开幕词是请人代劳的，所以“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一真理虽然在一般的党员和群众的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在毛泽东的头脑中似乎没有留下多少印记。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真理在取得伟大胜利之时的意义。

1957年整风时，党外人士曾尖锐批评共产党有骄傲自满情绪。张奚若指出：这种骄傲自满情绪主要表现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陈铭枢也批评说：共产党“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轻视古董”。罗隆基则说：1956年以来经济建设中主要是冒进，而不是保守。这不是哪个人的问题，也不是哪个部的冒进。对这些逆耳之言，毛泽东不仅没有认为是“忠言”、“良药”，以此引起自己的警惕、自戒，反而视为右派言论，在党内外的会议上多次批驳。1958年1月30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好大喜功”，看好什么大，喜什么功？是反动派的好大喜功，还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革命派里两种，是主观主义的好大喜功，还是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我们是好六万万人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在成都会议（3月22日）上又说：张奚若批评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无产阶级就是这样嘛！任何一个阶级都是好大喜功的，不好大喜功，难道“好小喜过”？禹王惜寸阴，我们爱每一分钟。孔子“三日无君则惶惶如也”。孔子“席不暇暖”，墨子“突不得黔”。这都是急功近利。我们就是这个章程。水利、整风、反右派，六亿人口搞大运动，不是好大喜功吗？我们搞平均先进定额，不是急功近利吗？不鄙视旧制度、反动的生产关系，我们干什么？我们不迷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干什么？我们错误是有的，主观主义也是有的，但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是正确的。这些话，抽象地讲，无可厚非，问题在于毛泽东的好大喜功脱离了中国实际，是一种主观主义的好大喜功。

在成都会议上，他广征博引，大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其中也说到，我们不要怕马克思。他说：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要有势如破竹的风格。在八大二次大会上，他又说：马克思写的东西，不一定都要读完，读一部分基本的东西就够了，但我们做的超过了马克思。列宁说的、做的，许多地方都超过了马克思。马克思没有做十月革命，列宁做了，所以在实际方面是超过了。他那时有那时的条件，马克思没有做中国这样大的革命，我们实践也超过了马克思。在实践中，就会产生出道理来。马克思革命没有革成，我们革成了。在毛泽东的启发下，1958年夏，王任重写了一篇《学习马克思，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王任重在文章的末尾讲：本想用“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这个题目。但有的同志不同意（按：李达就不赞成），才改成现在的题目。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很大争论。1959年，王任重就这个问题请教毛泽东。毛泽东说：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是站在发展论的立场上讲上述话的，学生超过先生，后来者居上，这是

---

毛泽东一般不请别人代为自己写讲稿，偶尔代劳一下，也要说明，从不埋没别人劳动。在致完开幕词后，在休息室，许多人称赞开幕词写得好。毛泽东对大家说：“开幕词是谁写的？是个年轻的秀才写的，此人是田家英。”见逢先知的《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

人类认识发展的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从毛泽东当时的思想倾向看，自信、大胆有余，谦虚、谨慎不足。他赞赏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有势如破竹的态度，但也指出：对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有些破烂了”。我们也可以说，毛泽东本人过于自信，也有破烂了的。他为一系列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为假象所迷惑。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讲，今年一年好事多得很，开辟了道路，许多过去不敢设想的事实现了。此时的毛泽东有点飘飘然，他想创造奇迹，实现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跃进，尽快实现共产主义，让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讲，斯大林的悲剧是想做好事，结果做了坏事。而他在说这话的时候，也正在重演斯大林的悲剧。可他丝毫也没有觉察到这一点。

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急性病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表现。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吃过急性病的亏。希望中国革命早一点胜利，快一点胜利，抽象讲，这没有什么不好，问题是这种主观愿望不符合中国革命实际。毛泽东同这种“左”的急性病进行了斗争。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急性病又一再发作。日子稍好过一点，就头脑发胀，经济形势稍一好转，就犯急性病。这一顽症，毛泽东临终时似乎有所觉悟。他给华国锋的三条指示之一是：“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确实，无论在经济建设上、社会制度的改革上，都不能操之过急。“欲速则不达”，这是一个值得我们牢记的真理。这样讲，并不是说越慢越好，而是要实事求是，留有余地，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

## 第二节 大跃进中的辩证法与形而上学

通观毛泽东建国以后的哲学思想，我们可以发现，在 1956 年以前，他的重点是在讲唯物论，批唯心论，批主观主义。也许正因为这样，那时实际工作中唯心论、主观主义相对少一些。从 1956 年起，他转向重点讲辩证法，反对无矛盾论，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1957 年 3 月 19 日，他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中写道：“中国应当是辩证法发展的国家。”1958 年更是他大讲辩证法的一年。5 月 17 日，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说：辩证法应该在中国得到发展，别的地方我们管不着，我们是管中国的事，我们这一套比较合乎辩证法，比较合乎列宁，不太合乎斯大林。同年 12 月 9 日，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他又说：1958 年，马克思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在我国有很大发展。如何评价毛泽东的上述自我鉴定？大跃进中辩证法是不是真的有很大发展？我认为，对这样的问题很难作是与不是的简单回答。从单纯的理论上讲，毛泽东确实有许多深刻的独到的见解，但从实践上看，他的辩证法或者是为“左”的错误作辩护，或者是没有贯彻实行。

### 一、“两条腿走路”与对立面的结合

毛泽东讲 1958 年对立统一学说在我国有很大发展，首先是指提出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他在 1958 年 12 月 9 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讲话中的第六个问题是“研究辩证法问题”。他说：两条腿走路是对立统一的学说，是属于辩证法范畴的。马克思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1958 年在我这有很大的发展，例如：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与轻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小土群与大洋群同时并举，土法生产与洋法生产同时并举，还有管理体制中央统一领导和地方各级分级管理，从中央、省、地、县、公社一直到生产队，都给他一点权，完全无权是不利的。这些思想在我们党内已经确立了，这很好。这些事在社会主义阵营，在有些国家是不合法的，不许许可的，在我们这里是许可的，合法的。他在另一些讲话中多次讲到，苏联只重视工业，不重视农业、轻工业，这是一条腿走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手扶拐杖，比较偏颇。“两条腿走路”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其哲学含义是注意对立面之间的统一、结合，防止片面性。毛泽东提出的上述一系列并举，两条腿走路是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也比较容易做到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综合平衡。

在大跃进的过程中，毛泽东还提出了一系列的对立面结合，他针对有的领导干部只注意生产，忽视生活的倾向，提出了既抓生产，又抓生活；针对只讲苦战，不注意群众休息的倾向，提出苦战与休整、劳与逸的结合；针对公社化过程只强调集体，忽视个人与家庭的倾向，提出“大集体”与“小自由”结合；针对一部分人头脑过热，提出冷与热结合、冲天干劲与科学分析结合等等。所有这些，他认为都是辩证法的推广。

1959 年 5 月 3 日，周恩来在部分文艺界人士的座谈会上对什么是两条腿走路的问题作了极好的说明。他说：“两条腿走路，就是对立面的统一。这个问题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早已解决了。对立统一本身就是两条腿，既要有机地结合，也要有主导方面（也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我们的哲学

思想，也是我们重要的工作方法。这本来是老问题，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一些同志常常强调这一方面。忘记了那一方面，变成一条腿，而一条腿走路，难免就要摔跤。”接着他针对文艺界的倾向谈了文学艺术工作中的两条腿走路问题：“文化艺术工作也要两条腿走路，既要结合，又有主导。”；“既要鼓足干劲，又是心情舒畅”；“既要力争完成，又要留有余地”；“既要思想性，又要有艺术性，主导方面是思想性”；“既要浪漫主义，又要现实主义”；“既要学习马列主义，又要和实际结合”；“既要学习政治，又要和生活实践结合”；“既要有基本训练，又要有文艺修养”；“既要有政治挂帅，又要讲物质福利”；“既要重视劳动锻炼，又要保护身体”；“既要敢想、敢说、敢做，又要有科学的分析和根据，客观的可能性与主观的能动性结合起来”；“既要独立风格，又要能兼容并包（或叫丰富多彩）”。总之，要从思想到工作方法，学会两条腿走路，以便作好我们的工作，同心同德，群策群力，推动我们的文化艺术不断前进。”

在十月革命后，列宁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曾提出对立面结合的思想。国内战争结束后，俄国物资紧缺，为了振兴工业，列宁主张实行倾斜政策，对国家最需要的部门特别偏重，将重点制与平均制结合起来。列宁承认，要想把重点制和平均制结合起来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因为这两个概念是彼此排斥的。“但不管怎样，我们多少学过一些马克思主义，懂得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可以（而且应当）把对立面统一起来，而更重要的是，在我们三年半的革命时期，我们在实践中已经不止一次地把对立面统一起来。”他指出：“可以把这些对立的观念不和谐地结合起来，也可以把它们和谐地结合起来。”做到对立面的和谐结合，这是一种领导艺术，需要具体分析、研究对立面的相互关系及结合的条件。关于“对立面结合”，列宁讲的不多。因此这一思想长期没有引起苏联学者的注意。只是到了六十年代以后，他们才抓住列宁的一二句话，大讲起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对立面结合。

与列宁相比，毛泽东关于对立面的结合言论就多得多。矛盾着的对立面既有互相斗争、互相排斥的一面，又有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一面。“两条腿走路”、“并举”、“结合”是解决矛盾的一种方法。当然由在理论上讲“结合”到实践上真正做到“结合”，需要有一过程。

在1958年，毛泽东在提出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时，还提出了二个口号：一个是，“发展工业，以钢为纲”；一个是，“发展农业，以粮为纲。”他认为，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他在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时说：我们工业搞了八年，不晓得以钢为纲。今年九月，才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辩证法，也是最近才摸到，过去是不认识、不理解的。又说：“工业内部以钢为纲，农业内部以粮为纲，其他按比例发展。”在复杂众多的矛盾中抓住主要矛盾，在矛盾两方面中抓住主要方面，这在理论上是完全正确的，而且也为实践所证明。但问题是：第一，主要矛盾要抓准，抓对；第二，正确处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的关系。钢铁生产在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并非为主要矛盾，并非抓住了它，就可以把整个工业带动起来。1958年，以“钢为纲”，钢产量翻一番，1070万吨，全民炼钢，结果，一是冲击了农业，粮食大丰收，

---

列宁：《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411～412页。

列宁：《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411～412页。

有些地方壮劳力炼钢铁去了，没有人收。（1958年彭德怀回故乡，平江县一残废红军战士给彭写了一纸条：“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获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一是冲击了轻工业和其他工业。所以1958年，毛泽东虽然提出两条腿走路，批评斯大林一条腿走路，可实际上，却还是一条腿走路，丢掉了一条腿，造成了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严重比例失调。

在大跃进年代，毛泽东提出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虽然没有能得到贯彻，但体现在“两条腿走路”中的“对立面结合”的思想在理论上的正确性是不容否定的，在实践上也仍然是有益的。

## 二、关于对立面转化的理论

斯大林在1938年写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只承认对立面的斗争，不承认对立面的统一。在斯大林的影响下，苏联哲学家不承认对立面之间有同一性，不承认对立面之间可以转化。苏联《哲学问题》杂志1953年第1期（中文《学习译丛》1953年第6期）刊登巴热诺夫的《评罗森塔尔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一文说：“我们认为罗森塔尔教授所用‘对立的统一’及‘对立的统一和斗争的法则’等名词是不妥的。斯大林同志在其经典著作《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已规定发展即对立面的斗争。”文章认为：“对立面斗争”的提法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最新成就”，而在“我们的哲学著作中所见到的对立的‘同一’或对立的‘统一’等名词，是黑格尔的表达方式的残余。”毛泽东在读了这篇文章后批写：“我认为这种批评是错误的”。在同年《哲学问题》第4期（中文《学习译丛》第11期）上罗森塔尔发表文章作了检讨，并说：“斯大林在表述辩证法的第四特征即发展是通过斗争时，就没有使用黑格尔的‘对立统一’‘对立的同一’这些概念，可惜我们在自己的宣传工作中还没有考虑抛弃这些概念的意义。”在《矛盾论》里，毛泽东用相当大的篇幅论述对立面的同一性问题，列举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战争与和平、生与死等许多例子来说明对立面的同一性。1954年出版的由罗森塔尔和尤金主编的《简明哲学辞典》在“同一性”条目中则不指名地批评了《矛盾论》的观点。他们说：“像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生和死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相互排斥的。”谁要是认为它们之间有同一性，那就是“滥用黑格尔的术语，孟什维克的唯心主义者格外热衷于这种做法。”

在1957年，毛泽东批评斯大林不承认对立统一，思想僵化，因而在政治上犯错误；批评《简明哲学辞典》对《矛盾论》的批评，说明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生与死之间有同一性。他还在许多讲话中谈到好事与坏事、正确与错误、成功与失败等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

1958年，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使人们的思想活泼起来，毛泽东在3月的成都会议上大讲对立面的统一和互相转化。他通俗、生动而风趣地说：开会的目的，为了调整生产节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是快与慢的对立统一。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下，波浪式前进，这是缓与急的对立的统一、劳与逸的对立的统一。如果只有急和劳，则是片面性。专搞劳动强度，不休息，那怎行！做事总要有缓有急。从前打仗，两个战役之间必有一个休整、补充和练兵，不可能一个仗一个仗打，打仗也有节奏。

中央苏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就是反休整，主张“勇猛果断，乘胜直追，直捣南昌”，那怎么行？苦战与休整的对立统一，这是规律。

而且是互相转化的，没有一种事情不是互相转化的。急转化为缓，缓转化为急，劳转化为逸，逸转化为劳，劳和逸、缓和急、苦战与休整有同一性。睡眠与起床也是对立的统一，试问谁能担保起床以后不睡觉？反之“久卧者思起”。睡眠转化为起床，起床转化为睡眠。

开会走向反面，转化为散会，只要一开会就包含着散会的因素。我们在成都不能开一万年会。王熙凤说：“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这是真理，不可以人废言，应以是否为真理而定。团结中包含着不团结。有意见分歧，就转化为斗争，不可能天天团结。年年团结，讲团结是因为不团结，因此要作工作。老讲团结一致，不讲斗争，不是马列主义。从团结出发经过斗争，才能达到新的团结，党内、阶级、人民都一样。苏联就不讲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没有矛盾斗争，就没有世界，就没有发展，就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老讲团结，就“一潭死水”，就会冷冷清清。他又说：生与死也是互相转化的，生物转化为死物，死物转化为生物。我主张五十岁以上的人死了开庆祝会，因为人是非死不可的。这是自然规律。粮食是一年生植物，年年生一次，死一次，而且死的多生得越多。例如，猪不杀掉，就越来越少，谁喂呢？毛泽东的这些话，初看起来是奇谈怪论，但仔细一想，却是包含深刻的哲理。在一般人看来，男人与女人是无法转化的。毛泽东却别有解释：女子转化为男子，男子转化为女子，当然直接转化是不行的，但结婚后生男生女，还不是转化。毛泽东的这一说明表明，矛盾是千差万别的，矛盾的对立面转化的形式也是千差万别的，不要拿一个框子去套。要是男人只是男人，女人只是女人，不能转化，那不仅世界上男女人数不会变化，而且人类也会灭亡。

在讲话中毛泽东还讲了生产与消费、父亲与儿子、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战争与和平、量变与质变、有限与无限等对立面转化。他说：“要举丰富的例子，搞几十个、百把个例子来说明对立的统一和相互转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认识。”“讲这些就是为了展开思想，把思想活泼一下，脑子一固定，就很危险。”“总而言之，要多想，不要死背经典著作，要开动脑筋，使思想活泼起来。”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为了启发人们去掉囿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他浪漫而富有哲理地提出：我们是不是住在天上？我们是不是神仙？我们是不是洋人？一般人因囿于俗见，认为我们住在地上，而不是天上；是凡人，而不是神仙；是中国人，而不是洋人。他则说：不，人们住在天上。在地球上，别的星球是在天上，如果别的星球上有人，他们看我们，不就是在天上吗？所以我们是住在天上，同时又住在地上。关于是否是神仙，他说：神仙是住在天上的，我们住在地球上，也都住在天上，为什么不算神仙？如果别的星球上有人他们不是把我们看成神仙吗？关于中国人算不算洋人，他说：中国人也叫洋人，因为我们看外国人是洋人，外国人看中国人不也是洋人吗？他的这些话确实能使人解放思想，包含着辩证法思想。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纸老虎”是毛泽东在1946年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顺便指出，把帝国主义比作纸老虎并不始于毛泽东。1904年5月，在陈独秀主编的《安徽俗话报》上发表了署名守一的政治小说《痴人说梦》。小说讲的是中国的外患一天紧似一天，不是割地，就是赔款，俄国人占住了

东三省，俄国人这样蛮横，不和他拼命恶战一番，中国是万不能自存的。小说针对一部分人恐俄情绪说：“那个腐败的俄鬼，不过是纸老虎，有什么可畏惧他呢？”〔第4期〕，又说：“俄国本是纸老虎，将来必不是日本的敌手”〔第5期〕。1922年3月6日，香港广州工人在庆祝罢工斗争胜利时就形象的将英帝国主义比喻为纸老虎，其后恽代英、蔡和森等在文章中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称作纸老虎。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1933年2月〕中有“戳穿叶灵凤纸老虎”之语。但对此论断作出科学说明并在实际的阶级斗争中发生重大作用的则是毛泽东。）全国解放后，他又作了多次解释。但头脑僵化的赫鲁晓夫却怎么也理解不了这一科学论断，1958年12月，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用对立统一观点再次阐述这一论断。他说：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既是真的老虎，又是纸的老虎，这是一个由真变纸的过程。变即转化，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走向反面。一切事物都是如此。不独社会现象。他进而解释说：“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反动的、落后的、腐朽的阶级，在面临人民的决死斗争的时候，也还有这样的两重性。一面，真老虎，吃人，成百万人成千万人的吃。……但是，它们终究转化成了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这是历史的事实。”因此，他说：“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向阶级敌人作斗争是如此，向自然界作斗争也是如此。”他进而指出，我们革命者就是做转化工作的。他说：我们的工作认识、掌握与运用自然运动的法则和社会运动的法则，“一个一个地解决人们面临的问题，处理矛盾，完成任务，使困难向顺利转化，使真老虎向纸老虎转化，使革命的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化，使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化，使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转化。使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转化，使年产几百万吨钢向年产几千万吨钢乃至几万吨转化，使亩产一百多斤或几百斤粮食向亩产几千斤或者甚至几万斤粮食转化，同志们，我们就是做这些转化工作的。”

从理论上讲毛泽东关于对立面的统一与转化的思想是深刻的，否认对立面的统一，否认对立面的转化，必然导致思想僵化，陷入要么这样，要么那样的片面性。像毛泽东这样讲转化，在哲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转化的思想也是他具有的敢想敢说敢做、富于创造和敢于藐视一切敌人与困难气质的体现。

---

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06～807、808页。

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06～807、808页。

共产党人是做转化工作的，但转化是有条件的。在《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是注重条件的，认为，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的双方不会转化。但在1958年，他讲转化时，已不那么注重条件。在实际工作中，不注意研究转化的条件，因而陷入浪漫的幻想。

### 三、关于平衡与不平衡的理论

在经济建设中，做好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综合平衡是计划工作的核心问题。因此平衡不平衡问题是毛泽东在大跃进时讲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

国民经济按比例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规律。计划工作中的冒进往往破坏必要的平衡，使正常的比例关系失调。周恩来在纠正1956年的冒进时说，搞计划必须注意实事求是，必须注意平衡。“搞生产就要联系到平衡，”“一定要为平衡而奋斗”。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以辩证的观点看待上马与下马，前进与后退，平衡与不平衡。他说：“我们对问题要作全面的分析，才能解决得妥当。进还是退，上马还是下马，都要按照辩证法。世界上，上马和下马，进和退总是有的，哪有上马走一天不下马的道理？”又说：“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暂时建立了平衡，随后就发生变动。上半年平衡，下半年就不平衡了，今年平衡，到明年又不平衡了。净是平衡，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平衡，矛盾，斗争，发展，是绝对的，平衡，静止，是相对的。所谓相对，就是暂时的、有条件的。”他认为，以这样的观点来看待经济，那今年冒进一点，就不是不得了，明年减少一点，也就没有什么。“有进有退，主要的还是进，但不是直线的前进，而是波浪式地前进。”之后，他又说：“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有时因为主观安排不符合客观实际情况，发生矛盾，破坏平衡，这就叫做犯错误。”他的这些论述，从一般的理论上讲是正确的。

到了1958年，毛泽东关于平衡与不平衡的思想有所变化。在他看来，过分注重平衡是右倾保守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过分强调了不平衡的作用，忽视了平衡的意义。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称：“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环节都进到高级。”当大跃进刚起，一部分人担心国民经济的平衡遭破坏，搞乱了整个经济秩序。《人民日报》在2月28日发表《打破旧平衡，建立新的平衡》的社论，批评所谓消极平衡，提倡所谓积极平衡。社论认为，以压低过高指标，求得的平衡是消极平衡，提高落后指标和定额向先进看齐的平衡是积极平衡。社论说：从“庸俗的平衡论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我们也就敢跃进了”。这种说法抽象看来似乎不错，问题在于“高指标”是不是符合实际，低指标有没有向先进看齐的可能性。那时“高指标”就是先进，“低指标”就是“落后”。在这种空气下，指标越来越高，完全脱离了实际的可能。当然，从理论上讲，毛泽东也不是完全不要平衡。在成都会

---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3～314页。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5页。

议上，他讲：“平衡理论问题，现在好像不要平衡，还是应当要一点。现在有人认为越不平衡越好，是否有道理？”但他没有展开讲。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提出：平衡的破坏是跃进，平衡的破坏优于平衡，不平衡大伤脑筋是好事。如一机部、冶金部、地质部等日子不好过，大家压他们很紧，都要大发展，这是好事。他的这些说法显然是过分偏爱不平衡，忽视了平衡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结果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平衡与不平衡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两种状态。它们本身是对立统一的。平衡与不平衡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互相转化，平衡中包含不平衡，因此事物才能不断发展，这是毛泽东所强调的。不平衡中又有相对的平衡，因此事物才能存在，才可能发展。恩格斯指出：任何特殊相对的运动，都是为了确立相对静止，即平衡的一种努力。“物体相对静止的可能性，暂时的平衡状态的可能性，是物质分化的根本条件，因而也是生命的根本条件。”这一点为毛泽东所忽视。他把不平衡看成是普遍规律带有片面性。“平衡——不平衡——平衡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的说法比较全面。应当承认，毛泽东在1959年夏已开始认识到平衡问题的重要性。他在庐山会议开始时把“综合平衡问题”列为会议的十八个问题之一，并说：“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没有兼顾，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又说，三种平衡：农业本身农、林、牧、副、渔；工业内部的平衡；工业和农业。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无综合平衡，即无群众路线。毛泽东的这一见解是对1958年大跃进引起的比例失调的一种反省、总结。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对平衡不平衡理论的说明趋于完整。苏联教科书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的发展极不平衡，必然加深生产中的比例失调现象。与此相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保证根据国民经济的需要有计划地发展科学技术。”毛泽东认为，这段话写的不对，它既否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某种平衡，也否认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某种不平衡。资本主义技术发展，有不平衡的方面，也有平衡的方面。问题是他们这种平衡和不平衡，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平衡和不平衡，在性质上不同。技术的发展是这样，经济的发展也是这样。他又说：平衡是对不平衡来说的，没有了不平衡，还有什么平衡？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门、各部门的各个环节都存在，不断地产生，不断地解决，平衡了又不平衡，按比例了又不按比例，这种矛盾是经常的永远存在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况，要求我们按比例和综合平衡。他认为苏联教科书关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这一章写得很长，但没有提出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他说，“物之不平，物之情也。”社会主义经济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使不平衡得到调节，但是不平衡并不消失。毛泽东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里，国民经济的平衡是通过危机达到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可能通过计划来实现平衡。但我们对必要的比例关系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因此，有不平衡，有比例失调，才能促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规律。出了一点毛病，就以为不得了，痛哭流涕，如丧■妣，这完全不是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他的有些话抽象地看是不错的，问题是这些错误不是不可避免的，有些错误犯得如此之大，能不使人痛心疾首吗？

苏联不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国民经济的发展存在着不平衡，结果虚假的平衡掩盖了农业与工业、重工业与轻工业等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对这种错误，毛泽东是认识到了。可他又走向另一极端，以“不平衡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为由，搞冒进，从另一方面，使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当然，从哲学理论上认识平衡不平衡的规律，到实际上正确处理国民经济的各种比例关系，达到平衡、协调、稳步的发展，这是一个过程。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调整就是为了求得平衡、协调的发展，发展、调整、发展这是与平衡、不平衡、平衡相一致的客观规律。

#### 四、“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

“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是毛泽东在1958年和1959年间讲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他把这一问题单列为一条。他写道：“人有十个指头，要使干部学会善于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或者多数指头和少数指头。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有区别，这件事看来简单，许多人却不懂得。要宣传这种观点，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区别，我们要注意抓住主流，抓错了一定翻跟斗。这是认识问题，也是逻辑问题。说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这种说法比较生动，也比较合于我们工作的情况。我们的工作，除非发生了根本路线上的错误，成绩总是主要的。”

紧接着，他又写了另一条：“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这是一种脱离实际情况的形而上学的方法。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我党在历史上吃过这种方法的大亏。这是教条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也用这种方法。”“我们应当总结过去的经验，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加以批判，使干部觉醒起来，以免再吃大亏。好人犯个别错误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采用这种方法，所以好人也要研究方法论。”

抽象地讲，毛泽东的以上论述不无道理。但他在这时讲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问题是为了批评“反冒进”。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他认为，“反冒进”的同志采用的是资产阶级的方法，没有弄清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他请大家看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会上印发了）。他解释说：登徒子向楚襄王反映宋玉长得漂亮，会说话，好色。宋玉一一作了反驳（长得漂亮是父母所生，会说话是老师所教，好色无此事）。宋玉反说登徒子好色，说登徒子讨了一个麻脸驼背的老婆，生了五个孩子，你看好色不好色。只攻其好色一点，不及其余。他讲，宋玉的这篇文章使登徒子两千多年不得翻身，他的方法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完全属于颠倒是非的诡辩。3月25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辩证法是研究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的。矛盾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过去发生反冒进的错误，即未抓住主流和本质，把次要矛盾当做主要矛盾，把支流当做主流，没有抓住问题本质。5月17日，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又讲：不要忘记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1956年反冒进，就是忘记了这个问题，不从本质看问题，要从中吸取教训。毛泽东的这种批评明显是错误的。第一，1956年反冒进是正确的，冒进是脱离了实际，是主观主义的；第二，周恩来等批评冒进，并没有否认当时经济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并不是使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

到了1958年下半年和1959年初，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的问题已非常突出，非常严重，可毛泽东在1959年2月2日的省市书记会议上依然讲：有些人一讲去年的缺点时，尽是缺点，脑筋里记了几十条缺点，把成绩方面挤得没有了。这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是形而上学还是辩证法的问题。他认为，不管我们有多少缺点，归根到底，不过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他又说：和尚念经，天天念，这是个别与一般、大部分与小部分、部分与全体的关系问题，我们党有几十年的经验，对于本来是好心的人，犯了一点错误就夸大起来，就会变成一片黑暗。现在有些好心的人，就是方法不对，分不清部分和全体的关系，缺点一列几十条，就是天昏地暗，一无是处。这一点要警惕。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等同志，认为彭德怀等人颠倒了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采用的是“攻其一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的方法。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最根本的原因是毛泽东脱离了实际，把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公式化。抽象地讲，“只要路线正确，工作中成绩总是主要的，缺点总是次要”的说法，未可厚非，问题是路线正确与否本身需要有实践来检验。他虽然承认工作中有缺点、错误，但总认为自己的路线是不会错的，是正确的。所以当人们实事求是地指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时，批评指导思想上有错误时，他就指责别人区分不清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甚至给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对于工作中的成绩与缺点，应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加以科学分析，成绩是几分就是几分，缺点是几分就是几分，既不夸大，也不缩小，不能从路线是正确的这未经证明的前提出发，将九指头和一个指头（或七分成绩、三分缺点，或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作为一个公式，到处去套。

“观察的客观性”是辩证法的第一要素。尊重辩证法首先要尊重唯物论，对辩证法的主观主义运用就会将它变成为诡辩的工具。毛泽东由于过于自信，由于主观主义的运用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公式，辩证法又一次走向了反面，成了为错误辩护的工具。这教训值得我们记取。

## 五、若干工作方法

领导是一门艺术。毛泽东在江西时期就提出注意工作方法问题。到了延安时期，他更自觉地将哲学运用于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写出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这样的名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践相结合开辟了新的领域。1958年，为了适应新的情况，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作了总结，集中了大家的意见、智慧，写成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他在前言中说：“这里讲的也不完全是工作方法，有些是工作任务，有一些是理论原则，但是工作方法占了主要地位。我们现在的主要目的，是想在工作方法方面求得一个进步，以适应已经改变政治情况的需要。”《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虽然其中许多内容是正确的，但从总的倾向看，它是为“大跃进”作准备的，带有“左”的印记。

1959年4月，针对大跃进以来出现的“左”的问题，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作了工作方法问题的讲话，先是提出“工作方法九条”，之后作了补充，搞了一个“工作方法十六条”。他指出：“我们要实现总路线，必须有好的工作方法，没有好的工作方法，我们的总路线是不能完全贯彻的。有

了总路线，还必须有好的工作方法，才能实现多快好省、几个并举。”他又说：“所谓方法，无非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互相结合的，思想方法不对头，工作方法也就不对头。”他认为，总路线是正确的，之所以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主要是工作方法有问题，因此，“现在中心问题是工作方法问题”。他提出的工作方法主要有：“多谋善断”、“留有余地”、“波浪式前进”、“实事求是”、“要当机立断”、“解除封锁”、“一个人有时胜多数人”、“要历史地看问题”、“要解放思想”等。《工作方法十六条》是为纠“左”而提出的，因此许多内容至今看来仍有价值，但由于纠“左”只涉及到工作中的具体缺点，而没有触及指导思想，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大跃进的痕迹。

这里我们不可能把毛泽东在 1958 年和 1959 年提出的工作方法一一介绍，这里只能介绍若干方法。

（一）一切经过试验通过个别典型试验，取得经验，然后逐步推广，这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倡导的工作方法。在 1958 年，他重新提出“一切经过试验”。

1957 年湖北省红安县的干部，走出办公室，同农民、技术人员一起搞科学试验，种丰产试验田，取得经验，指导和推动广泛的群众生产活动。毛泽东对此种方法十分赞扬，并加以推广。1957 年 10 月 9 日，他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中写道：“红安县的经验值得注意，各级领导办试验田。”其后，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又写道：“普遍推广试验田，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导方法。这样一来，我们党在领导经济方面的工作作风将迅速改观，在乡村是试验田，在城市可以抓先进的厂矿、车间、工区和工段。突破一点就可以推动全面。”令人遗憾的是，在大跃进中，种试验田不仅流于形式，而且出现了假的、虚报浮夸现象，助长了高指标、瞎指挥风。

为了“争取在三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毛泽东提出：“口号是：苦战三年，方法是：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但在实际上，“一切经过试验”，被抛之于九霄云外。许多地方的苦干成了无根据的蛮干。放手发动群众成了一哄而起的运动群众。人民公社运动、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无不是在没有经过试验的情况下，立即在全国全面地铺开的。刘少奇在 1962 年的七千人大会上讲：“这几年搞了许多运动。这些运动很多是一哄而起的。我们要有朝气蓬勃，但是进行工作、开展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先经过典型试验，然后逐步推广，要有准备、有步骤、有区别、分期分批的进行。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更应该是这样。这是过去我们在土地改革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在建设时期，是向地球开仗，也要这样。”“‘敢想、敢说、敢做’的那个‘做’不是说一下子在全国去做，而是指在小范围内去做，先做典型试验。一切经过试验这一条，一定要实行。凡是没有把握的、没有成熟经验的事，都必须先经过试验，然后才分期分批地逐步推广。”刘少奇的这一总结包含着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工作中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

这里还要讲一下如何对待典型经验问题，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个别中包含着一般，个性中寓于着共性。但个别不等于一般，个性不等于共性。任何典型经验都是个别与一般的结合。因此，在总结、推广典型经验时要注意那些有普遍适用性，那些则没有。在学习、运用典型经验时，不可生搬硬套，

要善于将普遍的东西与本单位、本部门、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极不平衡，各地、各单位、各部门的情况千差万别，有些事情、有的任务，在有的单位、地方、部门可以办到。而有的单位、地方、部门则暂时还不可能办到，在这方面决不可作这样的推论：既然某某可以办到，其他地方也一定可以办到。

## （二）抓两头，带中间

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的发展较快，有的发展稍慢。有的个人、单位、部门、地区的工作做得好些，有些则做得差些，有的则处于一般。先进与落后是矛盾的两个极端。为了做好工作，毛泽东提出“抓两头，带中间”的领导方法。他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领导方法，任何一种情况都有两头，即是先进和落后，中间状况又总是占多数。抓住两头就把中间带动起来了。这是一个辩证的方法。抓两头，抓先进与落后，就抓住了两个对立面。”抓先进，是指要善于发现先进，帮助、培养先进，总结其经验；表彰先进，树立典型，促进中间与落后向先进转化。抓落后，是指积极帮助落后。做好工作，使之转化为先进，并总结后进变先进的经验。抓好落后，对先进和中间也是一种促进。先进与落后是相对而言的，先进并非一切都是先进，也有落后之处；落后也非一切落后，也有积极因素可利用；先进并非永远是先进，弄得不好，会转化为中间以至落后，无论对先进，还是对落后，都应采取实事求是的辩证分析态度。

（三）设置对立面这是毛泽东在 1958 年提出的工作方法。今天许多论者对“设置对立面”持否定态度。为了实事求是地评价这一方法，我将尽可能地介绍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论述。

3 月 9 日，他在成都会议上讲：苏联有苏联的一套办法，苏联经验是一个侧面，中国实践又是一个侧面，这是对立的统一。他批评照搬照抄苏联的做法。指出：把苏联的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不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什么事情都要提出两个办法来比较，这才是辩证法。不然就是形而上学。铁路选线、工厂选厂址、三峡选坝址，都有几个方案，为什么规章制度不可以有几个方案？

3 月 10 日，他又讲：忘记了历史经验教训，不懂得比较法，不懂得树立对立面。我昨天已经讲过，对许多规章制度，我们许多同志不去设想有没有另外一种方案，择其合乎中国情况者应用，不合适者另拟。

3 月 22 日，他讲：各省可办一个刊物，成立一种对立面。并且担任向中央刊物发稿的任务。

3 月 25 日，他说：尊重唯物论、辩证法的人，是提倡争论，听取对立面的意见，把问题提出来，暴露了对立面。

在 5 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讲了设置对立面的问题。在 5 月 8 日的会上，他说：设置对立面很重要。对立面是客观存在的。如我们对于右派，让他放，让他讲，这是有计划地这样做。目的是要设置对立面。整风反右以后，有的同志忽视整改，又强调了大字报，双反，这样设置了对立面，出一亿张大字报，逼得非改不可。他进一步解释说：设置对立面不是说客观上不存在而去设置。所谓对立，是要客观上存在的东西才能设置起来，客观上不存在的东西是设置不了的。

在 5 月 20 日的会上，他再次谈到设置对立面的问题。他说：设置对立面，有两种。一种是社会上本来存在，如右派本来就存在，放不放是政策问题。

我们决心放，大鸣大放，放出来作为对立面。另一种是自然界不存在的，但有物质条件，如修水坝，可以用人为办法设置对立面。抬高水的位置让它流，使它有个落差，可以发电，可以行船。如开工厂也是设置对立面。鞍钢是日本人修的，长春汽车厂是新的，是人工设置的对立面。自然界没有的，可以人为的制造，但要有物质基础。

1959年3月27日，他在党内通讯中就关于如何召开县和公社会议问题上指出，县召五级（县、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生产小队（即生产组），干部会，每一级都要有人参加，而且一定要有思想不通的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参加，最好占十分之一。“要使三种对立面在会上交锋：一种，基层干部与他们上级（公社和县）之间交锋；一种，思想不通的人与思想已通的人之间的人之间交锋；一种，十分之一的观潮派、算账派（有许多被认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其实并不是观潮派算账派，他们被人看错了）与十分之九的正面人物之间交锋。”毛泽东这种建议，为的是在不同意见的争论中求得正确的、符合广大群众的政策。

3月29日，他在党内通讯中又指出：城市，无论工矿企业，凡属大政方针的制定和执行，一定要征求基层干部（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工段长）、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等人的意见。一定要有他们占压倒多数的人到会发表意见，对立面才能树立，矛盾才能揭露，真理才能找到，运动才能展开。”

在庐山会议上，在7月11日夜，他对人说：他自己就是个对立面，自己常跟自己打架，有时上半夜想不通，下半夜就想通了。

毛泽东关于设置对立面的意见正确吗？1978年以后，大多数论者持否定态度。有人认为：二十年的实践证明，这是不正确的。（一）对立面在没有发展到一阶段，是不能用‘拔苗助长’的方法过早暴露出来的。（二）客观事物中不存在的对立面，是不能人为设置的，人为设置对立面给我国造成严重损失。（三）“设置对立面”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唯心论。我以为这种评论失之偏颇。毛泽东用设置对立面的方法搞阶级斗争（如1957年反右斗争），搞党内斗争（如1959年的反右倾和十年“文化大革命”）是极其有害的，对此应当加以否定。但由此全面否定“设置对立面”这一命题就值得商榷了。

从前面所引的毛泽东的论述中，所谓“设置对立面”的方法包括以下含义：（1）客观上有对立面的才能设置，客观上没有的，不能人为地设置；（2）所谓设置，其实是自觉地把对立面暴露出来，揭露出来；（3）从领导方法、工作方法上讲，自觉地设置对立面，可以有比较，有辩论，可以防止片面性。这一点连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也懂得，朝廷设谏官，专门提意见。我以为“设置对立面”的命题不应否定。1987年7月17日，陈云在一次谈话中说：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如有不同意见，就要认真听取。展开讨论，吸收正确的，驳倒错误的，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如果没有不同意见，自己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让大家来批驳。有钱难买反对自己意见的人。有了反对意见。可以引起自己思考问题。”“设置对立面”的方法不仅在领导工作中，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过程中经常运用，而且在文学、艺术的创作中也广泛使用。反衬法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

李秀潭：《“设置对立面”命题质疑》，《光明日报》1980年3月6日。

陈云：《身负重任和学习哲学》，《思想方法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91～492页。

（四）多谋善断这是针对大跃进中有些同志少谋武断而发的。毛泽东指出：“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谋是基础，有多谋才有善断。谋就是要同人商量。多谋，就要与多方面的人商量，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多看各方面的材料、各种方案。他批评有些人“与相同的意见谋得多，与相反意见谋得少，与干部谋得多，与生产人员谋得少”。他特别强调要听反面的意见，不同的意见。认为将各方面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分析研究，才能多谋善断，订的计划正确。他指出，谋的方法很多。如开调查会、座谈会，不拘形式，也可以跟秘书谋，与左右干部谋，与工人、农民谋。

谋的目的是为了断。所以不仅要多谋，还要善断。光谋不断叫做优柔寡断。三国时有个郭嘉，先在袁绍手下当谋臣，他感到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于是离开袁绍投奔曹操，深得曹操的重用，为曹操出谋划策。曹操平定天下，郭嘉功为高，不幸短命，事业未终，曹操痛惜。毛泽东建议大家读一读陈寿撰的《三国志·郭嘉传》，学习郭嘉多谋善断。1959年6月，毛泽东同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吴冷西谈话时说：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刘备、孙权、袁绍都有这个缺点，曹操就多谋善断。

谋是断的基础，多谋才能善断，但多谋并不等于善断。如何才能善断？这就需要“多思”，“善思”，即对谋得的各种意见、方案、材料加以科学的抽象，加工制作改造，从而作出正确的决断。这恐怕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难的。当然，谋与断不是绝然分开的，而是谋中有断，断中有谋。

善断，不仅包含断的正确与否，而且还包括时机。俗话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在指挥战争中，抓住战机尤为重要。故作为统帅、军事家的毛泽东一直很重视时机。他把“当机立断”作为“十六条工作方法”之一。他解释说：“只有观察形势正确，才能当机立断，把握形势的变化，来改变我们的计划。”

有的同志上不摸底，下不摸底，有的时候也有断，但断得不适当。优柔寡断是不对的，断的时候要下决心，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对党内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

（五）留有余地 1958年的高指标，弄得很被动。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提出：一切工作都要留有余地。他认为，这不仅是个工作方法问题，而且也是个政治问题。因为指标订得很高，实现不了，就挫伤群众积极性，

在国内外产生不好的政治影响。因此，我们安排工作计划时，要留有余地，给下面点积极性。不给下面留有余的，就是不给自己留有余地。过去打仗也是一样，要留有余地。集中兵力打击敌人，还要有个预备队，必要时把预备队拉出去。现在搞生产就丢掉了。留有余地也是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他说：我第一次访问苏联，与斯大林谈话时，问他们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有什么经验。苏联同志说：经济建设有两条经验；第一条留有余地；第二条是抓住重点。

留有余地，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颇难。毛泽东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就讲过：指标要确实可靠，要把过高的指标压缩一下，要谨慎些。给群众留点余地，也要给下级留点余地，这也是替自己留余地。但实际上，成都会议后，高指标不仅没有压下来，反而变得更高。195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上批示：下面发生的对群众生活不关心的问题，“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

着头皮去干，少于一点就被叫‘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虽然明确地把“留有余的”作为工作方法提出。但庐山会议反右倾，又出现高指标。要留有余地，必须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如果是主观主义的计划，即使是留有余地，那也还是主观主义的，是脱离实际的，是自以为留有余地而实际上仍然是过高的。

（六）波浪式前进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波浪式前进的，亦即螺旋式上升，而不是直线式前进的。这是一个客观规律。这一点，毛泽东早就有不少论述。针对大跃进以来一些人头脑过热，犯有直线性的毛病。他把“波浪式前进”列为一条工作方法。他说：波浪式前进是个工作方法。凡是运动就有波，在自然科学中有声波、电波。凡是运动就是波浪式前进，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做工作，订计划，也要照顾到这一点。波浪式前进是客观法则，不能老是翻一番。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懂得波浪式前进。“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但不能天天搞高潮，美国从1860到1958年的99年中间，也不过是七次生产高潮，不是每年都是高潮，也是波浪式前进。我们的经济建设。按实际情况，可以高些，可以低些。

波浪式前进，这是一个客观规律，经济建设也不例外。建设的速度有高有低，有快有慢，不可年年一样。计划工作做得好，发展过程中的波浪起伏就可能小些。计划工作做得不好，发生比例严重失调，就必须进行大的调整，波浪的起伏就大些，甚至可能出现大起大落的情况。在经济建设中，在社会制度的改革中，都要防止直线性、片面性，自觉运用波浪式前进的工作方法，以防止因主观主义失误而造成的大起大落的波折。

（七）红与专的结合，政治与业务的结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出：过去我们是革命一个接着一个，大家的思想都集中在那些问题上，很多人来不及学科学、学科技。从今年起，要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为了改变落后的面貌，我们一定要学习科学、学习技术，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技术革命的任务。同时，他又指出：全党的主要注意力移到技术革命上面，移到技术方面，又可能忽略政治，“因此，必须注意把技术和政治结合起来。”

他解释说：“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又说：“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问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将来政治这个名词还是会有，但是内容变了。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1958年以后，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过分夸大政治思想的作用，在政治思想工作中存在着脱离实际、脱离经济、脱离技术的“左”的

错误，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需要加以纠正。但是，我们在纠正这些错误的同时，不应否定毛泽东的上述论述。

为了做好领导工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毛泽东提出：领导干部要“学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学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学点历史和法学”，“学点文法和逻辑”。他甚至“建议在自愿的原则下，中央和省市的负责同志学习一种外国文。争取在五年到十年的时间达到中等程度。”他自己感到自然科学知识不足，需要补课。1958年9月，他在视察途中还读科学技术方面的书。有一天，在行进的列车中，与毛泽东一起视察的张治中发现毛泽东正聚精会神地看一本冶金工业的书。张治中诧异地问：你也要钻研技术的书？毛泽东说，“是呀，人的知识面要宽些。”我认为：毛泽东关于学习的建议十分正确。要做好领导工作，领导者必须有一定的科学素养，懂得必要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懂得必要的中国的和外国的历史、文化。1958年工作中的失误，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领导者缺乏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和现代经济发展的知识有关。

以上的工作方法，由于受到“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有的并没有能真正实行，有的实行中走了样，但就其基本的内容和精神而言，是正确的，至今仍有其价值。

### 第三节 人民公社化运动与历史唯物论

#### 一、由办大社到办人民公社

大跃进是毛泽东从 1955 年以来就追求的，是经过 1957 年的八届三中全会、1958 年的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一步一步地发动起来的，而人民公社则不同了。他曾讲过：人民公社的出现是他未曾料到的。人民公社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他无发明权，只有建议权。但这并非说，人民公社的出现与他无关系。

在 1955 年农业合作化高潮时，大多数合作社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规模一般以二三十户的为多。这样的社易于办成，易于

管理，适合当时生产力的水平和干部的管理能力。那时也有极少数的大社。毛泽东对大社颇感兴趣。他为《大社的优越性》一文写的按语道：“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有些地方可以一乡为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当然会有很多地方一乡有几个社的。”“这种合并要有步骤，有适当的干部，要得到群众的同意。”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在合作化方面的意向。

由于合作化的速度过快，相当一部分社虽然建立了，但并不巩固。在 1956 年下半年和 1957 年春就有闹退社和分社的。所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讲，合作社的巩固大概需要五年时间。就在毛泽东讲话后的一天，即 2 月 28 日，刘少奇在听取河南省新乡地委汇报农业生产合作社工作时说：大社办多了。普遍办大社有问题。他认为：生产单位、分配单位、经营单位小一点，每个人都看得见，谁做活好坏也看得见。这与生产力是手工生产相适合。社太大了对落后的生产力不适合。办太大的社，群众看不到，就是生产关系跑在生产力的前边了。他又说，根本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把生产关系调整一下，社太大不完全适合生产力。他一再讲：根本问题是小农经济，生产工具基本没有变。他肯定新乡地委实行的农业社包工包产到队，固定三年不变，超产有奖的办法。刘少奇的这些话无疑是切合实际的。是从生产关系一定适合生产力性质和状况这一点考虑的。按照此思路考虑下去，决不会发生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7 年 9 月 14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做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的指示》，其中说到：由于目前农业生产的种种特点，又由于目前农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还不高，几年来各地实践的结果，证明大社、大队一般是不适合于当前生产条件的，……因此，除少数确实办好了的大社以外，现在规模仍然过大而又没有办好的社，均应根据社员的要求，适当分小。指示认为，社的规模一般应当以百户以上村为单位，实行一村一社，生产队的规模，以二十户左右为宜。“社和生产队的组织规模确定了之后，应当宣布在今后十年内不予变动。”指示总结了合作化以来的经验，提出了一套适合现有生产力水平的生产管理制度，如：“统一经营，分级管理”，普遍推广“包工、包产、包财务”的“三包制度”，实行集体的和个人的生产责任制等。

---

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的按语》，《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257、258 页。

1957 年冬至 1958 年春，全国农村普遍出现了兴修水利和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高潮。在这过程中出现打破社界、乡界、以至县界的协作。在 1958 年 3 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考虑到以兴修水利为特点的农业生产的发展的需要，提出了将小社有计划地并为大社的建议。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并为大社的意见》（1958 年 3 月 20 日成都会议通过，4 月 8 日政治局会议批准）。意见说：“我国农业正在迅速地实现农田水利化，并将在几年内逐步实现耕作机械化，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合作如果规模过小，在生产的组织和发展方面势将发生许多不便。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意见发出后，一些地方开始并社。河南遂平县在 4 月 20 日成立了由 27 个农业社合并成的大社，即后来“赫赫有名”的卫星人民公社，全社共有 9369 户，43263 人。

为了实现大跃进，成都会议在通过并社意见的同时，还通过了《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号召县、乡、社都来办工业。在此之后，一部分社开始办为农业服务的小工业，如农机修造厂、肥料厂、粮食加工厂等。陈伯达根据中共湖北省鄂城县委写的《旭光一社用土办法办小厂》和《旭光一社是怎样领导和管理小小工厂的》的报告，写了《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均刊于《红旗》1958 年 7 月 1 日出版的第 3 期）一文。文中说：“把一个合作社变为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文章还说：农业合作社办工厂，“在实际上是指出了我国能够以史无前例的高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能够比较迅速地消灭工业同农业之间的区别及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的区别，从而为我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出顺利条件的一种正确道路。”陈伯达的文章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在 1958 年最早公开使用“人民公社”这个词的文章。不过，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多大注意。几乎与此同时，7 月 1 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七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传达了毛泽东办公社的设想，他讲：“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在这样的公社里面，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反映这种物质生活的人们的精神生活；全民武装是为着保卫这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全世界上人剥削人的制度还没有彻底消灭以前，这种全民武装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同志关于这种公社的思想，是从现实生活的经验所得的结论。”“很显然，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在这样‘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国民经济和文化普遍高涨的时候，人们已经可以看见我国将由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为期不远的前景。”从陈伯达的这番话中，我们可以闻到他在两个月后提出“消灭商品生产”、急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气息了。

在大跃进热潮的推动下，刘少奇完全改变了 1957 年时不赞成普遍办大社的主张，热心于办“工农商学兵”俱全、“政社合一”的公社。1958 年 6 月 14 日，他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的谈话中说：中宣部印了一本有关空想社会主义

---

叶永烈在《陈伯达其人》（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0 年 3 月出版）一书中说：他在采访陈伯达时，陈伯达向他坦率地承认，人民公社这个“歪点子”是他出的，“发明权”属于他（该书 181 页）。

陈伯达：《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红旗》1958 年第 4 期。

的资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为《大同书》中写的。康有为 27 岁（一说 25 岁）写《大同书》，要破除九界，即国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有财产……。毛主席讲话时也提到康有为的《大同书》，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过程中，这样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毛主席讲三无，无政府、无国家、无家庭。这将来会统统实行。毛主席讲过两次，家庭要消灭。刘少奇把办托儿所、公共食堂这样一些生活服务组织视为“大家趋向共产主义”。他提倡家务劳动社会化，解放妇女劳动力，办食堂、托儿所、洗衣房等服务性事业。他说：可以搞很多的事，像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说，小孩子多大年龄就到什么地方去，到处有花园，老人有养老院，还有戏院、小学、图书馆、电影院……。搞得好的，可以达到这种境地。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十五年等于三、四个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6 月 30 日，他同《北京日报》社编辑谈话时说：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试验。恐怕不能像现在这样，种地的净种地，作工的净作工，现在就要搞工农商学兵。他还作了解释，不能搞单打一，现在农业合作社已开始办工厂、商业、银行、服务事业、洗衣房、食堂、学校，都归它。以后就在工厂、农村、学校发枪操练。工农商学兵都有了。他提出：我看，三四十年的后可到共产主义社会。你们看，要不要这么长？7 月 5 日，他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时说：工厂要办食堂、托儿所、洗衣店，办学校，办农场，发点枪给大家操练。总之工农商学兵全都自己干。7 月 19 日，他在天津的讲话中提出：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他说，一个乡一个社，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为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商业，有农业，有学校，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共产主义（公）社。7 月 14 日到 18 日，刘少奇到山东视察，视察中讲了什么，不清楚，但很可能与在北京、天津讲的差不多。报导中说“少奇同志还非常关心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现”等等。刘少奇以上的这些话，无疑会对省、市的干部发生作用。刘少奇对办“工农商学兵”合一的大公社很热心。

1958 年 7 月 7 日至 1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在郑州主持召开了华北六省市农业协作会议。会议“详细讨论了由于农业大丰收引起农村新变革——农业社现有的规模、经营管理方法和分配制度等原有一套已经不够了。个别地方出现了一种比较高级的公社性的形式（着重号引者所加）。这在今天虽然还不是大量的，但我们必须预见到这点，及早着手调查研究和准备。”河南省信阳地区的同志在小社并大社过程中曾到郑州作过汇报。“谭震林同志向他们讲了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关于办包括‘工农商学兵’的大公社的一番道理，回来就叫成立公社。”

毛泽东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下讲的成立“工、农、商、学、兵”的大公社，至今仍未可知。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陈伯达及谭震林并没有假造“圣旨”。陈伯达在北京大学的讲话在 7 月 16 日出版的《红旗》上发表后，

---

《刘少奇同志视察山东工厂农村》，《光明日报》1958 年 8 月 4 日。

见《今日新闻》1958 年 7 月 20 日关于华北农业协作会议的报告。《新华半月刊》1958 年第 15 期 114 页。

见李友九写的《河南信阳来信》，《红旗》杂志 1958 年第 7 期。

发生了很大影响，对人民公社的出现有重大作用。中共河南省委 1958 年 8 月 22 日给中共中央的《关于建立人民公社情况的报告》中说：人民公社化运动“首先从农村开始，小社并大社，自留地归集体，大搞公共食堂，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大协作；在城市街道居民中，组织生产，办工厂、搞集体生活福利事业。这在实质上已经形成了公社的雏形，但还没有肯定的统一名称。在农村有的叫集体农庄，有的叫农场；在城市有的叫社会主义大院，有的叫社会主义大家庭等。直至《红旗》第 4 期陈伯达所写《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一文中引证了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指示后，才明确了建立人民公社的方向。”《红旗》杂志编辑李友九在小社并大社过程中到了河南省信阳，与河南省委、遂平县委的同志一起拟定了一个《嵯峨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稿）》（1958 年 8 月 7 日）。这个简章在 8 月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印发了，并经毛泽东推荐在《红旗》和当时的报纸上发表。

1958 年 8 月的 4、5 两日，毛泽东视察了河北省的徐水、安国、定县。从《人民日报》8 月 11 日发的简要新闻报导中可看出，毛泽东关注的是生产大跃进，报导中没有提小社并大社，更无成立人民公社的内容。但在视察中，他是讲到人民公社的。因为康濯写的通讯《毛主席到徐水》说到：徐水县大寺各庄社在毛主席视察后当夜成立了公社，树木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

8 月 6 日至 8 日，毛泽东沿京广线南下，到河南新乡、襄城、长葛视察，在新乡七里营乡时看到“七里营人民公社”几个字赫然挂在墙上，这引起了毛泽东的很大注意，也留下很深的印象（1960 年 6 月 18 日毛泽东在写《十年总结》时还提到这事）。当地的领导同志汇报了他们对大社没有用“共产主义公社”作名称而用“人民公社”作名称的缘由。毛泽东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可以加上地名或者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他同时指出，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但 8 月 12 日《人民日报》发的视察报导中没有写这些，报导的重点仍然是在农业生产的大跃进。

8 月 9 日，毛泽东到山东视察。当时山东很多地方也正积极酝酿办大社，有的一乡一社，有的数乡一社。对于大社的性质、名称说法不一。有的同志认为大社应当转为全民所有制，叫国营农场，有的认为仍然是集体所有制，可叫集体农庄，有主张叫共产主义合作社，有的同志则认为办大社有办不好的危险。毛泽东听取了山东省委的汇报后明确提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毛泽东的这番话在 8 月 13 日的《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了。于是各地相继仿效，搞小社并大社，成立人民公社。8 月 18 日《人民日报》以《人民公社好》为标题报导了河南省信阳地区人民公社运动的情况。同日发表了中共遂平县委副书记写的《人民公社带来的变化——介绍遂平卫星人民公社》的文章。

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的普遍开展是在 1958 年 8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以后。应当指出的是这次会议原定的中心议题主要是经济计划，工业上钢产量翻一番，并无

---

1958 年 8 月 11 日《人民日报》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注释本》第 323 页。

见谭启龙的《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红旗》杂志 1958 年第 9 期。

要在全中国搞人民公社化运动之意。会议开始时印发了 17 个题目，供大家思考、讨论。毛泽东在第一天会上讲话中讲了 17 个题目。“第五个问题：农业合作化问题，印了一份河南试办人民公社的简章”。从讲话记录稿看，对这一题目，他没有再讲什么。在会议进行过程中，关于公社的议论逐渐多起来了，最后作出了搞公社化运动的决议。决议认为，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社的规模，一般以一乡一社，两千户左右为适合；实行政社合一；在并社过程中，要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干部和群众，承认社与社之间差别，不要采取算细账、找平补齐的办法，不要去斤斤计较小事；社员自留地归集体经营；公社仍然是集体所有制，但已包含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人民公社成立后不急于改变原有的分配制度；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快的地方，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慢的地方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决议最后说：现阶段我们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但“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如果说该决议还注意到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那么毛泽东所推荐的卫星人民公社简章则抹去了这界限。简章规定：“各农业社合并为公社，根据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精神，应该将一切公共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社员转入公社，应该交出全部自留地，并将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公社公有”。公社实行工资制，实行粮食供给制，组织公共食堂、托儿所、幸福院。在实际的公社化的运动过程中，各地的平均主义、共产风愈来愈厉害。不仅公社共了农业社、生产队的产，而且集体共了社员个人的生活资料。为了办食堂等集体福利事业，社员的房屋、家具、桌椅板凳、以至锅碗瓢盆也归公。有的地方甚至将在外地工作的人汇给在农村亲属的钱也归公。有的地方互相比赛，实行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学、育、婚、乐等都由公社包下来。

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讲人民公社是个新问题，还有许多问题现在不知道，还要继续研究。他预计一秋一冬一春，就可以在全国普遍建立人民公社。谁知，到了这年 9 月底，仅一个月的时间，全国实现了人民公社化。截止 9 月 29 日的统计，全国共建人民公社 23284 个，每社平均 4767 户。

以上材料说明，人民公社的出现并不是群众自发的产物，它与毛泽东主张办大社、主张大跃进的基本思想有密切关联。

可毛泽东本人却另有看法，他认为人民公社是群众的创造，他本人无发明权。

1958 年 8 月 30 日，他在北戴河会议上讲，人民公社是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不是我们提倡的，我们提倡不断革命，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群众起来了。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都未料到。

1958 年 12 月 9 日，他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人民公社的出现，这是 3 月成都会议、5 月党代表大会没有料到的。其实 4 月已在河南出现，5、6、7 月都不知道，一直到 8 月才发现，北戴河作了决议。这是件大事。

1958 年 12 月 23 日，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我没有想到今年搞人民公社，也没有想到在农村搞公共食堂，帝国主义却造谣，说这都是我出的主意。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北戴河会议时都没有想起人民公社，7

月份还没有想过。

1959年7月23日，他在庐山会议上讲：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只有建议之权。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以后新闻记者要离开。据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人民公社”是毛泽东在视察中随口讲的一句话，记者在报导中写上了。毛泽东在看到报纸后，“忽然拍案失口喊道：“哎呀，糟糕，捅出去了，事先没有讨论呢？政治局还没有讨论呢？”事后，有人提出问题，毛泽东在小范围内作了解释：“这个话是我讲的，是我没慎重。也不能全怪记者。”说“随口讲”，这合乎事实，因为毛泽东早有所考虑。说“事先没有正式讨论”，这是事实。

在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又说：群众能创造出道路来，俄国的苏维埃是群众创造的，我们的人民公社也是群众创造的。

总之，在毛泽东本人的思想中人民公社是群众创造的，他只是总结、提倡、推广而已。这是他的故意谦虚吗？我想不是的。

从前面所引的陈伯达的材料和谭震林传达毛泽东和党中央关于办大公社设想的指示看：一是很可能在陈伯达向毛泽东吹他的《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时，毛泽东提出过将“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的设想。二是有可能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议论过此事。所以谭震林才讲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关于办大公社的设想。但这种设想，在最初只是一般的议论议论，也许真的只是随口说说而已。因此，在毛泽东本人的头脑中没有留下什么深的印记。因为这时他的兴奋中心是在大跃进，所以事后也就忘记。故当人民公社出现时，他说事先没有料到。但他的办公社的设想经陈伯达、谭震林的传达，在广大的干部和群众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转化为实践，促成了“人民公社”的出现。这正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毛泽东成了人民公社的始作俑者，可他本人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 二、人民公社与军事共产主义

小社比大社优越，小社要并大社，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根据《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1958年春夏间，他萌发了将“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的设想。但像吃饭不要钱，搞工资制，办公共食堂、托儿所、敬老院、取消自留地等确实是在并社过程中及大跃进过程中群众自发搞起来的，而不是毛泽东预先设想好的。从这种意义上讲，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特点中的“大”是毛泽东的主张，而非群众创造；“公”则是群众自发的创造，而不是毛泽东的主张。

根据“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毛泽东对群众的“创造”作了总结。在北戴河会议上，他多次讲，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大，了不起，人多势众。公，就是社会主义比合作社多，把资本主义残余去掉。如：自留地、私养牲畜取消，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全体劳动妇女可以解放。实行工资制度，搞农业工厂，每个男人，每个女人，每个老人，每个青年，都有工资，发给每一个人，和从前分配给家长不同。直接领取工资，青年、妇女

非常欢迎，破除了家长制度，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对个性解放很大好处。

虽然他指出：人民公社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要过分强调共产主义。可是，他对群众中自发产生的“吃饭不要钱”十分感兴趣。他在8月21日上午的会上讲，人民公社有共产主义萌芽。产品十分丰富，粮食、棉花、油料实行共产。如果做到吃饭不要钱，这是一个大变化。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吃饭、穿衣、住房上面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将来一律叫公社，不叫工厂，如鞍钢叫鞍山公社、城市、乡村一律叫公社，大学、街道都办成公社。乡社合一，政社合一，暂挂两个牌子。在这天下午会上又说：吃饭不要钱的办法，可以逐步实行，暂时不定，59年是否实行，明年再看，穿衣是否也可以不要钱。吃饭不要钱，不一定等到第三个五年计划。

少数农村中出现的一时的“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引起了毛泽东对战争年代供给制的美好回忆。他在北戴河会议上多次讲到供给制和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在8月21日上午的会议上，他讲：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的问题。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没有星期天，没有八小时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上万的人调动起来，这种共产主义精神很好。人活着只搞点饭吃，不是和狗搞点屎吃一样吗？不搞点帮助别人，不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取消薪水制，一条有饭吃，不死人；一条身体健康。他认为，进城后，变了，把我们一些好东西抛掉了，农村作风吃不开，城市要求正规化，衙门大了，离人民远了。蒋介石的阴魂在城市没有走，资产阶级的臭气熏我们，与他们见面，要剃头，刮胡子，学绅士派头，装资产味，实在没有味道。搞供给制，过

共产主义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作风的对立。我看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好。二十二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呢？为什么要搞工资制？这是向资产阶级让步，是借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来贬低我们，结果发展了个人主义。是不是由干部带头恢复供给制。我们“粗野”一点，是真城的，是最文明的。资产阶级好像文明一点，实际是虚伪的，不文明的。恢复供给制好像是“倒退”。“倒退”就进步，因为我们进城后退步了。在21日下午的会上，他又批评进城后搞工资制、等级制，资产阶级的海洋把我们淹到胸口，有的人被淹死，成了右派。

在8月30日上午会上，他对供给制、工资制等问题又讲了一大通。他说：我们有二十二年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不发薪水，实行供给制。进城后说供给制是落后办法，是游击主义，农村作风，不能促进积极性，不刺激进步，要搞薪金制，熬了三年，到五二年搞了薪水制。说资产阶级的等级、法权那样神气，其实是把供给制度变成资产阶级法权制，发展资本主义思想。难道二万五千里长征、土地革命、解放战争是靠发薪水过的吗？抗战时期，二三百万人，解放战争时期，四五百万人，是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没有星期天，党政军在一元化领导之下，没有什么“花”，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拥政爱民，把日本鬼子打走了，打败了蒋介石。打美国的时候，也没有“花”。现在有“花”，发薪水要有等级，分将、校、尉，可是有的还没有打过仗，到底如何，还没有经过考验，结果是脱离群众，兵不爱官，民不爱干。因为这一点和国民党差不多，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办公桌、椅子也分等，工人农民不喜欢我们。我看要打掉这个东西。薪水制可以不要马上废除，因为有教授，但一二年要作准备。人民公社搞起来，就逼着我们逐步废除薪水制。在这次

会上，他还批评平均主义出懒汉的说法。他说：过去二十二年，出了多少懒汉？我没有看见几个懒汉。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是政治挂帅，阶级斗争，打倒日本，打倒反动派，有共同目的，为多数人而辛苦。现在发明一个东西，要给一百块钱，倒是会出懒汉，争吵，不积极。过去仓糙发明多得很，那里是钱买来的呢？计件工资不是个好制度，我不相信，实行供给制，人就懒了，创造发明就少了，积极性就低了，因为几十年的经验，证明不是这样的。

在兴修水利、抗洪抢险过程中，河北省徐水县按军队的团、营、连、排组织生产和生活，并提出“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纪律化”的口号。毛泽东企图用军事共产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自然也对“军事化、战斗化、纪律化”的“三化”口号很感兴趣。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以赞赏的口气说：这“三化”的口号很好，这就是产业大军，可以增产，可以改善生活，可以休息，可以学文化，可以搞军事民主。在1958年12月23日的一次会议上他又说：武王伐纣，实行“三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那是打仗，从陕北打到豫北。“三化”是军队发明的，为什么公共食堂，军队搞得，乡村就搞不得。他希望将“三化”普遍推广，组织产业大军。

从上述言论看，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企图用军事共产主义的方法来建设社会主义，他的理由归结起来是一句话：过去能取得成功，今天为什么不能？这里他犯了双重的错误：

第一，他把军事共产主义的经验绝对化，不了解社会主义建设的特点，犯了经验主义错误。确实，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仍然需要革命战争年代的那一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共产主义精神，仍然需要政治挂帅。毛泽东强调这一点是很对的。但是社会主义建设与革命战争不同。它还必须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从物质利益上关心每一个劳动者。事实上，在革命根据地。军事共产主义——供给制只施之于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的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而没有普遍施之于整个根据地社会。即使在革命队伍内部实行供给制，也并非绝对平均主义（毛泽东本人就多次批评过绝对平均主义）。在抗日战争时期开展的大生产运动中，也有物质奖励。

第二，毛泽东对资产阶级法权有着很大误解。这种误解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体现在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中资产阶级权利，误认为按劳分配本身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其实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认为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的权利，并不是说，按劳分配本身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而只是指按劳分配实行的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交换中等量劳动与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马克思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按劳分配、资产阶级权利的存在是有其理由的，不可避免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实行抽象的公平分配。由于误解，毛泽东提出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以供给制代替工资制。二是将资产阶级权利的范围扩大了、泛化了。马克思所讲的资产阶级权利仅指按劳分配。列宁在《国家和革命》中除了按劳分配外，还包括所有制方面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毛泽东又作了进一步扩大，他把人与人之间的一切不平等现象（如，等级制、官僚主义、老爷作风等）都视为资产阶级权利。

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对进城后由供给制转变为工资制作了否定，并提出要准备恢复供给制。但不久，他有一些变化。善于投机的张春桥（当时任中共上海市政策研究室主任）根据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讲话的精神写了一篇题为《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的文章（刊于1958年9月15日出版的《解放》第6期上）。毛泽东读后将此文推荐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并

代拟了编者按。按语说：文章提出的问题“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讨论”，文章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所谓对历史过程解释的不完全主要是指否定了解放后由供给制转为工资制的必要性。这可以说是毛泽东对自己在北戴河会议讲话的一种小小的纠正。在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他把资产阶级法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人与人之间关系方面的，如等级制，不以平等态度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权力，这些东西要坚决破除，天天破除。另一部分是工资制、商品生产，要适当保留。12月23日，在武昌会议上，他又说：对于资产阶级法权要分析，应破者破，有用者要保护，使之为人民服务。若把它打得体无完肤，总有一天，我们要陷于被动。对有用的部分，打烂了，搞错了，还要道歉，还得扶起来。

毛泽东出身于农民家庭，在民主革命时期又长期辗转于农村，与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进了城，始终不忘农民，认为农民问题依然是中国的基本问题。据卫士长李银桥回忆：1957年底到1958年初，连续有人汇报农村某些地区出现“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加大的情况。每次听过汇报后，毛泽东脸色显得阴沉，久久思考，不作一语。大约在1957年12月，卫士马维探家带回一个窝窝头，又黑又硬，掺杂大量粗糙的糠皮，交给毛泽东并说：“我们家乡的农民生活还很苦，他们就是吃这个窝头，我讲的是实话。”毛泽东接过窝窝头时，他的手有些抖，眼圈一下子就红了，掰一块放嘴里，泪水立刻溢满眼眶，豆大的泪珠便顺着脸颊淌落下来。他一边哭，一边掰了窝窝头分给我们这些身边的工作人员：“吃，你们都吃一块，这就是我们农民的口粮，这就是种粮的人吃的粮食呵！……”可以想象，当听到有些地方解决了吃饭问题，吃饭不要钱，他会是一种多么快活的心情。他在安徽视察人民公社时说：“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不要钱，将来穿衣也可以不要钱。”

这种高兴的心情不仅毛泽东有，刘少奇也有。1958年9月，刘少奇在江苏省视察时非常关心人民公社实行粮食供给制。他问一个乡的党委书记：“秋后实行粮食供给制，群众拥护不拥护？”乡党委书记说：“大家一听说吃饭不要钱，都很高兴得跳起来了，有个老头说，过去担心受苦一辈子，怕吃不饱肚子，这下子可好了。”苏州地委第一书记在汇报时说：“群众非常赞成实行粮食供给制。他们说，一个心思丢下了，一个心思又来了。丢下的是几千年愁吃愁穿的苦心思，又来的心思是怎样把生产搞得更好，不然对不起共产党。”刘少奇对群众的这两句话很感兴趣。他说：“这两句话，很值得我们深思。有人担心，实行粮食供给制，会不会增加懒人。苏州农民的这两句话，给我们作了最有力的回答。这说明他们不是变懒了，而是情绪更加高了，生产更积极了。这就是人民的共产主义的觉悟的表现，是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更加提高的标志。”他又说：农民吃饭不要钱，搞供给制，乡社干部势必要跟农民走，乡干部一改，县干部、地委干部、省一级的干部，直到中央的，也都要跟着改。地方上改了，军队也得改。9月27日，他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说：我经过河南、河北、江苏，都决定农民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

---

李银桥：《走向神坛的毛泽东》第220～221页。

《人民日报》1958年10月4日。

《人民日报》1958年9月30日。

制。看来，大家都赞成分配制度，粮食供给制，加上工资奖励。又说：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上讲过实行供给制问题，在中央的会议上也谈过这个问题，如何在我们干部中间及在军队中间再实行供给制问题。如果要实行供给制，标兵在哪里？五亿多农民是就是我们的标兵。各级干部、军队，都要向农民看齐，向他排队。1958年10月3日，他在同一个外国议会代表团谈话中也谈到吃饭不要钱，他承认，现在公社的性质基本上还是集体所有制，但有一部分全民所有制，这部分还要增加。两三年后，很多公社就会变为全民所有制。

1958年粮食丰收，有的地方在办食堂时，搞吃饭不要钱，实行部分供给制，其实这不过是短暂的、局部的假象，是农民平均主义的表现。可毛泽东和党中央却认为是共产主义因素，在全国普遍提倡、推广。

在1958年，农民的平均主义穿上共产主义的外衣。河北省徐水县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实行全民供给。山东省范县宣布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人民公社的出现，毛泽东产生了错觉：这回“又是农村走在前头，城市还未搞”，似乎多少年来追求的共产主义的理想的实现即在眼前。他在考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要多长时间，三四年，五六年，或更长一点时间。是短了，还是长了，有时觉得长了，有时又耽心短了。他耽心短的时间居多，批评有人太性急。可是他还是认为：苦战三年，再搞十二年，十五年过渡到共产主义。1958年11月6日，他对《山东范县提出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批写道：“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有些地方可以在三四年内完成，有些地方需要五、六年或更长的时间”。决议最后说：“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那时党内干部的头脑发热到了极端，即使在开始降温的时候，在11月召开的武昌会议上，竟然讨论起是中国，还是苏联先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那时赫鲁晓夫在中国共产风的冲击下，也有些发懵，提出十二年后准备过渡到共产主义。毛泽东对一些性急的人解释说：我们一定要苏联先过渡，我们无论如何要后过渡。我们先过渡，苏联脸上无光，全世界无产阶级脸上无光，形势逼人，逼他快些过渡。毛泽东甚至说：如果我们先入怎么办？还是挂社会主义招牌，行共产主义的实质，有实无名。这些话，今天看来，简直难以相信是党的领袖讲的。然而却是事实，当时的毛泽东也承认，中国是破落户，一穷二白，一穷二弱。工人平均月工资90元左右，农民平均一年生活费不到80元，穷得要命，有的公社还要靠救济过日子。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认为很快可以进入共产主义呢？分析起来，可能有以下几个因素：第一，他认为生产可以大跃进。当时估计1958年的粮食产量是7千5百亿斤，1959年可达1万零5百亿斤，棉花19258年是6千7百万担，1959年是1亿担。他曾设想（幻想）十年可以搞4亿吨钢，1千万台机器，25亿吨煤，3亿吨石油。共产主义的第一个条件是产品极大丰富。在毛泽东看来，这个条件是可以在短期内实现的。

第二，他认为富了不好过渡，穷了反而好过渡，因此要趁穷之势过渡。毛泽东在1958年11月21日武昌会议上讲：现在就是吃穷的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怕犯冒险主义。刘少奇插话说：农村（人均）达到150元至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按：指大队所有制转为公社所有制），

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彭真讲：我们搞了土改，就搞合作化，又搞公社，只要每人到150元至200元就可以过渡，大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的标准）压低，早转化比晚转化好，三四年即可渡。毛泽东说：按照少奇、彭真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可以说这是“穷过渡”理论的最早提出处。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时毛泽东又说：现在全国农民每年平均收入85元，将来达到每人150元，而且大部分由公社发给的时候，就可以实行基本社有。这样，再进一步变为国有就好办了。《关于人民公社过渡问题——浙、皖、苏、沪四省市座谈会纪要》（1959年12月25）指出：社员每人平均200元左右，人民公社就可以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并认为用3~5年时间就可达到过渡的条件。

第三，毛泽东追求向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在进入社会主义时，理论准备不足。他憎恶特权，反对等级，追求和向往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他对平等的理解带有小生产平均主义的色彩，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带有农民小生产者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印记。毛泽东虽然承认，社会主义需要有现代化的大工业作基础，但他对现代化的认识与理解受到中国落后的生产力状况的限制。

毛泽东思想上空想社会主义的印记是现实的汪洋大海的农民小生产者思想的反映。毛泽东本人在生活习惯上也保留农民的特点。他与夫人江青生活不和谐，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生活习惯合不起来。毛泽东对卫士说：“我是土包子，我是农民的儿子，农民的生活习性。她（江青）是洋包子，吃不到一起就分开。今后我住的房子、穿的衣服、吃的饭菜，按我的习惯办。江青住的房子、穿什么衣服、吃什么饭菜，按她的习惯办。”毛泽东生活简朴，从1953年底到1962底，没做过一件新衣服。洗脸洗手从未用过香皂，刷牙习惯用牙粉，而不用牙膏。粗茶淡饭，累了，紧张了，只要求吃一碗红烧肉，补补脑子。保健医生劝他改变饮食习惯，注意营养。他说：“我是农民的儿子，自小过的就是农民的生活，我习惯了，你们不要勉强我改变，不要勉强么！”毛泽东的生活习惯反映了中国农民艰苦朴素的优良美德。但我们也从中可以看出，他思想上确实有某些农民意识。

1958年中国大地出现的人民公社与西方历史上的空想社会主义有一定的联系。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讲：“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根据这个意见，中宣部编印有关空想社会主义的资料。还应注意的是，五四时期，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对进步青年很有影响。毛泽东、刘少奇都被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所宣扬的新村主义所吸引。毛泽东在《学生之工作》（1919年12月1日）中描绘了他追求中的新社会、新生活，他认为未来新社会中有：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积淀在毛泽东脑海中的这种蓝图，在1958年得到了显现。这一点，我们还未见到毛泽东自己说过什么。

---

李银桥：《走向神坛的毛泽东》第197页。

李银桥：《走向神坛的毛泽东》第191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54页。

而刘少奇在 1958 年年 6 月 14 日同全国妇联党组的谈话中则明显地坦露了这一点。他说：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曾经组织新村，日本也有个人组织新村，我在入党以前看过组织新村的材料，很形象化，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看了心里激动了。在毛泽东、刘少奇看来，在社会主义社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一套设想可以实现了。

毛泽东也受到中国历史上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中国古代就有追求“天下为公”理想社会的“大同”思想。到了近代，康有为将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和西方的近代空想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杂糅起来，撰写了《大同书》。毛泽东曾讲：“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这话说得很对。是马克思，是历史唯物主义指出了实现大同的路。有意思的是，在 1958 年，毛泽东认为大同世界很快就要实现了。8 月 4 日，他到徐水视察。6 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中央搞共产主义试点的意图到徐水县，传达了刘少奇关于搞试点的指示。陈正人除了号召大家学习《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马列著作外，还把带去的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我以为，提出在此时看《大同书》的决不是这位副部长，很可能与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讲话中谈到《大同书》有直接关联。

毛泽东也受到历史上农民平均主义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农民在反对封建等级制度时提出了“平等”的思想。东汉末年，张道陵创立五斗米道，其孙张鲁在汉中建立地方政权近 30 年，实行政教合一，设立“义舍、义米、义肉”，路人量腹取食。《三国志·张鲁传》有记载。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说：张道陵的每人出五斗米的教，出五斗米就有饭吃，传到江苏的张天师就变坏了。吃粮食是有规律的，大口小口一年三石六斗，放开量叫他吃。薛仁贵一天吃一斗米，总是少数。我们搞公共食堂，也可以打回去吃。在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他对张鲁的原始社会主义政策发生兴趣。他说：三国时候，汉中有个张鲁，曹操把他杀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人，在饭铺里吃饭、吃肉都不要钱，尽肚子吃，这不是吃饭不要钱吗？他不是在整个社会上都搞，而是在饭铺里头搞，他搞了 30 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那是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了。随后，在武昌会议期间，他对陈寿的《三国志·张鲁传》写了两个批注，12 月 7 日的批注写道：“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是神道的。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一千六百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人民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了，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又说：“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这一批注反映了他对张鲁的原始的、空想社会主义政策的赞赏、共鸣。他大概也感到这一批语有些不妥，所以就涂了。12 月 10 日，他重新写了一个批注，基本倾向与第一个相同，赞扬张鲁的置义舍、吃饭不要钱、修治道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

---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71 页。

赵云山、赵本荣：《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党史通讯》1987 年第 6 期。

农经济为基础）等经济政治纲领。这一批注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连同张鲁传一起印发给到会者。

在第一次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上，毛泽东虽然开始纠正“共产风”，注意划清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但他认为人民公社实行部分供给制，办公共食堂等都是正确的，合适的。他对张鲁传感兴趣，并不是引导人们去思索为什么张鲁的那一套不能成功，而是要借以说明，现在人民公社的某些做法，历史上由来已久。他承认，现今的情况和张鲁时代“如天地悬隔”。也许正是这样，他认为过去不能做的，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今天，可以实现。人民公社的运动就是要把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付之实践，结果碰了钉子。

1958年出现的“共产风”、“吃饭不要钱”，同一百年前的太平天国实行乌托邦社会主义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太平天国的纲领《天朝田亩制度》提出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1958年的公社化运动可是说太平天国的乌托邦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某种重演。

### 三、纠正“共产风”与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人民公社办起来后，毛泽东心里一方面是高兴，另一方面又不踏实，脑子里还有问号，究竟怎样？从他在河北省石家庄地区（1958年10月31日）、邯郸地区（11月1日）和河南省新乡地区（11月1日）视察时的谈话看，他除了询问生产情况外，十分关心社员的生活。他每到一地都问：食堂办了没有？办得怎样？人民是否喜欢吃大锅饭？一月吃多少盐？多少油？做不做菜？有没有肉吃？他要求：一是吃饱，二是吃好。要不吃冷饭，吃热饭，要有菜。他说：吃饭就是劳动力，吃不好饭就不能劳动。托儿所要办好，对小孩要吃好，教好。幸福院幸福不幸福？大跃进中不少地方连续作战，挑灯夜战。对此，毛泽东讲，要下个命令，要休息，睡够。对供给制，他心里犯嘀咕。在石家庄，他问：徐水县怎样？实行供给制度能不能持久？年把垮台还不如谨慎些好。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他的询问得到的当然只是“满意”的回答。

人民公社化运动起来后，全国农村普遍刮起了“共产风”：集体共社员个人的产；大集体（公社）共小集体（农业合作社）的产；公社以至县联社任意无偿平调农业社的劳动力、物资；强行拉平社员与社员之间、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公社与公社之间的贫富差别。“共产风”是农民平均主义的产物，然而“共产风”刮起来后又严重侵犯了农民的利益，遇到农民的反抗。1958年本是个丰收年，但秋后粮、棉、油等农产品的征购任务不能完成，普遍发生瞒产私分。结果粮、油、猪肉、蔬菜供应不足。党内相当多的人头脑发胀，大谈共产主义，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陈伯达主张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毛泽东热中有冷，觉察到事关重大，先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1958年11月2日至10日），紧接着开了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11月21日至12月10日）。这两次会议在肯定人民公社前提下着重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肯定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必须利用价值法则，反对对农产品无偿调拨，纠正急于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冒险主义。

在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为了纠正“共产风”，澄清一些人头脑中的糊涂思想。毛泽东号召领导干部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编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他认为：斯大林的这本著作，基本方面是正确的，一、二、三章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也有一些写得不妥当，再有一些恐怕他自己也没有搞清楚，不要轻易否定这本书。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材料还是斯大林的这本书。在郑州会议上，他读讲《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1月9日，他发出了致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的信，向同志们建议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两本书，要求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读时三五个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他说：“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对一切同志有益。”最后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信中所说的“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是指陈伯达。在会上，陈伯达因提出废除商品生产、主张产品调拨被毛泽东树为对立面。毛泽东在讲话中还向有的人打招呼，“不要和陈伯达搞在一起”。

毛泽东本人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反复进行过研读，先后写批注有四个本子。“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曾流传有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讲话和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批语，“文化大革命”后又印发过《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记录》。这些稿子虽有详略的区别，但基本观点、思想是一致的。斯大林的全书共十章，外加两封信和一个答复。毛泽东所感兴趣的是前三章和信。他关于这本书谈话中心议题是从理论上纠正“共产风”，讲明发展商品生产、利用价值规律之必要，谈话也涉及哲学问题。谈话的要点归纳如下：

（一）研究、掌握、运用客观规律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第一章“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规律的性质问题”中着重论述了规律的客观性，指出不能将规律与法律、计划混为一谈。毛泽东肯定斯大林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他说：“客观规律是独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的，是和人们的主观认识相对立的，但是人们通过实践，认识了解客观规律，就能够熟练地运用这些规律，驾驭这些规律，达到改造客观世界的目的。”他认为斯大林“对党和群众在认识规律上的主观能动作用阐述得不够”。斯大林讲，“在天文、地质及其他某些类似的过程中，人们即使认识了它们的发展规律，也确实无力影响它们”。毛泽东不赞成斯大林的这种观点，认为斯大林“没有能从发展看问题”，“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是无限的，改造自然的能力是无限的。现在认识不到，将来可以认识；现在改造不了，将来能够改造。”毛泽东的说法很解放，但似乎也有点片面性。他强调人类认识能力、改造能力无限的一面，没有注意在任何时候人类认识能力、改造能力又有有限的一面，没有注意到无限的认识能力和改造能力要通过有限的认识能力和改造

能力去实现。

毛泽东认为，斯大林对经济计划怎么搞，没有展开，只说了几句。斯大林讲：“不能说，我们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完全反映了这个经济规律的要求”。斯大林的说法是谨慎的、留有余地的。毛泽东评论说：“说没有‘完全反映’，在他的心目中，认为苏联的计划是基本上反映了客观规律的要求的。”而在毛泽东看来，苏联的计划问题甚多，过分强调重工业，不重视农业和轻工业。那末毛泽东对我国的情况怎么看呢？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不是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呢？是反映得比较完全呢，还是不够好呢？毛泽东的看法则是：“我们现在的这一套比较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规律。”其实，毛泽东犯了斯大林的同样错误，过高地估计了对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规律的认识与掌握。

令人奇怪的是，毛泽东在讲经济规律是客观的、经济计划要反映经济规律时，却没有去思索一下，1958年的高指标、大跃进是否符合客观规律。原因可能是，他在读斯大林书的时候兴趣不在此。

（二）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必须利用价值规律斯大林书的第二章“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和第三章“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规律问题”是毛泽东阅读的重点。他的批注、谈话主要是有关这两章的内容。

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讲到公社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过渡，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有一个过程。但许多干部（指党内的高级干部和理论家）却急于过渡，否认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否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任意无偿调拨生产队和公社的劳力、物资，不搞商品交换。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反复讲要划清两种界限。他严厉指出：“秀才们不赞成划这两条线，是不是秀才要造反。”他教育干部：“只要还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极其重要，极其有作用。”他对斯大林关于商品生产必要性的分析很赞赏。指出：商品生产还要搬斯大林的，而斯大林是搬列宁的。斯大林讲，商品生产是农民可以接受的工农结合的唯一形式。毛泽东进一步说：如果取消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就会犯剥夺农民的错误，就要在政治上犯错误，就有脱离农民的危险，就要把农民引导到敌人那里去。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严重注意。他告诫干部，不要无偿调拨劳动力：“秦始皇调动七十万人替他修墓，结果垮台，隋炀帝也因乱调劳动力垮台。”

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毛泽东提出：主张取消商品生产的人忘记了这一点。他说：现在发生的问题是想当多数的干部不懂农民问题。农民的干劲一来，又容易把农民当工人，甚至以为农民比工人还高明。又说：现在有人说，农民的共产主义精神很旺盛，他们下一次乡，认为农民了不起，农民快上天了。农民比工人强，这是现象。他指出，为了团结几亿农民，商品生产还要大发展，货币也要增，这是几十万干部的思想问题，是对五亿农民的团结问题。

有人觉得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因此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斯大林认为，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商品生产比资本主义生产更老些。商品生产在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就存在过，并为他们服务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不引导到资本主义。毛泽东赞同斯大林的观点，并指出：商品生产不是孤立的，看它和什么联系，同资本主义还是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联系，

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联系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朝为什么叫商朝呢？就是因为有了商品生产。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有本质差别：我们有共产党的领导，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有工人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政权，有各级党组织，有成千万的党员，有广大的贫下中农作为我们的依靠，我们可以发展商品生产，让它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所以用不着怕商品生产。他指出：中国原来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印度的铁路和纺织比中国发达。中国很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

斯大林认为苏联社会的商品生产是特种商品生产，它的活动范围只限于生活资料，生产资料不属于商品。毛泽东批评斯大林对农民不放心，不肯把农业机器卖给农民，国家对农民控制得很死。毛泽东认为，商品不限于消费资料，有些生产资料是商品，国家与公社之间交换的生产资料都是商品。这是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一个突破。在八十年代，改革以后，不只是有些生产资料，而是所有生产资料都要通过商品交换。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交换，也是商品交换而不是产品的调拨。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了九十年代，进一步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这又是一个突破。

毛泽东指出：两种所有制存在是商品生产的前提，但这种解释还不够完整。“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在生产力没有达到高度现代化的时候，是不可能实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的，也不可能消灭商品生产。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才能为早日消灭商品生产创造条件。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是不可逾越的，要想超越，不过是空想。

应当指出：毛泽东提倡大力发展商品生产，这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是正确的。不过，他对人民公社生产的认识仍然带有小生产者的狭隘性。他认为，人民公社应从两方面发展生产：一方面是大力发展直接满足本公社需要的自给性生产；另一方面，尽可能广泛地发展为国家、为其他公社所需要的商品生产。“自给性生产”，这是自然经济的范畴。毛泽东把发展自给性生产放在第一位，反映了他思想存留有“自然经济”的残余。他对社会主义生产的看法与我们今天的认识是有很大差别的。

有商品生产，也就必然有价值规律。毛泽东讲：“所有的经济单位（包括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都要利用价值规律，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便不断地改善经营管理工作，合理地进行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以利于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他赞同价值规律不能起生产调节者作用的观点，认为对生产起调节作用的是计划。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时，他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价值规律作为计划的工具，这是好的。但是不能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重要依据。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而是依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依据我们扩大生产的需要。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就必然把去年大办钢铁说成是无效劳动。”“总之，我们是计划第一，价格第二。当然，价格问题是我们要注意的，前几年我们曾经提高生猪的收购价格，对于发展养猪有积极作用，但是像现在这样大量的养猪，主要还是靠计划。”

如何估价值规律的作用，这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有人主张，社会主义经济中，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是第一规律。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但有两点可以肯定：一是毛泽东对价值规律的作用估计是低了；二是毛泽东

没有搞清价值规律与国家计划之间的关系，没有认识到价值规律是计划工作的重要依据，经济计划要大体符合价值规律。在毛泽东以及斯大林看来：国家在作计划时无需考虑价值规律，只是考虑国家的需要。这样做的结果，导致相当多的商品的价格与价值发生严重的背离，严重影响了生产的发展，导致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从理论上讲，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无论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其他规律，还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其他规律都是在价值规律作用的基础上发生的。所不同的是价值规律对生产所起的调节作用的大小、方式因社会制度不同而有所不同。

毛泽东指出：商品生产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那么，商品生产有没有消极作用呢？有，就限制它，否定它，过去的资本主义的鬼已经吃掉了，将来再出现资本主义的鬼，就再吃掉它。怕这个鬼干什么？不要怕。”这说明：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有两重性，它可以产生资本主义，不过用不着怕，可以限制它。毛泽东的话对不对？我认为是对的。许多人怕商品生产，就是因为它会产生资本主义。在现有的生产力的状况、政治思想条件下和国际环境中，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某些消极的东西（但不同于旧社会会大批地、每日每时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会产生把追求利润作为企业唯一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损害国家、工人和消费者利益的情况，会产生商品拜物教、金钱拜物教；会产生投机倒把、买空卖空、中间剥削；会产生无计划性、无政府状态，至于私营企业剥削工人取得剩余价值更是不待言的。毛泽东讲不用怕它，这也是很对的。它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消极作用是可以限制的。既不能因为有消极作用就限制商品生产的发展，也不能因为大力发展商品生产而忽视对它消极作用的限制。

（三）重视上层建筑的作用毛泽东认为，斯大林只谈生产关系，不谈上层建筑，不谈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中国整风运动、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破除旧的规章制度，都属于意识形态。斯大林只谈经济不谈政治，见物不见人，不说人的作用、劳动者的作用。如果没有共产主义的运动，想过渡到共产主义是困难的。毛泽东的批评不无道理。斯大林有这一缺点，而且影响到理论工作者。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苏联的哲学工作者受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影响，很少讲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对矛盾。后来，毛泽东批评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说它只讲物质，很少涉及上层建筑，即阶级的国家、阶级的哲学、阶级的科学。毛泽东认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不过，毛泽东在纠正斯大林的缺点时走向另一极端：过分夸大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在片面强调政治的作用时，忽视了物质利益，忽视了经济规律。

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着重解决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明确必须发展商品生产，为纠正“共产风”提供了理论武器。但这两次会议未能涉及纠正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未能刹住“共产风”。为此，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对“共产风”进行了更严厉的批判。他说：人民公社在1958年秋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碗、筷等无偿归公共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

有些不得不借用，有些是不应当归壮而归社的，有的没有作价。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遍全国。他批评说：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只是无偿剥夺帝国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和地主的一部分房屋、粮食等生活资料。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采取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当时的农民普遍发生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以保卫他们的劳动成果，抵制共产风。可一些地方领导（如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等发表文章）则认为，这是农民的本位主义，要农民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对此，毛泽东说：不是人家的本位主义，而是我们上级犯了冒险主义。翻箱倒柜，拿共产主义做招牌，实际实行的是抢产。没有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我代表一千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告状。”为了引起大家的重视，在3月5日，他又严厉地说：“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谓之抢，青帮叫偷，对外面不要去讲，抢和偷的科学名词叫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他把“共产风”上纲为“左”的修正主义、冒险主义。“公社有修正主义。拦路抢劫，不作等价交换，一平（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二调（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偿调拨），三提款（银行在农村的贷款一律收回），不是马列主义，违反客观规律，是向‘左’的修正主义。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想快反而慢。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已弄清，但根本未执行，等于放屁。”他承认，从去年九月起，有一个很大的冒险主义错误，平均主义就是冒险主义。他反复申明，反对平均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不能搞平调，不能积累太多，变成秦始皇就危险，13年亡国，隋炀帝31年灭亡。这时他的头脑比较清醒，感到共产风刮得与农民关系紧张，不纠正不得了，要出大乱子。

在郑州会议上，他承认，在生产关系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要退，但退到哪里，他也不清楚。如何纠正共产风，在会上，他主张已平调的财产，一般不再算账。会后，他改变了主张，认为：“旧账还是要算的，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关于所有制，退到三级所有（公社、大队、生产小队），队为基础（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1959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又明确规定保留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生产小队对生产队实行“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的办法，贯彻等价交换、按劳分配的原则，恢复自留地制度，允许社员搞家庭副业，但在社员分配上仍然保留部分供给制的平均主义。

从1958年冬至1959年春夏，毛泽东的主要精力是在纠“左”。但他纠“左”是有限度的，是在肯定人民公社的前提下进行的。他认为公社化过程中“左”的东西只是一个指头，只是下面干部犯的，所以“左”的根本指导思想并没有触及。在这一年夏的庐山会议上，当有人提出人民公社搞早了的时候，他就火冒三丈。庐山会议反右倾之后，“共产风”再度刮起。

#### 四、人民公社与马克思

在毛泽东看来，大跃进、人民公社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找到了大大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迅速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形式，在理论上对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有重大发展。1958年8月11日，他在北戴河会议上讲：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有些问题要重新写。我们解决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先搞农业，同时搞重工业。又说：看来有些问题需要重新解释，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要有新的发展和补充。究竟有哪些新的发展和补充，毛泽东没有展开讲。

他认为，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分配三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对相互关系接触到了，但没有展开。关于平等、民主、说服、打成一片的思想，没有发挥，政治经济学也没有讲清这一条。他又认为：人们在劳动中的相互关系，是生产关系中的重要部份，搞生产关系，不搞相互关系是不可能的。所有制改变后，人们的平等关系，不会自然出现。中国如不解决人与人的关系，要大跃进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注重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强调生产者在劳动中的平等关系，反对等级制度，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不以平等态度待人，这是无可厚非的。但他往往脱离了现有的生产力和所有制来讲人与人的关系，带有空想的、平均主义的色彩。至于他提倡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提倡吃饭不要钱等，显然谈不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是背离。

人民公社化运动明显地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的基本原理。可是令人奇怪的是，毛泽东并不回避这一原理。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说：“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只有生产力发展到某种状况才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某种变革，这是马克思主义一条基本原理。同志们要记着，我国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毕竟是很低的。……因此。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这些论述无疑是正确的。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也承认：“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说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当然实际情况，并不是“前进过远一点”，而是前进的太远了，大大超过了现有的生产力的水平。

我国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在苏联农业集体化过程中也有过。苏联在农业集体化以前试办过农业公社，不仅把生产资料公有化，而且把住宅、小牲畜和家禽等也实行公有化，生活和分配方面也公有化，还办食堂、托儿所等。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有些地方不是搞农业劳动组合（只是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化），而是搞农业公社。斯大林在联共十七大上的总结报告和《胜利冲昏头脑》等文章中批评了这种“左”的做法，并将现有的农业公社转变为劳动组合。斯大林认为，只有生产力发展了，产品十分丰富了，集体农庄的劳动组合，才有可能转变为农业公社，兴办公共食堂、托儿所、洗衣房等。在1958年12月武昌会议后，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对当时的共产风很忧虑，认为我们人民公社颇有类似于苏联的农业公社的地方。为了吸取其他党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很好地研究一下苏联的农业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的异同之

处。于是他指示我国驻苏使馆，要他们组织留些学生，到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图书馆、苏联国家档案馆去翻阅有关苏联农业公社的材料，驻苏使馆经过摘译寄回国内。中联部根据王稼祥指示，编成了《论苏联农业公社》一书。

赫鲁晓夫不同意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针对中国的情况，他在1959年1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一大所作的报告中专门讲了“共产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若干问题”。其中说到：“有些同志会说，应当快些实行共产主义原则，但是，当还没有为此创造好经济条件，没有达到物质财富的富裕以及人们还没有养成按共产主义精神生活和工作的习惯的时候，过早地过渡到按需分配，就会损害共产主义建设事业。必须注意到，按目前的生产发展水平来说，财富还不足以充分满足一切人的需要。那种‘平均共产主义’只能使积累起来的资金都被耗净，并使得经济的进一步顺利发展和扩大再生产成为不可能。”同年7月18日，赫鲁晓夫在波兰波兹南省的一个合作社的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中谈到苏联农业公社的情况，认为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因而“没有什么成绩”，最后选择了农业劳动组合。《内部参考》上登了赫鲁晓夫的讲话。

在1959年召开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将有关人民公社的资料、赫鲁晓夫的讲话以及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攻击人民公社的谈话放在一起，印发到会同志，并写了一段按语。按语说：“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東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東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个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是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最经典的论述。其中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毛泽东并不害怕批评者用马克思的这一法宝来攻他。因为，他认为，人民公社是合乎历史要求的，是符合马克思的这一科学原则的。

历史证明：毛泽东是错了。搞人民公社明显地违背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的基本原理，可是毛泽东却认为搞人民公社是符合这一原理的。毛泽东对这种符合没有作出解释。是哪些因素使毛泽东把明显的“不符合”误认为“符合”的呢？我认为，可能有以下几点：

第一，毛泽东虽然承认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他对这一原理的理解上有点问题，这主要是表现在如何判定生产力的性质、状况。马克思认为：生产工具是衡量生产力性质和水平的标尺，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生产力诸因素中，人是最重要的，但决定生产力性质、水平的，不是人，而是生产工具。决定生产组织形式和生产关系的同样不是人，而是生产工具。有什么

---

《苏共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76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

生产工具，就有什么样的生产组织形式和生产关系。毛泽东注重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但忽视了生产工具的作用。在 1958 年，毛泽东和党中央在考虑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组织规模时只考虑到当时人的主观愿望（为了搞农田水利建设需要协作），而没有考虑到现实生产力的性质、状况（如前所讲，刘少奇在 1957 年的讲话和中共中央 1957 年的指示是考虑到的），只考虑需要，不考虑可能。在 1958 年，我国农业生产基本上是手工操作，主要的生产工具还是中世纪式的犁、锄、耙、刀、叉，主要的动力是畜力。在这种生产力的基础上，组织小规模简单协作性的合作社是可能的。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观点是不正确的，起码不适合于中国国情。但要使合作社巩固、发展，则需要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若要在手工劳动的基础上组织大规模的农业经济则是一种空想，即使一时能成，也不能持久。

第二，过分夸大了变革生产关系中的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生产关系的改革、变动离不开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决定生产关系改革的、变动的并不是人，更不是人的主观意志而是物质生产力。毛泽东则把人的意志看成是主要的。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讲，赫鲁晓夫很不喜欢公社。赫鲁晓夫讲公社，是讲苏联的历史。所谓办公社的物质基础问题。西方国家物质基础雄厚，波兰等国家也不错，但他们要办食堂、办公社就难。赫鲁晓夫只讲物质条件，不讲政治条件。我们的物质条件就是人。因为一切都太少，就要组织起来，他们物质条件好，但不出政治觉悟。中国人多，挤得很，东部有几亿人，土地少，对组织社会化，农业合作化，比较容易办好。如果稀稀拉拉就难办。毛泽东的这种观点与马克思的科学原理是对立的，陷入了历史唯心论。

第三，片面夸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毛泽东企图通过不断改变生产关系来加速生产力的发展，在初级社没有巩固的情况下就搞高级社，在高级社没有巩固的时候，又搞人民公社。他忽视了生产关系需要相对的稳定，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动力，忽视了现代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

第四，在如何检验生产关系是否适合生产力的发展问题上，毛泽东不是以生产力是否发展为根本标准，而是以群众满意不满意来定。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承认生产关系有一点过头，要后退，但退到什么为合适？他心中无数，他不是从现有的生产力性质、状况去考虑，而是依多数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而定。于是一步一步地退，直到 1962 年退到三级所有，以生产小队为基础。这一过程，固然反映了他走群众路线的一面，但也反映了他思想方法上存在着经验主义。

大跃进与人民公社是“左”倾思想的产物。大跃进引起人民公社，引起共产风，引起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而人民公社又为生产力的大跃进作“保证”，使大跃进搞得轰轰烈烈。但基本的还是由大跃进引起的。违背客观规律，要碰得头破血流。1958 年～1960 年的大试验证明了这一真理。

最后应当指出：正因为毛泽东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承认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一基本原理，所以在事实面前，他不得不步步退让，逐步地纠正共产风，使农村生产关系调整到基本适合生产力的程度。

人民公社究竟如何？毛泽东也不是绝对肯定的。1964 年 4 月 15 日，毛

泽东接见阿尔及利亚文化代表团。阿尔及利亚文化代表团团长说：“人民公社引起了某些共产党的批评，但我们相信，这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最好的‘王牌’。”毛泽东则说：“可能是，但还要看。现在正在试验过程中，最后做结论是以后的事情。”又说：“我们不忙做结论。究竟人民公社是崩溃，还是发展，要再看。”毛泽东的这种态度较为科学。

#### 第四节 大试验与庐山会议

大试验期间,中国共产党内的最重大的政治事件是毛泽东在 1959 年的庐山会议上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等同志的批判,并进而在全党进行反右倾运动,把阶级斗争引入共产党内。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同志的批判决非偶然,它是毛泽东及党内“左”倾思想发展的结果。庐山会议的后果是严重的,教训是深刻的。

##### 一、“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

1958 年,毛泽东虽然把主要精力转向了经济建设,搞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但他头脑中阶级斗争这根弦始终没有放松,他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继续沿着错误的方向发展。

在 3 月的成都会议上,他提出:我国当前还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一个是工人阶级,一个是农民阶级。他的这一估计更是远离了中共“八大”的关于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的结论。毛泽东没有正视:公私合营后的民族资产阶级正处在消灭之中,它的成员正在变成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他把知识分子(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多数)划为剥削阶级更是明显脱离了实际的。基于对社会阶级的这种分析,他在 4 月的武汉会议上讲: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复杂的。如果世界出了大事,中国出了大事,世界大战,大灾荒,右派还会造反,中间派还会起来反对我们。他提出,在斗争策略上要冷一冷,放一放,不冷不放,他是不会出来的。他提醒各省的第一书记要心挂两头,三头,四头,学会多面手。在摸工业、摸农业时,还要摸阶级斗争,思想动态,应首先抓思想动态。

毛泽东认为:经过土改,地主阶级搞臭了;经过三反五反,民族资产阶级搞臭了;经过反右派运动,右派搞臭了,孤立了,没有资本了;对知识分子戴了两个帽子,封了他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封了他们迷失方向,也不行了。因此,阶级斗争的重点发生了转移,由反对社会上的资产阶级转到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在成都会议上,一些省自治区的领导汇报了省委里边的“斗争”。根据汇报的情况,他说:省委里的斗争分两种情况,一种有反党集团,另一种是右派活动。是不是各省都大同小异,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阶级斗争发展到这个阶段,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一定会暴露出来,不出来反而是怪事。党内的思想动向值得注意。

在 5 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报告,进一步论述了中国社会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的观点。在这次会上,浙江、甘肃、安徽、云南、广西、青海、河北、广东、新疆、河南、山东等省、自治区的代表在大会的发言中报告了本地区的党组织在整风运动中同党内的所谓“右派分子”、“地方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分子”以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的经过,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被宣布为“右派集团”、“右倾集团”或“反党集团”。

毛泽东提出“两个剥削阶级”的论断是同他未能全面认识阶级与阶级的政治思想影响存在的关系有关。在反右运动中,他提出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

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命题，认为在政治上、思想上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长期的。在 1958 年 11 月 21 日的武昌会上，他则提出了“政治思想上的阶级”问题。他说：“消灭阶级问题，值得考虑。按苏联的说法是 1936 年宣布的，16 年消灭，我国 16 年也许可能。今年 9 年，还有 7 年。但不要说死。消灭阶级有两种，一种是经济剥削的阶级，容易消灭，现在我们可以说已经消灭了，另一种是政治思想上的阶级（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包括他们的知识分子），不易消灭，还没有消灭，这是去年整风才发现的。斯大林在 1936 宣布消灭阶级，为什么 1937 年还杀那么多人。毛泽东认为苏联知识分子里阶级消灭得不干净。所以他说：我看消灭阶级这个问题让他吊着，不忙宣布为好。如何看待他的这一思想？我认为，阶级的划分只能以经济为标准，但阶级不仅是一个经济范畴。而且是一个包括政治、思想在内的广泛的社会范畴，一个阶级在经济上消灭了，并不等于说它的政治思想影响也就立即随之消失。应当承认，阶级的消灭是一个过程，从这方面讲毛泽东上述话有正确的一面。但是，他得出剥削阶级依然存在的结论则是错误的，因为不能反过来认为，只要社会上还继续存在着某阶级的政治影响和思想残余，就认为某阶级如同以往一样的存在着。也不能因为由于旧阶级中的个别顽固分子（包括新产生的）的存在就认为整个旧阶级也存在。确实剥削阶级思想影响是十分广泛的，要彻底消灭它是长期的。我们不能因为某人思想上还沾染着某些剥削阶级的脏东西，就轻易地将人定为资产阶级分子。

在 1957 年以后，毛泽东把人民内部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等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争论上纲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他把不赞成搞冒进、搞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人斥为观潮派、秋后算账派、右倾、保守、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代表。1958 年 8 月召开的北戴河会议，在通过建立农村人民公社决议的同时，又通过了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提出大批“观潮派”、“秋后算账派”，大批“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等资产阶级思想”，提倡“拔白旗、插红旗”。就是在纠“左”的时候，毛泽东也没有忘记阶级斗争。他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讲：必须估计到，一方面那些观潮派、算账派将会出来讥笑我们，另一方面，有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将会进行破坏。他甚至认为：坚持不坚持办公共食堂是坚持不坚持农村社会主义阵地的问题。因此，他把不赞成办公共食堂的人视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把解散食堂说成是向党猖狂进攻。可以说：在大试验时期，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与实践成了执行大试验的工具，而大试验又反过来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进一步向“左”发展。

## 二、“要准备党的分裂”

在 1954 年揭露高饶反党联盟后，毛泽东提出要准备对付突然事变，准备对付高饶事件的重复发生。1958 年，毛泽东在许多会议上一再谈到要准备党的分裂问题。

1958 年 5 月 17 日，他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准备最后灾难”。所谓最后灾难，其一是世界大战，其二是党搞得不好，要分裂。他说：不能说不会分裂，苏联还不是分裂了吗？

在 5 月 20 日的会上，他又说：新的分裂是可能的，只要有党，就可能分裂，一百年后还会有。我们是乐观主义者，不怕分裂，分裂是自然现象。

5月23日，他又重复说：有分裂的可能，这是阶级斗争的正常现象。预料到了，就不要紧。

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他说：党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巩固，一是分裂。部分的分裂是经常的，去年以来，全国有一半的省分在领导集团内部发生了分裂。不希望分裂，但是准备分裂。没有准备，就要分裂。有准备，就可以避免分裂。

12月23日，他在接见参加全军政工会议的各军区负责同志谈话时说：坏事无非是打世界大战，扔原子弹，再有就是共产党分裂，分成两个中央，三个中央，有的省委分成两个是可能的。

为什么毛泽东在1958年突出他讲党可能分裂？这难道仅仅是从哲学上、从党的发展历史上讲分裂是可能的？我想不尽然。除了从一般的哲学意义、党的历史经验上之外，更主要的是出于当时的具体考虑。

第一，毛泽东认为：党内一部分人可以参加民主革命，但不愿搞社会主义革命，过不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这一点，他在过渡时期反复说到。在1957年，他又讲：“党内有这样的高级干部，他们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是动摇的。”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则认为：有些人是党的同路人，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乐意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者。

第二，他认为在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上党内存在着路线上的分歧。他对1956年周恩来、陈云、刘少奇等人反冒进一直不满，一批再批。总路线形成后，还会有斗争、曲折。所以他从1958年大跃进一开始就批观潮派、秋后算账派。他轻率地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后，党内党外，从上到下，发生了争论。有人赞成，也有人怀疑以至反对。为了推行他的试验，他在北戴河会议上（1958年8月30日）提出了六条纪律：一警告，二记过，三撤职留任，四撤职，

五留党察看，六开除党籍。他说，这几条是神经战，不可少，是属于惩罚一类的性质。九个指头是说服，靠政治，凭“良心”办事，一个指头是纪律。

自1956年反冒进以后，他感到，他的意见、主张并不能顺利贯彻，感到党内有阻力。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他心里有气，

说：关于人大代表会的报告，我两年没有看了，为了照顾团结，不登报声明。他对计划部门不事先通报情况十分恼火。他在1月12日的会上讲：八年来我为这样一个工作方法而奋斗，我说了一千次，一万次，这是极而言之，说多了，等于白说。人的思想总是逐步受影响，要“毛毛雨下个不停”。“倾盆大雨”，就会发生径流。政治局是团粒结构不足的，倾盆大雨吸收不了，顺着身子流走了。政治局成为一个表决机器，像杜勒斯的联合国，你给十全十美的文件，不通过不行，像唱戏一样，已经打了牌子，非登台演出不可。文件上又不讲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又有洋文。我有一个手段，就是消极抵抗，不看。你们的文件，我两年不看了，今年还不准备看。他又批评说：《人民日报》革命党不革命。我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民主党派拿我的文章各取所需，《人民日报》闻风不动，写一篇社论，从恩格斯讲起。二月开始谈判，我给他们讲：你们又不执行。为什么又不辞职？十

一月二中全会，一月省委书记会议，三月宣传公议，还有颐年堂会议，都说了人民内部矛盾，不必忧虑，是可以解决的，可是打不动有的同志的心。我说十个干部中有一个拥护我就好了。他也不说不对，就是不执行。地委副书记以上一万人，有一千人拥护我就好了。

苏共二十大批评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对中国党有影响。有人希望借此纠正中国党内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这本是好事，但毛泽东不这样看。他在成都会议上说：党内有一些人屈服于苏共二十大的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又说：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别人崇拜自己。

在党的领导人中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的要数彭德怀了。1951年7月1日，彭德怀在朝鲜参加志愿军庆祝建党30周年会上听了唱《国际歌》和《东方红》后感到：《东方红》歌中“他是人民大救星”，同《国际歌》中“全靠自己救自己”似乎有些抵牾。他认为改为“他是人民的好领导”，“领导我们向前进”更好些。但这一想法没有向人透露过，只是写进了自己的笔记。苏共二十大后，他在中南海西楼开会时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不赞成喊“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担心党内有人搞分裂。他担心的是谁？在那时，他自然不好明言。第二年，在庐山会议上，他在批评彭德怀时说：“去年八大二次党代会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彭德怀）。”也许正因为毛泽东对彭德怀有戒心，所以在八大二次会议后开的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林彪提升后并没有立即安排具体工作。毛泽东考虑的也许是万一彭德怀出了问题可以由林彪来接替。

总之，1956年以来，毛泽东认为，党中央内部不像以前那样一致了。路线上有分歧，他的话也不十分灵了。了解了这些，就可知道，他为什么在1958年一再讲要准备分裂，也很容易理解1959年庐山会议的斗争了。

### 三、庐山会议与彭德怀的悲剧

中共中央于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庐山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紧接着于8月2日至16日又举行了八届八中全会，简称为庐山会议，为了有别于1961年、1970年的两次庐山会议，又称为第一次庐山会议。

庐山会议本来的议题是继续总结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纠正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左”倾错误，安排当年和下一年的任务。毛泽东上庐山之前，先到湖南进行了视察，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冲，写了七律一首《到韶山》。诗的后四句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6月29日上庐山。7月1日作《七律·登庐山》一首。诗云：“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笼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诗的最后两句原为：“陶潜不受元嘉禄，只为当年不向前。”这首诗反映了毛泽东对形势的看法和心境。从诗中可见他对形势的看法是乐观的，认为诗人陶潜所追求的理想社会正在变成现实。

7月2日，会议开始，毛泽东提出了19个问题：1.读书，2.形势，3.今

年的任务，4.明年的任务，5.四年的任务，6.宣传问题，7.综合平衡问题，8.群众路线问题，9.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质量问题，10.体制问题，11.协作区关系问题，12.公共食堂问题，13.学会过日子问题，14.三定政策，15.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16.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问题，17.农村党团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18.团结问题，19.国际问题。他在讲话中指出：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社会主义经济还不太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该好好读书。中央、省、市、地县各级的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政治经济学的书。他提出，要给县社干部编三本书，一本是关于“好人好事”的书，收集在去年大跃进中敢于坚持真理，不随风倒，工作做得好的，不谎报、不浮夸、实事求是的例子。一本是关于“坏人坏事”的书，专门收集说假话，违法乱纪，或者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例子。第三本是中央从去年到现在的各种指示文件，系统的编一本。关于形势，他指出：总的说来，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这三句话是根据陪同他在湖南视察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的看法概括出来的。毛泽东把问题归结为（1）综合平衡，（2）群众路线，（3）统一领导，（4）注意质量。其中最重要的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他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是没有搞综合平衡。说两条腿走路，几个并举，实际上没有兼顾。整个经济工作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他提出，应以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国民经济，改变过去重、轻、农的次序。他肯定陈云同志关于先安排市场，后安排基建的主张。他还提出，要恢复农村初级市场，要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要恢复三定政策。从印发的谈话纪要看，毛泽东对成绩没有多讲，主要讲问题和如何纠正，也没有反右倾的意思。会议原定开半个月。

从7月3日起，会议分组讨论十九个问题。讨论中虽然对形势的看法上有不同意见，但总的气氛是好的，是“神仙会”。与会者白天开会，晚上看戏、跳舞。会议间隙，游山玩水，赋诗抒怀。毛泽东的心情也很好。休息时，与卫士们海阔天空地聊天、逗乐。他还请江西省省委书记的夫人给他的一位卫士介绍对象。7月8日，又请人将在南昌赋闲的贺子珍接上山叙旧。

7月10日，毛泽东召集组长会。根据讨论的情况，他指出：对形势的认识如不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首先要思想统一。他批评党内外右派否定一切，批评党内有的干部说去年大跃进“得不偿失”。他说：要承认缺点错误。从局部来讲，从一个问题说，可能是十个指头，九个指头，七个指头或三个指头，两个指头，但从全局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从具体事实来讲，确有得不偿失的事。但总的来说，不能说得不偿失。取得经验总是要付学费的。全国大办钢铁，赔了20多亿，全党全民学了炼钢铁，算是付出了学费。有人说，总路线根本不对。对此，他说：所谓总路线，无非多快好省，根本不会错。他承认去年以来高指标、共产风、浮夸风等问题。他提出：把道理讲清，把问题摆开，也不戴帽子，什么观潮派、怀疑派、算账派、保守派等等，都不戴。他希望通过讨论，在总路线下团结起来。毛泽东10日的谈话，明显带有批右的倾向，但仍未提出反右倾。会议仍安排到15日。

7月11日晚，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谈话的气氛是自由的，轻松的。毛泽东有一定的自我批评，承认1958年提倡敢想敢说，其中也有胡思乱想，引起唯心主义。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面和各部门。周小舟直言说，高

指标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毛泽东当时并没有显出反感和不快。毛泽东也赞同让陈云出来主管经济工作的建议，并引用“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的古语。李锐回忆说：“我们三人，从主席处出来，都觉得心情舒畅，真正向老人家交了心。”

总的看来，毛泽东的思想是：在肯定成绩伟大的前提下，中央愿意听取各种意见，但要保护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希望大家统一认识，改正缺点，继续跃进。毛泽东认为缺点正在改正，形势开始好转。他对存在问题的严重性缺乏认识，对形势的看法过于乐观。他的这种思想状态，自然影响会议不能冷静地、认真地总结经验，纠正错误。

会议原定 15 日结束。正当卫士们打点行李准备下山时，风波骤起。彭德怀在 7 月 14 给毛泽东写了信。

彭德怀（1898～1974），与毛泽东同乡，湖南湘潭人。1928 年 4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 7 月领导平江起义，成立红军第五军。同年 11 月，率红五军到井冈山，在毛泽东领导下坚持井冈山斗争。参加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师长、军长、三军团总指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前敌总指挥。抗日战争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建国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中共七届、八届政治局委员。彭德怀作战勇敢，功勋赫赫。1935 年 10 月，毛泽东作诗赞誉：“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又称彭为“张飞”，夸他勇猛顽强，心直口快。彭德怀刚正不阿，以直言著称于党内外军内外。他虽主管军事，但对 1958 年大跃进以来的问题深为忧虑。1959 年 4 月，他率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东欧各国。6 月中旬回到北京，6 月 29 日上庐山。彭德怀在去武汉的火车上曾谈到，“若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会出匈牙利事件。7 月 2 日，在主席那里汇报时，他也谈了这个看法。”

他分在西北组。在小组会上他对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直率的批评。他说：1957 年整风反右以来，政治上、经济上一连串的胜利，党的威信高了，得意忘形，脑子热了一点，把这些经验总结一下，不要丢掉，但不要埋怨。他也指名批评毛泽东：错误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1070（万吨钢）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有责任。“毛主席和党在中国人民中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不行。去年乱传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报的增产数，实际没有那么多。我去了解，实际只增产百分之十六。我又问了周小舟同志，他说那公社增产只有百分之十四，国家还给了不少的帮助和贷款。主席也去过这个社，我曾经问过主席，你了解怎样？他说没有谈过这个事。我看他是谈过。”彭德怀感到会议对存在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对经验教训总结、分析不够。他又感到有些话不便在小组会上讲。于是他经过 12 日的酝酿，在 13 日晚 14

---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 82 页。

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 284～285 页。

见赵林森的《毛泽东与彭德怀‘误解’真相》，刊于《毛泽东轶事》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46 页。

日晨给毛泽东写了信。

信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的标题是：“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其中说到：“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1958年以来的基本建设过多了一些，发生了比例失调，“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予决断”；大炼钢铁，有失有得；农村公社化具有伟大意义，人民公社中的缺点，基本上已经纠正。结论是：“成绩确实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信的第二部分标题是：“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信指出，1958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另一方面，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信着重分析了主观原因。“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彭德怀认为，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二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信具体指出了一些“左”的倾向，并认为，纠正左的错误要比反掉右倾思想困难。信的最后部分说：“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信的末尾引了毛泽东对形势估计的三句话后写道：“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

这封信的态度是诚恳的，分析是深刻的，没有过头之处，没有夸大之词，没有一点恶意。事实上对1958年以来存在问题和错误批评的言词语气，远比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要缓和得多，今天看来，如果这封信还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他还是在基本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前提下提的意见和分析。但毛泽东在收到信后于16日冠以“彭德怀同志意见书”的标题“印发各同志参考”。

从毛泽东对信加的标题并印发到会者讨论一事看，他是不赞成信的内容的。对信的性质是什么？他在开始时没有讲。卫士长李银桥回忆说：毛泽东看过信后，并没有当成太大的事，也就是个意见呗。毛泽东带着苦笑的表情说：“彭老总批给我看的尽是些消极材料，尽给我说消极材料。”中共中央常委决定会议继续进行，广开言路，扩大民主，让人讲话，把各种意见摆出来。17日，会议传达了刘少奇的“成绩讲够，缺点讲透，鼓足干劲”的话。

7月17日，下午五点到晚十点，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胡乔木、田家英、李锐五人去谈话。毛泽东说：现在的情况，实质是反冒进，我是反冒进的头子。要有几个右派朋友。我是机会主义的头子，我要找唱反调的人通讯。我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孙悟空偷桃子，只有这个办法，开庐山会议之类。过去不懂得管理经济之复杂。李锐认为，大家谈的很融洽，一起吃饭，一起喝茅台，还敬酒，谈笑风生，“主席还没有完全转向‘左派’，还没有立意发起一场反击”。

彭德怀的信，在会上引起了争论，完全同意的和基本反对的只有几个人，

---

李银桥：《走向神坛的毛泽东》第249页。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88、92页。

多数同志基本上同意。（另一种说法，有许多人赞成，但也有不少人提出质疑或表示反对。）但会议的气氛还不很紧张。晚上的舞会照常举行。据李锐回忆：7月20日左右的一个晚上，在小礼堂的舞会上，李锐问周恩来总理，对彭总的信有什么看法。他说：那没有什么吧！意思即这是一种很正常的情况，因为每次中央会议总要印许多传阅文件的。到22日为止，会议还是“神仙会”，交流情况，各抒己见，座谈之余，继续游山赋诗，心情愉快。7月21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要是那时会议空气紧张，批判彭德怀的意见占了上风，那张闻天可能不会发言。即使发言，也不会一讲就是半天。所以我认为。李银桥回忆毛泽东最初对彭德怀信的态度是可信的。毛泽东不同意信的内容，但也没有当成太大的事，只是希望通过讨论，统一大家的认识。

张闻天的发言对大跃进以来我党所犯的错误及所犯错误的理论、思想根源作了系统、深刻的分析。发言首先肯定“成绩伟大”，“总路线正确”，然后指出存在问题的严重性。他发言的重点在分析产生缺点的原因。他指出：“对于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关系的了解有片面性。有一个时期，把主观能动性强调到荒谬的程度。干劲虽大，但是强调得过了分，还反对讲条件，这就造成了主观主义。这是违反马列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的。”他认为，在处理政治和经济关系上，光讲政治挂帅还不行，还要根据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可有的人，根本看不起经济规律，认为只要政治挂帅就行。从党内生活上讲，他认为，党内民主作风不好，几句话讲的不对，就被扣上帽子，当成怀疑派、观潮派，还被拨白旗，有些浮夸的反而受奖励，被树为红旗。他不同意“讲缺点会泄气，会打击积极性”的说法，主张缺点要讲透。他认为，“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骄傲自满，麻痹大意的情绪。要更多地看到存在着问题的一面。”“我们的胜利一个接着一个。胜利本身有消极面，因为它容易使人头脑发热，骄傲自满，问题也就容易随着产生。”他明确赞成彭德怀的意见书。最后，他认为，大跃进中缺点和成绩的关系是一比九的关系。张闻天的发言很有理论分析，对产生问题的原因分析尤为精辟，讲到了问题的实质。

过了两天，即7月23日，毛泽东发表了讲话。他一开头就说：“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点吧，可以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据卫士回忆：有一天毛泽东开会回来，情绪显得有些异常，吃了三次安眠药还不能入睡。特别是几位中央首长来汇报什么之后，毛泽东更显出烦躁。虽然躺着，却总是看书，看材料，无法合眼。忽然，他问道：“你知道彭德怀原来叫什么名字吗？”“彭德怀原来叫彭德华，就是要得中华。”据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一致回忆：每遇到大事，毛泽东经常几天几夜不睡，思索问题。在23日讲话前，他一夜没有睡，在室外来回踱步，抽烟。可以说，23日讲话是他思索一夜的结果。他认为，当时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不愿听坏话；一种是在路线问题上有动摇，方向有问题。

看来，毛泽东这一夜想得很多。他把党内党外、会内会外、现实历史联系起来思索。

---

李锐：《总理在我心中》，《怀念升篇》三联书店1987年10月版，第46页。

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91页。

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张闻天选集》第501、503页。

见权延赤的《红墙内外》，昆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7页。

1959年5月，江西省80多个县委干部在省党校开会，讨论贯彻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巩固人民公社的方针。在会上，有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提出了尖锐的批评：（1）“大跃进”是吹起来的，是浮夸、谎报的结果；（2）、大炼钢铁是劳民伤财，是得不偿失；（3）人民公社是“早产儿”，违反了客观必然性，“是根据上级指示人为的产物”；（4）、人民公社没有高级社优越性，搞人民公社化根本没有条件；（5）中央通过的两个人民公社的决议是“心血来潮”，是“左”倾思想。

广州军区四十二军政治部的报告（这是彭德怀提供的）反映了“少数营团干部对经济生活有抵触情绪”。报告列举了少数干部讲的“怪话”：“现在除了水和空气以外，其他一切都紧张。”“中国大跃进举世闻名，但我怀疑，市场紧张就是证明。”“1956年好，1957年较好，1958年成问题。”“公社成立的太快，太早了，不合乎规律。”“去年不仅是工作方法上有问题，而且带路线性质的错误，中央要负责任。”……等等。报告说，讲这些话的人“政治上一贯落后”，“有一人是反右派斗争时的重点批判对象”。

党外一些民主人士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意见更大。章伯钧说，58年搞错了，炼钢铁失败了，食堂办不起来了，大办水利是瞎来。罗隆基说，物资供应紧张是社会制度造成的。私营工商业改造有毛病。现在人民怨愤已达极点。共产党说唯物，实际上最唯心。龙云说，解放后只是整人，人心丧尽。陈铭枢说，供求相差惊人，几年之内也难恢复正常供应。要是过去发生这种情况，早就该“下诏引咎”了。他们实行的不是列宁主义，而是斯大林主义。于学忠说，共产政策忽冷忽热，大跃进的成绩全是假话。天安门工程，像秦始皇修万里长城。

根据以上材料，毛泽东在23日讲话开始时就说，现在党内外右派攻我们，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了天安门，要垮台了。党内有一部分意见还没有看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映，各地都有。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有些人就是右派，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也认为一塌糊涂，如广东军区的材料。这些话都是会外讲的。我们是会内外结合，可惜庐山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他主张把右派的言论都印出来。

针对听不得不同意见，“一触即跳”的人，毛泽东说：人有一个嘴巴，一曰吃饭，二曰讲话义务。长个耳朵就要听。他要讲，有什么办法？有一部分同志就是不愿意听坏话，好坏都是话，都要听。他劝这些人，要“硬着头皮顶住”，让人家讲，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神州不会沉，天不会塌下来，无非是一个时期蔬菜太少，头发卡子太少，没有肥皂，比例失调，市场紧张。他反复劝大家，硬着头皮顶住，听他一二两个星期，再反击。实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的原则。

在批评了“触不得”的倾向后，毛泽东接着指出，另一部分人在这样紧急关头是摇摆的。有人虽然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化社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那一边？向那一方面讲？他的这些话显然是针对彭德怀等人讲的。他继续说：有些人关键时刻就是动摇的，在历次大风大浪中就不坚决。历史上四条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又是总路线，站不稳，扭秧歌。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

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讲。他又翻起了反冒进的老账，说：1956、1957年的动摇，不戴高帽子，讲成思想方法问题。如果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凄凄惨惨的泄气性、悲观性。我们不赞成戴高帽子。因为这些同志与右派不同，他们也搞社会主义。只不过没有经验，一有风吹草动就站不住，就反冒进。这一次，不讲冒进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说：“有失有得”，“得”放在后面是经过斟酌的。他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因为右的性质，往往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压力下，右起来了。他又说：他们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不是左派。我所谓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他们重复了56年下半年，57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只差30公里了。现在他们这种论调，右派欢迎。

针对缺点要讲透的观点，毛泽东说：一个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都登出来，登得完登不完？结果又如何？我们的国家会垮台，那时帝国主义不来，国内人民也会把我们统统打倒。你办那个报纸，天天登坏事，无心工作，不要说一年，就是一个星期，那也要灭亡了。

我认为，毛泽东的这一说法，从一般上讲没有错。党的报纸，应以正面宣传为主，这是完全正确的。但这并不是说，工作中的缺点可以掩盖。缺点要讲透，也不是说，报纸天天登坏消息，而是说，对存在的问题要实事求是地认识，是三分就是三分，是五分就是五分，是七分就是七分，不能固守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或七分成绩与三分错误的框框。

毛泽东往下又说：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

公共食堂办不办，会上有争论。毛泽东说：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办好，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食堂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他批评中国科学院昌黎调查组（该调查组认为食堂不办为好），学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的办法，说食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关于人民公社，他说：会不会垮台？现在没有垮一个，准备垮一半，垮七分还有三分。要垮就垮，办得不好，一定要垮。共产党就是要办好，办好公社，办好一切事业。

关于大跃进，他说：去年八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方面，对建设根本外行，对工业计划一点不懂。在西楼里曾经讲过，不要写英明领导，管都没有管，还说什么英明？同志们，1958年、1959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该说我。始作俑者，无其后乎！我一个儿子打死，一个儿子发疯。所谓始作俑者，应该断子绝孙。一个是1070万吨钢，是我建议的，我下的决心，结果9千万人上阵，20亿人民币，“得不偿失”。其次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建议之权。他带着情绪讲，我有两条罪状，一条叫1070万吨钢，一条叫人民公社。在重大问题上需要谨慎。我也放了三大炮：公社、炼钢、总路线。彭总说他粗中无细。我是张飞，粗中有点细。人民公社我说是集体所有制，我说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有一个过渡，两个五年计划太短了一点，也许要二十个五年计划。

针对彭德怀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毛泽东说：他们（按：指群众中百分之三十的积极分子）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他们愿意搞，你说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这不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他承认“共产风”，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但他认为这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他用马克思来为自己辩护，说：要说快，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天天想着欧洲革命要来了，又没来，反反复复，一直到死还没有来。到列宁时才来了，那不是急性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在 23 日的讲话中，毛泽东还鼓励大家讲话：有话讲出来，记录为证，口说无凭，立此存照。你们有话就讲出来，你们抓住就整我嘛！不要怕穿小鞋。成都会议讲过，不要怕住班房，甚至不要怕杀头，不要怕开除党籍。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两种人都不高兴我。一种是触不得，一种是方向有点问题。不赞成，你们就驳。说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

李银桥认为，毛泽东 23 日的讲话，先批“左”，后批右，两边摆平。我认为，这种评论恐怕不符合毛泽东讲话的基本精神。毛泽东的所谓批“左”，不过是指一部人不愿听不同意见，不愿听坏话，一触即跳，并非是批工作中的真正的“左”。毛泽东在讲话中确实还没有将彭德怀的信上纲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也没有把彭德怀看作右派，认为只是“讲话方向有问题”，是路线上的动摇。但毛泽东讲话从总体上看是针对彭德怀的，是批右，而且带着一股不满的情绪，要算旧账。毛泽东的批评是严厉的、尖锐的，不过还是留有余地的，承认彭德怀是好心，忧心如焚，犯了与 1956 年、1957 年反冒进同志同样性质的错误。

毛泽东 23 日的讲话，对一些希望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好提缺点的同志是一当头闷棍。周小舟认为按照讲话精神发展下去，毛泽东很像斯大林晚年，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只有个人独断专行。毛泽东的讲话是个“一百八十度转变”。当晚，周小舟、周惠、李锐要到黄克诚处谈谈心里的话。黄克诚是彭德怀的老部下，两人私人感情很好，有人称他们两人是“父子关系”。庐山会议时，黄克诚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庐山会议第一阶段未参加，是 17 日上山的。上山后与彭德怀同住一所房子。19 日，黄克诚在小组会上发言，没有直接谈彭德怀的信。他说他同意毛主席讲的三句话和少奇讲的“成绩讲够，缺点讲透”。他在发言中主要讲缺点。他说：检查缺点使我们前进，不会使我们后退。毛主席教育我们要天天扫地，洗脸，检讨了缺点，我们就会更加健康，就会干劲更足，更踏实。黄克诚稳重，踏实，开头不同意周小舟等人去他住处。由于周小舟的坚持去，黄克诚同意了。黄克诚与周上舟、周惠、李锐一样，对毛泽东的讲话也想不通，心情沉重。但他劝其他三人，不要激动。说中央集体领导很好，有错误，自己多想想，可以作检讨。他劝慰大家有意见还是当面见主席谈。在周小舟等将起身走时，住在房子另一头的彭德怀到了黄克诚的房间，没有多说话，周小舟等三人就回去了。回去路上，周小舟碰见了罗瑞卿。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均是湖南人，思想倾向相近。不久会议传出“湖南集团”的说法，追查右倾活动。最后推导出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活动。

7 月 26 日，毛泽东在对李云仲信的评论中对这次争论的性质作了明显的

上纲。李云仲原为国家计委基本建设局副局长，写信时（6月9日）是东北协作区办公厅综合组组长。在信中，李云仲认为：1958年第四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其根源则是在1957年整风反右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大炼钢铁损失很大，毫无益处，是一条失败的经验；人民公社也是错误的，劳动力和各种资料也都造成巨大的消耗；大办水利也有问题，“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是由大办水利引起的。信对计划工作提出了尖锐批评。李云仲在信中建议：“在各级干部中进行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教育，教育全体党员坚持党的原则，加强党性锻炼。”毛泽东对李云仲的信写了近三千字的评论。他在一开头就指出，李云仲“几乎否定一切”，“是一个‘得不偿失论’者，某些地方简直是‘有失无得论’者。”但毛泽东称赞作者“不隐蔽自己的观点，他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在的困难”。毛泽东肯定作者对计划工作缺点的批评“很中肯”，“十年以来，还没有一个愿意和敢于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系统地揭露我们计划工作中的缺点，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我就没有看见这样一个人。我知道，这种人是有的，他们就是不敢越衙上告。”毛泽东建议将信发到中央和省两级，并展开讨论，“将1958年、1959年自己所作工作的长短大小，利益得失，加以正确的分析，以利统一认识，团结同志，改善工作，鼓足干劲，奋勇前进，争取经济工作及其他工作的新的伟大胜利。”他肯定自去年11月郑州会议以来批判错误，改正缺点的必要性，并且认为已迅速地见效和逐步的见效。紧接着毛泽东写道“现在党内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1957年党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另一种情况，是无产阶级内部的思想性质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和这些同志基本上相同点。”但他们把党犯的错误估计得过大了一些。“是得失相当论者”，在紧要关头不坚定，摇摇摆摆。他们是典型的中间派。“我们不怕右派的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因为这种摇摆，不利于当前人民的团结，不利于全党一致地鼓足干劲、克服困难、争取胜利。我们相信，这些同志的态度是可能改变的。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他们，争取他们改变态度。”他认为，根据党的38年的历史，“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毛泽东的以上这些评论的意见，大体已在23日全体会议上讲过了。但毛泽东在评论的最后写道：“现在这一次争论，可能会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争论。如同我们在革命时期的各次重大争论一样，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可能是没有争论，风平浪静的。庐山会议可能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毛泽东的这些话明确地表明，他把与彭德怀等同志的分歧、争论看成是一次党内两条路线的大争论，已将彭德怀认定为错误路线的代表者。不过，此时毛泽东还没将彭德怀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还继续认为“他们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还是“无产阶级内部的思想性质的”问题。

26日，各小组传达了毛泽东以下的话：“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这天上午，周恩来对刚从北京来的各部委负责同志讲了前一段会议的情形和对形势的分析。他说，会议形势的发展，事先我也无思想准备。四个星期会议的发展，大家慢慢懂得了，不是简单的经验

总结，而发现是方向问题，是一场政治斗争。党内思想动态不能不反映党外思想动态。到了时机成熟时，主席才讲明这个问题。主席一开始就讲过得失论。周恩来说：去年绝非得不偿失、得失各半，而是得多失少。彭总的信是右的代表。

23 日后，尤其是 26 日后，一些人在小组会上对彭德怀的批评越来越激烈、尖锐。7 月 31 日和 8 月 1 日，毛泽东主持常委会，批评彭德怀。两次会主要是毛泽东讲，也有彭德怀的自我批评与申辩，也有其他人的批评。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在几次路线斗争中，彭德怀都是摇摆的，由于挨了整，心里恨得要死。三十年来，他与彭德怀的关系是三七开，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彭德怀历来有野心，历来要用自己的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这次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地反党，写信的目的是为了争取群众，组织队伍。彭德怀有个人英雄主义，野心即出在这里。彭的世界观是经验主义，等等。毛泽东最为担心的是：彭德怀想利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的问题进行篡党。

对毛泽东的有些批评，彭德怀是接受的，如：承认 14 日的信有缺点；路线斗争中有动摇；个人英雄主义；经验主义等。有些则不承认，如不承认有野心，不承认自己是野心家、伪君子；不承认写信是为了争取群众；不承认这次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的反党；不承认搞非组织活动；不承认与外国党有关系；不同意与毛泽东的关系是三七开，认为是对半开，等等。彭德怀虽然作了解释、申辩，但没有发生效用。

为了彻底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开展反右倾，毛泽东决定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8 月 2 日，八届八中全会开幕，毛泽东在会上讲：现在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问题，刮“共产风”的问题没有了，“一平二调三提款”没有了，浮夸没有了，实在不是反“左”而是反右，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向六亿人民、向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运动进攻的大问题。毛泽东认为，反了几个月的“左”倾，右倾必然出来，缺点确实存在，但已经纠正。他们还要求改，他们抓住这些东西，来攻击总路线，把总路线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毛泽东的这一认识是脱离实际的。虽然有几个月的反“左”，但只是纠正一些具体工作中的极“左”东西，而并未触及指导思想上存在的“左”的东西。因此，正确的做法就应是继续反“左”、纠“左”，而不是反右。再者，彭德怀、张闻天等同志并没有完全否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他们是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前提下，提意见，总结经验教训，目的是为了工作做得更好，根本不是什么向党、向六亿人民、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

8 月 2 日，毛泽东给张闻天写信，指责张闻天“陷入军事俱乐部”，与彭德怀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指责张闻天“旧病复发”，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毛泽东认为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结成反党集团。这一论断是毫无根据的。

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同志的错误斗争又使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向“左”的方向发展了一大步。8 月 10 日，他在一个批示中指责：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要“另立他们机会主义的党”。他认为，“这个党的主要成分，原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这些人在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时，他们是乐意参加的，有革命性。至于如何革法，也是常常错的。他们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

8 月 16 日，毛泽东在《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一文中又说：“庐

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正是依据这种看法，他认为，有些人“昨天还是功臣，今天成了祸首”。这里，毛泽东把党内斗争极端地简单化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共产党内会有反映，但这仅仅是党内斗争的一个方面。党内斗争大量的是由认识上的原因引起的，是认识上正确与错误，或比较正确与比较错误的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在剥削阶级基本消灭之后，尤其是如此。从庐山会议开始，毛泽东不加分析地把党内不同的认识上纲为路线斗争、阶级斗争，其结果导致更加严重、更加尖锐的党内斗争，最后发展成“文化大革命”。

为什么彭德怀的一封信会掀起一场这么大斗争，改变了庐山会议原来的宗旨呢？毛泽东关于庐山会议斗争有必然性的论述是错误的。但庐山这场斗争也不纯粹是偶然的。可以说，这是毛泽东 1957 年后以下错误发展的必然结果：（1）阶级斗争扩大化；（2）经济建设上的急于求成，因而不可能从根本上纠正“冒进”；（3）骄傲自满，个人专断的作风，总以为自己总的来讲是正确的；（4）思想上的经验主义。从更广的背景上看，错误批判彭德怀与党内（主要是高级干部）普遍存在“左”的情绪有关。可以说，若没有党内“左”的思想的推动，毛泽东不至于把彭德怀的信看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不至于把彭德怀等同志打成反党集团。

彭德怀、张闻天的批评远没有毛泽东自己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对“左”倾错误的批评严厉（如前所说；他认为“共产风”是冒险主义，“左”的修正主义。不改正将会如同秦始皇、隋炀帝那样垮台了）。毛泽东在 8 月 1 日常委会上也说：“我们讲了九个月，批判了九个月，你们批判的那些，难道超过了我们讲的？”彭德怀、张闻天的批评也没有李云仲的信尖锐。毛泽东虽不同意李云仲的意见，但不仅没有说李云仲是反党，反而称赞他“越衙上告”的精神。可是毛泽东却把彭德怀的信上纲为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纲领，并认为彭德怀反党篡党，里通外国。这是为什么？我认为这里有一些极为复杂的情况。

第一，毛泽东与彭德怀有历史旧账。如前所述，毛泽东赞扬过“彭大将军”，也委以重任，但对彭德怀历史上的问题（其实有些是误解，有些并不是像毛泽东所想象的那样严重）是一直记着的。在 1956 年彭德怀批评个人崇拜后毛泽东对彭德怀存有戒心。他认为，他与彭德怀有疙瘩，要解开。彭德怀在 8 月 1 日的会上也谈到：黄克诚批评我对主席有成见。贺龙在 8 月 1 日的会上说：彭德怀“对主席成见很深，信中有历史成见”。正因为两人互有成见，存有疙瘩，不爆发则已，一爆发即不可收拾，上纲上线。

第二，彭德怀在会上有些话说的不妥。1945 年延安整风时，华北地方和军队同志座谈会会对彭德怀在华北的工作进行了批评。这种批评，使他深受教育。但批评也有过火失实之处。在一些方面使他受了委屈，心中留下不快。

---

见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第 241 页。

如何评价这次座谈？薄一波认为：对彭德怀的批评，有些是正确的，有些则显然过火，有失公正。无甚道理的苛求和指责，看来也不乏其例。对彭德怀 1943 年关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谈话的批评是对的，彭德怀

这种委屈情绪在庐山会议上发泄出来了。他在会议初期的西北小组会上说：“华北座谈会骂我40天娘，现骂3天行不行？”这种说法引起与会者不满。这种说法，肯定不会写入简报，毛泽东很可能是在批判后揭发时才知道。对此，毛泽东很警觉，勾起了历史旧账。毛泽东在8月1日的会上说：“华北座谈会操了40天娘，补足20天，这次也40天，满足操娘要求，操够。”彭德怀“骂娘”的话给毛泽东很强烈的刺激，他在以后多次谈到。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说你骂我40天娘，我骂你20天娘还不行。

这一骂就被搞乱了，工作受影响。1964年3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七大前，开了斗争彭德怀的会议。他在庐山会议上说，你们骂了我40天娘，我也骂你20天。直到1965年12月21日，他在谈话中又说：庐山会议是讨论工作的，预计开半个月，15天还没到，彭德怀跳了出来，说：“你们在延安骂了我40天娘，我骂你20天娘还不行？”这三次谈话足以说明彭德怀“骂娘”的话给毛泽东的印象是何等的深。

第三，彭德怀给毛泽东个人写信，完全符合党的组织原则，无可非议。这是必须肯定的。但从另一方面看。从同志关系讲，在这特定的情况下以这种方式提意见，容易造成隔膜。彭德怀在党内是以直言闻名的。1951年1月，彭德怀从朝鲜回来，有紧急重大问题向毛泽东陈述自己的意见。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他又火急地赶到外地。其时毛泽东正在休息。毛泽东的睡觉是一件大事，他睡着时中央领导人一般不去叫醒，总是等他醒后再办事。彭德怀这次不顾警卫人员劝阻径直闯进毛泽东的卧室，陈述自己的意见。毛泽东并没有责怪彭德怀，而且当即表示同意彭德怀的意见。并不无赞赏他说：“只有你彭德怀才会在人家睡觉的时候闯进来提意见。”在庐山会议上，有些话不好在小组会上讲，可以直接去找毛泽东当面谈，彭德怀有顾虑，有些意见不成熟，怕谈不好，容易引起误会。在7月12日下午，彭德怀到毛泽东住处，觉得写信不易，还是当面谈算了。可巧毛泽东正在睡觉，没有谈成，于是决定写信。毛泽东接到信后在脑中起疑问是自然的。彭德怀郑重其事写封信，容易产生误解。黄克诚上庐山后对彭德怀说过：“有意见可以当面说嘛，写信干什么。”在7月31日的常委会上，毛泽东说：多次重要时期，你从没有写过信，为什么这次要上万言书？怀疑彭德怀动机有问题。

在23日的会上，彭德怀剃了一个很光的头，没有像其他政治局委员一样照例坐到台下前排，而是坐到最后一排。毛泽东讲话后散会时，彭德怀先走出，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首长向下坡走（礼堂在山坡上），这时彭德怀又忽然回朝坡上走，与毛泽东走了个对面。毛泽东打招呼说：“彭总，我们谈谈吧？”彭德怀一边走一边甩手，声音很大地说：“有什么好谈的？没有什么好谈的！”毛泽东望着彭德怀，态度很客气地说：“没关系么，我们有不同意见可以坐下来谈谈么……？”“没有什么好谈的！”彭德怀甩手而去。当时许多中央

---

接受了，作了检讨。座谈会批评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过早地暴露了我们的力量，是“战略错误”。彭德怀对此批评有保留，彭德怀承认有错误，主要表现在事先未向中央请示，以及对日军进攻方向上有问题，但并非战略失误。关于对彭德怀“闹独立性”的批评，可以说是批评错了。彭德怀对毛泽东“不捧”、“不盲从”、“不迷信”，这是他的高明之处。详见《领袖·元帅·战友》第105～108页。

见黄克诚的《丹心昭日月，刚正垂千秋——悼念我党我国我军的杰出领导人彭德怀同志》，《解放军报》1979年1月2日。

首长都在场，都看到这场面。事实是不欢而散。因为许多中央首长在场，我认为，卫士长的这一回忆是可信的。彭德怀的这种态度无疑会引起毛泽东的怀疑。

第四，彭德怀写信的时机问题。毛泽东在8月1日的常委会上讲，抗战时独立王国，你搞你的，并没有写信；抗美援朝也没有信。北戴河、武昌、郑州会议都没有信，这次抓到一个机会，打着无产阶级旗帜，攻击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以为万无一失。国内外，党内外议论纷纷，乘此机会，你是个投机分子。在8月16日的会上，毛泽东又讲：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不在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上提出意见，更不在北戴河会议上对高指标提出意见，也不在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上提出意见，也不在今年一月北京会议上提出意见，也不在二月郑州会议上提出意见，也不在三月底、四月初的上海会议上提出意见。这些同志为什么不在那时候提，而在这时候提呢？因为他们那一套，那时还提不出来。他们等到中央把问题解决了或者大部分解决了才提，认为这时不提就不好提了。再等几个月以后，形势更好转，时机过了，就更不好提了，故急于发动。类似的话，毛泽东在后来又讲过多次。如，1959年9月11日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和外事会议上和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时。关于这一点。彭德怀在自述中有所申辩，认为自己没有隐瞒观点，在1959年曾向中央打电报，说明粮食不能征购1200亿斤，只能征购900亿斤。有的文章根据彭德怀的申辩认为，毛泽东的批评不符合事实。我认为，客观地讲，彭德怀的申辩是无力的。因为彭德怀虽然发现了大跃进中的问题，也向一些同志谈过，打过电报，但他毕竟没有在中央的重要会议上直言自己的观点，疾呼纠正“左”的错误，也没有通过写信或个别谈话，向毛泽东或中央领导直陈自己的意见。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起，毛泽东花了很大的气力来纠“左”。这种情况，自然会使毛泽东产生这样的想法：我大力纠“左”，你们不吭气，不助一臂之力，现在“左”已基本解决了（如前所述，这种估计是错误的），你们发言了，你们安的什么心？是不是想利用困难、错误发难？

第五，7月21日张闻天的三小时发言引人注目，系统而有理论深度，切中要害。而事又凑巧，这年4月，张闻天作为外交部副部长去波兰华沙出席华沙条约缔约国和社会主义国家外交部长会议，彭德怀则率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代表团访问东欧各国。为了节省费用，张闻天与彭德怀同乘一机飞往华沙。在庐山会议上，他们两人的住处又是斜对面，中间只隔一条石级，相距五六十米远，一出门就相见，早晚散步时常交谈，两人思想一致。彭德怀把给毛泽东的信送出后，又让秘书将提纲送给张闻天看。这就引起毛泽东的怀疑，把张闻天说成陷入军事俱乐部，是文武合璧，是旧病复发。

第六，赫鲁晓夫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还想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搞联合舰队，企图控制中国。彭德怀访苏时，赫鲁晓夫又故意抬高他，说他是国际英雄。庐山会议正是彭德怀访苏归来后开的。毛泽东由此疑心彭德怀的万言书与赫鲁晓夫有关。在8月1日会上，毛泽东说：彭德怀历来要用你的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有各种原因，未得到机会。这次从国际取了点经（不能断定）。彭德怀解释说：出国实在不想去。毛泽东插话：“闻了人家

对大跃进、公社看法的气味”。在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和党中央进而无根据地指责彭德怀“里通外国”。

前面已说过，从苏共二十大以后，尤其是反冒进以后，毛泽东就感到党内不太平，有分裂的可能，对彭德怀存有戒心。他怀疑党内有“鬼”。他在8月2日会上讲：去年八大二次会议上我就说过，危险无非是二，一世界大战，二党的分裂。当时还没有显著迹象，现在有这种迹象。庐山会议上种种情况在毛泽东的头脑中所引起的疑问，很容易把彭德怀当作“鬼”。可当时的彭德怀也好，张闻天也好，都不了解毛泽东的心态。以为毛泽东还像延安时期和建国初期那样虚心听取意见。所以，他们对毛泽东对他们的态度是没有想到的。

总之，庐山会议的发生是复杂的，是诸种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即使没有彭德怀7月14日的信，类似的会议在以后迟早会发生。因为在党内和中国社会里存在着产生这类斗争的“左”的思想基础。把庐山会议错误批判彭德怀等同志的责任仅仅归结为毛泽东个人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庐山会议错误地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定为反党集团，罢了彭德怀的国防部长的官，撤了黄克诚的总参谋长、张闻的外交部副部长、周小舟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之职，但还保留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罢官后，彭德怀向毛泽东作了三条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不做反革命；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自杀；今后工作是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罢官后，彭德怀先在北京西郊挂甲屯吴家花园读书、学习，继续思索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后来，又回故乡作了些社会调查。

到了1961年，无情的现实证明：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把彭德怀等同志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并在全党开展反右倾是错误的。但毛泽东和中央仍然坚持庐山会议批彭德怀是对的。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讲：庐山会议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展开这场斗争是不是只是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从彭德怀同志的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问题不在这里。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在反对高、饶集团的时候，没有把他提出来。他是高饶的余孽，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所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说：到底是高、饶联盟呢，还是高、彭联盟呢？恐怕应该是彭、高联盟。更主要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刘少奇认为，彭德怀同志阴谋篡党，这就是庐山会议要展开那场斗争的根本原因。刘少奇这些话当然不只是他个人的意见。但他的辩解是无力的。庐山会议批彭德怀无疑是由彭德怀7月14日的信引起的，当时把信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纲领。刘少奇的辩白等于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意见没有错误，批他是因为他想篡党。而所谓篡党，同样也是捕风捉影的事。

1962年6月，彭德怀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八万言的长信，一面从严检讨，一面澄清历史真相，批驳不符事实的指责。表明“不是什么‘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野心家’，‘阴谋家’，‘蓄谋已久的篡党分子’”，并无所谓“反党小集团”，也无“里通外国”。他希望中央在“平反甄别”错案时解决他的问题。在八届十中全会上，他的信被当做“翻案书”打了回来。毛泽东讲：彭德怀的案不能翻。

后来，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庐山会议的斗争的认识有变化。刘少奇在1964年7月2日和7月9日两次讲话中说：庐山会议犯了个错误，那个时候应该继续反“左”，不应该反右，结果反了右，中央要负责。1965年9月11日，中央派彭真同彭德怀谈话，说明中央准备派他去西南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彭德怀没有立即答应，9月24日给毛泽东写了信。毛泽东收到信后，“高兴得睡不着觉”。第二天，9月25日，就同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周恩来因外事活动没有参加）一起约见彭德怀。毛泽东说：“现在要建设战略后方，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是适当的，将来还可带一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对庐山的争论，毛泽东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让历史去做结论吧！”又说：“彭德怀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时，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诚心诚意的，对老彭的看法应当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一分为二”。毛泽东列举了彭德怀在历史上的主要功绩，说：“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一定要否定一切呢？”谈话进行了五个小时，并共进午餐。彭德怀接受了任命，在三线积极工作。他有自知之明，不出头露面。1966年4月，在成昆铁路通车典礼上，当时的三线总指挥李井泉和另一位副总指挥程子华坐在主席台上，而这位老彭却坐在群众之中。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彭德怀横遭迫害，骇人听闻，最后含冤屈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11月举行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彻底平反，洗清了多年的沉冤，恢复了他应有的荣誉。

庐山会议给彭德怀造成了悲剧，也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造成了不幸。庐山会议的后果：一是“左”倾错误不仅没有纠正，反而愈加严重，二是全党中开展了反右倾运动，把相当一部分（约三百几十万）坚持实事求是的干部、党员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党内民主遭严重破坏；三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进一步升级，将阶级斗争由党外开始转到党内；四是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进一步发展。

#### 四、“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是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为《哲学小辞典》所起的书名。他为这小辞典写了前言，其中说：“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在这里印出《哲学小辞典》中的一部分，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读哲学的兴趣。尔后可以接着读全书。至于读哲学史，可以放在稍后一步。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三方面打败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思想方面，即理论方

面，建议从哲学、经济学两门入手，连类而及其他部门。”毛泽东这里所讲的经验主义指谁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彭德怀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建议读哲学，批经验主义的目的也是很清楚的，那就是为了打败所谓的“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

作为革命家、军事家的毛泽东，十分重视哲学，这是他的一个特点，也是一个优点。对错误路线、错误倾向，他不满足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批判，还注意从思想上、哲学上的批判。他对王明路线的批判就是如此，而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他认为同彭德怀的斗争也是一次路线斗争。所以对彭德怀的批判也应如此。

在8月1日常委会上，毛泽东认为：彭德怀事务繁琐，事务太多，读书少，世界观是经验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彭德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基础不懂，经验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敌对体系。如果承认是经验主义，那就是同马克思主义敌对，是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毛泽东讲彭德怀是经验主义，看来主要是认为彭德怀读书少，缺少理论。他对彭德怀说：“你出身劳动人民，感情站在革命方面，对群众有感情。问题是经验主义。”彭德怀也承认：“经验主义肯定有，靠自己几十年经验办事。”这里所说的经验主义，明显是指唯物主义的的经验主义，而不是唯心主义的的经验主义。

在8月11日的会上，毛泽东又说：“讲讲世界观、人生观。人生观这个词，在外国书上看得很少。中国人喜欢说人生观，其实世界观、人生观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在一部分同志中，这个问题几十年来没有解决，自己也不愿意解决，就是说，他们是经验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还有个方法论，它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有些同志讲话只讲方法论，不讲世界观。这就是讲历来犯错误的同志，据我观察，以及中央常委和他们交换意见的结果，他们的世界观、方法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是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的，而是主观唯心论，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论。从外国流派来说，是列宁所批判的马赫主义。”“历来犯路线错误的人，都是部分的、大部的或者是全部的主观唯心论。所以难以改造，要改变他们的世界观方法论。”“为什么从这谈起，因为历来一讲到政治问题都不讲世界观。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宇宙观，不谈不行。一切要从这里开始。”

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也说：“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思想方法是资产阶级的经验主义和唯我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思想方法。”

这里所讲的彭德怀等人犯的经验主义，已不是唯物主义的，而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但毛泽东没有做具体的分析，指出它的表现之所在。

彭德怀在工作中存在有经验主义（唯物主义的的经验主义），这是彭德怀本人也承认的。但这并不能说，毛泽东批彭德怀的经验主义批对了。毛泽东批彭德怀的经验主义批错了，这是肯定的。可我认为，毛泽东提出的“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的判断却是正确的。延安整风，虽然也批经验主义，但重点是批教条主义。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教条主义者缺乏经验主义者的合作就不易流毒全党，而教条主义被战胜以后，经验主义更成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但中共“七大”后，并没有批判经验主义。1948年5月，毛泽东在《1948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中提到“必须反对经验主义的方法”。但当时忙于

战争、土改，无暇顾及批判经验主义。所以毛泽东讲“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这是符合历史的。由于没有批判经验主义，所以党内经验主义在滋长，成了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不过，毛泽东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在大跃进、人民公社问题上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不是彭德怀，而正是他本人。

毛泽东在大试验中，夸大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夸大了精神、上层建筑的作用，夸大了生产关系的作用和阶级斗争的作用，这些都是唯心主义性质的。他对政治、经济形势的分析也是严重脱离实际的。这也是无可置疑的。从认识论根源上，我认为大试验的错误与他思想上的经验主义有密切关系。

综本章所述，毛泽东的经验主义主要表现为：

（1）不了解现代化经济建设的特殊性，企图用解决军事问题、政治问题的速度在较短的时间里来解决经济问题。

（2）企图用搞革命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方式来搞现代化经济建设，将革命时期的大搞群众运动的经验绝对化。

（3）企图用革命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理由是：过去二十二年的革命战争都取得了胜利，为什么现在不能用？

（4）对下面干部和群众提出的口号、指标，不作科学分析便加以肯定、推广，实际上当了下级和群众的尾巴。

（5）把群众中一时的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如吃饭不要钱）误认为共产主义的萌芽，把假象、现象当成了本质。

（6）习惯于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党内矛盾，把党内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认识，不加分析地视为阶级斗争的反映，视为两条路线的斗争。

（7）将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公式绝对化，不能实事求是看待工作中的成绩与错误。

（8）片面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忽视现代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研究，以至闹出钢产量一年之内翻一番和共产主义即在眼前等大笑话。

（9）光凭个人经验、直觉来决策，对提出的任务和目标不进行科学的理论分析和作可行性论证。

（10）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错误除了经验不足之外，另一很重要的原因是全党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准备不足。毛泽东往往带着自己的经验去理解社会主义。

总之，毛泽东一方面将自己的经验绝对化，用旧经验来解决新问题，另一方面，在贯彻群众路线过程中对群众的意见、要求、情绪缺乏全面地科学地加工制作，往往为表面的现象、甚至假象所迷惑。毛泽东的经验主义、党内各级领导干部中的经验主义，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的经验主义，而不是唯心主义的的经验主义。正因为毛泽东思想上有经验主义，导致他主观与客观相分离，犯有主观主义；也正因为犯有唯物主义的的经验主义，所以他自以为是坚持了群众路线，坚持了唯物论，自以为代表了群众。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毛泽东在1958年一边讲尊重唯物论，尊重群众，而实际上却脱离了辩证唯物论，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

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虽然提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但实际上没有批经验主义，更不会批实际工作中存在的真正的经验主义。在此以后，党内的经验主义继续发展。经验主义依然是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重要认识论根源。时至今日，纠正和克服领导工作中的经验主义仍然是思想战线上一个紧迫的

重要任务。

## 第五节 《读 政治经济学 谈话》十年经验初步总结

### 一、读书的建议与活动

如前所说，毛泽东和全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犯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准备不足。关于这一点，毛泽东本人也多多少少地感觉到了。为了纠正“共产风”，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提出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同时也提出，将来有时间，可以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八届六中全会上，他又专门谈了“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再次要求党内干部读上面提到的三本书。他说：“拿出几个月的时间，各省要组织一下，为了我们的事业，联系实际研究理论问题，目前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毛泽东提出读书，反映了他想提高全党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水平。

在1959年庐山会议开会的第二天（7月2日），他又号召读书。他说：“有鉴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应当好好读书。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政治经济学》第三版，时间三至五六个月或一年。还说：现在有些人是热锅上的蚂蚁，要让他们冷一下。去年有一年的实践，再读书更好。学习苏联经验。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是比较好的办法。他认为这本书是有缺点，但比较完整。他为这次会议拟定的19个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读书”。在7月23日讲话的最后也提到：要学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要深入研究，否则事业不能发展，不能巩固。在8月16日，他提议读两本书，其中一本就是《政治经济学》。不过在庐山会议上以及在庐山会议后的一段时间里，并没有认真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因为那时各级干部忙于批判右倾机会主义。

这年11月，刘少奇去海南岛休养，他利用休养时间，读《政治经济学》，并邀请了两位经济学家王学文、薛暮桥一起同读。参加读书活动的还有陶铸、林李明、林树兰和王光美。时间从11月11日至11月22日。在讨论过程中，刘少奇讲了他的学习心得（存有记录要点）。薛暮桥将刘少奇在讨论会上的发言归纳整理成18个问题。

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毛泽东也组织了一个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小组，参加者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这个读书小组的活动随毛泽东开始于杭州，后到上海，最后结束于广州。1960年1月，毛泽东在上海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号召领导干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说：我有一个建议，中央各部门的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组织起来读《政治经济学》，先读下半部（社会主义部分）。现在一月差不多还有半个月，还有二月、三月、四月，以第一书记挂帅，组织个读书小组，把它读一遍，至于上半部（资本主义部分），也要定个期限。今年主要精力恐怕先读经济学。国庆节以前，把苏联经济学教科书读完。读的方法是用批

---

该书为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1958年出版，1959年人民出版社出了中文版，全书分上下册，上册为资本主义部分，下册为社会主义部分。

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这么一个建议，如果可行，就这么作。

就在这个月。李富春在上海组织国务院各工业部长和上海市委负责同志读《政治经济学》，李富春还请薛暮桥传达了刘少奇在海南岛读书的谈话要点。同年2月，周恩来在广东从化与国务院各部委和中南局的领导同志组成读书小组，学习同一本书，并请胡绳传达了毛泽东在读书时的谈话要点和印发了刘少奇在读书时的谈话要点。

毛泽东和读书小组的成员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逐章逐节地边读、边议。在议论过程中，毛泽东结合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发表了评论、意见、想法，参加读书小组的同志将毛泽东的谈话进行了整理。现有两个本子：一个是《读 政治经济学 教科书的笔记》。这个本子按教科书的顺序记录了谈话的内容，并依据内容加上了小标题。周恩来曾将这个本子送毛泽东审阅过。1960年3月，周恩来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说，“送上胡绳同志在我们学习时作辅导用的笔记二本。这里头的话，都是主席在阅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讲的，现用笔记形式写出。我们已告诉参加学习同志，只能在省、市委书记和各部、委党组中学习使用，不下传。”事实上，在六十年代初，许多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已都在传抄。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就更广为流传。另一个本子是《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的论点汇编》。这个本子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内部印行过。这个本子完全打乱了谈话前后的次序，按内容作了分类归纳。这个本子有明显的缺陷：一是脱离了教科书，使读者不了解毛泽东是针对什么而讲的，二是删去了不少内容（主要是在编者看来不够正确的一些话）。当然这个本子也增加了若干《笔记》所没有的论点。

毛泽东的谈话，内容极为丰富，涉及经济、哲学、政治、科学社会主义等，既有对教科书的评论，又有对中国和苏联经验教训的总结。但总起来看，毛泽东谈话、议论的中心是着眼于从理论上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谈话可以说是对建国后十年历史经验的初步总结。谈话不是正式场合的讲话，因此比较随便，无拘无束，从中更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一些问题的思考过程和他所感兴的问题，他的思想倾向是什么。

## 二、世界革命中心转移问题

为什么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俄国取得胜利？教科书说：这是由于“俄国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毛泽东对此作了发挥。他说：从过去的革命历史来看，革命的中心是由西方向东方转移。18世纪末革命中心在法国，当时法国成了世界政治生活的中心。19世纪中叶，革命中心转到了德国，无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产生了马克思主义。20世纪初叶革命中心转到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20世纪中叶，世界革命中心又转移到了中国，当然以后革命的中心还会转移。

关于世界革命中心转移的论点并不是毛泽东提出的，而是由考茨基在1902年提出的。考茨基在《斯拉夫人与革命》一文中说：现在可以认为“革命中心正从西方移向东方。19世纪前半叶，革命中心在法国，有时候在英国。到了1848年，德国也加入了革命民族的行列……新世纪开始时发生的事变，

使人感到我们正在迎接革命中心的进一步转移，即移向俄国。”列宁也主张世界革命中心转移的论点。在十月革命后，列宁依然肯定考茨基的上述论点，并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幼稚病》等著作中引用了考茨基的话。在二三十年代，共产国际认为中国是东方革命的中心。斯大林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曾有过看法，1949年7月，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访苏。斯大林向刘少奇承认他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有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成熟的党，中国的干部是成熟的干部，有水平。在宴会上，他说：“世界革命中心从欧洲移到苏联，以后会移到中国，希望小弟弟超过老大哥，我为此祝酒。”刘少奇听了非常紧张，不肯接受祝酒。斯大林解释说：“世界革命中心东移，你们的历史责任加重了，这是我们衷心的愿望。”刘少奇还是不接受，说：“老大哥还是老大哥，小弟弟还是小弟弟。”苏联同志都劝说：“弟弟赶上和超过老大哥，这是规律，斯大林的祝酒应该接受。”推让了半小时，刘少奇还是没有喝酒。苏联同志感到茫然。刘少奇不接受斯大林的祝酒，反映了刘少奇的谦虚、谨慎的个性。可以设想，若是毛泽东的话，那他一定会在客气一番后愉快地接受这一祝酒。

考茨基、列宁、斯大林关于世界革命由西向东转移的思想，毛泽东是了解的。他在读教科书时关于世界革命中心的谈话与考茨基、列宁、斯大林一脉相承。毛泽东认为：20世纪中叶，世界革命的中心转移到了中国。这一看法，同对赫鲁晓夫和苏共的看法的变化有关。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有的共产党对苏共不满，希望中共出来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头。毛泽东不赞成，并在发言中突出地讲了社会主义阵营应以苏联为首，别人没有资格当头，批评有的人不承认以苏联为首。但此后不久，他认为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不革命了，而中国在国内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在国际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他自认为，到了20世纪中叶中国成了世界革命的中心。不言而喻，他则成了世界革命的领袖。不过，“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的话在“文化大革命”前没有公开讲过。在“文化大革命”中则通过广播、报刊，反复加以宣传。有的理论工作者也根据世界革命中心转移到中国来论证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继列宁主义之后的新阶段、第三里程碑。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虽然多次批评宣传工作中的“自吹自擂”，但他没有否认中国是世界革命中心这一观点。1968年5月16日，毛批评了在一个文件中用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这种提法，指出“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提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冷静下来思考，不再讲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了。

世界革命中心转移的论点对不对？我以为是对的。世界历史的发展如同一切事物发展的一样是不平衡的。有时候这个地区、民族、国家走在世界历

---

见《列宁选集》第四卷第179～180页。

师哲：《陪同毛泽东访苏》，原载《人物》1988年第5期，引自《毛泽东轶事》第332页。师哲是当时的翻译。

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1958年5月17日下午）上说，1949年7月，刘少奇同志率我党代表团到苏联。斯大林在宴会上举杯祝贺中国将来要超过苏联。刘少奇同志说：“这杯酒我不能喝，你是先生嘛，我们是学生。我们赶上你，你又前进了。”斯大林说：“不对，学生不超过先生，那还算什么好学生，一定要喝。”僵了一二十分钟，最后刘少奇同志还是喝了。先生教了学生，学生赶不上先生就不争气。师高弟子强，我们不要狂妄。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也不要自卑感，妄自菲薄。要破除迷信，把自己放到恰当的地位。

史的前列，而在另一时候，另外的地区、民族、国家走在前列。在古代，巴比伦、埃及、中国、印度走在前列，在中世纪，中国继续领先。到了近代，欧洲崛起，英国、法国、德国先后走在前面，本世纪初，革命中心移到俄国。继十月革命之后，又发生了中国革命并取得了胜利。所谓世界革命中心，则不过是指在某一历史时期内。某一国家的革命对世界历史的影响要比别的国家大些，而决不是说，某一国家成了世界革命的领导者，更不是说其他国家的革命都要服从于世界革命中心的领导与指挥。从这种意义上讲，世界革命中心由西向东转移的论点是符合近现代世界历史发展的实际的。我认为，不是在本世纪中叶，而是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成了世界革命的中心。1957年以后，中国在世界政治形势格局中的地位虽然有上升，到了七十年代，成了美、苏、中三足鼎立之势，但中国并不是世界革命中心。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处于曲折之中。同时，中国革命胜利后，虽然亚非拉地区出现了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高潮，许多国家纷纷独立，旧的殖民主义体系崩溃。但总的看来，朝鲜战争结束后，世界处于和平发展时期，并没有出现世界革命的形势，更没有形成中心。所以我认为，毛泽东提出的在本世纪中叶世界革命中心转移到中国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这是一种自大思想的表现，不恰当地估计了中国在世界革命中的作用。

### 三、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经验的普遍意义

苏联教科书在谈到中国资本主义所有制变化为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时，只讲了对民族资本的改造，而没有讲对官僚资本的没收政策。毛泽东批评教科书讲得不全面。他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比重是8：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立即没收了官僚资本，把占全国工业、运输业固定资产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转变为全民所有制，这就是把中国的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他又指出：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反对官僚资本就是反对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性质，一方面反官僚资本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教科书把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改造资本主义当成一种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形式。毛泽东认为，教科书的意思实际上把我国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来改造民族资本主义，当成例外的、个别的、特殊的经验，否定这种经验的普遍意义。接着毛泽东阐述了中国经验的普遍意义。他说：西欧各国和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高，少数的垄断资本占统治地位，但同时也还有大量的中小资本家。据说美国的资本是集中的，又是分散的。在这些国家革命成功以后，垄断资本要没收，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中小资本家也一律没收吗？是不是也要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来改造他们呢？他还说：我们的东北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发展很高的地区，以上海和苏南为中心的江苏省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发展很高的地区，既然我国的这些省区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那么世界上同我们这些省份类似的国家为什么不可以实行这个政策呢？他指出：我们对于民族资本主义的改造经过三个步骤，即加工定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就每个步骤来讲，也是逐步实行的。这种办法使生产没有遭到破坏，而且在改造过程中有所发展。他认为，我们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是有许多新鲜经验的，公私合营以后，给资本家定息，就是一项新经验。

毛泽东对中国改造民族资本主义的经验具有普遍意义的阐述是正确的。

因为，资本主义无论怎样发达，垄断资本无论怎样集中，但总有大量的中、小资本的存在，还有更多的人持有少量的股票。在没收垄断资本之后对中小资本实行赎买，进行和平改造，给一般的股票持有者以定息，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完全必要的。

#### 四、社会革命与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

列宁讲：“社会主义的唯一的物质基础，就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根据列宁的这一思想，苏联教科书论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意义及其本质。其中写道：“走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国家面临着这样一项任务，以加快发展大工业（对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的办法，最迅速地消除资本主义统治的这些后果。”教科书在论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时说：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社会主义能在国家工业化实现以前，就在所有制方面（包括农村在内）取得胜利，是因为有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存在，有苏联这样高度发展的工业国家的援助。毛泽东认为，这话讲得不对。接着毛泽东谈了对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的关系、社会革命与发展生产力的关系的看法。

他说：一切革命的历史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的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还要继续进行生产关系的改造，进行思想改造。他又说：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力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拿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来说，先是简单协作，然后发展为工场手工业，这时已形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是手工工场还不是采用机器生产。在英国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才进行工业革命，德、法、美、日也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以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

毛泽东又作了进一步的概括：首先造成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在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以前，不存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中已经初步成长起来。在这一点上，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有所不同。但是，这个一般规律，对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都是适用的。

毛泽东所作的概括对吗？“文化大革命”后有人认为这是上层建筑决定论。我以为这种评论欠妥。因为毛泽东承认，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由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有了这一点，就同历史唯心论划清了界线。在一定的生产力（不是充分发展了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再大力发展生产力，这确实是历史的事实，是一般规律。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从毛泽东的谈话的总的倾向看：他过分强调上层建

筑、生产关系对发展生产力的反作用。如果把他的话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论述相比较，不难发现他们之间的重大差别。马克思主认为，只有当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社会革命的时代才到来，“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他们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未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并不否认社会革命的作用，但在理论上，他更注重的是生产力，注重变革生产关系必须有生产力作为先决的前提。毛泽东承认中国生产力落后，一心想加快生产力的发展，但他主要是想通过新的生产关系，通过上层建筑中的革命来推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他忽视了生产力发展自身的规律，忽视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其他因素。革命可以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无可否认的。但第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是有限度的；第二，变革生产关系必须以现实的生产力为前提，离开现实的生产力，人为地过早地改变生产关系，不仅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而引起生产力的破坏，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看来，毛泽东没有对“共产风”、人民公社化运动作理论上反省。

## 五、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

苏联教科书受斯大林形而上学的影响，认为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各族人民的友谊、苏维埃爱国主义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对此，毛泽东说：只承认团结一致，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内部有矛盾，不承认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样一来，矛盾的普遍性这个规律就被否定了，辩证法就中断了。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社会总是向前发展的，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因为不一致才有团结的任务，才需要为团结而斗争，如果总是十分一致，那还有什么必要进行团结的工作呢？毛泽东又说：教科书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矛盾，也讲要克服这些矛盾，但是不承认矛盾是动力。教科书承认让会主义生产方式是在新的和旧的、新生的和垂死的、进步的和落后的之间的斗争，在克服各种矛盾和困难中发展。教科书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内部斗争的论述，讲得有些生气，但毛泽东认为，教科书把批评与自我批评说成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强大动力的说法不妥当。矛盾是动力，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解决矛盾的方法。

毛泽东强调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的思想是好的。矛盾是对立面之间的又斗争，又统一。光讲斗争不行，光讲统一也不行。斗争的目的是为了达到统一。“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的说法好。但 1957 年以后，毛泽东在批评无矛盾时又过分注重斗争，忽视了统一。

毛泽东指出：当作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科学。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矛盾的发展和转化，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还是矛盾，怕讲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斗争，说明问题不从分析矛盾出发，这是教科书的最大缺点。他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

向前发展的基本动力。从这种观点出发，他提出：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与不平衡、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平衡与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这本书提到了国家，但没有加以研究，这是这本书的缺点之一。当然，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研究大发展了，就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了；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阶级斗争论、国家论了。毛泽东的这一见解是正确的，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联系生产力、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意识形态）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及其必然要灭亡的历史过程的。列宁称生产关系为社会的骨骼，上层建筑为社会血肉，《资本论》则把资本主义社会和盘托出。从六十年代以来，从经济学角度研究生产力，已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生产力经济学。

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多种因素的系统，其中有物质的因素，有精神的因素，有客观的因素，有主观的因素，而最基本的、最基础的无疑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两对矛盾，我们已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目前进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及其他各个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正确地解决这两对矛盾。

## 六、政治挂帅和物质鼓励

分配是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一问题。毛泽东在读书过程中发表了许多议论，其中有正确的，也有不够正确的，甚至是错误的。

苏联教科书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列宁关于物质利益的原则，注意使劳动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自己的劳动成果，注意物质刺激的作用。教科书有的提法不够准确，如，把个人物质利益说成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强大的动力，但总的意思是要贯彻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毛泽东认为，教科书关于分配问题写得不好，需要重写。他的主要观点如下：

（一）教科书把消费品的分配当作发展生产的决定性动力，这是一种分配决定论的观点。按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分配首先是生产条件的分配，生产资料在谁手里，这是决定性的问题。生产资料的分配决定消费品的分配，教科书不讲生产资料的分配，只讲消费资料的分配，并把消费品的分配当作决定性动力。这是对马克思上述正确观点的一种修正，是理论上的一种很大错误。我认为，苏联教科书注重分配对生产的反作用是对的，并不是什么分配决定论。在所有制问题解决以后，生产关系中的分配问题突出出来了。这一点，刘少奇在1957年就多次说过：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大量地表现在分配问题上”，应花很大的力量去注意解决分配中的问题。要是沿着这一思路走下去，就可能不会发生刮共产风。看来，毛泽东对这一问题有所忽视。他感兴趣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对苏联教科书的批评明显地反映了他对分配的作用缺乏应有的认识，反映了他对

物质利益原则的不够重视。这是他晚年的重要失误之一。

（二）毛泽东在理论上并不否定社会主义应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并不否认要实行“物质鼓励”，但他在谈话中反复批评教科书有关“物质利益”、“物质刺激”的论述。他说：这本教科书很多地方一有机会就讲个人物质利益，好像总想用这个东西来引人入胜，钱能通神。这本书没有体系，可是在这点上却有体系。他们说，这个问题和个人物质利益有关，那个问题也和个人物质利益有关。似乎离开了个人物质利益，就什么事也办不成。试问达尔文的进化论是物质鼓励出来的吗？这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原则，反映了他们相当多的经济工作人员和领导人员的精神状态，也反映了他们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毛泽东认为：教科书片面讲物质鼓励，结果，在他们那里，唯物主义者就成为不战斗的了。又说：人不一定天天、月月、年年都需要物质刺激的，在困难的时候，减少一些物质刺激，人们也在干，而且干得很好。教科书把物质刺激片面化、绝对化，不把提高觉悟放在重要地位。他们不能解释同级工资中为什么人们的劳动有几种不同的情况。比如说，都是五级工，可是有一部分人干得很好，有一部分人干得很不好，还有一部分人干得大体上还可以。即使承认物质刺激是一个重要的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总还有另一个原则，在政治思想方面精神鼓励的原则。

毛泽东还指出：教科书在讲物质利益时常常只讲个人物质利益，有点偷天换日的味道。他们不讲全体人民的利益解决了，个人的利益也就解决了，他们所强调的个人物质利益，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教科书把个人物质利益原则片面化了，绝对化了，一定要出毛病，一定会走向自己的反面。他认为，强调个人物质的倾向是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队伍中的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表现。历史上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家英勇牺牲，他们也不是为个人的眼前利益，而是为他们这个阶级的利益，为这个阶级的后代利益。他提出：讲物质利益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在分配问题上，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不能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个爱人、一座别墅，一辆汽车、一架钢琴、一台电视机”这样为个人不为社会的道路上去。

毛泽东主张：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他认为：苏联现在强调的是个人的、暂时的、局部的利益，不强调集体的、长远的和全局的利益。他还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不能只讲个人消费，不讲社会的消费，社会主义不搞集体福利事业，还成什么社会主义？

（三）苏联特别强调个人物质利益的原因何在？毛泽东认为：斯大林时代过分强调集体利益，不注意个人所得，过分强调公的，不注意私的；现在走到了反面，又过分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大注意集体利益，这样强调下去，又一定会走到反面。毛泽东用辩证的观点来分析公私关系，他说：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从来讲公私兼顾，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又说先公后私。个人是集体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毛泽东的这一分析，值得我们注意。在《论十大关系》等著作中，毛泽东吸取了苏联的教训，注意到兼顾劳动者个人的利益。但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他强调发扬共产主义风格，结果平均主义泛滥，大锅饭盛行，破坏了按劳分配原则的贯彻。

毛泽东在批评把物质刺激绝对化的同时还提出：彻底实行按劳分配，会带来个人主义的危险。基于这种认识，他不赞成“计件工资为主，计时工资为辅”的工资形式，主张以“计时工资为主，计件工资为辅，计时加奖励”的工资制。毛泽东的这一看法，脱离了当时中国的实际。实行何种工资形式，一要看生产现代化的水平；二要看劳动者的觉悟，不可一概而论。毛泽东看到了计件工资的某些不足，但他急于取消计件工资，结果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滋长了平均主义。

总起来说，在分配原则上，毛泽东的基本观点是：把政治挂帅和物质鼓励结合起来，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从原则上讲，这一思想没有问题。但从倾向上看：他在强调政治挂帅时，忽视了物质利益原则，他对教科书的批评不尽恰当。

## 七、不断调整人与人的相互关系

斯大林认为，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所有制、分配、人与人的相互关系。毛泽东赞成此种说法。他认为：在所有制问题解决后，生产关系中人与人的关系突出出来了。基于这种认识，在1956年以后，他较多地注意人与人的关系方面的问题。他在1958年就多次讲过：现在所有制和分配改变了，人与人的相互关系未变。这次整风，就是为了解决相互关系。毛泽东所说的“相互关系”未变主要是指人与人之间依然存在着不平等的关系（如官僚主义等）。他在读苏联教科书时进一步发挥了上述思想。

他说：关于在生产和劳动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教科书中除了“同志式的合作关系”这样一句空洞的话外，根本没有接触到实际问题，没有在这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制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制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是一定所有制下的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在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所有制的变革，在一定时期内总是有底的，总是不能没有限度的。例如，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之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的性质总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可是在一定时期内，即所有制相当稳定的时期内，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相互关系，却不能不是不断变革的。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我们对全民所有制的企业采用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党的领导、工人群众和技术人员相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变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样一套。毛泽东认为，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他企图通过不断调整人与人的关系来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推动生产的发展。

毛泽东关于所有制问题解决后，最重要的是如何管理的问题的论断是正确的。但是他把管理问题仅仅看作是企业内部的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就片面了。应当说：管理问题，不仅包括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而且还包括国家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与个人的关系问题，分配问题，各种具体的规章制度问题等，而其中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将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利益结合起来的问题。企业管理是一门很大的学问。

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毛泽东强调的重点是领导人员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以平等的态度待人。他说：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是自己的，而是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

使工人不愿意自觉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在一个企业内，如果人与人关系不和谐，领导与群众不齐心协力，工人心中有气，那势必挫伤群众的积极性，生产搞不好。毛泽东总结出来的两参（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一改（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的制度是好的管理经验。国外的一些企业家也吸取了我国的经验，吸收工人参加管理，奖励工人提合理化建议，以调动工人积极性，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 八、“大跃进”问题

教科书依据列宁、斯大林的思想指出，“工业化的速度对苏联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并从苏联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阐述了高速度实现工业化的必要性。这很自然地引起毛泽东的共鸣。他说：“现在我国的速度问题也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原来工业越落后，速度问题越尖锐，不但国与国之间比较是这样，就是一个国家内部，这个地区和那个地区比较起来也是这样。”毛泽东认为教科书讲了政治环境要求高速度，没有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许可高速度，这是一种片面性。他说：如果只有高速度的需要而没有可能性，那怎么能高速度呢？毛泽东是战略家，他还从人类历史长河中看大跃进：“人类历史一百万年中，资产阶级的三百年，是一个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大跃进？”确实，人类社会发展的速度与时间的平方成正比，随着历史的前进，其速度也愈来愈快。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速度要高于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近几年苏联东欧发生的剧变不过是历史长河中一个小小的短暂的插曲。若为小小的波折而悲观，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这是一种短视。

十月革命后列宁曾说过，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但取得胜利后，要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则比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困难。根据俄国和中国的经验，毛泽东不同意列宁的观点。他说：其实经济越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愈容易，而不是越困难。人越穷，越要革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业人数比较多，工资水平比较高，劳动者受资产阶级影响很深，在那些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看来并不容易。这些国家机械化程度很高，革命成功后，进一步提高机械化，问题不大，重要的问题是人的改造。在东方，像俄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原来都是落后的，贫穷的。现在不仅社会制度比西方先进得多，而且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也比他们快得多。他又说：我国的资产阶级只有三代，而英、法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有了几十代，他们资产阶级发展的历史有二百五十年至三百多年，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影响到各个方面，各个阶层。因此在西方各国进行革命和建设很困难。

毛泽东的上述说法对吗？应当说，虽有合理的因素，但总体来说是错误的。苏联、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较容易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事实。但是要巩固这一制度却并不容易。这里毛泽东忽视了：第一，落后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在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以及整个社会生产的现代化上会遇到极大的困难。毛泽东对现代化的艰难性估计不足。在他看来，革命都成功了，建设还不容易。而实践的结果，革命不容易，建设更困难。中国现在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是特殊条件下的补课，而西方的无产阶级在

革命胜利后没有这一任务。第二，他只看到，中国这样的国家的资产阶级影响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要小，要浅，但他没有估计到中国的封建遗毒比西方要厉害得多，改造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不比肃清资产阶级的影响容易。

法国《快报》在评论中曾说：“穷是中国跃进的动力”。毛泽东对“穷是动力”的话很赞赏，说：“讲得很对。因为穷，就要干，要革命，要不断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在目前的情况下，越往西越富，革命也越困难。我们因为穷，人口那么多，东西那么少，这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就要有现在的这样一种干劲，这样一种朝气，而且一定要长久保持下去。”有的论者认为，后来“富则变修”观点是上述思想的发展，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国家变富，人民致富的历史进程受到了影响。我认为，这种推断很难成立。穷推动中国人民发愤图强，去干，去革命，去跃进，目的是为了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是为了使中国又富裕又文明，而不是保持一穷二白，让中国永远穷白下去。毛泽东确实讲过：将来富了，一定会发生问题。不过，他所说的发生问题，不是指变修，而主要是指骄傲自大，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变得停滞不前了。毛泽东的问题恰恰不在于怕富，而是要急于变富，急于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让全国人民过好日子。富了不一定变修，但富了有可能变修。如果只注意物质文明的建设，不注重精神文明的建设，其结果是不堪设想的。

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搞得快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得比较彻底”，“尽力肃清资产阶级的一切影响，破除迷信，力求使人民群众在各个方面得到彻底的解放”。因此，他认为，为了保持继续大跃进，“重要的问题是要把社会主义革命搞彻底，坚持反对资本主义影响的斗争”。他把革命看成推动大跃进的动力。所以他说，他“看到革命二字就高兴”。这也是他为什么始终注重阶级斗争、批判资产阶级的重要原因之一。

列宁讲：“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今天，为什么有人认为，资本主义优越于社会主义？原因很复杂，其中客观原因是现今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还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加快生产力的发展，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应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重要的任务。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毛泽东也有正确的论述。他说：资本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靠技术，社会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靠技术进步和政治。又说：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两者都是精神因素。当然，提高劳动生产率，除了毛泽东所讲三条之外，还有科学的管理，正确的分配政策等其他因素。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速度应当而且也可以比资本主义国家搞得快些。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速度究竟以多少为宜，这就需要实事求是。钢产量翻一番、粮食产量成倍增长，这是根本不可能的。经过1958年的高指标后，1959年，毛泽东稍为冷静一些。在《工作方法十六条》中说：每年增产百分之十是跃进，百分之二十是大跃进，百分之三十是特大跃进。庐山会议后又提出：农业每年增长超过百分之十五就是“大跃进”，工业每年增长超过百分之二十五就是“大跃进”。毛泽东的这种论断，既没有顾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是建立在对我国现有经济状况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带有明显的主观随意性。毛泽东认

为，经过 1958～1959 年的大跃进，1960 年仍将是生产大发展的一年。1960 年 1 月他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仍然说：现在有人不相信我们能够高速发展，到 1972 年钢产量达到一亿五千万吨，把世界各国都抛在后面。那时，看你相信不相信！资产阶级能够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实现大跃进！如果不能实现大跃进，还要共产党干什么！毛泽东的雄心可谓大矣。无产阶级能实现大跃进，这没有错，问题跃进的速度是否切合实际。如果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百分之十五，在目前状况下那就很可能是冒进，是欲速而不达。如果能在百分之十上下持续稳定发展那就很了不起。

无根据的大跃进遭到严重挫折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并没有放弃大跃进。刘少奇在 1962 年 1 月 27 日的讲话承认，过去我们对大跃进的解释，也有一些片面性。比如说，产量每年翻一番，或者每年增加百分之几十，才叫大跃进。对大跃进的解释，还是应该按照毛主席几年以前讲过的，就是要从一个历史时期来看。刘少奇说：大跃进不能就一个短时期的成绩来解释，比如说，不能就某年增加多少，或者减少多少来解释，而应该就一个历史时期内全国人民努力奋斗的结果来解释。所以，他认为，大跃进还应该继续作为我们全国人民努力奋斗的目标，应该坚持下去。1964 年 12 月，毛泽东在修改周恩来在第三届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增写了一大段话，对大跃进作了新的解释。他写道：“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亚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么？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做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毛泽东的这一番话有何等的气魄，读来令人振奋，令人鼓舞，不象有的人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面前直不起腰来，乞求西方资产阶级来帮助建设社会主义。但这是就战略而言的，是从历史的发展长河中来看而言的。就战术而言，就具体速度而言，不能盲目冒进，无根据地主观地决定增长速度，既反对冒进，又反对保守。但总的看，急性病是主要倾向。正确的方针应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这样看起来是慢，实际反而快，仍然可以说是“大跃进”。

## 九、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问题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共产主义有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在第二个阶段，即高级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他又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

期，这个过渡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认为：“过渡时期开始于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完成于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实现——建成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这种观点在斯大林时期就成了定论。建国初期，毛泽东和党中央也接受这一观点。1952年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渡时期”就是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但在1956年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并没有宣布过渡时期结束。在毛泽东的讲话和文章中，一方面认为我国的社会已是社会主义社会，另一方面同时又称我国还处于过渡时期之中。在人民公社成立后，我国理论界对“过渡时期”、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讨论。毛泽东在读教科书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马克思所说的过渡时期包括什么阶段，只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还是既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也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究竟怎样说法才对，要好好研究。

毛泽东本人对这一问题怎样看？他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有可能分成两个阶段：一是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这可以叫做下发达的社会主义；二是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即由比较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到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了后一阶段，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大为丰富，人的共产主义觉悟大为提高，就可以进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印的“谈话汇编”是这样写的：“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这两个本子的文字，意思略有出入，只好存疑。）照毛泽东的说法，他把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即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之间的整个时期都看作“过渡时期”，然后再把整个过渡时期，又分成两个小过渡，第一个过渡是由资本主义到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完成，这是不发达社会主义，第二个过渡，是由下发达社会主义到发达的社会主义的过渡。发达社会主义建成之日，就是共产主义开始之时。看来，毛泽东在这时也还没有一个固定的成熟的看法。他对我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上取慎重的态度。他认为我国只有实现了“四个现代化”，才能算社会主义建成。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早了。这表明，在他看来我国虽然进入了不发达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还没有完全建成。

按照毛泽东对“过渡时期”的理解，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而是一个过渡性的历史阶段或时期，因此，他批评将现有的各种社会关系、制度凝固化。苏联教科书引用联共十八大决议：由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解决了“完成农业集体化，彻底巩固集体农庄制度”这样一个极端困难的任务。毛泽东批评说：“彻底巩固”这几个字看了不舒服。任何东西的巩固都是相对的，怎么能彻底呢？如果自有人类以来，所有的人都不死，都“彻底巩固”下来，这个世界怎么得了？宇宙间，地球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发生、发展和死亡，都是不能彻底巩固的。毛泽东是辩证法的大师，“彻底巩固”的说法是不符合辩证法的，毛泽东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他承认，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生产关系，要巩固，但是不能强调过分。苏联在生产方面没有停顿，但是在生产关系方面可以说基本上停顿了。他又说：“一定

的社会制度，在一定的时间之内，需要巩固它。但这种巩固必须有一个限度，不能永远巩固下去，否则就会使反映这种制度的意识形态僵化起来，使人们的思想不能适应新的变化。”毛泽东否定“彻底巩固”，承认“相对巩固”。从理论上讲，是对的。但运用到实际问题上，他则忽视了相对巩固的重要性，急于不断变革，走向另一个片面性。

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建立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个不同的所有制的基础上。他批评苏联教科书只讲公有制两种形式的存在是客观必然的，没有讲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是客观必然的，批评教科书把两种公有制的形式说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说法。抽象讲，这也没有错。问题是在那时需要的是巩固刚刚建立起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而不是急于向人民公社过渡，更不是去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毛泽东对“彻底巩固”的批评，固然有符合辩证法的一面，但也反映出他对事物发展过程质的相对稳定性的认识不足，反映了他“左”的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倾向。可能是由于“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口号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之故，刘少奇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时批评“巩固社会主义秩序”的提法。他说：“如果不把社会主义当做过渡阶段，就容易把社会主义定型化（巩固社会主义秩序）”“把社会主义定型化，无冲突论，有形而上学味道。”这就更急躁了，连有相对的巩固也否定了。

苏联教科书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同共产主义利益相冲突的阶级和社会团体，所以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不需要通过社会革命完成的。毛泽东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但是不能说这不是社会革命。因为一种生产关系代替另一种生产关系，就是质的飞跃，就是革命。我国的个体经济变成集体经济，再从集体经济变为全民经济，都是生产关系方面的革命。由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转变为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也不能不说是生产关系方面的革命。毛泽东所讲的革命，已不是本来意义上革命，即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行动，而是泛义上的革命，即社会关系某一方面以至整个方面发生质的飞跃。依据对革命的这种理解，他认为，即使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要发展的，一定会出现新的阶段、新的目标，提出新的任务，也不是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一定会有从这一阶段过渡到另一阶段的革命，还有技术革命、文化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的阶段，因此也一定会有很多的革命。这些当然只是哲学家的预言了。

斯大林提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毛泽东认为斯大林没有能解决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和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问题。他自以为，中国解决了这一问题，人民公社是实现两个过渡的最好形式。历史证明：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不论是在今日，还是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还谈不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当今的迫切任务是如何巩固、完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问题。在过渡的条件还不具备、不成熟时所提出过渡的设想只能是一种带有空想色彩的假设而已。

毛泽东在读书过程中对建国以来的十年经验作了初步总结，发表了许多好的见解。不过，从总体看，这次读书与1958年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有很大不同。如果说1958年那次主要是为了纠“左”，借用斯大林来压活人，批评一些“左”得出奇的秀才和冒险主义者。而这次读书，

是在庐山会议之后，故很少见他谈纠“左”的问题。他的锋芒是在批右，批所谓的修正主义。他对 1958～1959 年的问题无多大认识。他说：“这两年我们做了大试验。”“大试验”的结果怎样？他没有直接回答，但从谈话中可看出：他是肯定的。他认为这一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已经解决，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人的斗争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一次很尖锐的革命，这表明，在读书时，他的头脑依然很热，没有冷下来。这样热的头脑，当然不可能对十年革命和建设进行冷静的、科学的分析与总结。这是我们在研究毛泽东读书谈话时必须注意的一点。

## 第六节 《读（政治经济学）谈话》中的若干哲学问题

毛泽东是哲学家，与他一起读书的秀才，有的是哲学家，有的对哲学也很熟悉，所以毛泽东在同读书组成员的议论过程中常常谈到哲学问题。因此，有必要对谈话中的若干哲学问题作一介绍。

### 一、哲学要为当前政治服务

这是读书笔记除补遗之外的最后一个标题。整理者把它放在最后，很可能是因为这是毛泽东在结束读书时说的。在此题之前，毛泽东谈了对教科书的总的看法和如何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想法。笔记的八个补遗，看样子是整理者后补加上的。

毛泽东说：任何哲学都是为当前政治服务的。资产阶级哲学也是为当前政治服务的，而且每个国家，每个时代都有新的理论家，写出新的理论，来为他们当前的政治服务。英国曾经出现过培根和霍布士这样的资产阶级唯物论者；法国十八世纪又出现了百科全书派这样的唯物论者；德国和俄国资产阶级也都有他们的唯物论者。他们都是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他们都是为当时的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所以并不因为有了英国资产阶级唯物论就不要法国的；并不因为有了英国的、法国的就不要德国的、俄国的。

紧接着，毛泽东又说：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也是更密切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对于我国来说，马恩列斯的书必须读，这是第一。但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的东西是不行的。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抗日战争初期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时代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毛泽东的这些话不只是在一般地谈论哲学与政治的关系，而是有感于当时中国的理论界落后于时代的需要而发的。所以往下他便说：现在我们已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毛泽东的这些话，一方面反映了他想在新的时期写出新的论著的意向；另一方面也可看作是他对理论界的期望，鼓励理论家们去创新、去探索，去写出适合时代需要的新论著。

毛泽东是一个欢喜创新、永不满足的人。1953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出版，中央准备组织干部学习。但他说：《毛选》都是过去历史上的东西，还是要学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他的秘书田家英在编辑《毛泽东选集》时发现毛主席不愿再看自己多年前的著作，感到主席的兴趣似乎变了，他的注意力完全转向了新的事物。1957年，他提出辞去国家主席职务，重要的缘由之一是想集中精力研究理论，他想在晚年于理论上还要有新的建树，放新的光彩。1961年1月23日，毛泽东在同何其芳等人谈话时说：“第一次大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是因为缺乏舆论准备。抗日战争时期，有《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就有了准备。解放战争时期，有一些指示、文件，也是做了准备，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却缺乏这种舆论准备。”

---

《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33页。

何其芳：《毛泽东之歌》，《时代的报告》1980年第2期。

当时正是困难时期，毛泽东和全国人民一道在饿饭。他认识到，缺乏理论准备，所以摔了跤。全国人民受苦，他是很内疚的。1961年的一天，他对卫士讲：他正考虑在他的《实践论》的基础上，根据社会主义时期的实际情况，再写一篇哲学著作。他感到，现在搞社会主义，这还是一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他想认识这必然王国。他对卫士又说：人们常说，“虎死了留皮，人死了留名。”我这个人啊，只要为人民留点文就行了。1964年3月，他对部分中央领导谈到《毛选》时说：那都是以前的著作了，现在也想写一些东西，但老了，精神不够了。同年6月，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又说：现在学这些东西（指《毛选》），我很惭愧，都是些古董了，要把现在新的东西写进去。以上的话反映了毛泽东晚年依旧“壮心不已”。他大胆地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史无前例的探索、试验。大跃进、人民公社是试验。“文化大革命”也是试验（他叫“演习”）。他虽不认为这些试验失败了，但也并不感到令人满意。他无法形成新的、系统的论理，写出如《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这样满意的论著。

在阶级社会，任何哲学都是为政治服务的。这一点，有些资产阶级哲学家不承认，宣扬哲学与政治无关。而另外一些哲学家却是承认的，自觉的用自己的哲学为本阶级政治服务。冯友兰在三十年代说过，哲学在政治及社会方面的用处是显而易见的。每一种政治社会制度都需要一种理论上的根据，都需要一种哲学作理论上的靠山。1959年，冯友兰出版了《四十年回顾》。毛泽东读过这书。他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曾说：冯友兰在《四十年回顾》中，讲了他过去怎样适应国民党的需要，采用一些什么哲学来骗人。他用自己的事实驳斥了所谓哲学不为政治服务的说法。

无产阶级哲学要为当前政治服务，这是确定无疑的。但对这种服务不能作简单的、实用主义的理解，不能像西欧中世纪那样把哲学变成神学的奴婢，为现行的任何政策作论证，而不管这种政策是否正确。哲学是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哲学的社会功能是多方面的，为政治服务的形式也是多方面的。哲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最根本的、最主要的是宣传、普及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给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以最正确、最锐利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武器。在哲学为政治服务上，我们有很深刻的经验教训，必须反对用实用主义的态度来看待哲学与政治关系的关系。实用主义的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既阻碍了哲学自身的发展，又容易使政治走上歧途，帮了倒忙。

## 二、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

恩格斯说：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哲学家们按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阵营。“但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绝大多数的哲学家

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

我国哲学工作者在对恩格斯的话的理解上出现了分歧。一种认为恩格斯的话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二个方面的概括，“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可以有唯物主义的理解，也可以有唯心主义的理解。另一种意见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命题，不可能作唯物主义的解释。这种争论是从1958年开始的。

1958年8月，陈伯达借住中央党校休假，与杨献珍同住一楼。陈伯达约请杨献珍写一篇批评苏联《简明哲学辞典》“同一性”条目的文章。于是杨献珍写了《略论两种范畴的“同一性”唯心主义范畴的“同一性”和辩证法范畴的“同一性”》。该文认为，唯心主义的同一性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的同一性，和辩证法的“矛盾的同一性”的同一性，乃两种范畴的同一性，必须加以区别，不能混为一谈。针对当时报刊上有的文章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可作唯物主义解释这一点，杨献珍则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只能是唯心主义的命题。杨献珍还指出：弄清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问题，“不止是在划清唯物唯心的界限，清算中国的马赫主义在哲学思想上有重大意义，在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上，也是有重大意义的。”杨献珍将文章印了三份情样，一份交陈伯达，一份交康生，一份留自己。据杨献珍说：康生看了文章后问毛主席：思维 and 存在有没有同一性。毛主席说，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康生告诉了我。杨献珍的文章没有发表。但关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的争论继续在报刊上进行。在读书过程中，秀才们自然也很想听听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见解。据《谈话记录的论点汇编》，毛泽东作了如下的说明：“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问题，争论很久了。认为思维只是思维，存在只是存在，思维不能达到存在的彼岸，存在不能被认识，客观不能被主观所认识、这就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最后走到康德那里。”“思维和存在不能划等号。说二者同一，不是说二者等同，不是说思维等同于存在。思维是一种特殊物质的运动形态，它能够反映客观的性质，能够反映客观的运动，并且由此产生科学的预见，而这种预见经过实践又能转化成为事物。”

在争论中，有一部分同志认为：说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就等于说思维等于存在，因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只能是唯心主义命题，而不能作唯物主义的解释。针对这种观点，毛泽东讲：“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只要肯定了这一条，我们就同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了。然后还要进一步解决客观存在能否认识，如何认识的问题。还是马克思说的那些话对，思维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说思维和存在不能等同，是对的，但是因此就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则是错误的。”

“人们的主观运动的规律和外界的客观运动规律是同一的。辩证法的规律，是客观所固有的，是客观运动的规律。这种客观运动的规律，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中，就成为主观辩证法。对这个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是同一的。这是恩格斯多次阐明的论点。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势必走到反对恩格斯的论点。”

---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1页。

杨献珍：《略论两种范畴的同一性》，《杨献珍文集》第2卷，第114页。

杨献珍：《我的哲学罪案》第234页。

毛泽东的上述言论正确吗？我认为是正确的，是符合恩格斯的原意的，是唯物而又辩证地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否认思维与存在有一同性的观点是错误的。毛泽东在 1958 ~ 1959 年，确实犯有夸大主观能动性的错误，但不能就因此否认他上述说明的正确性。同样，也不能因为否认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的同志正确而勇敢地批评了大跃进中的主观主义、唯心主义，就认为他们否认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观点也正确。当然，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可以继续下去。

### 三、关于对立统一规律

如第一章所说，毛泽东从 1956 年开始就注意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批评形而上学的无矛盾论。毛泽东的读书谈话继续体现了这一指导思想。他认为苏联教科书不承认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实际上否认了对立统一规律的普遍性。他强调应从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入手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揭示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

毛泽东强调世界观、方法论的重要指导作用。他说：世界上没有不能分析的事物，只是：一情况不同；二性质不同。许多基本范畴，特别是对立统一法则，对各种事物都是适用的。这样来研究问题，看问题，就有了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认为，苏联教科书没有运用这种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苏联教科书的作者没有辩证法，对各个问题没有用辩证法分析。他提出：写经济学教科要有哲学头脑，要有哲学家参加，没有哲学头脑的作家参加，要写好经济学教科书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毛泽东的这一见解是深刻的，不独对经济学是如此。在现代科学研究中尤其是在理论科学的研究中，辩证法显得尤为重要。这一点，恩格斯早就指出过：“辩证法对今天的自然科学来说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苏联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矛盾不是不可调和的。毛泽东认为，这种说法不合乎辩证法，一切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那里有什么调和的矛盾呢？有的矛盾是对抗的，有的矛盾是非对抗的，但不能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可以调和的矛盾。毛泽东的这一论点正确吗？有人赞同，有人不赞同。

我认为：一切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说法过于绝对。矛盾的斗争是绝对的，但决不是说，一切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事实上，毛泽东在三十年代也承认：“和解、妥协、调和是可以有的，在过程发展的一定状态是必要的。停战、媾和、终止罢工、临时的统一战线、某些合作，是阶级斗争中有过的，但不是总战术。”确实，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对抗阶级之间的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仍然有调和的可能和必要。这种调和表现为暂时的联合。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具有对抗的性质，但在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这两者又结成同盟，共同反对封建阶级。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抗日。这种合作，双方都有让步，都有妥协。没有让步、妥协，也就不可能合作。这种合作就是一种调和，是处理国共矛盾的一种特殊形式。当然，这种

---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466、467 页。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95 页。

合作，并不排斥斗争。至于非对抗性矛盾之间的调和更是明显。一个家庭中，夫妇之间不互相谦让、谅解，而是处处针锋相对，那就无法在一起生活。我认为：调和既是矛盾的一种特殊状态，又是在一定条件下处理矛盾的一种手段或方法。取消斗争、不讲原则的调和论应当批判，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一切调和，这正如我们批判反对革命的改良主义而不否定在一定条件下改良的必要一样。

#### 四、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

这一原理并非是毛泽东提出的。毛泽东读过的苏联三十年代教科书早已阐述过，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和艾思奇在《中国文化》上发表的文章也都有论述。毛泽东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尤其是在革命战争中对这一原理作了出色的运用。自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出版后，苏联哲学教科书就很少讲这一原理了。解放以后，我国的哲学工作者也很少论及。

1958年，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顺便提到“在总的量变过程中有许多部分的质变”，但没有展开。他在读苏联教科书时则作了较系统的说明。

毛泽东从理论上说明了“总的量变过程中部分质变”的普遍性。他说：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不能说量变中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质变是飞跃，在这个时候，旧的量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又说：在一个长的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这里有个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工作中，不促进大量的量变，不促进许多的部分质变，最后的质变就不能来到。

在谈话中，他列举了大量的例子来说明上述原理。（1）蚕的一生要经过蚕子、蚕、蛹、飞蛾四个阶段，每一小阶段，都有部分质变。（2）人从生到死的过程经过童年、少年、青年、壮年到老年不同阶段，这是一个量变过程，同时也是不断地进行部分质变的过程。（3）一个工厂内部的设备的部分更新就是部分质变。（4）打垮蒋介石是一个质变，这个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例如，要有三年半的时间，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蒋介石军队和政权。而这个量变中，同样有若干的部分质变。（5）从个体经济转变到集体经济是一个质变过程，这个过程在我国是通过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这样一些不同阶段的部分质变完成的。（6）在思想战线上也要通过不断的量变、不断的部分质变，达到完全肃清资本主义思想影响。他认为，即使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仍然有部分质变。量变、质变的具体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部分质变的形式自然也是各异的。

经过毛泽东的阐述，部分质变的思想重新为我国哲学界重视，以后的哲学教科书大都写入了“部分质变”的原理。

#### 五、关于认识的辩证过程

苏联教科书说：随着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化，“人们成为自己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人”，“能够完全自觉地掌握和利用这些规律来为整个社会谋福利。”对此，毛泽东评论说：自觉地掌握和利用规律是不容易的，需要有

一个过程，先锋队也不能例外。他解释说：规律，开始总是少数人认识，后来才是多数人认识。就是对少数人说来，也是从不认识到认识，也要经过实践和学习的过程。任何人开始总是不懂的，从来也没有什么先知先觉。认识规律，必须通过实践，取得成绩，发生问题，遇到失败，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使认识逐步推进。要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进行实践，在实践中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进行研究，而且必须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

为什么认识要有一个过程。这是因为事物的本质总是藏在现象的后面，不是直接呈露的，人们只有通过现象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在研究问题时，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现象出发，通过观察再找出原理、原则。毛泽东指出，《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挈领。在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研究战争的方法，也是从现象出发，揭露本质。敌人力量大，我们力量小，敌人强，我们弱，这就是当时最大量、最普遍的大家都能看得到的现象。我们就是从这个现象出发来研究和解决战争问题。研究我们在小而弱的情况下，如何能够战胜大而强的敌人。

毛泽东还指出：规律是在事物运动过程中反复出现的东西，不是偶然出现的。事物的反复出现，才成为规律，才能够被认识。例如，资本主义的危机在过去是十年一次，经过多次反复，就有可能使我们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危机的规律。土地改革中要按人口分配土地，而不能按劳分配，这也是经过多次反复后才认识清楚的。因此：“一种意识形态成为系统。总是在事物运动的后面。因为思想、认识是物质运动的反映。”

毛泽东认为：苏联教科书没有系统，还没有形成体系，这也是有客观原因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身还没有成熟，还在发展中。又说：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种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毛泽东说得极为中肯。社会主义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还很远，这是一种清醒的估计。

### 第三章

#### 调整时期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

社会的发展有其客观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规律。任何阶级、政党和个人的实践活动都不能违背它，违背了就要碰钉子、吃苦头。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毛泽东的大跃进试验不得不中止。1960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始认真纠正农村工作中“左”倾错误，并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以解决大跃进时期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恢复生产力。与此同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大力倡导调查研究与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端正党的思想路线。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几年的努力奋斗，国民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进入六十年代，毛泽东提出了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大理论问题。从1962年9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开始，他对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形势作了主观主义的估计，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和实践得到进一步发展。在调整时期，毛泽东对大跃进时期的失误进行了哲学总结，丰富了认识论思想。他还提出改革现有哲学体系的设想。

#### 第一节 实事求是，总结经验

##### 一、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向群众寻找真理

严重的经济困难，全国人民的饿饭，毛泽东的心情是异常沉重的。他的头脑也变得清醒起来。他认识到，这几年严重错误的原因之一是思想路线出了问题，脱离群众，不了解下情，犯了主观主义。为了扭转严重局面，渡过难关，端正思想路线是重要一环。为此，他决心恢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1960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67岁生日。这一天，他请了汪东兴、秘书、卫士七人一同吃晚饭。桌上没肉，没有酒，只是盐和油比平日多一些。席间，他说：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你们都去搞调查研究，那里到底有什么问题？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反映上来。他要身边工作人员去山东省作广泛的调查，要他们讲真话，不讲假话，不许隐瞒欺骗。虽说是伟大领袖的生日，但没有欢乐的气氛。这顿饭自然也吃不好，谁也吃不下去。夜里，毛泽东睡不着，对卫士说：“我不放心哪，他们许多事瞒着我，我出去，到哪里，他们都能作准备。你们要下去，你们能看到真实情况，要告诉我真实情况。”他为下去的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除汪东兴外，你们六个都下去，不去山东，改去信阳专区，那里开始好转，又有救济粮吃，对你们身体会好些。我给你们每人备一份药包，让我的护士长给你们讲一次如何用药法。淮河流域气候暖和些，比山东好。1月21日去北京训练班上两星期课，使你们有充分精神准备。你们如果很饥饿，我给你们送牛羊肉去。”写完后，又补充道：“12月26日，我的生辰，明年我就67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这封信不仅表达了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的深切的关心、爱护之情，反映了当时生活的艰难之状，而且也透露了他“老了”的悲凉心境，寄希望于年轻一代。

这时，中共中央正在北京开工作会议（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

月13日)，讨论1961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毛泽东在最后一天的会上说：社会主义建设不能过急，过急了办不成，越急越办不成。要波浪式地向前发展。要搞它半个世纪，要搞几年慢慢腾腾，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他批评“一平二调”、“共产风”是“人祸”，要求大家勇于承认错误，有多少错误就说多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什么反什么。毛泽东这次讲话的中心内容是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他指出，做好工作有三条：一要情况明，二要决心大，三要方法对。情况明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无从说起。要情况明，必须调查研究。他回顾党的历史说：我们有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就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跟中国实际相结合。过去我们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比较注重调查研究，办事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但是在全国解放以后，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许多同志，包括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大概官做大了，调查研究工作不大做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改，也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

确实，建国后，进了城，他成了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所到之处，一片欢呼声，一片万岁声。他已无法过普通人一样的生活，逛大街，游公园，几乎无法与普通的老百姓拉家常，聊大天。据他身边工作人员讲：1952年春节期间，他戴上了口罩，游黄鹤楼。不料被眼尖的小孩认出，结果，一片万岁声，游人像潮水般涌来，人挤成了一团，卫士和其他领导同志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保驾”突围。毛泽东自己风趣地说：“真是下不了黄鹤楼。”为了安全，毛泽东的行动自由受到限制。对此，他“愤怒、痛苦，又无可奈何”。“不能随便行动，不能随心所欲走到群众中去，这是毛泽东最痛苦的事。”毛泽东只能靠听汇报、看材料了解情况，无法像革命战争年代那样亲自作调查工作。为了弥补这种不足，他要求卫士回乡探家时作调查。为了了解的面广，他要求警卫中队的战士应来自不同的省、市、自治区，来自不同的专区，不要重复。由于“领袖”的这种特殊的地位，毛泽东已很难向群众作调查。1958年，他虽然到大江南北的许多工厂、农村进行走马观花式的视察，但看到的是一片大跃进的假象。他在1月13日会上作的自我批评是真诚的。

为了端正党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提出：1961年要搞一个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他要求参加会议的同志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不但要亲自抓典型，到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学校，一两个商店，进行深入的周密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而且要组织和指导广大干部去搞调查研究，教会许多人作调查研究。

在中央工作会议后，接着召开了中共八届九中全会（1961年1月14日至18日）。在会上，毛泽东又讲了调查研究问题，提出，这几年，我们吃了不调查研究的亏，1961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在实践中进行了调查。会后，他要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三人各带一个调查组分赴广东、湖南、浙江三省农村，作人民公社调查，然后直接向他汇报，为制定农村政策提供依据。

正在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时，毛泽东重新见到他在1930年写的《调查工作》一文。1961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由中南、华东、西南三大区的中央局书记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会议（简称“三南”会议）上，论文印发给到会者。3月13日，毛泽东说：找出30年前我写的一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我自己看还有点道理，别人怎样看我不知道。文章是自己的好，我对

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这篇文章我是喜欢的，这篇文章是经过一场大斗争写出来的。……请大家研究一下，提出意见，哪些赞成，哪些不赞成。如果基本赞成就照办，不用解释了。这篇文章后来以《反对本本主义》为篇名正式公开印行。

根据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三个调查组的调查，毛泽东指出：当前农村人民公社中应有着重解决两个平均主义，即生产大队内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和生产队内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在“三南”会议召开的同时，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三北会议”（即由华北、西北、东北三区中央局书记及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会议）。3月13日，毛泽东给在北京的中央领导同志写信，指出：对农村中存在的两个极端严重的平均主义问题，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至今还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自的典型调查，满足于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观花的调查。他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他表示，他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

根据毛泽东的多次讲话精神，中共中央于3月23日发出了《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信对毛泽东的《调查工作》一文作了极高评价，要求各级领导联系最近几年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入讨论。信对1958年大跃进以来所犯错误的原因及其教训作了初步分析，强调各级领导要深入基层，蹲下来，亲自作典型调查。“总之，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针对许多调查工作并不是为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是为现行政策作论证的主观主义毛病，中央指示信说：“调查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调查而调查：调查应该采取客观态度，不应该抱定一种成见下去专替自己找证据，应该发现事物的真相，不要为各种假象所蒙蔽；应该对调查的材料作全面的综合和分析，不要满足于孤立的、片面的、看不到事物发展规律的观察。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信的这些意见击中了调查工作中长期以来存在的主观主义的要害。

同年4月25日，毛泽东致信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要他通知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人在5月中央工作会议前利用一段时间对农村的若干问题（如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自留地问题等）进行重点调查。“下十天至十五天苦功夫，向群众寻求真理。”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收到各地送来的许多调查报告，为了交流情况，他批转了一些报告和信件。他在5月14日给当时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的信中说：“都要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

广州会议后，刘少奇从4月1日至5月15日在湖南长沙、宁乡两县深入农村，同基层干部和社员进行座谈、访问，就食堂、供给制、社员家庭副业、自留地、商业、集市贸易等问题广泛听取意见，并向在长沙的毛泽东通报了

---

见逢先知的《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共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8页。

毛泽东：《致张平化》，《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82页。

调查的情况。周恩来在繁忙的国务活动的情况下，挤出时间，于4月下旬至5月中旬到河北省邯郸地区进行调查，并及时向在上海的毛泽东通报了对食堂、供给制、评工记分、恢复社员体力和畜力问题的看法。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同志也深入基层，进行调查工作。

在全党调查研究基础上，中共中央陆续制定了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教育（六十条）、科学（十四条）、文艺（十条）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这些条例，反映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前进了一步，对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繁荣社会主义事业起了积极作用。没有全党从上到下调查研究，就没有这些工作条例。没有这些工作条例，也就不可能调动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积极性，迅速扭转严重的困难局面。

“下苦功夫，向群众寻求真理”，这说得很好，这也是毛泽东一贯的群众路线的思想。1958年以来发生的严重问题，重要原因之一是脱离群众，不作调查研究。这也很对。但似乎也还有别的问题：像农村办不办公共食堂、搞不搞供给制、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以什么为好等问题，难道仅仅是一个作不作调查的问题吗？我想不尽然。

拿食堂为例来说。1958年，在大跃进中，有些地方的农村，在农忙时办起了临时食堂。这是从实际需要出发、群众自发办起来的，无可指摘。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农村普遍办起食堂，而且与吃饭不要钱联在一起，并把办不办食堂看成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生活水平下，农村办常年的公共食堂（更不用说吃饭不要钱）显然是不适宜的，许多社员也有意见。1959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作调查的结论：不赞成办公共食堂。结果调查组成员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这件事给毛泽东留下很深印象。1961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就此作了自我批评）。也是在这一年，安徽省委书记张凯帆经过调查，主张解散公共食堂。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认为，这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进攻。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办食堂。各地为了怕戴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也只能硬着头发办食堂，那怕有名无实。直到1961年经刘少奇、周恩来、毛泽东自己的卫士与秘书等调查后，才下决心停办食堂。

再以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放在哪一级来说。自1959年第二次郑州会议起，毛泽东一直在考虑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其核心是究竟以哪一级为基本核算单位。1959年3月，他两次写信，提出这一问题，“要照群众意见办”，并说“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能行得通，否则终久是行不通的”。从一般道理讲，毛泽东的说法是正确的。在那时，通过调查、讨论，确定以生产大队（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只有部分的所有制。这种体制仍然不能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直到1961年9月，他才认识到应以生产队而不是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他在9月29日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有关同志的信中说：“要调动群众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要在明年及以后几年，大量增产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以及猪、马、牛、羊、鸡、鸭、鹅等类产品，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又说：“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1956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该醒过来了吧”。为什么糊涂六年之久，是没有人提出这种主张吗？当然不是，看来是毛泽东头脑中的“一大二公”的思想在起作用，致使正确意见不能为他吸收。

再以“包产到户”来说。在1957年、1959年有些地方就试行过“包产

到户”。但都被视之为搞资本主义，打了回去。1960年，为了渡过困难，恢复农业生产，不少地方实行不同形式的责任制。有的实行包产到户，也有个别地方提出分田单干。安徽省委就生产责任制问题曾三次（1961年3月20日、4月27日、7月24日）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作了书面汇报。也许因为以前毛泽东在会议上批评过“包产到户”，所以安徽省委的报告申辩说：实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的办法，不是“包产到户”，不是单干。报告讲了实行责任制的好处，也讲了出现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对安徽省的办法，毛泽东不甚赞同。在3月的广州会议期间，秘书田家英将安徽省的包产到户的材料转给他，同时田家英还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寡妇们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下只好互助求生。她们讲：

如果实行包产到户，不带我们的话，要求给我们一条牛，一张犁，八个寡妇互助，爬也要爬到田里去。看到这些，令人酸鼻。工作是我们做坏的，在困难的时候，又要实行什么包产到户，把一些生活没有依靠的群众丢开不管，作为共产党人来说，我认为，良心上是问不过去的。”信中还说，为了总结经验，包产到户作为一种试验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普遍推广，“依靠集体经济克服困难，发展生产，是我们不能动摇的方向。”毛泽东是赞成田家英的意见的，立即将这份材料连同田家英的信批给政治局常委和几位大区书记传阅。陶铸赞成田家英的意见，陈云则不以为然说，安徽搞包产到户，应当允许人家试验嘛！

毛泽东虽然对“包产到户”持保留意见，但并没有立即阻止这种试验。到了这年秋，安徽全省百分之七十五的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全国各省约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地区实行类似的办法。到了这年12月，毛泽东向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表示：有了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后，可以不再搞“责任田”。安徽省于1962年3月20日作出了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

在实行包产到户过程中，确实也出现了许多问题。1962年2月中央监委发了广西自治区党委关于广西农村有不少党员干部闹单干的情况简报。简报讲了分田单干所产生的“严重后果”，（1）土地大量撩荒，征购任务完不成；（2）发生两极分化，困难户卖田、卖房和家俱；（3）给阶级敌人可乘之机，有的地富反攻倒算，要“土地回家”。中共中央于3月11日又转发了中央监委的简报。那时候，“包产到户”与“分田单干”几乎成了同义词，两者视为一回事。恐怕类似的材料不止这一件。这些材料，当然会影响毛泽东。

不过，在那时，广大农民是欢迎包产到户的。1962年3月，田家英奉毛泽东之命带调查组到湖南湘潭的韶山（毛泽东的家乡）、湘乡的唐家坵（毛泽东的外祖父家乡）、宁乡炭子冲（刘少奇家乡）、长沙的天华大队（刘少奇1961年蹲点的地方），进行贯彻农业六十条情况和问题的调查。田家英在调查中听到社员普遍要求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呼声。田家英的思想起了变化。因事关重大，田家英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毛泽东听了汇报后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包产到户就不能听。”那时包产到户继续在全国发展。刘少奇在1961年湖南调查时不赞成分田到户，此时，刘少奇赞成包产到户。6月，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召见田家英。田家英系统地陈述了他对包产到户的意见：现在全国各地实

---

逢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64～—65页。

逢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66页。

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百分之三十，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由领导地搞。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百分之四十，另外百分之六十是集体的和半集体的。现在搞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是临时措施，权宜之计，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毛泽东只是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最后毛泽东向田家英发问：“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田家英回答：“是我个人意见。”其实在此之前，田家英向刘少奇、邓小平汇报过，并得到他们的支持。田家英为顾全大局说了“是我个人意见”。到了八、九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批单干风和包产到户，认为这是阶级斗争问题，是马列主义还是修正主义问题。

毛泽东主张坚持集体经济、依靠集体经济渡过困难，这一原则并没有错。事实上，这种选择在那时也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但从当时我国农村生产力的状况、集体经济、干部和社员的思想情绪看，在广大地区、多数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的选择，也许更佳，可取得更好的效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证明了一点。

这里讲公共食堂、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和包产到户三例，无非是想说明，群众和干部意见是多种多样的，有些甚至是相对立的，群众的创造也是多种多样的。如何对待群众和干部中的不同意见，究竟听哪种意见？过就需要领导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制作。毛泽东说：“有时候不能完全听群众”，这抽象讲不无道理，走群众路线，向群众学习，并不是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能否加工正确，这里有多种因素：一是原料丰富与否；二是加工制作的方法正确不正确；三是加工者的立场、思想倾向、感情；四是加工者的知识结构。1958年以来发生的严重问题，并不是在当时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而是当时的领导者听不进去。这表明在如何向群众学习、走群众路线问题上是有经验教训可总结的。在调查研究，向群众学习问题上要防止经验主义、尾巴主义。

## 二、民主集中制与认识论

经过1961年的努力，形势（主要是农村）开始好转，但困难仍然很大，工业生产继续下降。党内外从上到下对困难的形势、对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对中央纠正“左”的错误的方针政策，认识并不一致。为了进一步总结经验，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地纠正错误，克服困难，争取国民经济尽快的恢复好转，中共中央于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开了扩大会议。到会有七千人，所以又称七千人大会。这是中共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由毛泽东主持。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一开始，先将由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的一个书面报告发给与会者进行讨论，提意见。在大家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再由刘少奇主持，组织了一个21人的起草委员会，集中大家意见，写出了第二稿“书面报告”。1月26日再次印发给大家讨论。1月27日，刘少奇在全体会上对书面报告作了说明。会议原定在书面报告通过后即结束。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有的同志

认为会议发扬民主和反对官僚主义强调不够。不少人由于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心里有话还没有讲出来。毛泽东在 29 日大会上讲：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一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要让人讲话，要给人家机会批评自己。他建议让人“出气”，不“出气”就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他号召大家发扬民主，开“出气会”，解决上下通气问题。他承担责任：中央的错误有些我要直接负责，间接的我也有责任。会议决定延长，与会者在北京过春节。1 月 30 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民主集中制的讲话，之后分组进行讨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2 月 7 日会议结束。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又主持对书面报告进行补充、修改，主要是把毛泽东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的基本精神补充进去，形成了“书面报告”第三稿。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先到杭州，后到武昌，亲自整理、修改讲话记录稿，补充了许多重要内容。他做得很认真，先后改了六稿，改出后，又分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有关同志征求意见，根据他们的意见，他又再作修改。可以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毛泽东晚年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依靠群众，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面对严重困难，他更感到应紧紧依靠群众，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因为“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但 1958 年以来（远一点 1955 年下半年以来），党内民主空气不够，民主生活不正常，干群关系、上下级关系不正常。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从多方面讲了民主集中制问题。

民主集中制是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刘少奇在中共“七大”所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作了系统说明。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强调，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实质是一个群众问题。他把民主集中制问题提高到世界观的高度来论述。他说：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工作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了，但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又说：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那怕是骂自己的话，要让人讲。他认为，如果没有“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的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克服困难，没有集中不行，没有民主也不行，因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集中。针对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这不好一点，他反复说明，领导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群众讲话。“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他以历史上的刘邦、项羽为例教育大家。刘邦“豁达大度”，“从谏如流”，而项羽则相反，不爱听不同意见，不善于团结人。结果刘邦打败项羽。项羽演出了一出“霸王别姬”的悲剧。他尖锐地讲：“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最后要垮台的。”经毛泽东这样一讲，七千人大会的民主空气是好的，大家比较敢于发表意见。当时有这样的说法：“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千一稀，大家满意。”毛泽东还指出：发扬民主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的重要前提。他说，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但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这种方法”。充分发扬党内外民主，形成民主的气氛，有助于解决长期积累起来的人民内部矛盾。虽然，他强调民主，但并不否认集中的必要。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经济，那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是在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是民主与集中的统一，两者不可偏废。反民主的专制主义和极端民主化都是与民主集中制不相容的。刘少奇曾在中共“七大”深刻指出：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常常当作专制主义倾向的一种惩罚而出现，凡是专制主义倾向较严重的地方，那里就可能出现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刘少奇的这一番话值得我们深思。七千人大会的中心议题是总结经验，进一步认识建设社会主义规律，统一全党的思想。刘少奇的报告具体总结了建国以来，尤其是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的讲话更富有理论色彩，从认识论的高度总结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经验教训，论述了民主集中制与认识论的关系。他指出：民主集中的集中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是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如果没有民主，大家意见还没有发表，有气还没有出，集中统一就建立不起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是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也不可能真正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他反复说明，发扬民主，造成民主气氛，是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重要前提。没有民主，就不能从群众中来，也不可能真正到群众中去。

历来讲认识论，不讲民主问题。其实民主与认识有密切的关系。有了民主，才有思想自由，才能让各种不同意见都说出来，并展开讨论、辩论，这样可以避免或减少认识上的片面性，可以使认识不断深化而不致停留于某一点。作为一领导者，只有具有民主作风，广开言路，从谏如流，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才能团结人。若实行个人专断，家长制，一言堂，那就堵塞了言路，必然陷入主观性、片面性。认识是社会的认识，认识受社会条件制约，政治是其中之一。历史证明，民主政治有助于认识的发展，学术的繁荣，专制政治则阻碍认识的发展。中国“独尊儒术”以来的封建社会，欧洲的中世纪，就是封建专制政治阻碍认识发展的明证。

### 三、自由与必然的辩证规律

面对严重的困难，面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在一部分同志中产生埋怨和悲观情绪。为了振奋精神，毛泽东在讲话中用很大的篇幅结合中国革命的历史，阐述了认识是一曲折的过程，讲了自由与必然的辩证规律。

他指出：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上，从1921年党的建立到1945年“七大”，一共24年，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中间经历了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我们才认识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没有充分经验，是不可能充分认识中

国革命规律的。他讲中国共产党人认识民主革命规律的艰难历程，目的是要引导广大干部认识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达到自由王国。”

关于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要有一个过程，要有一定的代价，这是毛泽东在 1957 年就说及的。不过，那时他“希望不要有革命时期所付的代价那么高”，在时间上“要缩短一些”。

在 1958 年大跃进时，他头脑发热，对认识经济建设规律的艰巨性大大低估了，以为已基本掌握了。到了 1959 年 2 月，他头脑稍为冷静，承认：我们搞经济还是小孩子，无经验，向地球开战，战略战术我们还不熟，要正面承认这些缺点错误。1960 年 6 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即 18 日的上午，毛泽东写了《十年总结》。文中最后说：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的认识过程中逐步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能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用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固有的规律，以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在下午的会议上，他又作了说明，指出：认识过程中错误“难免论”是正确的，列宁就是“难免论者。”机械唯物论就是一次完成真理。

1961 年 1 月 18 日，他在八届九中全会上说：凡是规律总要经过几次反复才能找到。民主革命花了 28 年才成功，希望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像搞民主革命那样长的时间，是不是 20 年就取得经验，比民主革命少 8 年，过去想缩短很多，看来不行。同年 8 月，他在第二次庐山会议上说：讲到社会主义，不甚了了。你们说有一套，我还不大相信。毛泽东的这些话可以说是对上面所引 1957 年话的一种修正，对掌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性的艰巨性有了新的认识。

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的认识又进了一步。他坦诚地说：到现在为止，“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调查它，研究它。”

在 1958 年时，他以为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可以在经济上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时，碰了钉子，认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

---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26 页。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01 页。

毛泽东：《十年总结》，《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文选》，第 385 页。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29 页。

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是不行的。他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在对建设规律的认识上，他提出：“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毛泽东的这一认识是经过曲折后取得的。他深切地感到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艰难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认识到改变我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赶上和超过世界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他的这种认识有助于克服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急性病，有助于防止骄傲自满。

在七千人大会讲话中，他对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作了如下的总结：“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在谈论必然与自由关系上，人们常常（毛泽东本人也是这样）爱引用恩格斯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这一名言，而往往忽略了恩格斯的另一句话，“自由是在于根据对于自然界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理论工作者谈话时说：“自由是对必然的理解，这句话不完全，只讲了一半，单讲理解就能自由了？自由是对必然的理解和依据这种理解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他的这一说明把恩格斯的思想（尤其是为人忽视的那一点）更清晰、更通俗地表达出来了。后来，他将这一思想增补到《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现在讲话中“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的表述中“客观世界的改造”是1964年后加上的。

恩格斯正确地指出：自由“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可他又说：“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类才实现“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恩格斯的理解，包含有（起码容易使人认为）将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绝然对立的意思。毛泽东对“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理解与恩格斯稍有所不同。1964年12月，他在修改周恩来在全国三届一次人代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加了一大段话，其中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第二年，他在重读自己的旧作《长冈乡调查》时写的批注中又说：“人类总是要犯一些错误才能显出他们的正确。对客观必然规律不认识而受它的支配，使自己成客观外界的奴隶，直至现在以及将来，乃至无

---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9、833页。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3、154、323页。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3、154、323页。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3、154、323页。

毛泽东：《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毛泽东著作选读》卷，第845、846页。

穷，都在所难免。认识的盲目性和自由，总会是不断地交替和扩大其领域，永远是错误和正确并存。不然，发展也就会停止了，科学也就会不存在了。要知道，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人类同时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奴隶，又是它们的主人。这是因为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人类社会、人类本身（即人的身体）都是永远认识不完全的。如果说有一天认识完全了，社会全善全美了（如神学所说那样），那就会导致绝对的主观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毛泽东的这些论述进一步阐明了必然与自由的辩证关系，表明自由是具体的，历史的，相对的，没有绝对的自由，即使到了共产主义，仍然有盲目的必然性，仍然有不自由的领域，仍然有一个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的问题。

## 第二节 社会主义教育与阶级斗争扩大化

### 一、“重提阶级斗争”

1960年6月24日至26日。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谈。会谈前夕，苏共代表团突然散发苏共中央6月21日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对中共进行全面攻击。在会议中，赫鲁晓夫带头围攻中国共产党。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单方宣布要在一个月内撤回全部在华专家1390人，撕毁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257个科技合作项目，停止供应一切设备，给中国的建设事业造成极大的困难。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急剧恶化。苏联政府的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径无疑激怒了毛泽东，影响到他对苏共的看法。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工作会议，主要研究国际问题。

这年冬天，河南信阳地区严重的非正常的人口死亡事件被揭露。1961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河南省地委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这个报告，夸大了敌情，混淆了两类矛盾，把该地区发生的粮食严重减产和大量饿、病、死人的现象，一概归之于坏人当权和地主封建势力的破坏，提出依靠贫下中农，进行整风整社，彻底孤立和打倒反革命复辟势力的作法。中央的指示肯定了信阳地委的这个报告，并要求“全国三类社队整风整社都应照此执行”。这一报告所讲的阶级斗争现象自然会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毛泽东在1月1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一开头就说：三类县、社、队，有的领导权被地、富、反、坏分子篡夺了，实际上是打着共产党的招牌，干国民党地主阶级的事，是国民党、地主阶级的复辟。他估计，全国县、社、队百分之二十是坏的，属三类。

1月18日，他在八届九中全会的讲话中又说：近几年，调查研究少，情况不甚了解，譬如农村中地主阶级复辟问题。不是我们有意给他挂上这笔账，而是事实是这样，他们打着共产党的旗帜，实际上搞地主阶级复辟，在出了乱子以后，我们才逐步认识在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是地主阶级复辟。凡是三类社、队，大体都是与反革命有关。这里边也有死官僚，死官僚不管人民死活，不管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是帮助了敌人，是地、富、反、坏、蜕化变质分子的同盟军。

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他把“我们应该联合那一些阶级？压迫那一些阶级？这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单列为一个问题，以期引起人们的注意。他还指出，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洁。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在这次讲话中，他错误地认为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已被修正主义篡夺，我们要从中吸取教训。但总起来看，那时他还没有把阶级斗争放在很重要的位置。

1962年8、9月，中共中央先后在北戴河、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在8月6日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阶级、形势、矛盾”问题。在以后的多次大小会上，他又讲了这方面的问题，并大批所谓“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在9月24日的会上，他说：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阶级存在？有没有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有阶级斗争。列宁曾经说，革命胜利后，因国际上有资产阶级存在，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残余，小资产阶级的存在，会不断产生资产阶级。因此，被

推翻了的阶级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要复辟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后，如英国、法国等都曾以几次反复。封建主义被推翻以后，都经过了几次复辟，经过几次反复。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这种反复。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教育干部，教育群众，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会走向反面。……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在“文化大革命”的1967年，一些人将毛泽东的话作了整理，归纳成：“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线路。”

如何评价毛泽东的上述思想？

在“文化大革命”中，上述一大段话写进了“九大”政治报告，基本精神还写进了党章和宪法。这一大段论述被称之为中国共产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党的生命线，一再进行宣传与教育。

我认为：我国正反两方面的实践已经证明，毛泽东提出的上述党的基本路线是错误的，应当坚决否定。但这种否定，又不应当是形而上学的全盘否定，而应当是辩证的否定。毛泽东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当作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把阶级斗争当作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中心工作，这是错误的。但他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等思想大体是正确的、深刻或合理的。

毛泽东提出“基本路线”是他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又一次重大“升级”，导致这次“升级”的主要因素有：

第一，从客观上讲，当时国内阶级斗争相对激化。国内经济困难，国际上的反华浪潮，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利用暂时困难叫嚣反攻大陆。这些国内外的因素使得极少数没有改造好的地主资产阶级分子，企图复辟变天。社会上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封建迷信等现象也有所增加。确实，在农村极个别的社队的领导权为坏人所篡夺，阶级斗争出现了相对激烈的情形。在这时，他提请全党注意阶级斗争问题是对的。但是，他把一定条件下暂时激烈的阶级斗争夸大了，并得出了普遍性的结论。

第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同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进行的斗争是正确的，正义的。赫鲁晓夫的某些理论也确实离开了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毛泽东认为苏联的党和国家领导权已被修正主义篡夺，则是不符合实际的。这种错误的判断，反过来又影响到他对国内问题的看法。他在8月9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

组会上讲，资本主义思想几十年、几百年都存在，不谈几千年，讲那么长吓人。社会主义才几十年，都搞得干净？历史都是如此。苏联到现在几十年、还有修正主义，为国际资本主义服务，实际是反革命。又说：苏联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考验，走了许多曲折的道路，现在还出修正主义。他从苏联想到中国，故一再提出矛盾、阶级、阶级斗争问题，提出防止出修正主义问题。关于防修反修的思想，从这一时期他所写的诗词中也明显流露出。1961年10月，郭沫若看了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后写一首七律，其中有“千刀当刮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之句。毛泽东在同年11月17日写了一首七律和郭老。其中唱道：“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域必成灾”。“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他担心将来中国也会出修正主义，发生“妖雾重来”。

第三，对党内的矛盾、意见分歧作了错误的、不符合实际的分析和判断。

在七千人大会前后，党内对出现困难形势原因的看法上有分歧。有的同志认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有的则认为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1961年5月31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1962年1月27日，他在七千人大会上又说：到底天灾是主要原因呢？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具体分析。就全国总的情况来说，“我们所以发生相当大的困难，一方面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这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一种委婉的表述。从后来的情形看，毛泽东对这种说法是有保留的。不过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在对形势的看法上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分歧。

七千人大会后，2月21日至23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发现当年预算有很大赤字。国民经济处于“非常时期”。5月，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会议，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会议认为，对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要有充分的估计和认识。刘少奇在会上讲：现在经济形势总的来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形势。针对当时有的干部害怕将困难估计过头而犯右倾错误的顾虑。刘少奇解释说：我看对困难形势估计过分危险性不大。我们估计有那么多困难后发现好一点，困难没有那么多，这好，这危险不大。对困难估计不够就危险，我们多少年都是因为困难估计不够而陷于被动。他这种看法，也符合毛泽东一贯的宁肯把困难设想多一点的领导方法。后来，他又说过：工业上要想退够，农业上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单干。刘少奇的讲话，也许个别用语不一定恰当，但他对形势的估计总的来讲是实事求是的。

在1962年8、9月时，农业形势开始好转，工业生产还继续下降。毛泽东在这时提出形势问题，认为党内一部分人对形势估计过于悲观。他在8月6日会上讲，有些同志曾经认为是一片光明，现在是一片黑暗，没有光明了。我们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是一片黑暗。现在一片光明的看法没有了，不存在。有些人思想混乱，没有前途，丧失信心，不对。他认为还是回到1959

---

刘少奇：《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37页。

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20页。

年庐山会议上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8月9日，在中心小组会上他又说：“要分析，不要讲一片光明，也不能讲一片黑暗。1960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了，或者大部分黑暗。”在会上，有的同志听了批评“一片黑暗”论后有压力。对此，毛泽东说：“你压了我那么久，从1960年以来，讲两年多了，我也可以压你一下么。”再联系到1966年8月他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指责刘少奇在1962年犯有右倾，从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在那时心里有怨气。在对形势的看法上，他与其他领导人实际上有分歧，但在严重困难面前又不好说。毛泽东一生喜欢挑战，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所以阶级敌人也好，自然灾害也好，在他看来算不了什么，都是可以战胜的。在严重困难面前，他虽然心情沉重，但对前途充满信心。但应当说，刘少奇对形势的估计并不是悲观的，也不是“一片黑暗论”。当时面对国际的反华浪潮，国内的严重困难，党内会不会有人悲观、失望呢？肯定是有的。毛泽东的批评如果是指一般干部和群众中对形势错误看法，这是对的。确实在困难面前，不应悲观，泄气，而应挺起腰杆，奋发图强去战胜困难。可惜，毛泽东指的不仅是一般的干部。另外，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如刘少奇所说：主要的倾向不是对困难估计过分，而是估计不足。

如前所述，1961年以来，包产到户等形式的责任制，在各地呈现发展之势。在中央工作会议前后，毛泽东批发了一些材料给大家参阅。其中有陶铸、王任重任在广西龙胜县座谈会的记录《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安徽省太湖县宣传干部钱让能写的《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报告》、河北省副省长胡开明写的《关于推广“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的建议》。钱让能自1952年起亲自办过互助组和农业社。1957年冬下乡当过八个月生产队长，1960年又到太湖县农村当过七个月大队党支部书记。他写的报告十分生动，真切，很有水平，有力他说明责任田是农民的一种创造，是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种好形式，责任田制度不是单干，不是资本主义。这个同志是在安徽省委已作出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定以后向毛泽东推荐的，是很有点勇气的。但这没有打动毛泽东的心。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反复批判“单干风”、“包产到户”。他说：任务是从分析形势提出来的，既然认为一片黑暗，任务的提法就不同；既然是一片黑暗，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而就全部或者大部单干。他指出：有些地委、省委书记（如曾希圣）就代表富裕农民，包产到户这股风越到上层就越大。他认为，包产到户实际上是解散集体经济，搞单干。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一方面是富裕、贪污、多占、放高利贷、买地、讨小老婆，其中包括共产党员，共产党的支部书记；一方面是破产，其中有四属（军、工、烈、干属）户、五保户。他认为：农村中的问题还是究竟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农业合作化还要不要？走哪条路。他批评邓子恢，你这次搞包产到户，马克思主义又飞走了。他进而说：党内有些人一有风吹草动就发生动摇，那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没有马列主义，他严厉指责：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场！言下之意，你们比赫鲁晓夫走的还远。

毛泽东在批评所谓的“黑暗风”、“单干风”的同时，还批评所谓的“翻案风”。七千人大会后，中共中央于4月27日发出了《关于加速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在中央通知指导下，各地对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了甄别、平反。在这种形势下，彭德怀在6月16日写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申诉自己没有“组织反

党小集团”，“没有里通外国”。毛泽东认为彭德怀的案不能翻。毛泽东对当时大规模的平反有看法。他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近来平反之风不对。真正错了，再平反，搞对了的不能平反，不能一律平反。抽象他讲，一律平反，是不对的。但问题是1959年反右倾是错误的，当时恐怕还是平反不彻底。毛泽东对平反的态度，反映了他对1958年以来“左”的错误缺乏根本的认识。

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他把党内认识上的分歧归结于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他说：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看来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从北戴河到北京的两个半月会议，是两种性质的问题。一种是工作问题，一种是阶级斗争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工作问题也有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问题，也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问题。由此开始，他由反对国际上的“修正主义”，进到反对国内的“修正主义”。

当时，全党全国人民面临最紧急的第一任务是解决吃饱饭的问题，是恢复国民经济问题。所以，他接受刘少奇等人的意见，指出：要吸取1959年庐山会议的教训，阶级斗争不要影响我们的经济工作。各地各部门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工作与阶级斗争平行，阶级斗争不要放在很突出的地位，不要因阶级斗争干扰我们的工作。

八届十中全会是毛泽东晚年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重要转折点，毛泽东虽然在八届三中全会上重新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规定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背离了“八大”的决议，但在实际工作中，他依然把经济建设当作党的中心任务，他自己也亲自抓，搞大跃进。十中全会后，从全党来看，经济建设仍是中心工作。但从毛泽东本人来看，他的主要精力则重新转向阶级斗争。他的这种转向势必最终导致全党的中心工作发生转向。

## 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与整“走资派”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一些地区进行了整社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河北省的同志在保定地区发现，人民公社存在着财务管理方面的问题。根据群众的要求，他们进行了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和清理工分的工作（简称“四清”，为了与后来的“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的大四清相区别，又称“小四清”）。在清查中发现一部分干部多吃多占、贪污盗窃、不参加劳动等问题，群众对此意见很大。1963年2月，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上介绍了湖南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河北保定地区进行“四清”的经验。他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次会议决定在农村普遍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在城市进行“五反运动”（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

同年5月2日至1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由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专门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会前，毛泽东收到关于农村阶级斗争情况和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报告材料二十件。依据这些报告和材料，毛泽东对我国农村及整个社会的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脱离实际的估计。他认为，当前农村中出现了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严重形势，可许多干部、党员对阶级斗争的严重性认识不足，甚至熟视无睹。他引用孙中山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话，并说：我

们现在是社会主义正在进行；有些地方民主革命尚未成功，要进行民主革命补课；还有一些地方，地主根本没有打倒，要重新革命，他指出，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在城市搞“五反”，在农村搞“四清”，就是挖资本主义的根子，修正主义的根子。他批评许多党员、干部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右倾。他在一个批语中是这样描绘当时形势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毛泽东又一次把阶级斗争放在首位，决定开展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他说：要抓重点，以前有本《香山记》开头就说：“不唱天来不唱地，单唱一本《香山记》”。天和地都不唱，单唱《香山记》，就是抓阶级斗争。这次会议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决定在全国分期分批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3年9月，中共中央依据各地试点的经验和情况，又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这时，从中央至地方的大批干部到农村、工厂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工作。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于1963年11月至1964年4月到河北省唐山专区扶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搞了一个展开“夺权斗争”的“桃园经验”。“经验”讲了运动的全过程。“经验”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比土改规模更大、范围更广、而且是更尖锐、更复杂、更深刻的一场大革命”；现在阶级斗争的焦点是阶级敌人千方百计搞和平演变，篡夺领导权。毛泽东赞扬王光美，批示要推广“桃园经验”。中共中央于9月1日，批转了这个“经验”，要全国所有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人都学习这一经验。这个“经验”在当时起了“典型”示范的作用，绝大多数工作队都模仿“桃园经验”的做法。

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再次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会议根据各地反映上来的片面的、表面的、夸大的情况，对阶级斗争形势作了极端错误的估计：全国基层政权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而在敌人和他们的同盟者手里。会议提出，要彻底发动群众，追查四不清干部在上面的根子。这实际上已把运动的重心放到整党内干部上。

9月，刘少奇主持修订了“后十条”，修订中吸取了“桃园经验”。毛泽东审阅批准了修订稿。修订后的“后十条”，变得更加“左”。在“后十条”和“桃园经验”指导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得越来越“左”。由于把农村阶级斗争看得十分严重，结果一个大队集中十几人以至数十人工作队队员，搞人海战术，搞神秘化的扎根串联，不仅干部因怕挨整而恐慌，就是一

般社员也感到紧张。毛泽东觉察到了这个问题。这年12月15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工作会议，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会后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23条”，1965年1月14日发布）。这次会议纠正了运动中某些“左”的过火的做法，提出：对干部要一分为二，要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改变了以往把所有干部都看成被整的对象和仅由工作队领导的错误做法；运动中不搞人海战术，不搞神秘化；运动中要始终注意抓生产。但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写进了正式文件。

关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文化大革命”中简称为“走资派”）的概念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如前所说，1964年5月，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就认为：农村基层政权有三分之一不在我们手里，要追查“四不清”干部在上面的根子。这年12月5日，他在谢富治关于沈阳冶炼厂的蹲点报告上批示：“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在经营方面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还更多些，要一个一个地查清楚，才知道。”毛泽东认为，这种“资本主义经营管理”的“主要来源”是上边。12月12日，他在陈正人关于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报告上批写道：“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批语中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的概念。批语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的对象，革命的对象，社教运动不能依靠他们。”这可以说：“走资派”的概念已基本形成，不过语言还不十分规范化。

在12月召开的全国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讲：地富是后台老板，台上是“四不清”干部。你不搞清干部，贫下中农通不过，迫切的是干部。这次运动的中心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你不从当权派入手，不行。他引了杜甫《前出塞》的“挽弓当挽强，射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的诗句，指出，要抓住当权派。当时，他认为，省委、部委也有烂掉的。有的部长、省委书记被擒下了马。

毛泽东指出重点整“走资派”还有一层意思，是要把大多数干部解放出来。在“后十条”、“桃园经验”的指导下，所有干部一开始都靠边站，成了挨整的对象。他认为，这样整，面太宽，伤人太多，要发生“左”的潮流。他提请大家注意，不要没有虱子，一定要捉虱子。四不清干部，贪污四五十元的、一百元的是多数，要先解放一批，退赔要合情合理，挤牙膏挤不干净，留一点也可以，宽大处理，要给出路。他举历史上陈平为例。他说：陈平宰肉甚均，他作宰相时贪污。周勃等人告发他，说给钱多的做大官，给钱少的做小官。刘邦找他谈话，说人家告你贪污。陈说：我养的人多，那是我没有钱呀！刘邦说，给你四万两黄金，搞统一战线，有了四万两黄金就不贪污了。在运动中，发现干部多吃多占现象比较普遍。毛泽东讲，多吃多占复杂得很哪！主要是我们这些人。我只有430元，有汽车、房子，有暖气，司机、秘书雇不起。他认为目前正在火头上，一、不可打击面太宽；二、不可泼冷水。他的意见：对一般干部的多吃多占和少量的贪污，不要揪住不放，要解放他们。

从12月20日会议上看：关于运动重点整走资派这一点，毛泽东与刘少

奇及其他领导人并无分歧。关于运动的性质，讨论中有不同意见。有三种提法：一、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二、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前两种提法是刘少奇根据“桃园经验”提出的。毛泽东主张第三种提法。在12月28日的会上，他讲：“常委谈过，又跟几位地方同志谈过，认为还是第三种提法较好。因为运动的名称即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四清教育运动，也不是什么矛盾交错的教育运动。”又说：“政治局常委觉得，大家讨论了也觉得，第三种提法较妥，较为适当，概括了问题的性质。”毛泽东的话表明，虽然讨论中有不同的提法，但并没有发生重大争论。“文化大革命”中有人认为，在这次会议上，在运动的性质和运动的重点问题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发生重大争执。这种看法，有待于确凿的材料来证明。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二十三条”，对当时运动中出现的一些极左的政策、做法有一定的纠正，中止了运动继续向极左方向发展；但另一方面，“二十三条”又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把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转移到党内，“左”的根本指导思想不仅没有纠正，反而以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在“左”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左”的实践，而“左”的实践反过来又促进“左”的理论的发展。这就形成了“左”的理论与“左”的实践的恶性循环，最后导致“文化大革命”。但是应当指出：（一）直至“文化大革命”前，全国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农村只占三分之一左右，城市的工厂只有少数单位进行试点。（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仅包括阶级斗争，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和管理制度方面的改革，运动中注意抓生产。

因此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虽然错整了部分干部，也伤了部分群众的积极性，但对解决干部作风、制止贪污盗窃、改进经营管理方面有积极作用。

### 三、意识形态领域里“左”的政治批判

毛泽东历来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诬陷小说《刘志丹》（上册送审样书）有所谓严重的政治问题，是为高岗翻案，向党进攻。在9月24日的会上，根据会议提供的材料，毛泽东说：“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个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的，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他在注意农村阶级斗争、党内思想斗争的同时也密切注视着意识形态里的斗争，文艺界的动向。

对文艺界的情况，毛泽东很大程度上是听信了江青的意见。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多次讲：有几年我害病多，为了恢复健康，医生要我参加一些文化生活，锻炼听觉和视觉。这样我就比较系统地接触了部分的文学艺术问题。哎呀，觉得这个问题就大啦！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的是资产阶级的、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她又说：1962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组织的。

八届十中全会后，文艺界根据全会精神检查工作。1963年3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5月，上海《文

汇报》发表文章，把孟超的新编昆剧《李慧娘》（内有鬼魂出现）和繁星（即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作为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从此开始了报刊上的一系列的公开点名批判。同年9月27日，毛泽东指出：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方面，大量的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少，在舞台上尽是些帝王将相。这样搞下去，三十年后就没有人看了。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为之检查，认真改正，如不改正，就改名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同年12月12日，他在柯庆施的报告上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社会经济基础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1964年6月27日，又对文艺界的整风报告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是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倒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毛泽东要求文艺界反映社会主义生活，表现社会主义时代的新人新事这是对的，但他对文艺界的估计和批评则不符合实际，全盘否定了建国以来文艺界的成绩。在批示的指导下，文艺界再次进行整风，并在全国报刊上对一批文艺作品进行批判。

1964年，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过火的政治批判从文艺界扩大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各个学术领域。哲学界批判了杨献珍、冯定，经济学界批判了孙冶方，史学界批判翦伯赞、吴晗。

1965年，在毛泽东的同意下，江青秘密在上海与张春桥、姚文元合伙，炮制《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把《海瑞罢官》同1961年的所谓“翻案风”、“单干风”联系起来。文章出来后，毛泽东表示赞同。并认为，文章没有击中要害。1965年12月21日，他在杭州同陈伯达、田家英、艾思奇、胡绳、关锋等人谈话时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田家英在整理毛泽东的谈话纪要时认为，毛泽东的上述话不过是顺便提到（这次谈话的中心是哲学问题），也不符合事实，因而和其他附带提到的话都不必记入谈话纪要。“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关锋告了密，田家英被诬陷为篡改毛主席的谈话。这件事成了田家英的一大“罪状”。

毛泽东把《海瑞罢官》与彭德怀联系起来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海瑞是中国历史上以刚正不阿、铁面无私而出名的“清官”。海瑞的故事、戏曲在民间广为流传。如何评价海瑞这个历史人物，是个学术问题，完全可以有不同意见，百家争鸣。毛泽东在1959年时并不否定海瑞，而且还提倡过学习海瑞。他本人也喜欢看海瑞的戏。在这年4月上海召开的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他针对当时干部队伍中不敢讲真话、实话的不良倾向，向大家推荐《海瑞传》，提倡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他还说，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但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这年6月，吴晗（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海瑞骂皇帝》一文。庐山会议前夕，胡乔木约请吴晗再为《人民日报》写一篇有关海瑞的文章。当时吴晗还答应写一个以海瑞

为主人公的戏。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区分左派海瑞和右派海瑞。吴晗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论海瑞》的末尾写上了毛泽东的这个观点。1959年下半年，在一次政协会上，北京京剧团团长马连良要求吴晗为他们写一出关于海瑞的戏。1960年底，戏写成，原名《海瑞》。后接受别人的意见，为区别其他的海瑞戏，改成《海瑞罢官》。1961年1月在北京首次演出。1962年，江青多次向毛泽东提出：《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毛泽东开始不同意，后来被说服了。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和彭德怀是“海瑞”的思想是受了康生的影响。从上所说。将《海瑞罢官》与彭德怀联系起来完全是一种主观的、随意的联想，并无事实依据。

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过火政治批判，是毛泽东阶级斗争扩大理论的产物，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过火政治批判、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则又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 四、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思考

如前所述，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的主要精力重新转移到阶级斗争方面，把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当作头等大事。他对我国社会阶级斗争形势和党内状况的估计是脱离实际的，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看法也有主观、片面之处。这是毋庸讳言的。但从战略上看，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即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警惕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

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战略的提出、形成有一个过程，毛泽东对防止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思考也有一个过程。

由于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社会主义只能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这样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势必出现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并存的局面。尽管社会主义国家从诞生之日起就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但帝国主义却总想千方百计地消灭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帝国主义的本性所决定的。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手段归结起来无非是两手；一手是硬的，实行孤立、封锁、禁运以至武装侵略；一手是软的，通过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外交等途径进行和平瓦解。帝国主义同时使用这两手，但侧重点则随形势的变化而有所不同。有时以硬的一手为主，软的一手为辅；有时则以软的一手为主，硬的一手为辅。一般说来帝国主义首先侧重于硬的一手，企图通过孤立、封锁、禁运、武装干涉等手段，将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扼杀在摇篮里。如1918年~1920年14个帝国主义国家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武装干涉；1950年美国发动侵朝战争；60年代美国发动侵越战争。当这一手失败后，它便在实力政策的基础上转向侧重于软的一手，搞和平演变。总的来说，在20至40年代，帝国主义对苏联主要采用硬的一手。

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形成于50年代后期。

---

1966年2月8日，毛泽东在谈话中说：“我说过吴晗文章的要害是‘罢官’，这是康生向我讲的，是康生的发明权。”在1966年4月和5月的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生讲：“六四年的时候，我曾向主席讲过，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有关，同彭德怀问题有关”。以后他又多次讲过类似的话。详见仲侃《康生评传》，红旗出版社1982年版，第175~176页。

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帝国主义出钱出枪，支持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妄图用反革命战争消灭共产党和人民武装，以便把中国变成美国的殖民地。无奈国民党反动派腐败无能，在人民解放军的反击下，节节败退，最后无可挽回地失败了。1949年7月30日，美国当时的国务卿艾奇逊致信总统杜鲁门，承认国民党的失败已成一种定局。但他不甘心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把今后在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受过西方教育的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者身上。艾奇逊说：“民主个人主义终将再起，中国终将推翻外来的羁绊。”他建议美国政府“对于中国目前和将来一切朝着这个目标的发展”，“都应得到我们的鼓励”。这是美国政府对华实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开端。8月，美国政府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和艾奇逊致杜鲁门的信。毛泽东及时抓住这一反面教材，亲自撰写《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五篇评论白皮书的文章，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玩弄的种种阴谋，教育中国人民，尤其是对美帝国主义存在某些幻想的知识分子（即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丢掉幻想，准备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作长期的斗争。毛泽东对“白皮书”的评论，揭开了同美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斗争的序幕。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帝国主义者竭力利用“秘密报告”，把它作为摧毁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武器。1956年5月15日，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有迹象表明，在苏联内部有较大的自由主义力量”，“如果这种力量在苏联内部继续发展，而且声势日大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也有理由希望，像我曾经说的，在十年或者一代人期间里，我们可以达到我们政策的伟大目标”。

匈牙利事件后，杜勒斯认为，改变共产党世界的性质是件可能的事。于是，他更加起劲地鼓吹和演变战略。1957年7月2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几乎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将要发生一种演进性的变化”。他认为，这种和平演变不是一、二代人所能实现的。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有记者问：“赫鲁晓夫的孙子是否将有自由了？”杜勒斯回答：“我并没有对这件事定过日期，但是，我愿意这样说，如果他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孩子，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帝国主义者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的出处。

1958年10月24日，杜勒斯从台湾回到美国立即发表声明：扬言要用“和平方法”改变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

同年12月4日，杜勒斯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的演说中提出：美国应“使中苏集团内部的政府政策加速演变，使其越来越谋求它们自己境内的人民的福利，而不是利用这些人民来征服世界。”他认为，应“全力以付地执行”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用和平手段取得胜利”的“高尚战略”。

1959年1月28日，杜勒斯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上提供的证词中说：“基本上，我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的演化，从而使它不再成为对世界自由的威胁，只管它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法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和野心。”

过了三天，即1月31日，他在纽约州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的演说中说：要以“法律和正义”代替武力。“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

总之，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尤其是在匈牙利事件之后，作为帝国主义代言人的杜勒斯愈来愈把和平演变作为帝国主义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战略方针。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毛泽东十分推崇的《孙子兵法》中的名言。军事斗争是这样，政治斗争也是这样。毛泽东历来重视对敌人的研究，把敌人视为反面教员。他很重视杜勒斯的言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就引了杜勒斯有关和平演变的话，指出，敌人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杜勒斯在给我们上课了。

1958年3月10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讲：《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公布后，《纽约时报》全文登载，并发表文章说，这是“中国自由化”。资产阶级要灭亡，见了芦苇当渡船，那是很自然的。但资产阶级政治家中也不是没有见解的人，如杜勒斯听到我们的文章后说，要看看。不到半个月，他便作出结论，中国坏透了，苏联还好些。

1958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同协作区主任谈话时指出：杜勒斯比较有章程，是美国掌舵的。杜勒斯讲五大问题：民族主义、南北极、原子能、外层空间、共产主义。这个人是想问题的。要看他的讲话，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要翻英文字典。他又说：杜勒斯是真正掌舵的。省委要指定人看参考资料。

1958年12月23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全军政工会议的各军区负责同志的谈话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崩溃的危险，如果大家不警惕就不好。美国的事情是杜勒斯在办，杜勒斯是美国政府的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或者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是文森豪威尔的灵魂。杜勒斯这个人是“好人”，办了不少“好事”，对无产阶级团结和对帝国主义作斗争有益。

1959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一次小型会议，讨论国际形势。会前，他要自己的国际问题秘书林克找出他看过的杜勒斯有关和平演变的一些讲话给他。林克选了三篇，即1958年12月4日杜勒斯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发表的题为《对远东政策》的演说、1959年1月28日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秘密会上的证词、1959年1月31日在纽约州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发表的题为《法律在和平事业中的作用》的演说。毛泽东阅后同林克谈了他对杜勒斯三篇讲话的看法，并要林克根据他的谈话内容在杜勒斯每篇讲话前拟一个批语。会议印发了杜勒斯的讲话及批语（批语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翻印流传）。

11月12日，毛泽东在会上又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和说明。他说：“这三个材料都是关于杜勒斯讲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问题的。比如杜勒斯今年1月28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上作证时说：基本上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还是这一次演说，杜勒斯说：要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仗不打，要搞法律同正义。杜勒斯又说：在这方面极力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笑声）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容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杜勒斯这段话表明，由于世界社会主义力量日益强大，世界帝国主义阵营陷于孤立和困难的境地。……所以美国企图利用更富有欺骗性的策略来推行它的侵略政策和扩张野心。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它不侵略呀！美国在标榜希望和平的同时，正在加紧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阴谋手段来达到挽救帝国主义的颓势，实现它的侵略野心的目的。这就是，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毛泽东最后说：“去年这一年。……世界力量对比越来越不利于帝国主义，……但美国不仅没有打算放弃实力政策，而且作为实力政策的补充，美国还企图利用渗透、颠覆的所谓和平取胜战略。……它也是要和平取胜呢！摆脱美帝国主

义陷入无情包围。这个‘陷入无情包围’是杜勒斯自己的话，‘从而想保存自己，保持资本主义，消灭社会主义。无非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嘛，资产阶级要消灭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嘛，而我们要消灭他那个反革命力量嘛！这是杜勒斯的演说，希望大家看一看印的这个文件。’毛泽东的这次讲话对杜勒提出的和平演变战略的背景、和平演变战略的实质、和平演变战略与实力政策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等作了深刻的说明。

12月初，毛泽东在杭州再次召集有关人员讨论国际形势及对策问题。他在《关于国际形势讲话提纲》中除了谈到敌人的战争策略外，又谈到和平策略。他说：“和平旗子，文化往来，人员往来，准备用腐蚀、演变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基本原则。”

这两次会议表明：毛泽东要求全党，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警惕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

进入60年代后，毛泽东更加密切注视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我国的舆论工具不断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揭露帝国主义的在和平烟幕下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的战略阴谋，并批评赫鲁晓夫散布美化美帝国主义的错误言论。1964年1月12日，毛泽东在《支持巴拿巴人民反美爱国正义斗争的谈话》中指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也严重地威胁着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它还力图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的政策，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瓦解社会主义阵营。”同年6月16日，他在党的重要会议上郑重地说：帝国主义说我们第一代没有问题，第二代也变不了，第三代、第四代就有希望了。帝国主义这个希望能不能实现呢？帝国主义这个话灵不灵？我希望它不灵，但也可能灵？为了防止第三代、第四代出问题，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专门讲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

毛泽东早就指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帝国主义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能不能得手，关键在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如何。为此，毛泽东一再提出，要警惕出修正主义，尤其要警惕党中央出修正主义。1965年8月，他在一次谈话中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为了防止和平演变，他先是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继之，又发动“文化大革命”。

到了70年代，国际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1971年2月，毛泽东抓住时机，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由此中国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领域的交往出现了新的局面。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是由于中美双方在国际关系中的互相需要，也是由于中国的日益强大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尼克松以反共著称，是右派。毛泽东喜欢同右派打交道。他甚至在同尼克松第一次见面对也直言不讳地对客人讲：我喜欢右派。他幽默而意味深长地说：右派当权我比较高兴。中美关系缓和、正常化。决不要中美双方放弃了自己原有的政治立场和理想信仰。当然，毛泽东又机智而风趣地对尼克松说：“你，作为个人，也许不在打倒之列”。“如果你们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1976年1月

---

详见林克的《回忆毛泽东对杜勒斯和平演变言论的评论》，《党的文献》1990年第1期。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2页。

1日，毛泽东在接见尼克松的女婿、女儿时又说了同样的话：“我喜欢右派，你岳父算右派吧？”在毛泽东看来，尼克松虽然在打开中美关系上做了件好事，成了老朋友，但尼克松是右派，这一点不能模糊。而尼克松呢？他也十分了解毛泽东的立场。1976年，毛泽东又一次会见来华的尼克松。尼克松在《真正的和平》（1984）年一书中提到这次会见的情形：“他（毛泽东）问我：‘和平是你的唯一目标吗？我回答说，我们的目标是和平，但这种和平不光是不打仗。我对他说，这种和平必须是一种保持正义的和平。’倘若我用仅仅强调和平友好的必要性的论述来回答毛泽东的这个问题，他不但会认为我的看法是错误的，而且还认为，我是个傻瓜。”确实，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尼克松，都清楚对方具有自己坚定的立场和信念，都决不会被“和平”、“友好”、“老朋友”之类的词句所迷惑。

如何评价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

我认为，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是他晚年留给我们的一份重要遗产，具有两重性，其中既有深刻的、富有远见的战略思想，也有对现实情况的主观主义的估量和理论上的偏颇。因此，我们对它不宜作绝对的肯定或绝对的否定，而应作具体的分析。

作为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作了毕生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的毛泽东，他以下的思想是深刻的：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除了警惕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颠覆外，还要防止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防止和平演变，最重要的是搞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警惕党内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除了要有正确的理论，路线和政策外，还要注意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

受历史条件的局限，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也有严重的失误之处。这主要有：第一，对当时我国社会阶级斗争形势和党内状况的主观主义估计，过分夸大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第二，只着眼于从阶级斗争角度来思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忽视了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忽视了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是新制度战胜旧制度的最重要的保证。第三，只看到右的、修正主义的危险性，没有认识到“左”的、教条主义同样可以葬送社会主义。第四，只注意到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忽视了民主和法制的建设，忽视了从制度上来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毛泽东的这些失误是导致他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总的长河看，全世界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需要几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因此，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在一个很长历史时期里和平共存，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这种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共存，既是双方斗争的结果，又是双方互相的需要。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只讲斗争，否认在一定条件下在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文化、生态保护以至军事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在实行对外开放时，我们又不能丧失警惕。“国际反动势力从来没有放弃敌视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立场。从50年代后期开始，他们在武装干涉的一手失败后，就把政策重点转向和平演变，运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手段，利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暂时困难和实行改革的机会，进行渗透，施加影响，支持、收买所谓‘持不同政见者’，

培养对于西方的盲目崇拜，传播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价值观念以及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在他们认为有机可乘的时候，就制造谣言，挑起事端，策划动乱，进行颠覆活动。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国际敌对势力也正在从这里找到了他们实行‘和平演变’‘战略的根据’。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是长期的。对于这一点，全国各族人民、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保持高度的警觉。”这是党中央根据新的形势、新的历史经验所作出的概括和总结。

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是以它的实力地位为基础的，是作为实力政策的补充，而它在加紧推行它的和平演变战略时，丝毫也没有放松它的实力政策，放松它对军事力量的加强。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阴谋之所以能在苏联和东欧得逞，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客观原因之一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处于优势，相比之下，进入 70 年代以后，苏联和东欧在经济上处于停滞状态，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得不到满足，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失去信心。因此，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和平演变的最重要的基础工作。这是我们在进行反和平演变教育时必须注意的一个基本观点。至于想重新以反和平演变来冲击、取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左”的观点则更是错误的。

邓小平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他又说：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份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以后，谁来保险？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值得我们重视。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国际国内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毛泽东防止和平演变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我们防止和平演变、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指针。

### 第三节 进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教育

#### 一、“不厌其烦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毛泽东历来重视干部哲学教育。在 1957 年，为了克服人们思想上的形而上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他提出：“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在莫斯科会议上，他侃侃而谈，讲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并指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观念，关于辩证法，需要作广泛的宣传”，“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1963~1965 年，毛泽东又多次提倡学哲学，尤其是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不过应该注意，这次学哲学是在重提阶级斗争的背景下进行的。

毛泽东认为，许多干部对中国社会存在的阶级斗争的严重性认识不足，究其原因主要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用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不懂得马克思主义认识论。1963 年 5 月，他在杭州会议上讲：事物有现象有本质，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现象和本质是对立的统一。本质是看不到的，要透过现象去抓本质。比如，干部不参加劳动，势必会产生修正主义。又比如，平常我们走路看不到蚂蚁，大踏步就更看不到了，要蹲下来，才能看到蚂蚁，才能看到很多东西。否则不仅新鲜的萌芽的东西看不到，就是大量普遍存在的的东西也看不到。比如阶级斗争和干部不参加劳动是大量存在的，有些人却看不到。

毛泽东又指出，调查研究中也有两条认识路线的对立。他说：调查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大胆的主观的假设，小心的主观主义的求证。这是很坏的方法。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河北省保定地委关于“四清”的调查就是这种方法。保定地委开始并不是去搞“四清”，是去搞分配，群众不同意，提出搞“四清”。保定地委听了群众的意见，改变了计划，搞了“四清”。这才是真正的调查研究。毛泽东的这一论述，非常正确，非常重要。建国以来，不是没有搞调查研究，而是搞调查研究的态度、方法有问题。可以说许多调查是主观主义的，不是为了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作调查，而是为了论证现有结论、政策去寻找证据。社会现象是纷繁复杂的，罗列一大堆例子，寻找个别的例证是毫不费毫力的。这一点列宁（还有黑格尔）早就指出过。主观主义的调查方法之所以流行，当然有思想路线的问题，但最根本的还是政治上的原因。因为领导喜欢这样。领导者对下级送上的与现行政策、与自己意见相反的调查报告，往往加以打击。

在杭州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为了造成调查研究的风气，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要在日常工作中讲哲学，对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教育，要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成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他指出，哲学并不难，不要把哲学看得那么神秘，哲学是可以学到的。我看过雷锋一部分日记，这个人就懂得一点哲学。

为了引起全党同志的注意，也为了对全党同志进行辩证唯物论认识论的教育，他在《前十条》一开头就写了一大段认识论（即《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其中指出：现在我们的同志中，很多人不懂得马克思主义认

---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62 页。

毛泽东，《党内团结的辩证法》，《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89 页。

认识的道理，“因此，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

根据毛泽东讲话的精神，《前十条》的第十个问题，亦即最后一个问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问题”。文件写道：“事实证明，有许多问题，并不难发现，也不难解决。重要的在于我们的同志能不能接近群众，会不会做调查研究工作，会不会把群众中间的分散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并且经过酝酿讨论，在领导干部中取得认识上的一致”。文件又说：我们的不少同志，“并不懂得或者不甚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革命的认识论，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还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他们常常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既然这样，那他们的调查工作就不可能做好。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力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在一个不长的有关农村工作的文件中，专门讲认识论，这是前所未有的。这表明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哲学的重视。

1964年9月25日，毛泽东在致刘少奇的信中又指出：“我们的干部中，自以为是的很不少。其原因之一，是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因此，不厌其烦地宣传这种认识论，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不按照这种认识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则官越大，真理越少。大官如此，小官也是如此。”

从上可以看出：毛泽东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教育出发点是双重的：一方面是让广大干部掌握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以便科学地进行调查研究，纠正错误，克服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另一方面就当时的直接目的而言，主要是为了解决干部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右倾”。正是后一方面导致了以下的情况：一方面是从中央到地方的成百万干部到农村、工厂去蹲点，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且时间不短，半年、一年，以至更长；可另一方面，全党对阶级斗争形势的认识却越来越远离中国现实，陷入了主观主义。

毛泽东提出对干部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是有战略意义的，因为处于执政党地位的干部，容易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命令主义的错误。至于这次认识论的教育未能收到好的效果，这又是令人十分遗憾的。

## 二、“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

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基本内容是什么？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作了集中论述。如前所述，这篇短文原来并不是一个单篇文章，而是《前十条》的一个引言。该文只有一千多字，但言简意赅，通俗而精辟地略述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基本观点。这篇文章是对建国13年以来，尤其是1958年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认识论总结，是《十年总结》、《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哲学思想在理论上的升华，丰富和补充了《实践论》。

（一）社会实践的三种基本形式在《实践论》中，毛泽东论述了实践的形式问题，指出生产实践是人类社会实践的基本形式，此外还有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等其他形式。文中提到“物质生产过程”、“阶级斗争过程”、“科学实践的过程”，又提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但由于只是在论述其他问题时顺便提到的，因此没有为哲学家们所注意，其中尤其没有注意到科学实验。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开宗明义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下掉下来的吗？不是的，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的。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他在同一时间写的上面已引过的批语中则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称之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这样毛泽东就更明确地把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规定为社会实践的三种基本形式。

毛泽东所讲的科学实验的含义是什么？只是指自然科学实验，还是既括自然科学经验，又包括社会科学上的试验？当时人们的理解不一。1964年12月，聂荣臻在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间：科学实验的含义是什么？毛泽东说，我讲的科学实验，主要指自然科学实验。社会科学、哲学、政治经济学、军事科学不能搞实验。商品、价值法则不能搞科学实验。战争不能搞科学实验。辩证法不能搞科学实验，理论法则是概括出来的。军事演习不能搞实验。毛泽东也许感到社会科学不能搞实验说得过于绝对，欠妥，故又说：社会科学一部分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搞科学实验。毛泽东的这一补充是必要的。在社会科学方面，有的不能搞科学实验，但有些应用科学是可以搞的。如教育学就离不开实验，这就有所谓的“实验小学”、“实验中学”。改造社会的某些政策，先要搞“试点”。“试点”也带有实验的性质。在今天，军事演习也可以搞实验室。不过，我认为，毛泽东讲他所说的科学实验主要是指自然科学的实验这一点也是重要的。因为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之一的科学实验，作为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相并列的认识基本来源的科学实验，主要是自然科学实验。

毛泽东把科学实验提到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同样重要的地位，是发前人之未发，有重要意义。科学实验是在生产实践基础上发展出来。到了近代，科学实验成了一种独立的实践形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科学实验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现代许多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以科学实验为先导的。毛泽东把科学实验看成是建设强大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革命运动之一，是基于他对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伟大作用的认识。

1964年12月，毛泽东在听取聂荣臻等汇报新的十年科学技术规划时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仗，一定要打好，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府、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他把科学技术看作生产力。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一向比较注意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1973年7月17日，毛泽东接见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杨振宁说：“毛主席，您看得很远，看到社会的将来，您把科学实验与阶级斗争、

生产斗争一起提，很重要。”毛泽东回答：“没有科学实验行吗？”确实，没有现代化的科学实验，就没有现代化的科学，没有现代化的技术，也就不可能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毋庸讳言，毛泽东关于“三大革命运动”的提法存在着过分夸大“阶级斗争”作用的缺点。在社会主义社会，虽然还存在着阶级斗争，但它是一种特殊形态的阶级斗争，已不同于历史上的阶级斗争，不再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

## （二）“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把人的整个认识过程概括为由实践到认识和由认识到实践的两个大阶段。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毛泽东作了进一步的概括。他将由实践到认识的第一段，看成是“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维的阶段”；将由认识到实践的第二阶段，看成是“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

由思维到存在的阶段”。他认为，认识的过程，就是由物质到精神，再由精神到物质的过程。他指出：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可我们的许多同志觉得不可理解。有人认为，物质变精神，可以理解，精神变物质不好理解，精神怎么能变物质呢？针对这种疑问，毛泽东在1963年5月11日讲话中说：

“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也可以变物质，说精神不能变物质，人民大会堂还不是工程师、工人变成的。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就说的是精神变物质。”南昌研究所一个青年说，物质变精神可以理解，精神变物质大部分可以解释，但变石头则不能解释。对此，毛泽东在1964年3月20日同人谈话中说：大理石有许多种，有自然的，有人造的，人造的大理石是不是石头？人民大会堂的大理石很多不是山里的，是人造的。人为什么能造大理石？因为理解了大理石的化学结构。化学这门学问是一门精神的学问，写在书上变成思想，然后再变成物质。

物质变精神，决不是物质本身变成了精神，而是指人们在实践过程中正确地反映物质世界，通入脑的加工制作将物质形态转化为观念形态的精神产品。精神变物质，也不是精神本身变成了物质，而是指人们在实践中依照已获得的认识来改造物质世界，将观念形态的精神产品外化为物质产品。这种现象确实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基础是社会实践。

毛泽东关于“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论断唯物而辩证地解决了物质与精神、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也是对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争论的总结。在哲学界，有人认为毛泽东的这一论断是属于认识论的命题，又有人认为，这一论断不仅是属于认识论的命题，而且也是属于本体论的命题。两种观点曾发生过热烈争论。依我之见，这种争论是多余的。因为在毛泽东的思想体系中，本体论与认识论是一回事。“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论断，把本体论与认识论统一起来了，科学地解决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划清了辩证唯物论同唯心论、不可知论、机械唯物论的界限。

“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离开了社会实践，就不可能科学地说明物质变精神和精神变物质，不能科学地解决哲学的基本问题。实践是人类有目的有意识地改造客观世界的一种物质活动，离开了物质与精神，也不可能有科学的实践观。所以，“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

的论断将哲学中的三个最基本的概念物质、精神、实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论断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能动作用不仅表现于认识的第一阶段，即由实践到认识，由物质到精神的飞跃，更主要表现于认识过程的第二阶段，即认识到实践，由精神到物质的飞跃。他指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他又说：认识过程中的第二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目的。”

物质如何变精神，精神如何变物质，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认识论问题，甚至可以说是整个认识论中最难、最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毛泽东的短文没有触及这问题。

（三）一个正确认识需要反复多次才能完成如前所述，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结合党的历史阐述了认识过程的曲折性、复杂性。《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对此作了进一步的理论概括：“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1964年8月20日，他同李雪峰等人谈话中说：“我们不会搞社会主义，大家都没有搞过嘛！我没有搞过，你们会吗？搞了十几年，有了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经验，现在才有些经验了。经过北戴河会议、十中全会，略微动了一下。到了1963年5月杭州会议，搞了第一个十条。前面的序言是我写的，说人的认识事物是不容易的，正确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客观事物反映到我们脑子里可不容易啦。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现在看来，八届十中全会、《前十条》对我国社会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和认识是错误的。这就进一步证明了认识的曲折性。

还是在8月20日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人是由蠢慢慢变聪明的。无论什么人，都是由不知到知，由少知到多知，至于全知的人，没有那回事。马克思知道多一些，但也不是全知。我们就不用说了。单是社会科学有几百门，你能全知？戏有几百种，你们都懂？河北的戏有七十种，你们都熟悉吗？有的看也没有看过。”他又说：“全知也不合理。全知等于不知，一样都不精嘛！自然科学有几百门。怎么学得了？一个人只能活几十年。”全知全能的思想是一种唯心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是宗教思想，基督教宣扬全知全能的上帝。

毛泽东还指出：“一切真理开始总是在少数人手里，总是受到多数人的压力，这是一个规律。”他以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安眠药的发明过程等为例进行了说明。他又说：“在核算单位下放问题上，当时少数人代表了全国大多数，多数人并不代表全国大多数。我们这些人常常是要犯错误的。”正是基于这一规律，要实行双百方针，要注意听取少数人的意见，允许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人总是会犯错误的。对自己要有自我批评精神，不要自以为是，一贯正确，不要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对别人，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一棍子打死，就上纲为立场问题、世界观问题，要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一道工作。

认识过程的曲折性、复杂性还表现在实践对认识检验有其不确实性、相对性的一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实践标准的确实性、绝对性。但实践对真理的检验要有一个过程。毛泽东指出，一般说来，人们的思想在实践中，“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面，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无论在自然斗争或社会斗争中，有些时候，在当时看来是“成功”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后的实践证明是失败的。有的情况下，在局部看来、眼前看来是成功的，但是在全局看来，长远看来却不可行，是失败的。在另外的情况下，在局部看来、暂时看来是失败的，但并不由此就证明将来不会胜利。今天，社会主义在有的国家虽然遭到挫折、失败了，但并不等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规律不能成立，并不等于社会主义事业失败了。因此，对实践中的成功与失败要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不可采取实用主义态度，不能“成则王侯，败则贼”，简单以成败论英雄。

### 三、毛泽东认识论的优点与不足

从理论上讲，《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正确的，它的锋芒主要是反对唯心论。可是就整个《前十条》来讲，明显有“左”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这是一个矛盾。

1963~1964年，毛泽东大力提倡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教育。

1964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学习毛泽东四篇哲学论文（《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的指示，全党出现了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热潮。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从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先是中央和省一级干部下去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1963年5月，《前十条》下达后，更多的领导干部下去蹲点，调查研究。到1964年下半年，全国则有数百万的干部（包括大学教师、大学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么多干部到农村、工厂，时间又这么长，这是建国以后从未有的。照理讲，全党对中国社会情况的认识应当更趋于正确，可事实却相反，全党对阶级斗争形势的认识越来越脱离实际，这又是一个明显的矛盾。

如何解释这类矛盾？出现上述矛盾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最主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指导思想出了问题。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理论方面犯了扩大化的错误，结果把许多并非阶级斗争的现象说成是阶级斗争。二是毛泽东的认识论本身有局限性。

毛泽东的认识论有非常明显的优点，强调实践与群众在认识中的作用，抓住认识与实践这一对基本矛盾来讲认识论，从宏观上揭示了认识运动过程的根本规律。1964年9月25日，他在致刘少奇信中提出不厌其烦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了更为简洁的概括：“简单地说，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就能听到群众的呼声，就能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变为主观真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如果行不通，则必须重新向群众的实践请教。这

样就可以解决框框问题，即教条主义问题了，就可以不信迷信了。”毛泽东讲认识论，重点放在批评脱离实践、脱离群众的唯心论上，他把人脑比作一个加工厂，注重加工的原料来源。他的认识论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点：简明，扼要，易懂，不搞烦琐哲学。

1964年8月24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关于从实践到感性认识，再从感性到理性的飞跃道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讲清楚。列宁也没有讲清楚。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只讲清了唯物论，但是没有完全讲清楚认识论。这个道理，中国古人也没有讲清楚，老子、庄子、墨子、张载、李卓吾、王船山、谭嗣同都没有讲清楚。我认为可以说，毛泽东从总体上，从宏观上将实践与认识、感性认识与理论认识的关系讲清楚了，从宏观上讲清了认识的辩证过程。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重大贡献，也是他认识论的最大优点。毛泽东认识论的最大优点，同时又是他认识论的一大局限，因为他讲认识论始终没有超出这样的范围：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从群众中来，又回到群众中去”。他对认识如何从实践中来，感性认识如何上升为理性认识、理性认识又如何回到实践中去等问题没有加以具体论述，对认识过程中思维的作用、思维的形式、思维的规律、思维的方法等缺少研究。而这方面的问题，正是认识论中最细微复杂的难题，需要将认识放在“显微镜”下加以分析、综合。在认识活动中，原料自然十分重要，脱离实践、脱离群众，认识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然不行。但这是获得正确认识的前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有了原料，即使是丰富的、优质的原料，大脑加工制作出了问题，仍然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正如工业生产中同样的原料，但由于工厂设备不同，加工制作的工艺、方法不同，工人的技术水平不同，最后的成品也不同。因此，认识的原料固然重要，对原料的加工制作更重要。影响加工制作的因素很复杂：有立场、观点、方法问题，认识能力问题，知识结构问题，个人的性格、兴趣爱好、情绪问题，以至身体状况问题等。从认识论上来讲，主要是研究加工制作的方法亦即思维的形式、方法、规律问题，这也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狭义的辩证逻辑问题。毛泽东讲认识论，只是从宏观上讲，而未能深入到思维领域。在五十年代中后期，他对形式逻辑、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关系很感兴趣。1961年，他同李达谈话时曾说，他想研究辩证逻辑。这也许是毛泽东想弥补自己的不足，但苦于没有时间。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批评教条主义，也批评经验主义，号召学理论，学哲学。他的《实践论》批唯理论，也批经验论，这些都应肯定。将毛泽东的哲学说成是经验论是错误的。但也应承认，毛泽东对辩证思维研究不够。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现实阶级斗争的主观主义估计的原因之一，是将马、列某些论断教条化，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原因是把社会生活中个别的、局部的、表面现象加以片面夸大，当作事物的本质与全体；把个别的、甚至是错误的经验误认为正确的、普遍的；把非阶级斗争的问题说成是阶级斗争问题。所以，广大干部虽然在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论文，虽然在农村、工厂与工人、贫下中农“三同”，搞调查研究，虽然有大量的感性材料，但由于加工、制作、改造有问题，由于“左”的阶级斗争观念在起作用，因而仍然不能得出近于实际的结论。在这方面不仅存在着错误的理论与错误实践的恶性循环。还存在着上级领导的错误与下级领导错误的恶性循环，毛泽东根据由

下面送上来的、不够实事求是、甚至是完全不符事实的材料，作出了夸大阶级斗争的判断，而毛泽东的错误判断，反过来又影响了全党干部，产生了更错误的材料和报告，这样的错误的材料和报告再送到毛泽东那里，又会使毛泽东的认识起变化。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竟然得出建国 15 年后“三分天下有其二”、“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结论。如何防止类似的恶性循环出现，这是党的领导工作中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

最后还应指出的是：毛泽东认识论的这种不足也影响到中国哲学界。在五、六十年代的哲学教学中，大部分教员基本上参照《实践论》的体系讲认识论。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亦是如此，该书没有辩证逻辑的内容。直至八十年代，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变。

#### 第四节 哲学体系改造的设想

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围绕着阶级斗争、“反修”“防修”的主题，不仅从认识论上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进行反思，提出改造哲学体系的设想。

毛泽东关于哲学体系改造的想法并不是这时期才有，他在 1937 年编写《辩证法唯物论提纲》时就有所考虑。这个提纲虽然从内容上（《实践论》、《矛盾论》除外）基本上取材于苏联三十年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新哲学大纲》、《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三本著作，但在体系的安排上则有他自己的特点，书中“物质论”、“运动论”、“时空论”、“意识论”、“反映论”、“真理论”、“实践论”等的标题反映出毛泽东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意向。因为中国古代哲学家就有“齐物论”（《庄子》）、“白马论”（《公孙龙子》）、“天论”（《荀子》）、“崇有论”（裴頠）、“神灭论”（范缜）等为篇名的传统。毛泽东认为，现在中国许多辩证法书，不是错误，就是写得不好，或不太好，使人望而生畏。他对自己的书也不满意，但他有志于在将来写出一本好书来。其后，他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写出了许多充满哲学色彩的军事、政治、文化和党的建设方面的论著。由于繁重的领导工作，他不可能像专门的哲学家那样去著述教科书式的专著，构造自己哲学思想的逻辑体系，以实现自己的宏愿。

至于为什么毛泽东在 1963～1965 年又重新提出哲学体系的改造，我认为，这很可能同他对“反修”“防修”的思考有关。在他看来，苏联出现“修正主义”，这与斯大林哲学思想的缺陷有联系。为了从根本上防止出修正主义，有必要将斯大林时代延续下来的哲学体系加以改造。

这一时期毛泽东关于哲学体系改造的意见反映在他的许多讲话、谈话中，其中主要集中在 1964 年 8 月 18 日和 24 日、1965 年 12 月 21 日的三次谈话里。

##### 一、“要搞实际的哲学”

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理论工作者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就会变成修正主义。因此，他提出：知识分子、理论工作者要到农村、工厂参加阶级斗争。1964 年 2 月 13 日，毛泽东在“春节谈话”中说：“书不一定读得太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也不能读得太多，读十几本就行。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有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在此之前，1 月 8 日，毛泽东在同《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谈话时提出：“《人民日报》要注意发表学术性文章，发表历史、哲学和其他的学术文章。”“抓哲学，要抓活哲学。”

这年 8 月 18 日，他在同陈伯达、康生等人谈话时一开头就说：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哲学家们应当下乡去。今冬明春就下去，去参加阶级斗争。他批评大学文科现在的搞法不行。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不行。书本里怎么能出哲学？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科学社会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基础是阶级斗争，然后才能研究哲学。搞哲学的人，以为第一是哲学，不对，第一是阶级斗争。压迫者压迫被压迫者，被压迫者要反抗，找出路，才去找哲学。从这一点出发，才有马列主义，才找到哲学，我们都是这样过

来的。他提出：文科的大学生、教授、助教统统下去，去搞阶级斗争。那是个大学，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他的结论是“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哲学。”

哲学作为一门学问产生于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裂之后，产生于奴隶社会。从这种意义上讲，“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是大体符合历史实际的。在阶级社会，哲学是有阶级性的。任何哲学都是为一定阶级、阶层、政治集团或派别服务的。哲学的命运看满足阶级的需要而定。在阶级社会，阶级斗争决定哲学。从这种意义上讲，阶级斗争是第一位的。当然，就是在阶级社会，哲学的水平、形态依然受着生产斗争和科学（主要是自然科学）的制约。哲学是处于社会意识形态的顶端，具有相对独立性。哲学不等于政治。因此，又不能把哲学与阶级斗争关系简单化。在今天的世界上，在社会主义社会，哲学依然是阶级斗争的武器，阶级斗争依然是推动哲学发展的动力之一。但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的作用已有所减弱，毛泽东依然认为“第一是阶级斗争”的说法是欠妥的。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还批评哲学界的缺点是没有搞实际的哲学，而是搞书本的哲学。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要求理论工作者分期分批下去，参加阶级斗争。这也是这次谈话的主要用意。

8月30日，毛泽东在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说：比较起来，我国文科最落后，就是因为接触实际太少，无论学生也好，教师也好，都是一样，就是在课堂里讲课，讲哲学就是书本上的哲学。如果不到社会上、人民中间去学哲学，不到自然界去学哲学，那种哲学学出来就没有用处，仅仅懂得点概念而已。

在1965年12月21日的谈话中，毛泽东说：“你们搞哲学的，要写实际的哲学，才有人看，书本的哲学难懂，写给谁看？”又说：“希望搞哲学的人，到工厂农村去搞几年，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不要照过去那样写、不要写那么多。”他认为，大学教育应该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他提出：“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吗？”他又一次讲：“你们都是洋哲学，我是土哲学。”“写哲学能不能改变过去形式，要写通俗的文章，要用劳动人民的语言。”

毛泽东对哲学界的批评对吗？我认为其中虽有合理之处，但总起来看是偏颇的，当时的哲学界总的说是联系实际的。如果说这方面有缺点的话，那是在联系实际时缺乏科学性，往往盲目地用哲学为现行的政策作辩护。

毛泽东要求搞实际的哲学，不要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改变现在教科书的写法，这对吗？我认为总的来说是对的。哲学处于意识形态的顶端，具有高度的抽象性、概括性。有人据此便认为，哲学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本身具有思辨性的特点，不思辨就不算哲学。持这种观点的人，对毛泽东提出哲学的解放，搞实际的哲学，很不以为然，甚至加以非议。我认为，这种认识有片面性。哲学确有高度抽象的一面，但哲学还有它具有最大普遍性的一面，生活中处处有哲学，时时有哲学。因此，哲学既是最抽象的学问，又是最实际的学问。晦涩、思辨、难懂并不是哲学固有的。也不是所有哲学都有的。在西方哲学中，德国哲学比较思辨、晦涩，而法国哲学则不怎么思

辨。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康德、黑格尔的哲学很费解，而费尔巴哈的则好懂得多。思辨、难解并不是康德、黑格尔哲学的优点，而是他们的不足。

哲学作为一门科学，它离不开对概念的定义和分析，对基本原理的推理和论证。如果把这也称之为从概念到概念，那就欠妥了。哲学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实践。一个脱离社会的人，一个不关心社会发展的人，是不可能对哲学的发展作出贡献。费尔巴哈之所以没有前进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在四十年代后，他在穷乡僻壤过着农民式的孤陋寡闻的生活。社会实践给哲学家以各种启示和极大的动力。书斋里不能出哲学家，书本上不能出哲学家。毛泽东要求哲学工作者深入社会，接触工农群众这是对的。但哲学的发展最终是通过哲学家对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社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实现的。毛泽东在谈话中也提出：“要研究自然科学史，不读自然科学史不行”。“哲学研究工作要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的历史过程”。哲学是一门反思的学问，哲学工作者不仅需要广博的现代科学知识，而且要懂得人类历史和人类认识史（哲学史及各部门学科的历史）。因此，哲学工作者坐下来潜心读书，读中外哲学著作，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新著作，需要坐下来沉思，将获得的知识作出概括、总结。如果把这也看成是脱离实际，那就不妥了。

如何理解“搞实际哲学”？我认为，搞实际的哲学，并不是简单地指在哲学教科书中讲现实的具体工作，也不是指原理加上几个现实的例子。“搞实际哲学”，首先就是要结合现实的时代搞哲学。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实际哲学最根本的是要对新的实践经验、新的科学知识作出概括总结，亦即要有适合新时代的新内容。搞实际哲学也包括结合日常的生活、工作讲哲学，使学者感到很有用，很能解决问题。当然，由于接受者对象的不同，哲学教科书也可有不同的层次。有属提高的、理论性强的学术专著；有供青年学生使用的教材；有供一般干部、工人、农民、战士学的不同种类的通俗读物。在这方面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毛泽东注重哲学的应用，提倡广大干部、群众学哲学，用哲学。他在1963年5月的杭州会议上讲：要在日常工作中讲哲学。中央、中央局、省三级开会时都要讲。讲哲学不能超过一小时，最好在半小时以内，超过一小时就讲糊涂了。他提出：“哲学要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尖锐的武器。”1964年12月20日，在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会上，毛泽东又讲：历来讲认识论，不联系具体工作。离开具体工作讲认识论，那讲哲学干什么？有什么用处。针对当时思想上存在的问题，《二十三条》中专门写了一条“思想方法”：“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无论什么事情，都必须加以分析。把什么事情都看成是绝对的，静止的，孤立的，不变的，是形而上学。罗列一大堆表面现象，拼凑一大堆枯燥无味的条文，使人得不到要领，是烦琐哲学。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

毛泽东对一些报告缺少辩证法很不满。1964年12月，他在一个文件上批写道：“十几年来，形而上学盛行，唯物辩证法很少有人理，现在是改变的时候了。”当他读到一些运用哲学运用得好的材料时十分高兴，1965年1月，他对徐寅生的《关于如何打乒乓球》一文批示：“讲话全文充满了辩证唯物论，处处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多年来没有看到这样好的

作品，他讲的是打球，我们要从他们那里学习的是理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如果我们不向小将学习，我们就要完蛋了。”他认为，这是小将们向我们一大批老将们的挑战，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

毛泽东注重哲学的应用，提倡哲学的解放，这是应当肯定的。我们不能因为在学哲学、用哲学的过程中出现过简单化、庸俗化的缺点而根本否定毛泽东的这一十分可贵的思想。

“你们搞的是洋哲学，我搞的是土哲学。”毛泽东的这一断语是耐人寻味的。它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现状的评价。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五四”时传入中国后，在同中国社会实际结合过程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并形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我国的理论工作者在传播、普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不过也应看到，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虽然吸收了具有中国特点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但就整个体系而言，并没有摆脱苏联三十年代形成的模式。“你们搞的是洋哲学”一语击中了中国哲学界的要害。他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进行新的创造。“我是土哲学”一语含有他的哲学是结合中国实际的哲学的意思，是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哲学，不是单纯外国的舶来品，他的哲学从内容到形式有中国的特点、作风与气派。

总之，尽管毛泽东对哲学界的批评不尽符合实际，但他提出要搞实际的哲学和改造现行哲学体系的意见是很有见地的。我理解，毛泽东关于哲学体系改造的含义包括以下方面：第一，从内容上讲不能从概念到概念，要结合实际，吸收最新的成果，使之密切结合中国的现实。第二，写法上要通俗、生动，用群众的语言，不要学生腔，不要写那么多，搞烦琐哲学，使人得不到要领。第三，在理论体系的构造上要有自己的新创造，打破苏联传入的旧框框。下面来讲第三方面的内容。

## 二、“哲学就是认识论”

毛泽东在1964年8月24日的谈话中说：“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别的没有”。“哲学就是认识论”，是毛泽东对哲学体系改造的重要意见之一。

哲学的对象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是什么？这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对毛泽东的“哲学就是认识论”的论断，有人赞成，说是一种灼见。有人反对，说是缩小了哲学的对象，取消了本体论，与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划不清界限。也有的人认为，这是毛泽东的即兴言论，随口说说而已，不必过于重视。

我认为：“哲学就是认识论”的论断，并不是一时的即兴言论，而是他以往一贯思想的继续和发展。

早在1937年抗大讲哲学时，毛泽东就探讨过哲学的对象。那时他依据列宁的逻辑学、辩证法、认识论“三者是同一东西”的论点。反复说明世界观、方法论是一个东西，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是一个东西。他用通俗的言语指出：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是认识的方法，是论理的方法，然而它就是世界观。世界本来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是世界观；拿了这样的世界观转过来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去议论人家长短，这就是方法论，此外并没有别

的什么单独的方法论。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世界观同方法论是一个东西。辩证法、认识论、论理学，也是一个东西，毛泽东虽说三者是一个东西，但强调的是辩证法。辩证法是唯一科学的认识论，也是唯一科学的论理学。

1958年，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尊重辩证法，首先要尊重唯物论，为什么要尊重唯物论？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这三个东西是一个东西。

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讲：唯物论、唯心论、世界观、辩证法，都是讲的认识论。你看吗？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又如此反复。

由此看来，他在1964年8月提出“哲学就是认识论”的论断并不是一时的即兴之言，而是他以往思想的继续和发展。

对“哲学就是认识论”的论断，毛泽东没有进一步展开说明。不过，从他的一贯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这一论断的立论依据是列宁的关于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是一个东西的原理。“哲学就是认识论”，不仅是指哲学具有认识论功能，而且是指哲学研究的对象是认识论。

有的同志认为，“哲学就是认识论”的论断在马列著作里缺乏根据，我认为并非如此。

哲学是一门历史科学，哲学的对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实践和人类认识的发展而变化的。在古代，哲学被看成各种知识的总汇，哲学家们重点探讨世界的本原是什么。到了近代，各门具体科学陆续从哲学中分离出去，哲学家们把注意力转向认识论的研究。当时有的哲学家仍将哲学看成是凌驾于各门科学之上的“科学之科学”。黑格尔就建立了一个包括自然哲学、历史哲学在内的包罗万象的绝对真理体系。不过，他天才地猜测到存在规律、认识规律、思维规律是同一的，即本体论（即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是同一个东西，他的逻辑学，就是他的辩证法，也是他的认识论。在此之前，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是各自独立而又互不相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标志着“科学之科学”的终结，在哲学的对象上发生了变革。恩格斯多次指出：“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形式逻辑早已成了一门独立科学，从哲学分离出去了。哲学最后只剩下辩证法。恩格斯所说的辩证法，就是大写字母的逻辑学。所以在恩格斯那里，说哲学就是辩证法，与说哲学就是逻辑学，都是可以的。工人哲学家狄慈根曾对哲学作了历史的考察。他认为，随着各门自然科学不断从哲学中分化出去，最后哲学选择了认识本身、认识的方

法作为它的对象，它想认识怎样做到借理智之光来认识其他对象。他说，哲学并不想知道一切，而只是“以理智为专门的对象，即以思维能力或认识能力”为对象。又说：“作为哲学的专门对象的认识，只是，也只能是推广的逻辑”他又把这种逻辑，称为认识论，称为辩证法。可以说，狄慈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最早明确讲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是同一个东西的人。列宁关于三者同一的思想除了来源于黑格尔、马克思之外，很可能还受到狄慈根的影响。

---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页。

狄慈根：《哲学的成果》，《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302、339、347页。

狄慈根：《哲学的成果》，《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302、339、347页。

有人认为，哲学就是认识论，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观，取消了本体论，与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划不清界限。我以为，这种观点是一种误解。作为科学的认识论，首先是世界观。承认外部世界及其在人脑中的反映，这是科学认识论的起码前提和基础，而且认识规律、思维规律是与客观世界规律相同一的。所以科学的认识论，离不开本体论。认识论必然包含本体论。本体论本身也是认识论。离开了认识论，本体论就讲不清，也失去了意义。

有人担心，“哲学就是认识论”会导致取消历史唯物论。我认为，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科学的认识论不仅要研究认识的客体，而且要研究认识的主体。唯心论者把自我、绝对、神当做认识的主体，旧唯物论者把抽象的个人当作认识的主体。马克思主义哲学则认为：认识的主体是具体的历史的人，是群众、阶级、政党、是社会。人类社会是物质运动的最高形式。它既是认识的对象，又是认识的主体。

要讲清科学认识论，必须研究认识主体，即人类社会。离开了历史唯物论，就不可能有科学的认识论。当然，如同自然辩证法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科学一样，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唯物论也可以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科学存在。

我认为，根据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是同一个东西的原理，讲哲学就是辩证法，哲学就是认识论，哲学就是逻辑学，都是可以的。既然如此，那么毛泽东为什么更强调哲学就是认识论呢？这是因为：

第一，哲学就是认识论，更能反映哲学的本质和对象。哲学要研究客观世界运动发展的最普遍的规律，但哲学又不是直接的以整个世界为其研究对象的。它是通过总结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通过总结人类认识史来探求世界发展的最普遍的规律和认识规律的。

第二，哲学就是认识论，突出了哲学的认识论功能。人们习惯所讲的本体论、辩证法、逻辑学，都有认识论的功能，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哲学的认识论功能越来越显著。

第三，哲学就是认识论，概括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不仅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而且也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的最基本问题，毛泽东的整个哲学思想都是围绕着物质与精神、主观与客观的关系而展开的。

第四，哲学就是认识论，反映哲学发展的趋势。认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重点。六十年代以来，苏联哲学界也有人主张哲学就是认识论，与毛泽东的观点，不谋而合。

“哲学就是认识论”，所说的认识论，是广义的认识论，而不是人们习惯所说的狭义认识论。关于狭义认识论的内容，毛泽东有过许多论述，这是前面已讲过了的。关于广义认识论的内容。他并未论及。作为整个哲学的广义认识论的内容是否可设想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研究认识的客体，即物质世界存在的最一般形式及其发展的最一般规律。

第二部分是研究认识的主体，即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

第三部分是研究主体和客体的相互关系，主体与客体如何才能达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这三部分不是互相孤立的，而是互相渗透的，也不是互相并列的，而是一个比一个具体，一个比一个复杂，一个比一个丰富，第二部分包含第一部分的内容，第三部分包含了第一、二部分的内容。整个哲学围绕着解决物质

与精神、客体与主体的矛盾而展开的，亦即围绕着人类如何才能有效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从而愈来愈获得更大的自由面展开的。这种结构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完全融合为一体。这种客体、主体、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逻辑，是同哲学史的发展相一致的，也是同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基本原则、基本规律相一致。至于每一部分的细节则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 三、辩证法的一元化问题

1964~1965年间，毛泽东在哲学上提出的另一个重要论点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只有一个，即对立统一规律。具体的讲法如下：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有人提出：“主席能不能讲讲三个范畴的问题？”他回答：恩格斯讲了三个范畴，我就不相信那两个范畴（对立统一是最基本的规律。质量互变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根本没有）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同对立统一规律平行的并列，这是三元论，不是一元论。最根本的是一个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就是量与质的对立统一。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这是《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的文字。参加这次谈话的龚育之所作的记录是：“我不相信那两个范畴，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同对立统一平行并列。这是三元论，不是一元论。就是一个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就是量和质的对立统一。对立统一也包括否定之否定。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两个稿子基本思想一致，具体说法略有不同。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谈话中又说：“辩证法过去说是三大规律，斯大林说是四大规律。我的意见是只有一个基本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

1965年，毛泽东在读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内部讨论稿）时批注道：“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就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这在列宁已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任务是加以解释和发挥。至于各种范畴（可以有十几种），都要以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去说明。例如什么叫本质，只能说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如此类推”。

毛泽东的两次谈话，一段批语，其基本思想是清楚的。（1）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只有一个，辩证法其他范畴应在对立统一规律指导下予以说明。（2）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他的上述思想同他以往的思想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毛泽东在抗大讲哲学时依据列宁的思想强调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实质，但同时又赞同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有三个，即矛盾统一法则、

---

龚育之：《读 毛泽东批注集 札记两侧》，载于《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当代》（论文集），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2页。

毛泽东：《读李达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内部讨论稿）一书的批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505~507页。

质量互变法则和否定之否定法则,此外还有本质与现象等一系列范畴。1956~1957年,毛泽东为了纠正斯大林的形而上学多次重申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加以说明和发挥。直到1958年,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依然主张辩证法有三个基本规律。

那么,为什么在1964~1965年毛泽东批评起恩格斯三个规律和斯大林四大特征的说法呢?为什么在这时强调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只有一个呢?我认为这主要是毛泽东基于对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总结。在毛泽东看来,苏联出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斯大林思想上的形而上学,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1964年7月14日)一文将毛泽东所提出的关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政策归结为十五条,其中第一条就是“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基于这种考虑,毛泽东为了突出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作用,故提出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只有一个,其他规律与范畴不能同对立统一规律并列。

如何评价毛泽东的这一变化。我认为,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与列宁的思想是相一致的。列宁在世时还没有读到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并不知道恩格斯三大规律的观点。所以在列宁的著作中也就没有三个规律的提法。列宁把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与其他范畴一样看成是对立统一的实例或具体的展开。斯大林既不同于恩格斯,又不同于列宁,提出四大特征。斯大林的做法是离开了列宁的正确的思想。毛泽东提出辩证法一元化的思想是对列宁思想的恢复和发展。

毛泽东只承认一个基本规律,不承认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这就不免有点偏颇。他只看到对立统一规律对理解其他规律和范畴的作用,没有注意到其他规律和范畴反过来对理解对立统一规律也有意义。如矛盾的发展过程,就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也有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的统一与斗争就有一个度的问题。其次,他只注意到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不能与对立统一平行并列,但他没有注意到把这两条规律与其他范畴并列,就降低了这两个规律在辩证法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以为狭义辩证法的体系可分三个层次:一是对立统一规律;二是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肯定规律。三是其他范畴。

这里还要谈谈毛泽东对对立统一规律的理解。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开头就说:统一物之分为二及其对矛盾着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中国古代也有一分为二的说法。在解放后,毛泽东也喜欢用“一分为二”,讲“凡事都可能一分为二”,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二分法或两点论)来看事物。这些都是无可指摘的。但在1959年以后,他比较强调对立面之间的斗争。1959年8月16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讲:“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1961年1月,毛泽东在修改何其芳的《不怕鬼的故事》的序中增加了这样的话:“事

---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讲:“有人(邓宝珊)说我们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我说他们也是斗争哲学。无产阶级斗争哲学还在他们后面。”

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向着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他的对方转化的”。在再次审稿时又增加了“通过斗争”四字，改成：“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之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

毛泽东不仅强调“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而且还把发展过程看成是一分为二，强调分。他说：“学说也是这样，总是要分化的。有革命的、科学的学说，就一定会就在其内部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它的对立物，产生反革命的、反科学的学说。因为现在社会有阶级的分裂，一万年以后的社会也会有先进集团和落后集团的不同，总是要不断产生对立物。这个理论早已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各门社会科学的历史所说明了，也为自然科学的历史所说明了。科学和科学史本身，就是说明这种对立统一，对立斗争，因而得到发展的。”他用一分为二来说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党内的斗争。他说：“任何社会，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不仅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一分为二，而且无产阶级也一分为二。有共产党，有社会民主党，有修正主义者，有我们。有几个修正主义者好，没有就不好。”“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势必一分为二，从来就是一分为二的，从马克思的时候起，就是如此。”毛泽东不赞成“合二而一”的表述，认为“合二而一”是修正主义。

任何事物都有矛盾，都可一分为二，都可分解为不同的部分。毛泽东用“一分为二”来表达“矛盾”、“对立统一”规律，我以为是可以的，无可非议。但毛泽东晚年过分强调“分”，强调“斗”，对于对立面的“统一”、对立面的“结合”注意不够，这有片面性。这种片面性导致他不断地进行党内斗争，不断地搞政治运动，使党和社会失去相对的安定与稳定。按照彻底的辩证法：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也是对立的统一，分与合也是对立的统一，一中有二，二合为一，分中有合，合中有分，把分与合绝对对立起来是一种片面性。

根据一分为二的观点，毛泽东还提出物质是无限可分的。他在3月18日的谈话中说：列宁讲过，凡事都可以分。举原子为例，他说不仅原子可以分，电子也可以分。可是以前认为不可分。原子核分裂，这门科学还很年轻，才二三十年。几十年来，科学家把原子核分解，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这是重的，还有轻的。这些发现，主要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和以后才发展起来的。至于电子和原子核可以分裂，那时就发现了……。庄子说：“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个真理。不信，就试试看，如果有竭，就没有科学了。事物总是发展的，是无限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空间方面，宏观微观是无限的。物质是无限可分的。所以科学家有工作做，一百万年以后，还有工作做。我很欣赏《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坂田昌一那一篇基本粒子的文章。从前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他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他引了列宁的话。

毛泽东讲的坂田昌一的文章是《基本粒子的新概念》（刊于《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第1期，1963年8月）。1964年8月，首都北京召开了国际科学讨论会。坂田昌一作为日本代表的团长参加会议。8月23日毛泽东会见参加会议的各国科学家，同坂田握了手。第二天，毛泽东又约周培源、于光远到中南海卧室谈坂田文章。毛泽东说：坂田说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电子是可分的。他们这样说，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的，接着毛泽东又说：世界是无限的。世界在时间上、在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在太阳系外有无数个恒星，它们组成银河系。银河系以外，又有无数个银河系。宇宙从大的

方面来看，是无限的。宇宙从小的方面来看，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分，而且可以无限地分割下去。庄子讲：“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对的。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要不然，物理学这门科学就不再发展了。如果我们的认识是有穷尽的，我们已经把一切都认识到了。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

关于物质无限可分性的思想，在恩格斯、列宁那里就有。毛泽东在 1955 年就谈到过。1955 年 1 月 15 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亲自召开了一次专门研究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发展问题的会议。在会上，毛泽东听了科学家们的汇报，观看了仪器表演，询问了有关问题。他问物理学家钱三强，质子、中子是由什么构成的。钱三强回答，对这个问题还没有新知识，根据现在的研究，还只知道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核的基本粒子。所谓基本粒子，就是最小的，不可再分的。毛泽东打着手势说：原子里头分为原子核与电子，它们是对立面的统一，原子核里头又分为质子和中子，它们也是对立面的统一。一分为二是普遍的现象。质子、中子、电子也仍然是可分的。现在实验上虽然还没有证明，将来实验条件发展了，将会证明它们是可分的。毛泽东微笑着说：“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在当时，许多科学家还把中子、质子视为不可分的物质最基本组成部分。

毛泽东只是站在辩证法的立场上，预言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是可分的。至于它们是如何分，那需要自然科学家们的科学实验与研究，这是哲学家无法代替的。

毛泽东关于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关于“基本粒子”可分的观点，不仅对我国的基本粒子的研究有影响，而且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影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格拉肖、温伯格、萨拉姆等人开始不相信基本粒子可分，后来直接间接受到毛泽东的可分思想的影响，改变了自己的看法。1978 年在美国夏威夷举行的第七届粒子物理学会议上，格拉肖提议，“把构成物质（夸克）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Maons），以纪念已故的毛主席，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层次的统一。”往后，他又解释说：他之所以建议这样命名，是因为这与中国的毛泽东主席有联系，按照他的哲学思想，自然界有无限的层次，一个比一个更小地无穷地存在着，因此，我想取用他的名字。

#### 四、关于肯定否定规律

毛泽东在谈到辩证法的三个规律时，不仅强调辩证法的一元化思想，不赞成将对立统一规律同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平行并列，而且还说：“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事物发展，每一个环节，既是肯定，又是否定。奴隶社会否定原始社会，对于封建社会它又是肯定。封建社会对奴隶社会是否定，对资本主义社会又是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对封建社会是否定，对社会主义社会又是肯定。”

如何理解和评价毛泽东的上述论述。有人认为，这里毛泽东根本否认否定之否定规律。也有人认为，毛泽东在自己的文章中从未提过否定之否定规律，他和斯大林一样对否定之否定规律持否定的态度。我认为这种说法是错

---

见钱三强的《毛主席指引我们不断攀登科学高峰》，《光明日报》1977 年 9 月 18 日。

误的，不符合事实。

在《毛泽东选集》第1~4卷中确实没有出现过“否定之否定”一词，但这并不等于说，毛泽东从来就不承认“否定之否定”规律。如前提到，他在抗大讲课时写的提纲中就明确把“否定之否定法则”列为辩证法的三个根本法则之一。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可看出：毛泽东在1936年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时对“否定之否定的法则”是很注意的，写了不少批语。毛泽东的批语重点是在讲辩证的否定观。他写道：“否定不是破坏一切，一刀两断，不是绝对的否定，而是先行的东西中间包含有后来的东西，后来的东西中间包含有先行的东西。没有否定的运动，也就没有肯定的运动。一切过程都是如此。”又说：“完全否定，乾坤或几乎息。”“否定是过程更向上的发展。”“一刀两断，斩尽杀绝，不是辩证法的否定。”“第一个否定造成了第二个否定之可能”。“辩证法否定是过程发展之动因，这种否定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方面表现为扬弃，即克服旧事物之主要的适于保存的东西；一方面表现为肯定，即把旧事物中某些还暂时适于生存在的东西给以合法的地位而保存起来”。

毛泽东也肯定发展过程中的三段式，他写道：“恩格斯之言三段法是对的。”“任何过程都是由正命题，对正命题之否定的反命题，及对反命题之否定之否定的合命题，构成其发展之全生涯。正命题之中已经包含矛盾或反命题在内。反命题之中也包含正命题在内，合命题之中又包含正命题反命题在内。”可见毛泽东是肯定发展过程中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三段式的，是肯定黑格尔的正、反、合的命题。

苏联教科书依据普列汉诺夫的有关论述，批判了俄国民粹派米海洛夫斯基对恩格斯关于否定之否定论述的攻击。米海洛夫斯基认为小麦的生长过程是茎否定粒，花否定茎，果实否定花，是三个否定，而不是二个否定。毛泽东肯定教科书的批判的。同时，他写道：“问题是明显的，否定之否定论是由同一规律性所发生的现象之内的联结。其行程只有两个否定，多数否定说法，如蚕蛹蛾、茎花果、少壮老等等，是不对的。因为都是同一规律性所发生的现象，虽通过种种变异阶段，依然只是完成一个种属的持续过程，依然处在同一的规律性中。”又说：“否定之否定表示过程发展的一个循环之终结，另一个循环开始。”。

毛泽东本人也喜欢用三段式来表达事物发展过程：如团结——批评——团结、平衡——不平衡——平衡。1958年5月8日，他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事物总是要走向自己的反面。希腊辩证法，中世纪形而上学，文艺复兴。这是否定之否定。中国也是如此，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这是辩证法，封建时代的经学——形而上学，现在又讲辩证法。如前面所引过的，他在1965年读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时写的批语中继续使用“否

---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21、123页。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21、123页。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124~125、115页。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124~125、115页。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20页。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17~118页。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26页。

定之否定”一词。

那末如何理解毛泽东在北戴河谈话中所说的‘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呢？我认为，毛泽东这一论断，并不是完全否认“否定之否定”规律。他虽然认为将否定之否定规律与对立统一规律平行并列不妥，但他还是承认这一规律的，不过，是要在对立统一规律指导下予以说明。他认为这一规律的基本内容是肯定与否定的对立统一。毛泽东所说的“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可理解为毛泽东不相信“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三段式的普遍性。他认为发展过程就是肯定、否定、肯定、否定……的过程。也许正是基于这种理解，他在1958年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将“否定之否定”规律改称为肯定否定规律。

毛泽东的这种改称对吗？有一段时间，中国的哲学界似乎持肯定的态度，有的教科书也这样写。八十年代以来情况发生变化，几乎所有的哲学教科书，又恢复使用“否定之否定”的名称。我以为，毛泽东的改称是值得肯定的。

首先，“肯定否定”更能正确地表述这一规律的基本内容。通常所称的“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基本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辩证的否定观，事物发展的每一环节既是否定，又是肯定，否定中有肯定，肯定中有否定；二是事物的运动过程不是简单的循环，也不是直线，更不是后退，而是波浪式的前进，或螺旋式的上升运动。这两方面中，前者是基本的，后者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肯定否定”的表述概括了“肯定、否定、肯定……”发展的全过程，而“否定之否定”的表述只表达了发展的第三个环节。“肯定否定”比“否定之否定”更能反映事物发展过程的曲折性和重复性。“肯定、否定、肯定”的表述正是“商品——货币——商品”、“货币——商品——货币”、“实践——认识——实践”、“特殊——普遍——特殊”等等具体公式的概括与抽象。

第二，“肯定否定”的表述，可以同辩证法的其他规律和范畴的表述在形式上取得一致。辩证法的其他规律和范畴都是以成对的矛盾概念的形式来表述的。如对立与统一，量变与质变、现象与本质、原因与结果等等，“否定之否定”则是唯一的例外。而“肯定否定”的表述就没有这一问题。

第三，“肯定否定”的表述消除了这一规律在表述方式上的黑格尔主义的遗迹，剥夺了辩证法敌人对它歪曲和攻击的口实。德国的杜林、俄国的米海洛夫斯基、中国三十年代的张东荪都把辩证法歪曲为三段式，然后加以攻击。“肯定、否定”的表述消除了这一规律的神秘外衣，也使攻击者失去了口实。

有人不赞同毛泽东的表述，主要的理由之一：三段式或“两次否定三个阶段”具有普遍性。三段式是不是具有普遍性？我认为不具有。这一点连黑格尔也是这样认为的。黑格尔说：“如果那第一个否定已经是第二项，那末，被数为第三的，也可数作第四；抽象的形式也将不用三分法而被当作是一个四分法。”黑格尔也认为，三段式并不是本质的东西，它“只是认识方式完全表面的、外在的方面。”他强烈批评当时许多的人并不懂得辩证法，而只是形式主义的占取三分法，用它来构造各种体系。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充分肯定了黑格尔对三分法的分析和对形式主义的批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不反对三段式，可他们从来不拘泥于三段式，反对将辩证法与三段式混

为一谈。在自然界和社会里，有的发展过程不一定表现为三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全部地质学是一个被否定了的否定系列，是旧岩层不断毁坏和新岩层不断形成的系列。”

总之，我认为，毛泽东并没有否定“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客观性、普遍性，他只是否定“三段式”的普遍性，把发展看成是肯定、否定、肯定、否定的无限过程。他将“否定之否定”规律改称为“肯定否定”规律更好地揭示了这一规律的内容，是辩证法史上的一种进步。我以为我们的教科书不宜再沿用“否定之否定”的表述，而应采用“肯定否定”的表述。

八十年代以来，有人根据毛泽东关于“波浪式”发展的大量论述提出：“波浪式发展”规律是辩证法的一条基本规律，它与“肯定否定”规律是两条规律。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螺旋式”上升与“波浪式”发展是不同的。我认为，这种见解值得商榷。至少在毛泽东那里，波浪式与螺旋式是一个意思，都是表达事物的发展是一个曲折的前进运动。硬说在毛泽东那里“波浪式”与“螺旋式”有区别是不符合毛泽东的原意的。我认为波浪式发展是一个规律。但它并不是与“肯定否定”规律不同的辩证法的另一条基本规律，它不过是“肯定否定”规律的一部分、一方面。

## 五、关于分析与综合

分析与综合是辩证法的一对重要范畴。毛泽东在1964年8月的北戴河哲学谈话和1965年12月杭州的哲学谈话中都讲到这一对范畴。

在北戴河的谈话中，他说：历来讲分析、综合，讲得不清楚。分析比较清楚，综合没有讲几句话。我曾找艾恩奇谈话，他说现在只讲概念上的综合、分析，不讲客观实际上综合分析。我们怎样分析综合共产党与国民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地主与农民？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拿共产党和国民党来说，我们怎样分析综合？我们分析：无非是我们有多少力量、多少人、多少党员、多少军队、多少根据地，如延安之类。弱点是什么？没有大城市，军队只有一百二十万，没有外援，国民党有大量外援。……我们的长处是人民的支持，国民党脱离人民。你地方多，军队多，武器多，但是你的兵是抓来的，官兵之间是对立的。

他接着讲：怎么综合？国民党共产党两个对立就是这么综合的：他的军队来，我们吃掉，一块一块地吃。不是两方面和平共处的综合。他不要和平共处，他要吃掉你。不然他为什么打延安……分析了，如何综合？你要到的地方，你去。你的军队，我一口一口吃你。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宜川被我们包围，刘戡军长，打死了，他的三个师长，两个打死，一个俘虏了。全军覆灭。这就是综合了。所有的枪炮都综合到我们这边来，兵士也都综合了。愿留下的留下，不愿留下的发路费。

他的结论是，一个吃一个，大鱼吃小，就是综合。从来书本上没有这样写过，我的书也没有写过。因为有人提出合二而一，谈综合就是两种东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世界上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有联系，但总要分割的。

关于分析与综合的关系，他说：“分析时也综合，综合时也分析。”人吃动物吃蔬菜，也是先加分析。为什么不吃砂子？米里有砂就不好吃。为什

么不吃马牛羊吃的草？只吃大白菜之类？都是加以分析。神农尝百草，医药药方，经过了多少年分析出来，那些能吃，那些不能吃，才搞清楚。蚂蚁、蛇、乌龟、王八可以吃。螃蟹、狗、下水能够吃。

在杭州谈话中他说：写书不能像现在这样写法。比如讲分析、综合，过去的书都没有讲清楚。说分析中就有综合，分析和综合是不可以分的。这种说法恐怕是对的，但有缺点。应当说分析和综合既是不可分的，又是可分的。什么事情都是可分的，都是一分为二的。在这次谈话中，他对综合的看法说得更明确：“综合就是吃掉敌人。我们是怎样综合国民党的？还不是把敌人的东西拿来改造，俘虏的士兵不杀掉，一部分放走，大部分补充我军。武器粮食，各种器材，统统拿来。不要的，用哲学的后来说就是扬弃，就是杜聿明这些人。吃饭也是分析综合，比如吃螃蟹，只吃肉，不吃壳。胃肠吸收营养，把糟粕排泄出去。你们都是洋哲学，我是土哲学。对国民党的综合就是把它吃掉，大部分吸收，小部分扬弃。确实，像毛泽东这样讲分析综合是前所未有的。分析与综合是思维把握现实的方法，分析是把事物分解为各个部分从而认识其中的每一部分；综合是思维在分析的基础上把事物的各个部分加以整体的考察从而形成对事物完整的认识。唯物辩证法的分析与综合与唯心论不同，唯心论的分析不是从现实事物出发，而是从概念出发。是对概念的逻辑分析与综合。这种分析综合不接触现实，不受实践检验。唯物辩证法的分析与综合则从客观存在的事物出发，在分析与综合过程中不断接触现实，最后由实践来检验。毛泽东（以及艾思奇）认为现在只讲概念上的分析综合的看法是不符合实情的。毛泽东所讲的客观实际的综合分析，过去确实没有人讲过。不过，这已不是什么思维方法问题，而是实践方法问题。毛泽东的说明只能表明：分析与综合的思维方法是有着客观的实践基础的，分析与综合的结果还要受到实践的检验。毛泽东讲综合就是吃掉。这种说法很新奇，但未必有普遍意义。在实践上，有些综合可能是吃掉，如毛泽东所举的例子。但有些却不是如此，建筑师、技术员、工人盖大楼，可以说是最生动形象的综合。把一件件建筑材料按图纸建造成漂亮的大楼，这是综合。但这不是吃掉，而是把许多部分合起来创造成一个新的东西。

总之，毛泽东关于分析与综合的谈话是新颖的，可以启发我们进一步思索，不过，并不完全正确。

我认为，我们的教科书在分析与综合问题上的主要缺陷之一是对这一对范畴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估计不足，对它在辩证思维中的核心地位无认识。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实际上是把分析与综合的方法看成是认识的根本方法。马克思、列宁同样十分强调这一方法。从理论上讲，分析与综合是辩证法的规律范畴在认识过程中的一种综合性的运用。从实际的认识活动中看：它是认识方法中最基础的、最基本的方法。概念的形成，判断、推理的进行，假设的提出与验证，以至归纳与演绎、从抽象到具体、逻辑和历史的一致等方法，无不是在分析与综合的基础上进行的。可现在的教科书只是将它和别的思维形式、思维方法并列。现实生活中的经验论最突出的表现是对认识的对象不作认真的、科学的、细密的分析与综合，而往往凭经验、凭直观作出判断。一个人认识能力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分析与综合的运用的熟练程度。

毛泽东关于改造哲学体系的意见未必完全精当，但他提出改造哲学哲学的任务本身就具有开创性。苏联东欧的剧变，我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

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大潮，当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这一切更迫切要求我们改造现行的哲学体系，创造出适合新时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体系。

## 第四章

### “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

毛泽东生前曾对人说过：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金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他的这一自我回顾与总结，充分表明他本人是多么看重文化大革命。最初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解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问题，是伟大的创举，是自己一生中最辉煌的业绩。但历史的进程并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美好。他有能力发动“文化大革命”，却无能力结束“文化大革命”。他有点沮丧、忧虑。不过，他认为“文化大革命”虽有所不足，但总的来说不能否“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到1976年，历时十年，这确实是史无前例的。在这场革命中，毛泽东通过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运用大民主的方法，把自己领导建立起来的各级党组织和国家政权机关砸烂、打碎，然后重建。抗日战争进行了八年，解放战争进行了四年，而“文化大革命”却进行了十年。“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上最重大的事件，而且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共运史上和世界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已成为国内外毛泽东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如同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一次“大试验”一样，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也可说是毛泽东晚年理论的又一次大试验、大演习。十年“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没有写出成篇的有份量的理论著作。这主要是因为：（1）、激烈的政治斗争、复杂的党内矛盾使他无法潜心于理论的研究和著述。（2）、年事已高，精力不济。这种客观与主观的条件使得他的理论、思想、观点，主要散见于讲话、谈话、批示和信件之中。

####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一次“全国性的演习”

##### 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革命”。一般意义上所讲的“文化革命”主要是指普及教育，扫除文盲，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科学文化知识。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刀，虽然名之曰“文化大革命”，而实质则是一场政治斗争。毛泽东认为，这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一个阶段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但历史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文化大革命”虽说是一场“内乱”，但它是有领导的在明确理论指导下的一种特殊的“内乱”。“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指导这场“大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因此，客观地了解、评价“文化大革命”的最好办法是从了解、评价“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入手。

在迄今公布的毛泽东的著作、语录中，我们没有发现毛泽东本人明确使用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类术语。首先明确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专门术语的是1967年11月6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写的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这篇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文章认为：“毛泽东同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贡献，在于他系统地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系统地总结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不但总结了正面的经验，而且总结反面的经验，特别是总结了苏联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严重教训，完整地、彻底地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个当代最大的课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划时代的伟大发展。”文章把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要点归结为六条：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对象。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最重要的是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运用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这篇文章是由陈伯达、姚文元主持起草，并经过他们反复修改而成的。他们在送给毛泽东审阅的信中说：“这篇社论，又再作修改。关于主席思想六条，作了新的整理。列宁的话已经充分引了。”“大家希望主席能看一看，并加修改。”毛泽东在信封上批道：“内件已阅，修改得很好。可用。”可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这一术语虽非毛泽东提出，但却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陈、姚所归结的六条，基本上表达了毛泽东的思想。在此以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被反复宣传，写进了中共九大“政治报告”，被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毛泽东思想阶段的重要标志，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可以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毛泽东晚年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上“左”倾错误的集中概括，是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虽说有六条，但最根本的核心是两条：一是革命的主要对象是走资派；二是革命的主要形式是运用大民主，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揭发党的黑暗面，把被走资派所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正是这两条，使得“文化大革命”不同于以前的历次政治运动，造成长达十年之久的内乱。

## 二、对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估计

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来源于他对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分析。由前一章可看出，从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开始，毛

泽东以及中央的其他领导人对我国社会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越来越脱离实际，陷入了严重的主观主义。毛泽东在反对国际上的“修正主义”的同时，越来越担心中国党内的“修正主义”。他把党内思想认识上和工作上的分歧越来越上纲为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越来越把与自己相左的意见视为“修正主义”。

1963年5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我们党内有人主张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和气一些，对反动派和气一些，对修正主义和气一些，对亚非拉人民的援助少一些，这就是修正主义路线。

1964年2月，他在谈话中又说：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些人中间，有中央委员、省委书记、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他们在1962年到处宣传，夏季我们开了一个会议，把这些东西抖搂了出来。

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要县委顶住修正主义中央。

到了1965年，毛泽东不仅认为工厂、农村的基层政权三分之一不在我们手里，省委、部委有烂掉的，而且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内形成了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1965年10月，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谈话中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毛泽东的这些话是明显地为他以后的大行动造舆论，下毛毛雨。

同年12月8日至1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林彪一伙对罗瑞卿（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搞突然袭击。任意罗织罪名，诬陷罗“篡军反

---

1962年春，当时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向中央建议：为争取时间、渡过困难，加紧建设，有必要争取对外关系的相对缓和，在同美国、苏联和印度的斗争中要注意策略，对外援助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这些建议总的精神是正确的，将它概括为“三和一少”是明显不符合原意的，视之为修正主义更是错误的。

1962年，当时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根据合作化以来的经验和1960年至1962年在全国一些地方的调查向中央建议：在农村中实行联产责任制，以克服平均主义：允许社员在一定范围经营一些小自由、小私有等等。当时，我国部分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等多种形式的责任制。这些关于农村工作的正确主张和政策被概括为“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并受到批判。

党”。

12月底，毛泽东在一次会上问几个大军区司令员：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你们得学蔡锷，要造反哪！他又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是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政、军，这是最危险的。

毛泽东对中央内部的问题看得越来越重，心里也越来越不安。还是在12月，他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保密、警卫工作很重要，要保住党的机密，不要被修正主义利用，并防止内部出修正主义，打起仗来要警惕牛鬼蛇神出来破坏。”在此之前，1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任命汪东兴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免去杨尚昆的主任职务。

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江青先在北京找人搞，找了三次，没有人愿干，只好到上海去搞。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后，全国各地报纸陆续转载，北京各报纸在18天内未刊登。毛泽东对这些自然很不满，感到他的意见在北京行不通，北京市、中宣部的事他管不了。1966年3月28日至3月30日，毛泽东在同康生等人的三次谈话中说：1962年十中全会作出了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他认为：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又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毛泽东指责彭真、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按：指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要解散。毛泽东对整个学术界、教育界的估计更是漆黑一团。1966年3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过去我们蒙在鼓里，许多事情不知道。解放后，对知识分子包下来，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搞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他对中宣部很不满，说：“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按：中央农村工作部1962被解散）。到了5月7日，他在给林彪的信中进一步认为，现在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的学校”，提出这种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决定“文化大革命”从学校、知识分子开刀。1970年12月18日，他同斯诺谈话时说：“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文化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错误批判了彭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人大副委员长、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长）、罗瑞卿、陆定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杨尚昆（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决定停止和撤销了他们的职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通知（简称“5·16”通知）。这个通知是由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组成的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先后八次易稿，最后经毛泽东补充、修改、审定而成，4月24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了草稿，并决定提交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这个通知

从行文的形式上看，是对中共中央在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的批判。《二月提纲》对当时学术批判的性质作了这样的论述：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以及由此引起的学术界的大辩论，其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大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提纲试图对学术批判中“左”的倾向加以适当限制，指出：在学术辩论中要实行毛泽东提出的“放”的方针，要“摆事实，讲道理”，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实行“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准许改正错误，不要“不准革命”等等。这个提纲，今天看来，不是右了，而是“左”了，是“左”的气候下的产物。提纲提出的一些限制，并不能改变“左”的性质。但在毛泽东看来。提纲是右了，是修正主义纲领，要批判。毛泽东认为，这个提纲的要害是模糊了当前这场大斗争的目的，即对“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代表人物）的批判。”毛泽东在修改这个提纲时加了不少话。若删除毛泽东在修改时加的话，那“5·16”通知的最初稿子主要讲的仍是学术方面的批判，讲的是对学术领域里的资产阶级思想批判。他的修改则明显是着眼于批判中央和中央机关及各省、市、自治区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批判党中央的“修正主义”。他认为，党内的修正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毛泽东提出：当前的文化革命，不只是限于“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且“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毛泽东感到这样写还不足以引起全党的注意，不足以表达这场文化革命的目标，于是在这个通知的最后，又写上重重的一笔：“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可以说，此时他所考虑的已不只是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问题，也不只是夺回学术界、教育界、文化界、新闻界、出版界的领导权问题，而是要清洗党、政、军里的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要揪出赫鲁晓夫式的接班人问题。在他的头脑中已形成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概念。

毛泽东对当时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分析还表现在，他以为北京有发生推翻他的反革命政变的危险。1965年12月，他在上海会议期间问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假如北京发生政变，你怎么办？”关于发生政变之事，他同林彪谈过。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

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又说：“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毛泽东虽不赞成林彪大讲政变，但他没有否认他为防止反革命政变所做的调兵遣将。1967年2月3日，他同阿尔巴尼亚外宾的谈话也印证了上述调兵遣将的事。他说，去年5月，谢胡来时究竟马列主义胜利，还是修正主义胜利，还看不出来，还不能作结论。有两种可能，修正主义打倒我们，有可能我们战胜修正主义。我为什么把失败放在第一可能呢？这样看问题，可以不轻视敌人。又说：当公开发表北京市委改组时，我们增加了二个卫戍师。所以你们才能到处走，我们也才能到处走。

正是根据对形势的这种主观主义估计，他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认为，这样做“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毛泽东为什么会作出严重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估计呢？这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第一，对修正主义概念的误解。1957年，毛泽东提出修正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先是反国际上的修正主义，之后又发展到反国内的修正主义，并逐渐把反修防修当作头等大事来抓。1965年8月3日，他在接见法国国务部长马尔罗时说：中国有两个前途，一种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有走修正主义道路的阶层。问题看我们如何处理，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但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会走什么道路。他认为，国内方面下一步的目标是反对修正主义。

反对修正主义，抽象他讲也没有错。问题在于什么是修正主义？看来，毛泽东对修正主义的理解是有问题的。1969年4月，他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所说的一段话，最能反映出他对修正主义的误解。他说：“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党委、都是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显然，他所批判的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并不是真正的修正主义，有些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的原则，有些是符合我国现阶段所实施的一些政策，也有一些是属于工作上的不同意见或实际工作的缺点错误。这种理论上是非的混淆，必然导致政治上犯错误，最后发展到混淆敌我界限，把他一道反对修正主义的刘少奇、彭真等中央领导人也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第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由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使得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长期得不到纠正，支配了全党。在崇拜者眼里，毛泽东是真理的化身、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凡与毛泽东不同的议论即是异端邪说，是修正主义，都应批判、打倒。在这种气氛下，即使是在高层领导中，也无人敢对毛泽东的意见提出异议。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没有出席，是刘少奇主持的。会议上中央核心领导中没有人对错误批判和处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诸同志提出不同意见，也没有人对“5·16”通知发表不同看法。可以说，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之时，党中

央其他领导人是赞同毛泽东对形势的估量的（至少在形式上是如此）。

第三，毛泽东主观武断，在没有进行任何调查研究、弄清情况前就轻易给人定罪。对吴晗、翦伯赞等人是如此，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也是如此。这一情况，反映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遭严重的破坏。

第四，特殊的国际环境。从 1960 年起，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急剧恶化。毛泽东同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正义的，捍卫了中国的独立尊严，反映了毛泽东不信邪、不怕鬼的无畏气概。但他错误认为苏共变修了，苏联资本主义复辟了，苏联政权是资产阶级专政、希特勒式的法西斯专政。正是基于这种错误的认识与判断，毛泽东加紧进行反修防修，清洗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清洗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第五，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一些阴谋家、野心家，利用毛泽东的“左”的错误，诬陷好人，把一大批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领导人打成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修正主义分子，打成走资派、叛徒、特务。

上述复杂的因素，使得毛泽东对政治形势的估计完全脱离了实际，于是便决计发动“文化大革命”。

### 三、刘少奇的悲剧

从“5·16”通知看，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直接目标是要解决所谓的“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刘少奇从 1945 年中共“七大”起就被毛泽东定为自己的副手、接班人，而现在却成了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修正主义者。这是怎么回事？

刘少奇（1893～1969），湖南省宁乡县人。1921 年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 年回国，回国后一直从事工人运动。1925 年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1927 年在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委员。1931 年 1 月，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曾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长、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长期从事白区秘密工作。在工作中同当时党内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左”倾错误作过斗争。1932 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参加长征。1936 年赴华北，先后任中共中央代表、北方局书记。1938 年 11 月任中共中央原局书记，1941 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治委员和华中局书记。1943 年回到延安，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在 1945 年的中央七大上，作修改党章报告。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系统的论述。“七大”后正式成为毛泽东的助手，党内第二号人物。

毛泽东对刘少奇是赞赏的。1937 年 5 月 17 日至 6 月 10 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白区工作会议。中央决定由刘少奇提出报告，刘少奇的报告对大革命失败以后党在白区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指出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犯了“左”倾路线错误。当时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对刘少奇的报告不满，很多人也不赞成刘少奇对白区工作的估价。刘少奇的报告面临着否定的危险。6 月 3 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肯定了刘少奇的报告，并给刘少奇很高的评价：“少奇同志对于群众工作有丰富的经验，他在实际工作中，

在党内生活中，在华北工作中，基本上都是正确的。他一生的工作，很少失败。今天我们党内干部中，像他这样的人是不多的，他懂得实际工作中

的辩证法。”刘少奇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刘少奇对毛泽东也很崇敬。刘少奇在“七大”的报告虽然是正确的，但其中也有不足，对毛泽东个人作了过分的颂扬。

在中共“七大”以后，刘少奇一直紧跟着毛泽东。刘少奇在工作中自然也有缺点，在一些问题上，也有与毛泽东不同的认识，但这并没影响到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信任。1953年，高岗进行宗派活动，企图搞倒刘少奇，取而代之。毛泽东发现后揪出了高岗，维护了刘少奇的地位。1959年，毛泽东提议由刘少奇接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61年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第二次访问中国时问毛泽东：主席先生，中国的继承人是不是解决了呢？毛泽东回答：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已经确定是刘少奇。蒙哥马利又问：刘少奇以后是谁呢？

毛泽东说：不知道，那个时候我将和马克思在一起了。我相信，他们是会解决这个问题的。毛泽东有意通过蒙哥马利向全世界公布刘少奇是他的接班人。直至“文化大革命”，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心目中，中共领导核心是团结的，刘少奇是毛泽东的接班人。

那么，毛泽东头脑中的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概念是如何形成的呢？从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中看，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原则分歧始于1962年前后。

1956年，刘少奇参与“反冒进”，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1958年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1959年庐山会议批彭德怀等方面，刘少奇是积极支持毛泽东的，并无分歧。但到了1961~1962年，在对困难形势的严重性的估计上和产生困难形势原因的分析上，毛泽东与刘少奇有了分歧。刘少奇认为：“困难是十分严重的，现在的问题恐怕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不能总是套用“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公式；出现困难形势的原因，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的，但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的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毛泽东实际上不赞成刘少奇的看法，但他没有讲，把气憋在心里。到了1962年8、9月间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感到形势开始好转，便批“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把憋在心里的话放了出来。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右倾，其性质是资产阶级的，开始对刘少奇有了看法。

八届十中全会后，刘少奇紧跟毛泽东抓阶级斗争，为了便于指导运动，他让夫人王光美下去蹲点，搞四清。这件事得到毛泽东的赞扬，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无疑也反映了刘少奇的看法）得到毛泽东的批准。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同陈伯达等人谈话中讲到知识分子下去时说：王光美作了报告，她去搞一个大队，那里没有暖气，同吃同住，吃得不好，害了两次感冒，春节回来的时候，见了她，我问她，还去不去，她说还去。此时，毛泽东与刘少奇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上也是一致的，没有分歧。毛泽东讲：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刘少奇则讲：恐怕有些地方不止三分之一。

如上章所述，在1964年12月召开的中央四清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在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这一点上看不出有什么分歧，在运动的性质上，有不同认识，但很快刘少奇服从了毛泽东，并未发生争论。毛泽东对运动中极左的一些做法不满，但他也没有归罪于刘少奇。不过，在这次会

上，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的一些做法表示了很不满。有一次讨论，邓小平主持会议。正值毛泽东身体不适，邓小平以为是一般的会，劝毛泽东不要参加。毛泽东说，不行，非要参加不可。在会上，毛泽东讲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时，刘少奇插话：有“四清”“四不清”的矛盾，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好。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插话很不满。在下次会议上，他带上了宪法和党章。在讲话时，他一手拿着宪法，一手拿着党章说：这两本书，这本是宪法，我是公民，有公民权。这本是党章，我有党员的权利。你们一个不让我来开会，一个不让我发言。毛泽东发了脾气。会后，一些老同志对刘少奇提意见，说对主席尊重不够。后来，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检讨。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检讨不满意，认为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跟修正主义的问题。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一个是指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一个是指李富春主持的国家计委。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刘少奇分歧尖锐化了。毛泽东认为刘少奇不行，对刘少奇失去了信心。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1970年12月18日，斯诺问毛泽东：“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说，那就早喽！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时，刘少奇反对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斯诺在《我们同毛泽东谈了话》一文中说：“1965年1月25日，而不是在此之前，毛泽东决定刘少奇必须下台。至少是一个高级负责人对我谈了这点。”1月25日发生了什么事，这是一个谜。说刘少奇反对四清的目标是整走资派，这一条还需有材料来证明。要是刘少奇真的提出反对整走资派，那说明刘少奇是对的，但除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中所说的以外，至今也没有人依据可靠材料来证明刘少奇反对整走资派。但不管怎样，从这次会议后，毛泽东是想从政治上搞倒刘少奇了。

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还表现在对苏共态度上。紧接着《二十三条》事件后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1965年2~3月，日共总书记宫本显治率代表团来访。当时苏共支持日共内的反对派，所以日共对苏共采取批判的态度，与中共的关系较好。但宫本显治不赞成在中日两党联合公报中点名批苏共，刘少奇在北京主持政治局会议表示同意。刘少奇不能最后决定，向在广州的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说：中央同意的，我可以不同意。这样政治局的意见被否决了。另一件是：是否派代表参加苏共“二十三大”。1965年2月24日，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发来邀请信。参加不参加，毛泽东未置可否，要在京常委讨论。在京常委讨论的意见是：应邀进行斗争。刘少奇说：此事还要请示毛主席。毛泽东不同意参加。这件事在毛泽东的头脑中也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他在同期诺的谈话中说：“要搞修正主义，就要跟苏联妥协。苏共二十三大，刘少奇、彭真就建议派代表参加。修正主义是有国际性的。在中国搞修正主义不联合国际的修正主义不行。当然后来那个建议被我们打掉了。”现在看来，刘少奇在这两个问题上的做法比较正确。其实，刘少奇的主张也并不是要同“修正主义”搞妥协。无论刘少奇，还是彭真，也都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这一点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并无原则分歧。

毛泽东从1965年起讲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实际上是为搞倒刘少奇下毛毛雨，作舆论准备。但在日常的领导工作中一切照旧，刘少奇依然主持党中央工作。1966年3月25日至4月20日刘少奇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緬

甸。如前所述：“5.16”通知是在刘少奇主持下通过的。不仅刘少奇没有想到通知中所讲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正是指他自己，就是参与起草“5.16”通知、惯于投机钻营的康生、张春桥也没有能理解毛泽东的意图。康生在这次大会上的发言中不仅大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而且还恶狠狠地攻击朱德，诬蔑朱德是“空头总司令”，是“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没有入党”的党外人士，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可康生在发言中却恭维刘少奇，检讨自己在1931年批评刘少奇犯了错误，“没有认识到刘少奇同志是在白区代表毛主席路线的”。在后来，他又讲过，在那时，他只想到彭真有问题，没有想到、也不敢想到接班人（刘少奇）有问题。参与起草“5.16”通知的张春桥在1967年5月19日上海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说：运动开始时，对“5.16”通知中“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不太理解。只想到彭真，没完全想到刘少奇。

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只是批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至于下一步“文化大革命”怎么搞，并没有讨论。“5.16”通知只是提出“要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帜”，“清洗混进党里、政府里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并未涉及如何清洗。怎么搞？在五月时不仅刘少奇不清楚，恐怕连毛泽东本人也不清楚。“文化大革命”搞起来后，他在十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连，谁也没有料到，连我也没有料到，弄得各省、市，呜呼哀哉。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贴出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攻击北京市委、北大党委破坏文化大革命，想把革命运动纳入修正主义轨道。就在前一天，即5月24日，北大党委传达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运动中贴大字报的五点指示，强调“内外有别”。25日深夜十二时许，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派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到北大重申了中央关于运动中贴大字报的指示，并传达了周恩来的四点补充指示，进一步强调“内外有别”。当时刘少奇周恩来并不根本反对搞文化革命，也不反对贴大字报，只是希望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有秩序、有计划、有步骤地搞，不要造成天下大乱。毛泽东却另有想法。6月1日，当他在杭州看到康生送来的聂元梓等人大字报后，不同其他中央常委商量，就立即下令中央电台广播，决心以“四大”的形式来搞文化革命。

聂元梓等人大字报广播后，大学生、中学生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纷纷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学校出现了混乱，一些学校领导受冲击而瘫痪。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依照惯例，决定向北京的大学和中学派工作组。此时的刘少奇还是按照四清运动的老办法，派自己的夫人王光美到清华大学蹲点，以便取得具体经验指导文化革命。

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极左思潮的鼓动下，学校出现乱揪、乱斗干部的过火行动。1966年6月18日，北大部分群众（主要是学生），在学生宿舍楼区自发地设置“斗鬼台”、“斩妖台”，随意揪斗干部。批斗时出现了戴高帽子、脸上抹黑、挂牌子、罚跪、揪头发、拳打脚踢等极端不文明的野蛮行为，个别品质不良的人乘机对妇女耍流氓。北大工作组及时制止了乱斗现象，认为这是校内外敌人勾结起来破坏运动的一次突然袭击，它暴露了坏人。工作组提出警惕坏人破坏文化革命，加强了政策教育，整了一些积极参与事件人的材料。北大工作组在当日将处理“6.18”乱斗现象的过程和办

法写成简报，报送中央。中央于6月20日批转了北大简报，肯定“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样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当时陈伯达、康生等人也是赞成北大的办法的。陈伯达认为，北大“6·18”事件不简单，是一个反革命事件。康生则提出要揪出这一事件的后台。既然是阶级敌人的破坏，是反革命事件，既然要揪后台，当然就要整人，抓反革命，抓坏人。有材料讲，在二十多天的时间，北京二十四所高等学校有近万名学生被打成右派，有数千名教职工被打成反革命。这一数字显然是大大地夸大了的。但工作组确实整了一些人，要在群众中抓破坏运动的“右派”、“反革命”、“坏人”。为了防止坏人破坏，各校之间停止了串连，各校关门搞运动，以往热热闹闹的场面没有了。工作组的这些做法引起了少数学生的不满，出现了反工作组的大字报。群众中出现了工作组是革命的、不反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争论。当时绝大多数的人认为工作组是革命的，包括红得发紫的“左派”后又成为反工作组“英雄”的聂元梓在最初也认为工作组是革命的。工作组制止乱斗现象，强调政策，这在当时可以说是正确的。但工作组（以及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受传统的“左”的思想支配，把运动中群众受极左思想而产主自发的乱斗行动当作了阶级敌人阴谋破坏活动，则是错误的。当时的工作组可以说是两手抓：一手是抓整“走资派”，这是主要的；一手是排干扰，抓群众中破坏运动的“右派”、反革命。今天看来，这两手都有问题。

6月初，毛泽东在杭州。6月18日离开杭州到韶山，住滴水洞。6月28日到武汉。从毛泽东在7月8日给江青的信看，毛泽东对运动是满意的。他在信中写道：“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他对形势的估计是乐观的：“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他认为，这次文化革命是一次“全国性”的“认真演习”。

7月18日，毛泽东由武汉回到北京。20日，江青由上海回到北京。毛泽东回京后听取了有关文化革命的汇报。江青、陈伯达、康生谎报情况，给工作组加了种种罪名。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不满，派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到大学了解情况。毛泽东对当时文革形势的看法已与7月8日信中的看法迥然不同。他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镇压学生运动。谁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而实际上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本反动派。他提出改派工作组，认为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工作组阻碍了运动，要依靠学校的师生自己闹革命。毛泽东对工作组的批评显然是不符实际的。事实上，大多数工作组主要目标还是在斗“走资派”，而不是在整群众中的“坏人”。工作组整少数群众的材料不对，但也并不是在镇压学生运动。

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北京市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会上作了检讨。此时，刘少奇还未了解毛泽东的真实意图。他在大会上讲：“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太清楚，不太知道，你们问我怎样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

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晓得”，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是刘少奇的真心话。在文化革命上，刘少奇是支持毛泽东的，没有反对之意。不过，他只是按照过去的老办法来搞。按刘少奇的办法（亦是过去的办法）搞，损失可能少一些，不会天下大乱，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但也还是“左”的，把一部分干部打成“走资派”，也有可能重犯 1957 年反右斗争时将一部分群众打成右派的错误。

8 月 1 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文化大革命”。8 月 4 日，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对工作组提出了更加严厉的指责。他说：“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8 月 5 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 1962 年的右倾和 1964 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写这张大字报的目的是很清楚的，号召与会者及全党揭刘少奇的问题，炮打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开会后，在 8 月 2、3、4 日，刘少奇还到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参加辩论会，对同学、工作组发表讲话。直到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他才明白毛泽东要与他算账。

这里有一个问题，毛泽东为什么选择了亲自写大字报的方式来揭刘少奇的问题？这次全会进行的具体情况我们不知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党内许多干部并不认为工作组是镇压了“文化大革命”，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更不会认识到刘少奇犯了路线错误。那时党内的绝大多数干部的思想与其说同毛泽东一致，不如说同刘少奇一致。毛泽东感到“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暂时只剩下我自己”。退一步讲，即使有人在会上批评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的错误，但由于刘少奇是毛泽东自己自一手提拔上来的接班人，也由于刘少奇在党内享有很高的威望，故与会者也不会揭刘少奇的“其他问题”，更不会想到要更换接班人。也许正是会议上的这种形势，逼得毛泽东只好在会议进行到第五天时亲自写大字报，并在大字报中不仅严厉谴责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上的错误，而且联系到四清中的错误与 1962 年的所谓右倾问题。

毛泽东要在政治上搞倒刘少奇，更换接班人，但毛泽东仍把刘少奇作为党内矛盾处理，在组织上刘少奇仍为中央常委，不过由原来的第二位降至第八位。毛泽东在闭幕会（8 月 12 日）说：“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他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不要认为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许他改正错误。我们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我们过去

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它就有。”

在十月召开有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作了检讨。刘少奇不仅对五十天作了检讨，不仅对毛泽东大字报中提到的两个问题作了检讨，而且还对1946年以来的工作作了检讨。刘少奇的态度是诚恳的。今天看来，他所检讨的问题有的并不是问题。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检讨是满意的。毛泽东在刘少奇检讨的稿子上批示：“基本上写得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段更好。”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把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注：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就在社会上传抄，有的人就贴刘少奇的大字报，但被制止了）。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允许人家改正嘛！他提出让红卫兵看《阿Q正传》，意在告诉红卫兵不要不准革命，不准改正错误。他说，刘少奇邓小平是公开的，不是秘密的。要准许刘少奇邓小平革命，允许改正。你们说我是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毛泽东还讲：不能全怪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他们犯错误也有原因。他们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他还说：对刘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

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后。刘少奇处于受批判的境地，而且批判调子越来越高。应刘少奇的要求，毛泽东在1967年1月13日派车接刘少奇到人民大会堂谈话。刘少奇提出：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共和国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者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对刘少奇的要求，毛泽东没有表态，只是建议刘少奇好好学习，认真读几本书，还介绍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写的《机械人》。毛泽东劝刘少奇保重身体。刘少奇回家后，对家人说：“主席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很客气，叮嘱我认真学习，保重身体。”在对刘少奇的态度上，周恩来是紧跟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批刘少奇。这是从当时周恩来的许多讲话中可以看得出来的。也许是毛泽东同周恩来谈过如何对待刘少奇后，周恩来在1月16日深夜12点以后给王光美打电话说：“光美呀，要经得起考验。”

后来，刘少奇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批判，但刘少奇没有起来抗争。他只是在“检讨”中作些辩护，说明事情的真相。1967年8月8日，他写信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严正表明：“当我看到说我的目的就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要阴谋篡党篡国’等，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而我想的都是同这些相反的。”“我没有在党内组织任何派别，没有在党内进行过任何非法的组织活动”。这是刘少奇一生中的最后一封信。此后未见到他写过任何申辩材料。这也许反映了刘少奇忍辱负重的性格。不过他坚信：“中国人民是最可爱的人民”，“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

为了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思想上搞臭，1967年2月，毛泽东提出批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此书在延安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列为整风文

---

见刘平平、刘源、刘亭亭的《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工人日报》1980年12月5日~8日。该文在收入《缅怀刘少奇》（1988年出）时删去了周恩来给王光美打电话的情节。

献，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必读的书。该书不仅在党内外很有影响，而且还译成多种外文，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有一定影响。该书在 1962 年经过增删重新出版。可此时，毛泽东认为：这本书是唯心论的，是欺人之谈，这本书不讲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修养。毛泽东的批评显然不符合实际。《论共产党员修养》是一本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在今天也仍然有其价值。这里顺便指出：1962 年刘少奇的《修养》再版时，陈伯达参与了修订工作，可在 1967 年时，陈伯达竟然成了批《修养》的先锋。此事，直到 1970 年陈伯达垮台时才公诸于世。

毛泽东对刘少奇批归批，但在组织上还是主张以宽大为怀。直到 1967 年 3 月，毛泽东还讲：将来召开九大时，我还要提出让刘少奇当中央委员。看来他是用对待王明、彭德怀的办法来对待刘少奇。

但林彪、江青一伙不这样想，毛泽东不赞成刘少奇的大字报上街，张春桥却在 1966 年 12 月 18 日在中南海西门传达室单独接见清华大学学生造反派头头蒯大富，要蒯大富带头起来“打倒刘少奇”。1967 年 7 月，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煽动学生围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要揪刘少奇出中南海进行批斗。7 月 18 日，中南海里的造反派，开批斗刘少奇夫妇的大会，进行人身迫害，并进行抄家。更为恶劣的是林彪、江青一伙使用逼、供手段，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是叛徒、特务、内奸。对专案组提供的伪证，开始时毛泽东表示怀疑，不相信刘少奇是叛徒，下令调阅全部材料。但江青等人送的全是伪证，至于证明刘少奇历史没有问题的材料一件也不送。在“证据”（确切说“伪证”）面前，毛泽东由不信到信。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根据江青等人的假材料给刘少奇加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帽子，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

在对刘少奇进行政治迫害的同时还对他进行惨无人道的人身摧残。1967 年 9 月 13 日，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被诬陷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而逮捕入狱，子女被驱赶出中南海。刘少奇本人则处于囚禁之中，身体日益虚弱，走路、穿衣、吃饭都成问题，有病得不到治疗。在批斗时，他的双腿被打伤，行走十分艰难。从住处到食堂只有三十米，他走一趟要用五十分钟。最后走不动，只能由工作人员打饭。工作人员常被骂作保皇兵，弄得他们也不愿每餐打饭。这样常常是打一次饭，吃好几顿，剩饭剩菜常变质。1969 年 10 月 17 日，处于重病中的刘少奇被抬上飞机，送到开封，囚禁于一个特别监狱。11 月 12 日去世，秘密火化。火化单上填写的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就这样含冤惨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王光美进行同样的迫害。中共“九大”以后，林彪一伙下令判王光美死刑，立即执行。材料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批示“刀下留人”，王光美得以幸存。

刘少奇案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1980 年 2 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彻底平反昭雪，重新肯定刘少奇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作的历史功绩。

国外不少学者认为：毛泽东整刘少奇是出于个人权力之争，是个人恩怨。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从历史上看，毛泽东与刘少奇配合是好的，毛泽东信任刘少奇，刘少奇推崇毛泽东。中国党内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首先是由刘少奇搞起来的，林彪不过是在 1960 年以后把这种崇拜推到了极端。刘少奇本人无争权之心的，他的《论共产党员修养》等著作反映了他的处世为人。

毛泽东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主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包括那些反对过自己并证明是错了的人。但毛泽东又是原则性很强的人，在原则问题上从来不留情面。据卫士长李银桥讲，毛泽东多次写过讲过这样的话：“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相让的”。毛泽东的这番话是他处理党内矛盾的原则。这反映了他的个性。他对王明、李立三是这样，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也是这样。在八届十一届中全会中和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对刘少奇实际也是这样，对刘少奇实行一批二保。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保过很多人，认为犯路线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犯走资派错误的改正了仍可继续工作。但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把持了各种“专案”，搞假材料、伪证，把一些老同志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等，使毛泽东无法再保。客观他讲：刘少奇的悲剧，毛泽东要负主要责任。因为刘少奇根本不是什么修正主义者，而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内也不存在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存在一条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但另一方面，又必须承认；刘少奇被诬陷“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并迫害致死，那是林彪、江青等人反革命阴谋的结果。

#### 四、“大民主”与“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如前所提到的，毛泽东在修改“5·16”通知时已下定决心，要清洗刘少奇及其在各部门各地区的“代理人”，但以什么方式来清洗还没有定。是用历来的自上而下的罢官方式呢，还是采取别的方式？这也许是毛泽东正在考虑之中的一个问题。从1965年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以来，他感到文化革命阻力很大，绝大多数党委对这场文化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他认为，党、政、军里有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这种情况下，若采用以往那种自上而下的方式，恐怕很难彻底解决问题。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从去年11月批吴晗开始，许多同志也没有看文章，也不大去管。京戏改革，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等等，更不用说了。过去没有全盘抓起来，个别的抓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行，问题不能解决。”他继续说：去年八月以来，虽然有那么多文章，中间5月16日，又发了一个“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大多数人的注意，我看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想的事，这一冲就要想一下了。”1967年2月，他又说：“过去我们只抓个别问题，个别人物，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毛泽东决计选择另外的方式。

在革命形式的选择上，毛泽东自然会想到1957年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简称“四大”）。在那时，他认为，“四大”是一个创造，是适合革命新内容的新形式，“四大”是大民主，有利于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四大”是揭露矛盾、对付官僚主义的好办法。而下层的群

众，自然也会想到运用“四大”来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批判“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在5月25日聂元梓等人贴出大字报以前，有的学校机关就已有大字报。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康生妻子曹轶欧策动下写出的。这张大字报的矛头直指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是“向上攻”的。这张大字报正合毛泽东的心意。毛泽东决定用它来“点火”。后来他称聂元梓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巴黎公社的宣言”，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6月1日晚8时广播后，成千上万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把北大的校系领导冲垮了，学校的正常秩序彻底打乱了。其他学校、机关、以至工厂、农村的人络绎不绝地到北大声援、取经，开大串连之先河。其他学校也效法北大，停课闹革命，揭批“黑帮”、“修正主义分子”。工作组力图使运动有领导、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但毛泽东视之为镇压群众，是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主张群众自己起来闹革命，这实际取消了党的领导，形成了一种自发的群众运动。

在极左的热潮鼓动下，中小学生也卷进了“文化大革命”大潮。6月2日清华大学附中贴出署名为“红卫兵”的大字报，6月24日，7月4日，7月27日，又以“红卫兵”的名义写出三篇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的大字报。6月24日的大字报开头一段是这样写的：“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说，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十七年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大字报最后说：“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对今天这个修正主义的清华附中，就要这样大反特反，一反到底！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一开头就引了毛泽东在1939年12月21日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说的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大字报进一步论说“造反之必要”，同时又说：“我们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你们胆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青年学子，血气方刚，意气奋发，大字报字里行间洋溢着“革命”的激情。大字报很合毛泽东的口味。他在8月1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对红卫兵的造反精神和革命行动表示“热烈支持”；同时，又希望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这封信被列为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第二个文件。信很快传到社会上，于是红卫兵运动很快就席卷北京、席卷全国。整个中国上空响着“造反有理”的吼声。

为了把北京“文化大革命”之火烧向全国，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支持大串连。他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从8月18日至11月26日，毛泽东先后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红卫兵和革命群众1千3百万人。一时间，乘车不花钱，一些胆子大的大中学生跑遍全国。有的是为了“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有的只是为了看看祖国大好河山，到处玩玩。

“文化大革命”起于学校、机关，但很快波及整个社会，生产受到影响。为了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防止出现全国性的大乱，6月30日，刘少奇、邓

小平联名致信毛泽东说：“在京同志讨论之后认为，在文化革命运动的部署方面，重点放在文化教育部门、党政机关。对于工业交通、基建、商业、医院等基层单位，仍按原定的四清部署和二十三条结合文化大革命进行”。“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请主席考虑决定。”7月2日，毛泽东复信表示同意。于是中央发出通知，指示这些单位的运动要“按照原来确定的部署，分期分批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指出红卫兵不要到工厂、农村串连。1966年12月，林彪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工交战线的文化革命。林彪提出：“刘、邓不仅是五十天的问题，而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工交战线受刘、邓的影响很大。”他还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对全党的批判运动，对干部的批判运动。”“文化革命开始是学术批判，后来发展到学生中间去，现在进入到工人、农民中间去，进入全社会。现在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震撼世界，大势所趋，势不可挡。”由此，工厂、农村的造反运动、批判干部运动也兴起了。1967年1月，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在上海制造“一月风暴”，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毛泽东肯定了上海的做法，认为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一场大革命。上海的夺权斗争影响到全国。什么样的权可以夺？当时的报纸说，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的权，不是这样的不能夺。毛泽东在1月21日说：现在看来不能细分，应夺来再说，不能形而上学，或者受限制。夺来后是什么性质的当权派，在运动后期判定。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社论。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从上到下的夺权运动。当时中央除极个别部之外，绝大部分的部均被夺权、接管。对此，毛泽东说：“接管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我们这个政府是上面派去少数干部和下面多数留用人员组成的政府不是工人农民起来闹革命夺得来的政府，这就很容易产生保封建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

文化革命开始不久，群众出现了分裂，最初是在对待工作组上群众分两派，是保工作组，还是反工作组；之后是在对待干部问题上，一些群众保这一些干部，反另一些干部，另一部分群众则持相反的态度。你保的干部，我反，你反的干部，我保；最后集中到夺权斗争上，谁来掌权。在“文化大革命”中，任何一个地区、一个部、一个单位，以至有的家庭都分成两派。各群众组织都标榜自己是最革命的，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对方组织是不革命的，是老保，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派为了争夺权力，先是文斗，后是武斗。像堂堂北大、清华这样的全国最高学府，直到1968年春夏还是武斗不止，两派分别割据一些地方。至于外地，互相开枪、开炮者绝不是少数。真是天下大乱，全面内战。

对天下大乱，全面内战，毛泽东怎么看？

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讲过：“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要毁坏旧宇宙，创立新宇宙。他以辩证的态度来看待社会的治与乱。他在读《伦理学原理》一书时批写道：“是故治乱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来，一治即一乱，吾人恒厌乱则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吾人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

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生之所喜也。”这一段话十分精彩。把乱看成是绝对的坏，把平和看成绝对的好，是一种庸人的肤浅的观点。在历史上所谓乱，正是社会矛盾激化的表现，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契机。上述话也反映了毛泽东本人的性格与气质。在以后的革命岁月中，毛泽东依然保持着这种性质与气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学生造反，学校大乱，许多人怕乱。他则认为，不用怕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而且七八年后又要来一次。到了1967年后，全国大乱，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内战不止。在旁观者看来，在事后看来，这是严重的社会危机的表征。他却不这样看。他在视察时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地发动起来了。”“有些地方前一段时间很乱。其实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这样看来，乱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当然，他并不是认为越乱越好，并不主张无限止乱下去。1967年初，为了稳定、控制局势，他决定派解放军介入文化革命。实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但军队内部也分成两派，因此内战并没有停止。

“文化大革命”的火是毛泽东烧起来的。大火烧起来后，他对一些极左的东西，如打倒一切、怀疑一切、武斗等提出过批评。这一点与1958年相类似。在夺权过程中，有人提出“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口号。他批评说：解放后十七年，正确的东西占统治地位，因此“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是反动的，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正确的说法只能是部分地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针对社会上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他说：怀疑一切，怀疑不怀疑自己，打倒一切，打倒不打倒自己。他还讲：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要走向反面。他提出批无政府主义、反对极左是对的。可是当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等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的做法表示不满，同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等诬陷、迫害老干部进行激烈斗争时，毛泽东又严厉批评者同志，斥之为“二月逆流”，致使运动进一步沿着“打倒一切”的极左方向滑去。

社会运动有它自己的规律。“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但运动起来后，他本人也难以控制。在1966年10月2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认为：运动可能搞两个五个月，也许还要多一点。按照他的这种设想，周恩来在10月28日讲，对文化大革命是否可以设想一个时间表，如大区、省、市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步设想在春节前告一段落。中央各部的运动也在春节前告一段落。周恩来又说：“主席说春节前告一段落是设想，不要以此为限。”实际情况是春节前不仅没有告一段落而且进行了夺权斗争，大乱进一步升级。

1967年7月至9月，毛泽东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在听取各地汇报时，他对文化革命作了许多指示。从他的讲话的总的精神看，他力图扭转大乱的局势，希望大乱走向大治。他号召各地群众组织要实行大联合，要正确对待干部。他说：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只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己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不要一犯错误就

打倒。根据当时情况，他提出文化革命搞三年，一年发动，一年胜利，一年收尾。后来，毛泽东一再号召大联合，中央一再发布制止武斗布告，但收效不大。中央一个省一个省、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帮助解决问题，成立革命委员会。直到1968年9月，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才成立。从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到1968年9月全国（除台湾以外）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中间经过了整整二十个月。

在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所以有些问题拖长了。”“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彻底，究竟什么叫到底呢？我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天就差不多了。”从他在这次全会上的讲话看，他在肯定文化革命的前提下强调注意政策，提出在清理阶级队伍时要做到稳、准、狠，重点是一个准，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反对逼、供、信，不要轻信口供。他批评了一些极左的做法，提出对像冯友兰、翦伯赞这样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要一批二保，一批二养，一批二用，给予出路。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毛泽东想把“九大”开成如延安“七大”那样的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为了表示团结、落实政策，“九大”吸收了一部分“文化大革命”中挨整、靠边站的老干部参加。毛泽东赞同周恩来提出让徐海东参加“九大”主席团的建议。此时徐海东已患重病，但还是坐着轮椅、带着氧气瓶，上了主席台。在“九大”，毛泽东强调要落实政策，缩小打击面。他说：“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什么事情都上纲上线很高。北京有个工厂，有八个专案组，说他们的厂长是狗特务，经过群众审查，这个厂长是好的。有些专案组我就不大相信，”他批评进驻北京大学的六十三军宣传队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抓人太多（按：北大一万多人，抓了五百多人）。他认为抓千分之一，千分之三就可以了，其余都放回去。他结合党的历史讲一个时期有一个主要倾向，同时又掩盖着另一个倾向。在九届一中全会上，他提醒中央委员：“要小心谨慎，不要心血来潮。忘乎所以。”他深感党内矛盾的尖锐复杂，林彪、江青等一伙极左派与“文化大革命”中被冲击的老干部之间的矛盾很难解决。他本想让多一些老同志进政治局，提出了一个大名单，但遭到林彪、江青一伙的反对，不得不让步，搞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名单。“九大”没有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他说：文化革命在全国，我看还要一年左右，搞得好二十年大庆就差不多了。他对党潜藏的危机表示忧虑，呼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中共“九大”之后，他一次又一次呼吁“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安定团结”。但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存在，也由于根本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全党团结不起来，全国安定不下来。他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以为“文化大革命”只需几个月就可以结束。他万万没有想到，他有能力发动“文化大革命”，却无法在有生之年结束“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人们只能说“文化大革命”的好，不能说“文化大革命”的坏。即使工厂停产，机关瘫痪，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而林彪仍然讲，文化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谁要说“文化大革命”有缺点，那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现行反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被谱成曲，当歌唱。倒是毛泽东自己首先起来讲“文化大革命”的缺点在于“打倒一切”，

“全面内战”。1970年12月18日，他在同斯诺谈话时一开始就说：你早找到我，我就早让你来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看全面内战，all—roundCivilWar，我也学会了这句话。到处打，分成两派，每一个工厂分成两派，每一个学校分成两派，每一个省分两派，每一个县分成两派，每一个部也是这样。又说：武斗，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那时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到了1975年底，1976年初，他承认“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要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不足。不过他认为“文化大革命”不应否定，是“三七开，”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作为文化革命发动者、领导者的毛泽东，对“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所造成的灾难性的恶果估计不足。

总之，毛泽东想用“四大”，通过“大民主”，公开地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全面揭发党内黑暗面，清洗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纯洁党的组织，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达到反修防修的目的。但事与愿违，实际的结果是导致“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四大”、“大民主”成了林彪、江青的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工具，成为各地各单位大大小小的有政治野心的人、投机分子窃取权力的工具。“四大”在形式上充分发扬了民主，但实际上造成了严重的无政府状态，造成了社会的混乱。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群众发生严重分裂，由于坏人的利用与挑动，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受到摧残，形成一部分群众向另一部分群众专政的局面。在“文化大革命”中，党和国家领导人受诬陷的有38人，其他中央党政军领导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受诬陷的有382人，受到残酷迫害的干部和群众有70多万人，被迫害致死的达3.4万多人。总的估计，全国因大量冤假错案受到诬陷、迫害、诛连的达1亿人以上。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使经济损失了5000亿元人民币的国民收入。“文化大革命”表明：“大民主”不可取，应予以否定。

## 五、“文化大革命”原因论析

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它的原因是什么？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多种的。

我们先来看看作为“文化大革命”发动者领导者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他是以“阶级斗争观点”来看待“文化大革命”的。在毛泽东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直到1976年，他还讲：文化大革命是搞什么的，是搞阶级斗争嘛！他认为：同刘少奇、林彪的斗争，都是阶级斗争。依照这种观点，“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经过毛泽东审定的中共“九大”政治报告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不是偶然发生的。这是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正是根据“阶级斗争的理论”，毛泽东认为，“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

毛泽东的上述见解是始终一贯的，从他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活动讲，能自圆其说。不过，他的说明并不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因为中国共产党内并不存在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存在一条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中同林彪、江青反党集团的斗争是阶级斗争。但应当看到，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利用毛泽东的错误而形成的。可以说，没有“文化大革命”，就不会有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没有毛泽东的严重错误，也不会有这两个反革命集团。而这两个反革命集团一旦形成后，又反过来使毛泽东的严重错误进一步发展，成了“文化大革命”无法结束的重要原因之一。

“文化大革命”并不是我国社会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必然结果，那么它的发生是偶然的吗？当然也不是。从本书前几章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他1957年以来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继续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过去十几年“左”的阶级斗争实践进一步发展的结果。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与实践同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两者相辅相成，发展到了极端，酿成“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从这种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确实又不是偶然的，是毛泽东以往“左”的错误的必然产物。“物极必反”。所以“文化大革命”，也就成了纠正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的先导。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很可能至今仍不能认识1957年以来毛泽东和我们党所犯的“左”的错误，并加以改正。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他的错误自然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直接原因。这是不待而言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分析了这个直接原因后还进一步指出了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决议认为有两大方面的因素：

第一，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缺乏经验，犯错误就难免。这一方面又包括：（1）全党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2）由于我党的历史特点，容易把社会主义社会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阶级斗争，并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处理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从而导致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3）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如：“资产阶级权利”、“小生产者每日每时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等。（4）苏联领导人挑起了中苏论战，反对苏联领导人的大国沙文主义斗争。

第二，毛泽东本人的骄傲，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产生这些缺点除了毛泽东的个人原因外，还有复杂的历史原因：（1）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过的严重偏差，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2）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和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不是很容易肃清的；又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

决议的上述分析无疑是正确的。不过，还应看到，像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事件，除了如上主观方面的原因外，还有其深刻的客观的社会根源。十年“文化大革命”不是两个阶级斗争的产物，中国社会也不存在毛泽东所说的那种产生“文化大革命”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但站在宏

观的历史的立场上看，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无疑是中国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和表征，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第一，建国以来，特别是1957年反右以来积存起来的领导和群众的矛盾。“文化大革命”中的矛盾、斗争、冲突，集中表现为群众对领导者的揭发、批判、斗争。毛泽东在1967年夏说过：“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起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要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毛泽东所说的第一个原因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不存在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有的工作组确实整过一小部分群众，引起了被整群众的不满，起来造工作组的反。至于他所说的第二个原因确实是存在的。文化大革命前，北京大学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指导思想是“左”的，运动中将党委书记、校长陆平的性质搞错了。不过，也应承认，当时北大有些单位的干群矛盾很尖锐。1961年哲学系党总支改选，争论激烈，改选进行一年多。这种情况导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哲学系的部分党员教师成了整陆平的积极分子。1965年“二十三条”下达后，在中央书记处、北京市委的干预下，纠正了对陆平的错误批判，但又反过来，开会整社教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要积极分子作检讨。康生、曹轶欧正是利用这种情况，策动聂元梓等人写了所谓的“第一张大字报”。从全国来讲，“文化大革命”前党内确实存在阴暗面，有的干部作风不民主、官僚主义，有的搞特权、蜕化变质，群众对此十分不满。“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凡是这方面问题多的干部，受群众的冲击就厉害。毛泽东的错误是片面夸大了党内的黑暗面。事实上，从全国讲，干群关系总的来讲是好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运动一开始，大多数群众起来保干部，反对将本单位的干部不分青红皂白一概要打倒的原因。从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看，领导和群众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关系方面的一个基本的最重要的矛盾。这个矛盾处理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政权能否巩固、社会能否安定、经济能否繁荣发展。若处理不好就有可能发生罢工、罢课、闹事、以至发生骚乱、动乱。

第二，中国原来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的国家。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原有的小生产者成了集体所有制的劳动者，有的进了工厂，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分子。但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是不可能一下子消失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等极左思潮的泛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毛泽东本人的“左”的错误，有林彪、江青一伙的鼓吹，但也不可否认，这同中国原来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一样的国家有密切的关系。“文化大革命”中的派性破坏性极大。派性也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一种表现。所以毛泽东在1967年提出“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在我们这样国家，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派性是很容易泛滥的，要遏止它，消除它却很难。

此外，个人崇拜的社会基础是小生产者；毛泽东的某些平均主义思想也来之于农民小生产者。因此，毛泽东的思想很容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这是“文化大革命”能持续达十年之久的重要社会原因。

第三，社会上存着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党内外一些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私欲膨胀，野心发作，想在造反中大捞一把，在中央则形成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地方和部门则产生了许多造反起家的人，大大小小的野心家。正是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和各地各门部的造反起家的人，使得“文化大革命”的内乱不止。

总之，“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是直接原因；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是“文化大革命”发展成“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重要原因；长期积累起来的干群矛盾、中国原是一个小生产者占优势的国家以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存在是“文化大革命”产生的社会根源。

## 第二节 个人崇拜与唯物史观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个人崇拜是典型的唯心的英雄史观。它与主张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相对立。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毛泽东身上出现了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一方面在言论上大讲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让群众自己起来革命，严厉谴责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另一方面，又十分欣赏亿万群众对他的个人崇拜，致使整个中国在一段时期内出现了狂热的造神运动。这两种绝然对立的现象共存于毛泽东一身，如何解释？

### 一、由反对个人崇拜到需要个人崇拜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有一个过程，毛泽东本人对对他的个人崇拜的态度也有一个由反对到需要到欣赏的过程。

伟大的历史运动需要有杰出的人物来领导，而伟大的历史运动定会造就出这样的历史人物。中国共产党在经过胜利、失败的多次反复中选择了毛泽东作为自己的领袖，并赋予他极大的权力和极高的荣誉。大约从 1940 年起，中共党内的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就开始宣传毛泽东，宣传毛泽东的思想。1943 年，正值毛泽东 50 岁，党内一些同志酝酿为毛泽东祝寿（当时延安 50 岁祝寿较流行），并提出宣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说：“生日决定不做，做生日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当时有人还提出“毛泽东主义”，毛泽东不赞成这一提法，认为我们就是一个主义，马克思主义。这表明他当时谦虚谨慎。他告诫全党要力戒骄傲，推荐大家读郭沫若写的论李自成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要大家引以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他致信给郭沫若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他还希望郭沫若“写一篇太平军经验”，认为“会是很有益的”。他在信中恳切他说：“我虽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毛泽东的这些话，反映了他当时的心境，“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

1945 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刘少奇在“七大”所作的修改党章报告，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开始显露出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苗头。不过，毛泽东自己比较清醒。他在《“七大”工作方针》讲话中说：“决议案把好事都挂在我的帐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者，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他又说：“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无论在经济、军事、政治、党务各方面的工作中，我都犯了许多错误。”“我们大家都是半殖民社会出来的人，只有这样多的一点知识，这样大的一点本领。”这是出于毛泽东的肺腑之语，绝不是客套话。

---

毛泽东：《致何凯丰》，《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212 页。

毛泽东：《致郭沫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241 页。

毛泽东：《“七大”的工作方针》，《人民日报》1981 年 7 月 16 日。

在夺取全国胜利前夕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力戒骄傲”，“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在进北京的时候，他提醒自己：“我们决不当李自成”，希望在新的考试面前考个好成绩。在开国大典上，面对高呼“毛主席万岁”的人群，他内心激动，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群众高呼“人民万岁！”“同志们万岁！”大典结束回到住地，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人民喊我万岁，我也喊人民万岁，这才对得起人民呀！”

开国之初，有的城市拟议建立毛泽东铜像，以表示对自己领袖的尊敬与热爱。1950年，沈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决定在市中心修建开国纪念塔，塔上铸毛泽东铜像。沈阳市人民政府为此致函中央新闻摄影局，请求代摄毛泽东全身八时站像四幅。5月20日，毛泽东在来函的“修建开国纪念塔”旁批示：“这是可以的。”在“铸毛主席铜像”旁批写：“只有讽刺意义”。他又批：“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同年，北京市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一项提案，建议中央考虑在天安门前建立毛泽东大铜像。10月27日，毛泽东批示：“不要这样做”，并转给周恩来。

全国解放初期，他头脑清醒。1952年9月25日，他在审阅《人民日报》国庆社论提纲草稿时将两处“毛泽东思想”删去，并批示：“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在1953年夏季的财经会议上，他重申了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意见，又说，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因为当时报刊上有马、恩、列、斯、毛的提法。1953年，毛泽东不赞成使用“毛泽东思想”一词，他将二些文件中的“毛泽东思想”删去。根据毛泽东本人的意见，中共中央宣传部在1954年12月拟了一个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通知稿，通知稿说：“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毛泽东为这稿加写了如下的话：“在写文章做讲演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以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

1954年，毛泽东在审阅宪法草案时删去了颂扬他的文字。他指出：这不是谦虚不谦虚，“搞宪法是搞科学。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有人提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法定名为“毛泽东宪法”。他拒绝了这种提议。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4月，苏联宣传中对斯大林的提法有了一些变化，7月以后则十分明显，反映出苏联理论界开始批评个人崇拜，批评教条主义。1953年12月25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报送中宣部两个材料。一个是《苏联宣传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着重介绍1953年7月以后苏联反对党的宣传中的个人崇拜，揭露社会科学中个人崇拜的表现，从理论上批评个人崇拜，强调人民群众的决定作用和党的集体领导的情况。另一个是《苏联共产党反对宣传工作中的教条主义》。这两个材料刊在《宣教动态》1954年3、4期。1954年3月27日，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向中共中央办公厅报送了《苏

---

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3页。

李银桥：《走向神坛的毛泽东》第156页。

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31页。

联宣传中对斯大林提法的改变》的材料。毛泽东对这些材料十分重视。在接到张闻天的报送材料的第二天，即4月28日，毛泽东批示刘少奇：“此件，及去年冬季中宣部所辑关于反对个人崇拜反对教条主义的一个文件，都是重要文件，宜作为内部文件，印发给在京及各地的中委、候补中委，在京某些应当阅读的同志（如李维汉、安子文），请考虑酌定。”这一批示说明他对批判个人崇拜、批判教条主义的重视。驻苏使馆搞的三个材料，反映了张闻天在理论上政治上是一个很强、很敏感的人。

1955年，有同志提出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毛泽东还是不同意。他说：马列主义是主干，我们是枝叶。顺便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有的红卫兵也提出将“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但也没有被采纳。

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在会上批评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揭露了斯大林在农业合作化、肃反扩大化和卫国战争中的错误。毛泽东虽不同意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不同意突然袭击的做法，但他肯定苏共二十大对揭露和克服个人崇拜所做的努力，认为赫鲁晓夫有胆量，敢去碰斯大林，揭了盖子，搬掉了多年来压在人们头上的大石头。鉴于苏联的教训，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又一次重申：不要用人名去作地名，不许发一切致敬电，不要提英明领导，不要用马、恩、列、毛的提法，不要迷信权威。根据中央政治局讨论写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对个人崇拜这种历史现象作了深刻的分析。文章说：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个人崇拜不只在剥削阶级中间存有它的基础，也在小生产者的中间有它的基础。大家知道，家长制是小生产经济的产物。个人崇拜是千百万人的一种习惯势力。个人崇拜有害人民群众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扬。文章提出：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从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脱离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

在筹备中共“八大”过程中，毛泽东建议党的正式文件中不要用“毛泽东思想。”根据这种意见，“八大”通过的中共党章中没有再写上“毛泽东思想”。“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把“八大”党章不提“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刘少奇反对毛泽东的一大罪状，这实在是冤枉了人。国外许多研究者认为“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的一个失败，刘少奇的一个胜利，这纯粹是不了解内情的一种无根据的推断。

总的看来，直到1956年，毛泽东是反对个人崇拜的，他本人也比较谨慎。不过，他在批评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错误时并没有意识到在中国也有对他的个人崇拜现象的存在，没有提出要消除对他的个人崇拜的问题。

到了1956年底，毛泽东对个人崇拜问题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最明显的是1956年12月29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一文不再提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这种不再提反对个人崇拜，看来并不是因为“一论”（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中已讲了，而是另有其原因。1957年3月1日，负责起草《再论》的康生向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室的干部介绍《再论》时说：《再论》和《一论》基本相同，但有一点不同，《一论》中有反对个

---

“八大”党章删去“毛泽东思想”也与苏共“二十大”无关，“八大”党章最早的草稿是由胡乔木执笔的，在1955年10月20日已写成了，胡乔木的草稿中已经没有“七大”党章中两处涉及“毛泽东思想”的部分。（参见许卿卿、王锬鸣的《毛泽东领导了“八大”文件起草工作》，《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2期。）

人崇拜问题，《再论》中就不再提这个问题了。从康生讲话中可看出：在写《再论》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反对个人崇拜问题上有所变化，不再主张笼统地反个人崇拜了。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正确的个人崇拜问题。在3月10日的会上，毛泽东讲：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党内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一些人屈服于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正确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外一种是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反对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对吗？抽象看似有点道理。细细分析却有问题：第一，把崇拜个人与崇拜真理混为一谈。毛泽东不主张盲目服从，这是对的，但提倡个人崇拜，实际上是在提倡盲目服从，因为个人崇拜的必然结果是盲目服从。第二，他讲崇拜真理，这似乎也不错。但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误，这本身是需要由社会实践检验的。对已有的真理采取崇拜的态度，就会犯教条主义，阻碍真理的发展。如果把崇拜真理与崇拜个人联系起来，那问题就更大，因为在被崇拜者看来，他认为自己是真理的化身，即使像毛泽东不承认自己的话句句是真理，但却坚信自己总的来讲是不会错的。对崇拜者来讲，他之所以崇拜某个人，就是因为凭他的经验、心理，总认为被崇拜的个人一定是对的。我认为，我们应对真理采取科学态度，相信真理，坚持真理，而又不盲目崇拜真理。第三，毛泽东把个人权威与个人崇拜混为一谈。个人权威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在现代化的社会中更离不开。这一点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已有充分说明。即使是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仍然需要有杰出人物，需要杰出人物的权威。在现代化的社会中，尤其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不需要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个人崇拜是同民主政治相对立的。个人崇拜的结果必然导致个人专制和专断。毛泽东的关于两种个人崇拜的讲话，滋长了对他的个人崇拜。因为在他和他的崇拜者看来，对他的个人崇拜是属于正确的个人崇拜，反对对他的个人崇拜是别有用心。那时有的领导人就讲：“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也应指出：毛泽东虽赞成正确的个人崇拜，但并不赞成盲从。在1958年5月8日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在讲破除迷信时，他批评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非圣即违法”的传统。5月17日，他又讲：“昨天有一位同志讲，跟着某一个人就不会错。这个人就指的我。这句话要修正一下，又跟又不跟。一个人有对有不对，对就跟，不对就不跟，不要糊里糊涂地跟。我们跟马克思、跟列宁，有些东西跟斯大林。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即使掏大粪的，扫街的，只要他有真理。……不要糊里糊涂跟某个人走，很危险，要独立思考。”毛泽东的这些话是真正正确的，与他主张正确的个人崇拜言论不一致。

本书第二章第四节讲到：1959年庐山会议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升温。刘少奇在8月17日的工作会议上专门讲了领袖问题，批评彭德怀不赞成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刘少奇说：“我是积极地搞‘个人崇拜’，‘个人崇拜’这个名词不大怎么妥当，我想，我是积极地提高某些人的威信

的。”庐山会议后，9月9日，刘少奇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批彭德怀。他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一个是“关于所谓个人崇拜的问题。”关于后一个问题，他认为，苏共二十大后在中国也有人要反对个人崇拜，党中央内部有人反对个人崇拜，中央内部的代表是彭德怀。他指责，反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一种破坏活动，是对无产阶级事业的破坏活动，是完全错误的。他讲：我这个人，历来是积极提倡“人个崇拜”的，也可说“个人崇拜”这个名词不大妥当。我是说提高毛主席的领导威信。我在很长时期就搞这个事情。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主席，“七大”的修改党章报告我也宣传，现在我还要宣传。刘少奇混淆了“个人崇拜”和“个人威信”，主张搞个人崇拜，批判反对个人崇拜。1959年12月2日康生在军事科学院和高等军事学院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所谓反对个人崇拜的这一口号是不妥当的，不科学的，甚至是错误的。”同时他又大讲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大发展，大批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

在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感到他与刘少奇等同志在形势、阶级斗争问题的看法上有分歧。到制定“二十三条”时，他认为刘少奇、邓小平不听他的话，把他架空了。关于这种感觉，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多次谈到。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一线、二线”。我处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九、十月间谈的。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呢？北京没有人干这件事，就在上海发起。”1967年2月，他在一次谈话中又说：批判吴晗的文章，在北京写不出来，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文章是秘密搞出来的，文章发表后，全国转载，北京就不转载。刘、邓、彭（真）、陆（定一）是反对这篇文章的。北京市是水也泼不进，针也插不进。又说：好几年前，我就要洗刷几百万，那是空话，他们不听话嘛，毫无办法。《人民日报》夺了两次权，就是不听我的话。我去年就声明，《人民日报》我不看。讲了好几次，他就不听。看来我这一套在中国不灵了。因为大中学校长期掌握在刘、邓、陆手里，我们进不去，毫无办法。

毛泽东是深深懂得舆论的重要性的人。1965年1月9日，他同斯诺谈话时讲过：斯大林曾是个人崇拜的中心，而赫鲁晓夫则没有个人崇拜，因而垮台了。为了把“失去”的权“夺回来”，需要对他的个人崇拜，需要把自己放在至尊无上的地位。1970年他同斯诺谈话时回忆起“文化大革命”前夜的往事时说：“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省的党权，各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的权，我也管不了，所以那个时候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其实，在那时，对他的个人崇拜已经是够可以的了。可他还嫌不够。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他需要更多的个人崇拜。他认为，对他的个人崇拜，并不仅仅是为了他个人，而是为了党，为了革命。他对斯诺说：对他的个人崇拜，“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他们树立了刘少奇、蒋介石（按：毛泽东把刘少奇与蒋介石并提，混淆了敌我，这

是其一。其二，树立刘少奇的，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自己。）我们这边总需要树立一个人啊。树立陈独秀，不行，树立瞿秋白，不行，树立李立三，不行，树立王明，也不行，那怎么办啊？总要树立一个人来打倒王明嘛，王明不打倒，中国革命不能胜利啊。”毛泽东在这里把需要领袖与需要个人崇拜混淆一起来。革命领袖是需要的，树立、维护革命领袖的威信也是需要的，但这与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是两回事。

正是在“需要一点个人崇拜”思想的支配下，在“文化大革命”中搞起了一个狂热的造神运动。

## 二、林彪的崛起与自我爆炸

毛泽东需要个人崇拜，林彪看准了毛泽东的需要，在六十年代的中国搞起了造神运动。林彪是由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成为接班人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林彪也是由制造个人崇拜败露破绽，导致最后自我爆炸的。

林彪（1907～1971）在民主革命中，曾有过赫赫战功。1926年1月，他入黄埔军校学习，北伐开始后在叶挺独立团任见习排长。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后上井冈山跟随毛泽东，先后任连长、营长、团长、红四军军长，红一军团军团长。长征中任军团长，左路军（辖一、三、五、九军团）司令员。长征到陕北后任抗大校长。“七七”事变后任115师师长，指挥了威震中外的平型关战役。1938年负伤去苏联。1942年1月回国。中共“七大”被选为中央委员。抗战胜利后率十万大军和两万干部挺进东北，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后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指挥辽沈、平津战役。他领导的四野从北南下，一直攻到海南岛。建国后任中南行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在10个副总理中林彪排在陈云之后，彭德怀、邓小平之先，居第二位。1955年被授于元帅军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中最年轻的一位，排在朱德、彭德怀之后，居第三位。

在历史上，林彪自然也有过错误。最明显的有：（一）、在江西提出“红旗到底打多久”，对革命悲观，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长信就是写给他的。（二）在长征途中，在1935年5月会理会议前夜写信中央军委，要求改变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三）在辽沈战役中迟迟不执行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关于先攻取锦州的战略决策。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器重他。据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我在毛泽东身边的期间，林彪来见毛泽东时，总是正襟危坐，板着面孔，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敢发表意见，甚至当面否定毛泽东的意见。像这样毫无拘束，在毛泽东面前敢说敢争的军事将领，彭德怀和林彪是比较突出的。”林彪在1955年4月的七届五中全会上与邓小平同时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58年5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1959年庐山会议上接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1965年1月，第三届全国人大后，林彪的副总理位置排在陈云之前，居第一位。

全国解放后，林彪虽因身体原因较少参与军政大事，但他对毛泽东的心态、思想倾向是捉摸透了。他在一本1958年版的辞典上写道：“他自我崇拜，

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这话确实抓住了毛泽东晚年的致命弱点。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乘机搞个人崇拜的风，在军队内部首先搞起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1959年9月至10月，林彪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大讲顶峰论。他说：“现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时代思想的顶峰。”他提出：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是一本万利的事情”。在1960年10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反复讲：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号召全军指战员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毛泽东注重思想政治工作，注重政治挂帅。林彪则在军队政治思想工作中提出“四个第一”：人和武器相比较，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和其他各种工作相比较，政治工作第一；政治工作中事务性工作和思想工作相比较，思想工作第一；思想工作中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相比较，活的思想第一。林彪的这一套。毛泽东十分赞赏。

在1962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林彪的讲话也与众不同，他的主调依然是“高举。”他说：“在困难时期，要更加依靠党的领导，更加依靠毛主席领导，相信毛主席的领导。只有这样，才更容易克服困难。事实证明，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都听毛主席的话，那么困难会小得多，弯路会弯得小一些。”“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这里，林彪是投毛泽东之所好，把一切功劳归之于毛泽东，把一切错误归之于他人。

林彪晋升为接班人，客观一点讲，这与他主持军委工作后，军队工作有了较大起色有关。1963年，工业部门的同志主动提出学习解放军，从上到下设政治机关，加强工业部门的思想政治工作。毛泽东对此建议十分赞成，1963年11月16日，他在致林彪、聂荣臻、肖华诸同志的信中说：“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够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又说：“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了。”

不过，在1963年时毛泽东对林彪是有疑虑的。这表现在他在这年底写的《吊罗荣桓同志》的七律中。罗荣桓元帅是林彪的老搭档，林彪任115师师长时，罗荣桓任政治部主任。林彪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时，罗荣桓任四野第一政治委员。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在北京病逝。毛泽东一向很敬重罗荣桓，当他得知罗荣桓逝世后悲痛逾常，写了一首七律：“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诗的三、四两句是指林彪在长征中反对毛泽东和在辽沈战役中迟迟不执行先攻锦州的战略决策二事。毛泽东在悼念罗帅的诗中提及林彪，当然不像有的注家所理解的是为了批判林彪，因为此时的林彪正在重用之中。但从诗的最后两句中，可以看出，诗人对林彪是有保留的。他本想问问为人忠厚老实的罗君：你的老搭档林某人为人如何，能否进一步重用，可不等毛泽东问疑，罗君已离去，岂不

痛哉惜哉！

到了 1966 年春，林彪大致嗅到毛泽东要搞“文化大革命”，“需要一点个人崇拜”，于是便更加大力神化毛泽东，赞颂毛泽东思想。3 月 11 日，他就工业交通战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写了一封信，说：毛主席天才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提出“必须通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毛主席的思想灌输到工人、农民中去，才能改变劳动人民的精神面貌，才能使精神力量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5 月 18 日，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讲政变。他说，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1960 年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仅在亚非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先后发生了 61 次政变，搞成的 56 次。6 年中平均一年 11 次。又说，从中国历史上看，历代开国以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很短时间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他别有用心地说，野心家大有人在，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想推翻我们的无产阶级政权，不能让他们得逞。有一批王八蛋，他们要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他们是假革命，他们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是背叛分子，毛主席健在，他们就背叛。

林彪“5·18”讲话的另一内容是过分的颂扬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大讲天才。他说：毛主席经历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多得多。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恩格斯承认有天才，列宁也承认有天才。毛主席是天才。毛泽东广泛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19 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20 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要不服气，不服气不行，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他又说：“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要拥护毛主席。”“毛主席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锐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毛泽东思想能够改变人的思想面貌，能够改变祖国的面貌，能够使中国人民在世界面前站起来，永远站起来。能够使全世界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站起来，永远站起来”。“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他信誓旦旦地说：“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同年 9 月 18 日，他又讲：“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他提出，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我们要百分之九十九地学习毛主席著作。

经林彪这么一吹，整个中国的广播、报刊也都吹起来。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成了最高指示，衡量人们言论、行动的唯一准则，任何与毛泽东言论相左的思想、言论都被视为谬论、修正主义，甚至说成是反毛泽东思想，反革命。林彪则以红旗“举得最高”，“思想学得最好”而青云直上。在 1966 年 8 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代替了刘少奇，成为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毛泽东的“最亲密的战友”、“最可靠的接班人”、“副主席”、“副统帅”。林彪当接班人曾被认为是一件大喜事。1966 年 9 月 25

---

详见拙文：《国有疑难可问谁——毛泽东〈吊罗荣恒同志〉一诗之我见》，《党的文献》1990 年第 5 期。

日，一位老师在接见北京十三个艺术院校艺术团体部分师生代表时讲：“最近时期，我们党内还有一个很值得庆贺的大喜事。就是毛主席选定了他自己的第一个接班人。主席选了几十年，究竟谁来接班？选来选去，验来验去，经过近四十年革命斗争的考验，证明了林彪同志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是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还有高度的领导艺术，是毛主席最好的接班人。主席选定林彪同志这样一个最亲密的战友为接班人，肯定说，不但我们文化大革命运动能取得彻底胜利，而且对整个中国、整个世界的革命取得胜利也是乐观的。林彪同志的身体比我们中的任何人都好。我们确信，林彪同志跟着毛主席领导二三十年是毫无问题的。有了主席，有了林彪同志，这样英明伟大的领袖，有了他们两个人，刚好马克思恩格斯也是两个，毛主席林彪同志也是两个，我们的革命就无往不胜，就可信心百倍的完成我们伟大的革命事业”。10月5日，还是这位老师在军事院校文化大革命动员会上的讲话中又说：让林彪同志作为我们副统帅，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最可庆喜的事。林彪是在党的领导干部中，特别是在军队领导干部中是最全面掌握毛泽东思想，而且年龄最轻，身体也最健康，今年才59岁，经医生多年检查，从头脑到内脏没有什么毛病。因此，他是最优秀、最健康、最年轻、最有能力领导我们的。我们不仅要宣传毛泽东思想，而且要向全国、全世界宣传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健康，这有极大的政治意义。这位老师的这些话很有代表性。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中，明确规定林彪是“接班人”。这无论在中共党史上，还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实属“史无前例”，绝无仅有。

林彪当上了接班人后，为了巩固自己地位，进一步篡夺更大的权力，便在军内、党内网罗党羽，组织反革命集团。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头目除他的夫人叶群外，还有四员大将，即黄永胜（总参谋长，中共九届政治局委员）、吴法宪（空军司令员、中共九届政治局委员）、李作鹏（海军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九届政治局委员）、邱会作（总后勤部部长，中共九届政治局委员），此外还招纳了一位秀才陈伯达（中央文革组长，中共九届政治局常务委员）。林彪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实现自己个人野心的最好机会，鼓吹“文化大革命”就是批判干部运动，罢官运动，残酷打击、迫害老干部，制造了一起又一起的骇人听闻的惨案、冤案。这里仅举贺龙一例。

贺龙以两把菜刀闹革命的传奇故事而闻名全中国，是十大元帅之一，功勋卓著，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家体委主任。贺龙为人耿直。林彪视贺龙为进一步夺权的障碍。为了搞倒贺龙，林彪在1966年8月就散布：“贺龙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手了。”“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贺龙有历史问题，通敌收编”。叶群指使中央军委办公厅的一位处长写诬告贺龙的黑信。林彪则策动吴法宪、李作鹏给毛泽东写诬告信，造谣说贺龙是黑线人物，要“篡军反党”。毛泽东不相信林彪一伙的诬陷。1966年9月14日，毛泽东将贺龙请到家中会面，把吴法宪的信给贺龙看，并宽慰道：“你不要紧张，我对你了解。我对你还是过去讲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人斗争狠，能联系群众。”贺龙表示要找吴法宪谈谈，以消除隔阂。毛泽东说：“有什么好谈的？你不能找他们，不能承认上面的事，我当你的保皇派。”最后，贺龙还是表示，应当找他解释一下。毛泽东说，也可以。9月19日，毛泽东再次在中南海接待贺龙，并开门见山地表示：“问题解决了，没事了。”“你可以登门拜访一

下，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根据毛泽东的建议，贺龙到林彪家去征求意见。林彪企图拉贺龙站在他一边，遭贺龙婉言拒绝。林彪决计继续整贺龙。

与林彪一伙整贺龙的同时，江青一伙也在整贺龙。1966年7月27日，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群众大会上，仅根据北京大学的一张捕风捉影的大字报，断定有所谓“二月兵变”。之后，林彪、江青两反革命集团又合谋把“二月兵变”的后台说成是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他们又诬蔑贺龙是“大土匪”、“大野心家”、“反对毛主席”，鼓动学生抄家、揪斗。1967年1月18日，周恩来、李富春（本来还有江青，但她拒不参加）与贺龙进行了一次谈话。周恩来说：我本想让你住在中南海，但现在中南海也有两派，连朱老总家的箱子也被撬了。为了你的安全，另外给你找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你先去吧，到秋天我去接你。于是贺龙转移到秘密安排的地方，过了半年相对安静的生活。林彪、江青仍不罢休。1967年9月，中共中央同意对贺龙进行审查，专案组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控制，他们捏造事实，隐瞒真象，以欺骗和封锁中央，诬陷贺龙。在诬告、假材料面前，毛泽东改变了对贺龙的看法。1968年10月31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闭幕会上讲话临结束前说：过去说贺龙是一批二保，因为他是二方面军的代表。现在看来不能保了。因为他搞的事从前不知道。从××、×××、×××等揭发的材料看，他是破坏我们这个军队的，他的目的是篡军，反党的企图是有的，但没有来得及。毛泽东的这番话表明他原先是要保贺龙的，但受了林彪、江青一伙假材料的瞒骗，也轻信了贺龙的部下在逼供下写的假材料，他不得不放弃保贺龙。毛泽东的这一番话无疑宣判了贺龙政治上死刑。林彪、江青一伙不仅对贺龙进行政治诬陷，而且对贺龙进行人身摧残。贺龙有糖尿病，得不到治疗。贺龙在囚禁时日常用水也受限制，大热天，一天只给一壶饮用水。贺龙只好趁下雨之机用盆接些雨水以备急用。贺龙于1969年9月4日含冤而死。有材料说：贺龙在最后时刻，心还是向着毛泽东的，经常吟唱“东方红”，临摹贴在墙上的毛主席语录，一再嘱咐，“我死后，骨灰要放在高山顶上，我要看毛主席登上天安门。”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多次指示：要抓紧给贺龙作出结论，予以平反，恢复名誉。中共中央于1974年9月29日，发出为贺龙平反，恢复名誉的通知：1975年6月9日，补行了骨灰安葬仪式。周恩来抱病参加，代表党中央致悼词。他向贺龙的夫人薛明表示，没有保护好贺老总，深为内疚。他向贺龙遗像连鞠7次躬。“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贺龙的沉冤才得到彻底昭雪。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对贺龙的态度和贺龙对毛泽东的忠心很有代表性。“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泽东确实保过不少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同志，对许多人一批二保，有的保住了，有的没有保住。没有保住的是因为林彪、江青一伙制造假材料，诬陷有历史问题。只要戴上“叛徒”、“特务”的帽子，毛泽东就只好再保了。被迫害的干部，虽然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不满，对林彪、江青一伙表示愤慨，但对毛泽东本人无多少怨言。

一个人的野心是无止境的。对野心家来讲，随着地位的上升，野心也在扩大。林彪虽然成了“法定”的接班人，但毕竟还是第二号人物。他的目标是要成为第一号人物。中共“九大”后，林彪感到他的地位并不稳固。第一，党内、军内反对他的力量依然存在。由于毛泽东的坚持，一些老师、老将、

老干部参加了“九大”，进了主席团，进了中央委员，有的还进了政治局。第二，感到毛泽东对他并不放心。毛泽东对林彪的“顶峰”、“天才”、“绝对权威”等过分颂扬一直持批评态度（详见后面）。毛泽东否定陈伯达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又是一种不信任的表示。第三，江青有当中国女皇的野心。林彪与江青，本是一丘之貉，互相勾结，互相利用，共同篡党窃国。随着地位的上升，权力的增长，江青的权欲也恶性膨胀。她在中共“九大”前夕，建议党中央多设几位副主席。毛泽东洞悉江青的用意说：多设几位副主席可以，江青不能当副主席。毛泽东一语揭穿了江青的野心。“九大”只设一个副主席。林彪当了副主席。林彪当然知道，江青的野心并没死。江青对林彪是一个危险的存在物。

1970年3月，毛泽东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同时提议，改变国家体制，不再设国家主席。在3月17日至20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多数人赞同毛泽东不设国家主席的提议。林彪当然对毛泽东的建议不满。林彪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很想当国家主席。4月11日，他别有用心提出设国家主席，并建议由毛泽东当国家主席。他心里明白，毛泽东不会再当国家主席。只要宪法上写上国家主席，这个主席职位就一定是非他莫属了。4月12日，中央政治局将林彪的意见报给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

针对林彪坚持要设国家主席这一点，毛泽东在半年时间，先后六次讲过不设国家主席和他不再当国家主席。在4月下旬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还生动地讲了一个历史掌故：“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想把他放在火炉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他的话十分明显戳穿了林彪要设国家主席的目的。但林彪始终不悟，急于想当国家主席，坚持要设国家主席。5月中旬，林彪同吴法宪讲：“不设国家主席，国家就没有个头”。7月，叶群也对吴法宪又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那里摆？”

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开幕。这是中共党史上的第三次庐山会议。开会前一天，毛泽东在中央常委会上讲：要把这次会议开成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而不是分裂的会，失败的会。他这样讲是因为他又一次感到党内矛盾太大，有分裂的可能。在这次会上，林彪、陈伯达又提出设国家主席，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再次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在开幕式上，毛泽东主持会议，周恩来宣布了会议的两项议程：（一）讨论修改宪法；（二）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三）战略问题。之后，康生讲了毛主席对修改宪法的历次指示、修改宪法的过程、宪法的修改情况。会议并没有安排林彪讲话，林彪在前一天的常委会上也没有提出要讲话。可在康生讲话后，林彪要求讲话。他离开会议的议程，大力颂扬毛泽东，大讲毛泽东是天才。他说，我个人坚持“个人天赋”这种天才观点，并提出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的讲话是突然袭击，事先没有同毛泽东打招呼。当晚政治局开会，讨论国民经济计划。吴法宪提出，全会要学习林彪讲话，明天听林彪的讲话录音，企图改变原定会议议程。第二天，即24日，在林彪的指挥下，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分别在小组会上宣讲由陈伯达事先炮制的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及林彪称天才的语录。叶群在中南组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得多，懂得多，难道这些都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为表示对

毛泽东的感情和忠心，叶群在发言中还假惺惺地挤出几点眼泪。陈伯达在华北组毫无根据地说，有人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有人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说成是一种讽刺。陈伯达的发言登在华北组第6号简报上，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

这次，林彪完全打错了算盘。此时的毛泽东已讨厌称他为“天才”了。毛泽东从林彪的颂词和活动中进一步看穿了林彪的野心和阴谋。25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全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23日讲话，收回华北组第6号简报，责令陈伯达和其他“语录”宣讲员检讨。8月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揭露林彪一伙急于抢班夺权的野心。这次庐山会议，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一次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反革命政变。林彪一伙的政治纲领是设国家主席，理论纲领是天才论。不过，这一次，毛泽东只抛出了一个文人骗子陈伯达，而对林彪采取保护态度。庐山会议后，党内开展批陈整风，并要求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作出检讨。

毛泽东希望林彪改正，但林彪拒绝了毛泽东的好心。林彪感到：毛泽东对他极不放心，急不可待地要改变接班人，安排后事。林彪决心一不做，二不休，来一个先发制人，在“和平接班”失败后，搞反革命武装政变。用他们自己的话讲是：“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1971年3月22日，林彪、叶群指使儿子林立果等人在上海制定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这个计划分“可能性”、“基本条件”、“时机”、“力量”、“口号和纲领”、“实施要点”、“政策和策略”、“保密和纪律”等九个部分。

这个反革命武装政变纲领攻击毛泽东是“当代秦始皇”，“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攻击现行的社会主义是“社会法西斯主义”；攻击现行的国家政权是“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这个反革命纲领对当时的形势是这样描写的：“9·2（按：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军队受压”，“十年多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农民缺吃少穿”，“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利用，充当炮灰，后期被变成替罪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工资被冻结，等于变相剥削”，“人民群众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林彪一伙认为，这是他们搞反革命军事政变的有利条件。他们的策略还是老办法：“打着B—52（按：B—52是美国在侵越战争中使用的远程轰炸机，林彪一伙称毛泽东为B—52）旗号打击B—52力量”。他们的具体做法：或“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先斩爪牙，既成事实，逼B—52就范”，或“利用特殊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543（按：一种武器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在国际上，他们准备同苏联、美国秘密谈判，在核保护伞下充当“儿皇帝”。林彪一伙攻击他人是封建法西斯，把自己说得好像是体恤平民的“恩主”。可实质上，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才是道道地地封建法西斯，甚至比法西斯还要法西斯。《“571工程”纪要》本身也散发着浓烈的法西斯气息，打上法西斯的印记。“纪要”最后说：要“发扬”日本法西斯武士道的“江田岛精神”和遵守蒋介石一再提倡的“不成功便成仁”信条。林彪一伙“利令智昏”，完全错误估计了形势。“文化

大革命”虽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不幸，但毛泽东始终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伟大领袖，深受中国各族人民的爱戴和尊敬。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相信自己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林彪一伙的反革命武装政变不过是以卵击石。

这个《纪要》是“9·13”以后查获的。在此前，毛泽东并不知道。但毛泽东凭他一生政治斗争的经验感到林彪一伙在行动，搞阴谋。为了防范林彪的阴谋活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挖墙角，改组北京军区；二，抛石头，写了一系列批示，提醒全党注意，同时要林彪的几员大将检讨；三，掺沙子，派人进被林彪一伙所控制的军委办事组。

1971年7月9日，中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飞抵北京，为打开中美关系铺路。下午，周恩来等同基辛格会谈，晚十时结束。结束后，毛泽东要周恩来去他书房汇报情况。并告之要总参的熊向晖参加。周恩来等到后即要汇报会谈情况，毛泽东却摆手说，“那个不忙”。他向熊向晖了解总参批陈（伯达）整风的情况和黄永胜、吴法宪等人的检查。熊向晖如实作了回答。毛泽东从中得知，黄永胜没有讲庐山上的事，在总参，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的检讨像熊向晖这样的干部（总参副部长）都不知道。毛泽东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这说明，在毛泽东的头脑中，日程上，林彪问题是压倒一切的，即使在有重大的外事活动时也是这样。

1971年8月14日至9月12日，毛泽东在南方一些省巡视，沿途同各地党政军负责人作了多次谈话，下毛毛雨，唤起各地领导干部对林彪问题的注意，在谈话中，毛泽东说：在庐山会议上，林彪等人的突然袭击的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林彪对这件事当然要负一些责任。9月5日，林彪、叶群从他们党羽的密报中得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十分恐慌，决定对毛泽东采取谋杀行动，发动武装政变。9月8日，林彪下了武装政变的手令。

9月初，毛泽东在江西南昌同江西省革委主任程世清谈话时，感到情况不太对头。9月3日，毛泽东乘专列到杭州。9月8日夜，吃完夜餐，毛泽东突然叫过身边工作人员，要他立即将览桥机场附近的专列连夜转移。9月10日下午三时许，毛泽东又突然说：“现在把车调回来，我们马上就走”，并交待不要陈励耘（7350部队政委，事后查明是林彪一伙杭州的党羽）送行。三个多小时后，毛泽东的专列驶进上海，在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停下。林彪在上海的党羽王维国将毛泽东到上海的消息密报北京的林立果。林立果立即密谋，准备了几个谋杀毛泽东的方案：由王维国乘毛泽东接见时暗杀：炸在苏州附近硕放的铁路桥；用火焰喷射器打毛泽东的火车；派飞机炸专列：炸专列附近的油库，以便乘混乱之机杀害毛泽东，然后再以谋害的罪名加害他人。毛泽东到上海后未下专列，立即通知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到上海。11日上午，许世友飞到上海，毛泽东接见了许世友，但没有让王维国登车。中午，毛泽东让许世友和其他同来谈话的人一起下车吃饭，并拉上王维国。下午，毛泽东的专列离开上海，中间一站不停，直驰北京。为了安全起见，毛泽东的专列没有直进北京站，而是先停在丰台。毛泽东将北京军区和北京市负责人找到那里听汇报，谈了两个多小时，并作了一些部署。此时，他还

说：要找林彪谈谈，作争取工作。黄昏时分，专列驶进北京站。

毛泽东的突如其来的行动完全打乱了林彪一伙的谋害计划。此时在北戴河别墅的林彪成了惊弓之鸟，恐慌万状，策划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以图东山再起。为了掩盖南逃阴谋，林彪、叶群在 12 日晚为女儿林立衡安排订婚仪式。仪式进行中，林立衡发现情况异常，布置了服务员偷听林彪、林立果的谈话。据服务员的报告，林立衡得知林彪要南逃，于是立即向警卫的 8341 部队报告，警卫部队十万火急打电话给周恩来。此时的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主持讨论全国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晚 11 时 22 分，叶群故意打电话给周恩来说：“林副主席想动一动。”周恩来问：“是空中动，还是地上动。”“空中动。”“你们那里是否有飞机？”“没有。”其实，在此之前，周恩来已了解到林彪早把 256 号三叉戟专机调到山海关机场。林彪一伙知道阴谋败露，末日来临，于是决定改“南逃”为“北叛”。9 月 13 日零点 32 分，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在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仓皇出逃。

周恩来得知林彪飞机起飞后命令关闭全国所有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开动雷达监视天空。周恩来请调度人员向飞机喊话：希望你们飞回来，不论在北京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但终无回答。当飞机即将飞出国境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时，周恩来请示毛泽东，是否拦截。“不要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待。”毛泽东坐在沙发上，头向后躺在靠背上，微微合上双眼，边挥着手边说。13 日零晨二点三十分，三叉戟机油耗尽，又无法同蒙古机场联系（机上无通信人员），只好在温都尔汗的沙漠中迫降。降落时飞机爆炸，机上人员全部摔死、烧焦，暴尸异国他乡的荒漠之中。之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也逮捕、受审。

1971 年 10 月 16 日，毛泽东在由周恩来、叶剑英等参加的汇报会上谈到林彪事件时幽默地说：“我的亲密战友啊！多亲密啊！”毛泽东还念了唐朝诗人杜牧《赤壁》的诗：“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接着又说：“三叉戟飞机摔在蒙古，真是‘折戟沉沙’呀！”

从后来查获和揭发的大量材料看，林彪是一个很阴险的野心家、两面派、伪君子。他施展中国古代的“韬晦”之计，伪装起来，一再提醒自己要“忍耐”，“不可为了一区区小事而耽误自己的终身大事。”叶群在《工作手册》上写道：“谁不说假话，谁就要垮台”，“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他们又写过：“古皆真话惹祸。”在待人处事上，实行“三不”“三要”的立场。“三不，一不干扰人之决心（免已负责、免争领导之嫌（不建言））。二不批评三不报坏消息（去影射之嫌）”。“三要，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他们说：“打起红旗造反，不易被人看穿。”为了把林彪装扮成对毛泽东最忠诚，叶群对身边工作人员说：“选文件、打电话时都要提醒（林彪）言不离主席”，“首长参加外事活动时也要提醒”。这正如群众所说：林彪是“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大骗子，大阴谋家。以上林彪的黑话，反映了他是靠说假话、阿谀奉承起家的。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林彪和一切野心家、阴谋家一样，以自为很得意，自以为很聪明，其实是最蠢的。他以称“天才”起家，

---

见《新观察》1986 年第 18 期《毛泽东同熊向晖谈庐山会议》。

当上接班人，同时也以称“天才”而败露，自取灭亡。

### 三、由“逼上梁山”到批判天才论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泽东需要一点个人崇拜，但当林彪趁机大搞个人崇拜时，毛泽东又有点不安。洞悉中国历史的毛泽东对林彪的过分颂扬存有疑虑、戒心是很自然的。他对身后之事不放心。他的这种矛盾心态很难向旁人吐露。1966年7月8日，他借中共中央摧发林彪“5.18”讲话之机，给江青写了封两千字的长信。

毛泽东在信中说：“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他引了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的话：“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毛泽东说：“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4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5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了。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吧了。”他又说：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冷水，帮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对林彪的“5.18”讲话，毛泽东并没有立即批发，他拖了两个月，直到9月22日，中共中央才以文件形式下发。

毛泽东的这封长信，涉及面很广，因此，研究者对它的理解与解释自然也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人认为，信的重点是毛泽东在自我解剖。有的则认为，毛泽东写信的目的旨在通过江青遥控“文化大革命”。我认为信的基本点是：为形势所迫，他只好上梁山，流露出他对林彪的不放心。这封信是毛泽东为选林彪做接班人而写的一个“备忘录”。事实上，这封信在“9.13”事件后也确实起到“备忘录”的作用。在批林时，这封信在党内公布了，以证明毛泽东早有“预见”，看出林彪不是马列主义者。

毛泽东的信是在武汉写的。写完后由秘书抄了一个抄件，并在抄件上做了修改。首先看到这信的是周恩来和王任重。周恩来看了信后提出去大连说

服林彪改正。毛泽东同意。周恩来劝告林彪不要再作那种提法，林彪表面上答应了。这月的25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又批示：“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2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主要报刊负责人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不要说那些话的指示。8月4日，中共中央还专门发了一个通知，说以后不要再用“顶峰”、“最高最活”、“一句顶一万句”等话。但当时新任的中宣部长陶铸认为：最高最活等语言，是完全合乎实际的，是全国全世界人民的心里要求，不宜全部停止使用。

事实上，林彪并没有听毛泽东的话，不仅继续大讲，而且越讲越厉害，提出毛泽东的话“一句超过一万句”，“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要百分之九十九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毛主席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等。

在林彪一伙的鼓动下，毛泽东被大大地神化了，毛泽东著作的学习极端地庸俗化、形式化、简单化了。甚至出现了明显的宗教崇拜形式。大小集会开始必须手挥《毛主席语录》，集体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大小会前必须集体诵读有关毛主席语录。每天要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每天上班后，头一件事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小时，这叫天天读，雷打不动。唱语录歌，跳忠字舞，流行一时。到处张贴毛主席的语录，书写颂扬毛主席的标语、口号，到处挂毛主席的画像，许多单位树立毛泽东的塑像（北京大学还树了两尊大的塑像），人人佩戴毛泽东的像章。在狂热的个人崇拜气氛中，无人敢提出异议，因为谁要提出异议，就是反毛主席，是反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只有毛泽东本人及周恩来对宗教式的崇拜、极端庸俗的做法提出批评并加以制止。

1967年6月17日，我国爆炸了第一颗氢弹，毛泽东在审阅氢弹爆炸公报时把“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字样勾掉，也把毛泽东思想之前的“光焰无际”几字删去。第二天，他又说：宣传毛泽东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过去不搞，现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大搞特搞，吹得太厉害，人家接受不了。有些话何必要自己来说，我们要谦虚，特别是对外的。他又说：世上的光芒哪里有无际的，都有际，所以勾掉了。（公报中）“万分喜悦和激动的心情”，我把“万分”也勾掉了。不是十分，也不是百分，也不是千分，而是万分，我一分也不要，统统勾掉。

他反对到处建造他的塑像。1967年7月5日，他在一个文件上批示“此类事情是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股浮夸风，碰头会讨论一次，发出指示加以制止。”他还风趣地说过：你们让我白天黑夜、风雨无阻地为你们守大门，站岗（按：当时的塑像一般都站立在工厂、学校、机关的大门内），我不干。他对利用铝等金属做大量的像章也不满，批示：还我飞机。

林彪一伙鼓吹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对此，毛泽东也提出批评。1967年12月17日，他在一个文件上批写道：“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只存在于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毛泽东的这些话无疑是对的。人为地树立权威是不行的，是十个有十个要垮台的。这里有一个十分令人有趣的现象：当一个人在公众中威信高的时候，

他并不感到需要有意识地去树立自己的威信。当他感到需要人为地为自己树立威信时，恰恰是他还没有威信，或原来的威信发生动摇，正在逐渐下降中。

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两次圈去“九大”党章草案中的“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语句中的三个副词。当时有人提出：这三个副词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新党章不写不好。毛泽东的回答是：党代表大会，有权修改以前的任何文件。

毛泽东提出：在对外宣传中，不要强加于人，不要自吹自擂。“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有人将中国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绝对化，认为这一道路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适用，提出“井冈山道路通天下”的口号。日本共产党人安斋库治等人认为，日本不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1967年11月27日，毛泽东在一个材料上批示：“我认为安斋的意见是正确的”。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国际上一些共产党。对毛泽东思想也吹得很厉害。1968年3月29日，他批示：“一般地说，一切外国党（马、列主义）的内政，我们不应干涉。他们怎样宣传，是他们的事，我们应该注意自己的宣传，不要吹得太多，不应说得不适当，使人看起来好像有强加于人的印象。”1968年9月，他在审阅《人民日报》社论《世界革命人民胜利的航向》时批道：“把离开主题的一些空话删掉，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他把“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是理论联系实际伟大典范”等统统删去。

应当说，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前，对造神运动中的许多极端做法提出过批评，但是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陈伯达以“天才”问题发难，用“天才”问题打人，用“天才”论作为登上国家主席的宝座的垫脚石。毛泽东看穿了他们的阴谋，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专批天才论。他讲：在搞对他的个人崇拜上，他是“逼上梁山”的。我们同样可以说，他批“天才论”，批林彪、陈伯达，也是被逼出来的，也可以说是“逼上梁山”的。

《我的一点意见》只有七百多字，不妨全文抄录如下：

这个材料（按：指陈伯达在林彪指使下搞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称天才的语录》及《林副主席的指示》）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的一句话（按：指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一书德文版第三版的序中的“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到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只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

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又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惟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

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把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把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原稿上还有一句：“陈伯达抓住林彪的八条如获至宝。”林彪请求毛泽东删去，毛泽东同意了。原稿上陈伯达后面没有“同志”二字，是因林彪的要求而加上去的。

《我的一点意见》言简意赅，不仅揭穿了林彪、陈伯达搞天才论的政治目的，而且从历史观和认识论两方面批判了天才论。天才论涉及到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历史观，是谁创造了历史，是少数英雄、天才、伟人、帝王，还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二是认识论问题，知识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这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根本的，第二个是从属的。但为了科学地解决第一个问题，必须很好地解决第二个问题。只有科学的回答了杰出人物、英雄的思想、智慧是从哪里来的，才能真正驳倒天才论。许多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陷入天才论、英雄史观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不懂得英雄、天才人物的思想来之于社会实践，来之于广大群众。

在这次庐山会议上，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受骗上当，分不清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对此，毛泽东深感忧虑。他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是：这几年党内不提倡读马列的书。这实际上也是在批林彪。因为如前所述，林彪提出“要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读毛主席的书。”为了提高党的理论水平、纠正林彪的错误，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的闭幕式上说：“现在不读马列书了，不读好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呀！就照着吹呀！那么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呀。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基本开始嘛，不妨碍工作。”又说：“要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一讲读哲学史，那可不得了呀，我今天工作怎么办？其实还是有时间的。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因为上当，得到了教训嘛，人家是哪一个版本，第几版都说了，一问呢？自己没有看过。”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在一系列批示、谈话中又强调学马列。10月15日，在叶群的检讨上毛泽东批写道：“一个共产党员不读一点马列怎么行呢？我指的主要是担负高级职务的人。”

12月29日，他在姚文元的一个报告上批示：“我的意见，二百七十四个中央委员，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不同程度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

12月18日，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中提出对他的个人崇拜要降温。他说：

“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四个伟大”（按：指“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谦，总有一天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 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的。其他一概辞去。”斯诺说：我有时不知道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毛泽东说：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信那一套呢？毛泽东问斯诺，在北京的几位外国朋友是不是给你谈了这些情况？斯诺回答，他们说了一些，但是他们没有你这么坦率。毛泽东说：“他们还有一点恐惧，怕说错了话，我不怕说错话，我是无法无天，叫“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很快传达到群众。全国“降温”。但应当说，这种“降温”只是形式的，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仍然没有触动，因为就在这次谈论中，毛泽东坚持个人崇拜是必要的观点。他说：“总要有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总要有个人崇拜嘛，你也有嘛。”“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毛泽东又一次把个人威信、威望同个人崇拜混淆起来。

1971年3月15日，毛泽东在一篇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的文章上批示：“我党多年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这一批示更明显地是为批评、纠正林彪的错误而发的。林彪一伙对被指斥为“骗子”，肯定感到恼怒和恐慌，于是从3月21日到3月31日加紧炮制《“571”工程纪要》。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全党掀起了学习马列著作的热潮。不论是高级干部，还是一般干部，普遍都学习《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国家与革命》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著作。报刊、杂志上发表不少批唯心论的先验论的文章。

1971年8~9月，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又多次从理论上批判天才论。他说：“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对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了1918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又说：“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毛泽东对天才的这种解释是新颖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

他又说：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的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了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

---

斯诺在《漫长的革命》中把毛泽东在1970年12月18日谈话过程中说的话，写成在谈话结束后送斯诺到门口时说，并把毛泽东的话误解为“打着一把破伞的独行僧。”后来一些外国学者据此把毛泽东说成是“孤僧”。中国人自己编辑的《世纪行》电视片，又把毛泽东的话移到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对斯诺说的。这就更加离开原意。

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彪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毛泽东号召唱《国际歌》（还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说：国际歌的歌词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历史，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多字的文件，就是提出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

能说毛泽东对天才论的批判不对吗？不深刻吗？我想不能。

那么，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尤其是在林彪自我爆炸之后，能说毛泽东已认识到个人崇拜不对吗？能说中国社会中已不存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吗？同样不能。

我们不能因为前者，而否认后者，否认毛泽东晚年在历史观上实际上陷入唯心论。我们也不能因为后者而否认前者，否认毛泽东在理论上仍然有正确的一面。问题是如何解释这一矛盾。

#### 四 “人民万岁”与“个人崇拜”

个人崇拜是同唯物史观对立的。但这两者有时又可共存于一个人身上。斯大林一方面接受和鼓励个人崇拜，另一方面在理论上依然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而且有的讲得相当不错。毛泽东在修改《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时写道：斯大林“一方面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建者，承认党必须永远地联系群众，必须发展党内民主，发展自我批评和自下而上的批评，另一方面却接受和鼓励个人崇拜，实行个人专断，这就使得斯大林在后一时期在这个问题上陷于理论和实践相脱节的矛盾。”令人遗憾的是这一现象在毛泽东自己身上得到了重演，而且更加严重。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毛泽东的根本思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动力。”“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这些是为广大干部、群众所熟知的毛泽东的名言。在晚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在狂热的造神运动的时代，他抛弃了上述思想了吗？在言论上，没有。“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在批评工作组时反复指出：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他指责：刘少奇的“反动路线”其要害是镇压群众。他认为，他的革命路线与刘少奇的“反动路线”的对立主要在于对群众的态度上。毛泽东主张放手发动群众，运用“四大”的形式，自下而上地全面地揭发党内的阴暗面。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把广大人民群众前所未有地发动起来了。他始终站在群众一边说话。他提出：“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他又说：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群众给的。“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直到1975~1976年，他还说：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都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

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离脱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他告诫“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的老同志：受了冲击，心里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他同情受压迫者、小人物。他说，“一百年以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以后要不要革命？总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們要革命呢？”在1949年的开国大典上，面对高呼“毛主席万岁”的群众，他挥手高呼：“人民万岁”、“同志们万岁”。在“文化大革命”中，依然在天安门城楼上，他同样以“人民万岁”、“同志们万岁”来回报群众对他的崇拜和欢呼。人民喊“毛主席万岁”是出于内心的，毛泽东喊“人民万岁”同样也是真诚的。这两者是一致的。人民虔诚地崇拜毛泽东，而毛泽东也感到需要有一点个人崇拜。这两者也是一致的。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主要的缔造者。正因为这样，人民把毛泽东看成我们党、国家、民族的化身和代表。因此，谁反对毛泽东就是反对党、反对国家，就是反革命。毛泽东成了当代最大的“圣人”。“非圣即违法”。人民把毛泽东置于“至尊”的地位。毛泽东本人也认为，他代表了党、人民、国家和民族，对他的个人崇拜是党和国家的需要，整个民族的需要，是必要的，正确的。正是这两方面的因素使得毛泽东及其无数的崇拜者并不认为“个人崇拜”与唯物史观之间有什么矛盾。其实，个人崇拜是典型的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个人崇拜过分夸大了个人在创造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把党、阶级和人民群众在革命和建设中所取的每一个成就都归功于领袖个人，把领袖人物看成是历史命运的决定者，贬低以至于否认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个人崇拜把领袖人物宣传成真理的化身，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洞察一切、不犯错误的神人。在个人崇拜盛行时，领袖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人民群众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和执行。个人崇拜使得广大亿万群众崇拜个人，迷信英雄，失去了自己独立自主的人格而堕于奴隶服从的地位。个人崇拜压抑以至窒息了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中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个人崇拜把领袖同集体、阶级、人民群众割裂开了，导致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破坏，个人专断、一言堂、家长制作风的滋长和盛行。李大钊在总结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批判英雄崇拜论时指出：崇拜英雄使崇拜者“失去独立自主之人格，堕于奴隶服从之地位”。迷信英雄乃“酝酿专制之因，戕贼民性之本”，“英雄主义乃专制之原。”李大钊说这些话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革命民主主义者。不过，李大钊对崇拜英雄的批判是深刻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现象。形成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原因，也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有现实的，也有历史的。

从客观上讲，伟大的中国革命造就了毛泽东，而毛泽东确实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如邓小平所说：毛主席“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因此，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人中、在中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人民热爱他，信赖他，歌颂他，但这种热爱、信赖、歌颂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成为对他的个人崇拜，就把他神化了。

---

李大钊，《民彝与政治》，《李大钊文集》（上）第167、168、169页。

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303页～304页。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同中国原来是一个小生产者的国家有关。小生产者由于其生产方面的分散、孤立等特点，不容易看到自己的力量，往往希望一个大人物来解救他们出苦海。李大钊在论述农民运动的文章中指出：农民不知道自己起来革命可以自救，希望有一个“真主”来解除他们的痛苦，这是农民运动的一个缺点。因此革命党人应该把“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不是神仙亦不是皇帝，谁也解放不了我们，只靠自己救自己”这一歌声，经常吹入他们的耳鼓。中国革命是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的。因此，中国人民很自然地把他看成是“大救星”。“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确实唱出了中国人民对自己领袖的真挚的爱戴的心声，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朴素思想感情。我认为，对《东方红》这首民歌加以指责是极不公正的。但确实也应看到“大救星”的歌词夹杂着人民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心理。小生产者个人崇拜的心理是不容易一下子消失的，而这种心理很容易使对领袖的热爱转化为对领袖的崇拜。1958年5月25日，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毛泽东刚放下铲土的铁锹，一名解放军战士立刻就用自己的衣服把这张铁锹包了起来，并激动地说：“看到这张铁锹，我们就想起了毛主席，这样我们的干劲就会更大。”毛泽东的卫士长说：“这件事是很有代表性的。”对毛泽东的崇拜不仅在普通的干部、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中存在，就是在党外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中也存在着。许多党外民主人士对毛泽东佩服得五体投地。前面讲到1957年黄炎培、陈叔通不同意毛泽东不作下届国家主席的意见就反映了这一点。总之，在中国存在着对毛泽东崇拜的广泛社会基础。没有这一点，任何个人都不能在“文化大革命”中搞起如此规模的造神运动。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还有历史方面的原因。1956年美国共产党主席福斯特在分析产生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原因时首先考虑的一个因素“乃是传统因素，那就是在俄国历史上没有过民主”。福斯特的分析同样适用于毛泽东。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皇帝是最高的统治者，具有无限的、绝对的权力。在意识形态里，孔子被捧为“圣人”、“非圣即违法”。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激烈地批判了封建专制制度，批判了孔子，否定了孔子的绝对权威。五四以后，中国共产党人（以及一些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在为中国的独立、民主、自由而奋斗。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军队里，在革命根据地内实现了革命民主主义，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从整个社会讲，中国没有经历过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广大人民群众缺乏民主意识，而封建专制政治的遗毒又不是一下子可以肃清的。因此，广大人民群众是很容易用封建社会臣民对待皇帝的一套来对待自己的领袖。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对斯诺说：“要人们去克服三千年迷信皇帝的传统习惯是困难的事”。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教条主义有关。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讨厌对他们的歌功颂德，反对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教条主义，把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斯大林的言论当作万古不变的教条，谁要稍有不同意

---

李大钊：《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李大钊文集》（下）第874页。

福斯特：《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1956年7月2日），见《批判斯大林问题文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40页。

见，就是修正主义，是“异端”，加以讨伐。因此，在马克思主义者队伍中在一个很长时间里，谁也不敢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置一词。就这方面而言，不仅有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有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而且也有对列宁、马克思的个人崇拜。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从主观上来讲，毛泽东本人有责任。这里有两个方面：一是，从理论上，毛泽东认为有正确的个人崇拜，将个人崇拜与个人权威混为一谈，而不是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二是，在一连串胜利面前骄傲了，不谨慎了，不虚心了。

最后还应指出，我们反对个人崇拜，并不否认领袖、杰出人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特殊作用，并不是反对一切权威，并不是否认维护领导者威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们所反对的只是人为地去树立权威，无原则的歌功颂德以及将人神化。

### 第三节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反修防修”，清除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选上的“接班人”、“亲密战友”与“好学生”林彪，竟是一个真正的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毛泽东一生中受过多次打击，可以说，最大的打击莫过于林彪要谋害他。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讲，林彪事件后，他一下子老了许多。1972年1月突然休克，大病一场。在1973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大”上，他已经不能像“八大”、“九大”那样健步走上主席台。大会闭幕时，他已无力独自行走，可他又不愿让人们见他需要人搀扶行走，只好等全体代表退场后才离去。

毛泽东老了，行动不便，但脑子清楚，继续思考着党和国家的大事。他为身后之事在担忧，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作最后的奋斗，开展一场又一场的运动。

#### 一、邓小平的复出与江青组阁破灭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的心情是痛苦的、矛盾的。林彪事件客观上宣告了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失败。当然毛泽东本人是不可能有这样的认识的。不过，林彪事件后他也作过一些自我批评，纠正了一些错误。1971年11月14日，他在一次讲话中为“二月逆流”平反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们（按：指叶剑英等）“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1972年1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逝世。毛泽东在审阅悼词时将“有功有过”四字划去，肯定陈毅同志的功绩。10日举行追悼会，他临时决定要参加，连睡衣也顾不得脱，匆匆穿上外衣前往八宝山，使当时的工作人员措手不及。毛泽东对陈毅夫人张茜讲：“陈毅是个好同志。”也许是“文化大革命”挨批的缘故，张茜脱口而说：“陈毅不懂事，过去反对过主席。”毛泽东打断话说：“不能这样说，也不能全怪他。他是好人。”“陈毅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做出过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作了结论。”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参加他的同志、战友和朋友的追悼会。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不得不更加倚重周恩来。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新的转机。1972年5月，周恩来在例行的体检中发现早期癌症。在这样的时候，毛泽东得知周恩来的病情后心情是异常沉重的。他指示：由叶剑英、邓颖超、汪东兴和张春桥领导医疗组的工作。在今天，癌症还是不治之症，由谁来协助并接替周恩来的工作成了一大问题。正在这时，邓小平重新出现了。

邓小平，1904年8月22日生，四川省广安县人。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192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转苏联学习，1926年回国。1927年底到1929年夏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29年底和1930年初，与张云逸等领导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立红七军、红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1931年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因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排挤打击。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年底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后任129师政委。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与刘伯承率军南

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后任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在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中任总前委书记，后又率部队挺进西南，解放西南各省。全国解放后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国务院副总理。1954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55年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政治局委员。邓小平得到毛泽东的赏识，毛泽东称邓小平“有才干”，“能办事”，“周到”，“一公道”是“厚道人”。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上作修改党章的报告，被视为后备的接班人。八届一中全会上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毛泽东还讲过：政治局就是设计院，我是主席，是统帅，副统帅就是总书记，我的第一接班人是刘少奇，第二是邓小平。“文化大革命”前一直任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由第二位下降至第八位，但邓小平并没有受到直接冲击，排名由原第七位升到第五位，不过实际上已不能主持书记处的工作。在十月的中央工作会上邓小平与刘少奇一起受批判，刘邓并称，成了党内第二号“走资派。”

毛泽东虽然批邓，但对邓小平有好感，将他与刘少奇区别开来。1967年5月1日，毛泽东讲：邓和刘有区别，反王明路线是我一派的。在1968年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有人极力主张在开除刘少奇出党的同时也将邓小平开除出党。毛泽东在全会开幕式上讲：邓小平没有历史问题，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是打敌人的。他写了一份自传检讨，要求不开除党籍，最好做点工作。毛泽东认为，大的工作也难作，可以做点室内整理资料的工作。在全会闭幕式上，他又讲：邓小平大家要开除，我有点保留。应该说，邓小平同刘少奇有区别，事实上有点区别。要开除一个人很容易，我们这些人举手还不容易？你们要开除，将来开除好了，我是有保留的。我这思想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我总是讲几句好话。在“九大”，毛泽东也有类似的话，说：邓小平与刘少奇不同，总打了些仗，也做了好事。1969年10月，邓小平一家离开北京到江西南昌附近劳动，过普通人的生活。1971年11月，邓小平听了中共中央关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材料后说：“林彪不死，天理难容。”他写信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表示拥护中央决定，但无回音。第二年1月10日，毛泽东在参加陈毅追悼会时说：邓小平性质属人民内部矛盾。周恩来听后十分高兴，暗示陈毅子女将此信息传出去。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再次写信，表示希望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些工作。此时毛泽东正在考虑由谁来协助并接任周恩来工作的问题。所以当他收到信后于8月14日作了批示：“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捱整的，即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过的，例如，率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毛泽东同意邓小平复出。

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协助周恩来工作。从毛泽东批示到中共中央作出正式决定中间经过七个月时间，这表明在邓小平出来工作问题上阻力很大。在中共“十大”上，邓小平被选为中央委员。不久，邓小平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毛泽东接受了邓小平的建议。这年12月，毛泽东提议邓小平参加中央军委，任总参谋长。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大军区司

令员对调的建议，同时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报告追认。”12月15日毛泽东在同有关政治局委员和几个大军区负责人谈话中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也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毛泽东送给邓小平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代表时说：他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错整了贺龙、罗瑞卿和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再次申明，朱德是红司令。

这说明，受林彪事件的震动，毛泽东有一定的醒悟，有一定的自我批评。但他的醒悟和自我批评是有限度的。他对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并无认识。这突出表现在他不赞成批极左思潮。

如前所述，经林彪、江青一伙的煽动，“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大泛滥。在批林过程中，周恩来提出要批极左。1972年8月10日，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指出：外交部、《人民日报》社、新华社等单位的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有的也会抬头。9月，又说：极左思潮不批透，就没有勇气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根据周恩来的讲话，《人民日报》在10月14日发表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和《一个阴谋家的丑史》（这是一篇有关巴枯宁的书评）。批极左思潮必然批到江青一伙头上。他们便利用《文汇报》反对《人民日报》批无政府主义，批极左，提出林彪路线的实质不是极‘左’，而是极右。在这一争论中，毛泽东支持了江青等人的意见。从此，只准批右，不准批“左”。周恩来纠“左”的工作被迫中断。

林彪事件后，接班人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毛泽东。刘少奇不行，林彪又不行，谁来接班好？这一次，他不想从原来的干部中选拔，而是想从“文化大革命”中的工人造反派中选，结果选了王洪文。王洪文原不过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保卫科干部，进工厂前当过兵，“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下成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的“领袖”，任上海革命会副主任。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闭幕会上，毛泽东在讲到这次大会会有青年人参加时说到几个人，其中第一个就是王洪文。毛泽东说，“此人是王洪文，站起来看看，上海工总司负责人，上海市革委会委员，前年安亭事件是他搞的。”中共“九大”时王洪文被选为中央委员。1972年9月，毛泽东将王洪文调到北京，在第二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经毛泽东的提议，王洪文与华国锋、吴德三人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参与中央工作。在中共“十大”上，毛泽东让王洪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九大”只选了一个副主席，“十大”选了五个副主席。王洪文排名在周恩来之后，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之前。毛泽东想把王洪文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为此，他让王洪文陪他参与会见外宾。当时王洪文仅39岁。无论是从资历看，还是从能力看，王洪文还只是个见习生，需要培训与考察。

林彪摔死后，企图取代林彪的是江青。

江青（1913～1991），山东省诸城县人，原名李云鹤，1929年在济南入山东省实验剧院，第二年去青岛，1933年2月经俞启威（黄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去上海，主演《娜拉》成名，取艺名蓝平。1937年10月到延安，1938年与毛泽东结婚，改名江青。结婚后，江青主要照料毛泽东的生活，

不参与政事。江青对文艺仍然恋恋不舍，曾在《打渔杀家》中扮演肖桂英。全国解放后任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1951年，在批电影《武训传》过程中，江青组织人员到山东对武训进行调查，写出《武训历史调查记》。进城后，中央政治局常委曾几次提议给江青以较重的工作，但都被毛泽东否决了。直到1956年，经周恩来的提议，常委们的同意，将江青与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一起任命为中共中央主席的秘书。从此，江青开始正式进入政治活动，主要帮助毛泽东收集整理国际新闻。据卫士讲：毛泽东与江青的婚姻并不美满，毛泽东曾说：江青成了“政治包袱”。毛泽东不让江青出头露面，“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国的新闻媒介几乎很少提到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对此，江青大为不满。她在为自己拍的庐山汉阳峰照片配的诗中明显流露出这种恼怒的心情：“江上有奇峰，锁在烟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

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前后，江青涉足文艺界的斗争，1965年在毛泽东的同意下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真接介入“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一改过去的方针，在政治上开始启用她。1966年2月，林彪为了讨好毛泽东，委托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搞了一个《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1966年5月，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江青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这一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之下”。“文化大革命”开始发动时，她在上海观察形势。7月20日回到北京后，到北京大学等单位鼓动学生造反，反工作组。从此，她由后台走到了前台，在“文化大革命”的大舞台上作了淋漓尽致的表演。

江青是一个不甘寂寞的女人，她好胜性强。她的个人主义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恶性膨胀。在中共“九大”，她想当中共中央副主席，提出多设几个副主席，遭毛泽东批驳。有人给中央写信建议选江青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组织部长，毛泽东指示：“徒有虚名，都不适当”。不过，江青在“九大”还是当了中央政治局委员。

江青与林彪狼狈为奸，互相利用、互相吹捧。正当林彪一伙加紧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妄图谋害毛泽东时，江青于1971年6月9日给林彪照了一张“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彩色秃头像，以“孜孜不倦”为题，用整页的篇幅刊登在《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纪念“七一”的7~8期合刊上。1971年9月8日，正是林彪下达反革命政变手令的日子，叶群为了掩饰他们的反革命阴谋，故意从北戴河给江青打电话说：“林彪同志问候江青同志，请江青同志保重。”江青回答：“请林副主席放心。”叶群还派人给江青送几个西瓜。9月12日，正是在林彪叛逃前几小时，江青带上林彪送的四个西瓜游颐和园。她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些西瓜是林副主席送给我的，我再送给大家，这是林副主席对我们的关心，我们大家一起谢谢林副主席。”

林彪折戟沉沙后，江青立即把自己打扮成反林彪的英雄，同时梦想有朝一日成为中国当代女皇。

1972年8月，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维特克来我国访问，主要想了解我国妇女运动的情况。访问期间，维特克提出要会见江青。周恩来批示：“江青如愿见，谈上一个钟头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江青为了替自己树碑立传，扬名海外，置总理批示不顾，同维特克先后在北京、广州谈话七次，长达六十多小时。江青要维特克为她写传记。她对维说：“关于我本人的历史，从来没有对外国人讲过，你是第一个外国人。”“我

谈的都可以发表”，“斯诺写了一本《西行漫记》，世界闻名”，“我希望你能走斯诺的道路。”江青在谈话中信口开河，随意编造历史，美化自己，贬低、攻击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谈话中还泄露了党和国家机密。维特克答应回国写一本江青传，江青答应将谈话记录稿整理后全部奉送。江青将整理好的十来本记录稿分送给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审阅。张春桥、姚文元一字不改，退回江青，周恩来虽日理万机，又在病中，但为负责起见，仍仔细审阅了几十万字的稿子。边看边改，还几次找翻译及陪同人员座谈，听取大家意见。大家感到问题太多，不宜外送。江青大发雷霆。周恩来没有办法，只好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决定将所有记录稿封存。不过，维特克还是出版了《江青传》，造成很坏的影响。毛泽东就此事在朱德的信（1975年7月23日）上批写道：“孤陋寡闻，愚昧无知，30年来恶习不改，立刻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批件送到周恩来手里，周恩来批了“暂缓执行。”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虽然重用江青，但他对江青的政治野心一直很注意。1973年11月，江青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借题发挥，恶毒攻击和诬陷周恩来“迫不及待地要代替主席”。1973年12月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尼泊尔国王。会见完毕后，他在同周恩来、王洪文等人的谈话中，针对江青的攻击和诬陷说：不是总理迫不及待，是她（指江青）迫不及待。

中共“十大”后，江青为了篡党的需要，在政治局内与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结成“四人帮”。对此，毛泽东多次提出尖锐批评。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当着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面批评江青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又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是第一次提到“四人帮”。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到处招摇撞骗，说她代表毛泽东来看大家了。针对这一点，毛泽东讲：“她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毛泽东还说：“对她要一分为二，当然有好的方面，但是错误也是难改的。”

毛泽东发现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搞“四人帮”后，对新选的接班人王洪文很快就感到失望。王洪文不行，毛泽东准备进一步重用复出后的邓小平。1974年4月，邓小平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并在大会发言，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和我国的外交政策。邓小平出席联大，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有的推测邓小平为周恩来的接替者，中国未来的总理。以前，毛泽东会见外宾有周恩来、王洪文参加。从5月开始，周恩来、王洪文、邓小平同时参加，但邓小平坐的位子是以以前周恩来坐的，与毛泽东挨的近，中间只隔一个外宾。王洪文的位子离毛泽东的远了，中间隔着周恩来。6~8月，毛泽东未见外宾，到9月见外宾时，王洪文已不再参加。在周恩来住院时，只由邓小平陪同会见。看来，毛泽东要邓小平接替周恩来并支撑中国政局的想法是存在的。毛泽东的这一想法当然会得到周恩来及党政军的大批老干部的支持。

如同林彪反革命集团想利用全国四届人大抢班夺权一样，江青反革命集团也想利用四届人大组阁夺权。但毛泽东不答应。1974年10月，毛泽东决定让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四人帮”得知后大为不满，加紧密谋，商量对策。10月17日，江青发难大闹政治局，围攻邓小平。第二天，即10月18日，派王洪文秘密飞到长沙，向毛泽东告状，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

王洪文造谣说：“北京大有庐山会议味道”，他是“冒着险危险来的。”又说，周总理虽然有重病，住在医院，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同志。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王洪文同时吹捧张春桥、姚文元、江青。王洪文去长沙的目的是想告周恩来和其他领导同志的状，结果碰了一鼻子灰。毛泽东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但王洪文没有听毛泽东的话，继续进行帮派活动。

10月20日，毛泽东在听取唐闻生、王海蓉汇报后，表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主持，并提议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11月12日，毛泽东又批示，告诫江青：“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江青不听毛泽东的告诫，11月19日写信给毛泽东，先作了几句骗人的检讨：“愧对主席的期望”、“缺乏自知之明”、“对自己不能恰当的一分为二”。然后又狡辩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针对江青继续伸手要权这一点，毛泽东再次批评：“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但江青野心不死，要求唐闻生、王海蓉给她带口信，去长沙时向毛泽东转达她的意见：由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毛泽东听了唐闻生、王海蓉的转达后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江青受到毛泽东批评后，一股怒气一直郁闷在胸中。为了发泄她的怨恨，她将过去拍摄的庐山汉阳峰的照片及所配的诗用化名在《中国摄影》上发表。她日夜梦想，有朝一日，争脱“烟雾”，“露出峥嵘”，实现她篡党夺权的狂妄野心。

1974年12月23日，周恩来抱病和王洪文一起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情况，毛泽东称赞邓小平“人才难行，政治思想强”，再次提议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中共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要邓小平在京主持工作。同时，他又指出：“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的。”批评王洪文，“你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王洪文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后，在长沙写了一个很不象样的检讨，但没有交。

1975年1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相继召开。邓小平正式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江青组阁夺权的阴谋未能得逞。会后，周恩来病重，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实际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代总理主持国务会议。

江青组阁失败，十分恼火。在四届人大后，她把唐闻生、王海蓉找去，情绪十分激动地几乎把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大骂了一遍，并一定要唐闻生、王海蓉把她的意见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唐闻生、王海蓉的报告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唐闻生、王海蓉问：“你呢？”毛泽东说：“不在她眼里。”又说：“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毛泽东的这话说得很透底。他深知江青的为人，深知江青积怨甚多，不得人心，党内老同志只是看在他面上，投鼠忌器，敷衍她就是了。可江青缺乏自知之明，想做女皇。毛泽东料到：在他死后，江青要闹事，但不会有她好结果。

毛泽东同意邓小平复出并委以重任，批评江青，批评四人帮。这都是正

确的，说明毛泽东有清醒的一面。但就在同一时间，毛泽东发动了一个新的运动——批林批孔。这样一来又使得中国政治复杂化了。中国上空依然存在着政治阴云。

## 二、“批林批孔”与“评论《水浒》”

经过毛泽东的批准，中共中央于1974年1月18日转发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紧接着，江青一伙在1月24、25日擅自召开在京部队单位、中直机关和国家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在大会前后，江青等人又以个人名义给外交部、中共中央联络部、国防科委、中国科学院、海军、空军、南京部队、广州部队等领导机关及连队、人民公社送材料、写信。由此，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政治运动——“批林批孔”。从白发苍苍的教授、学者到普通的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以至目不识丁的家庭妇女都齐声声讨孔子。

“批林批孔”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批林批孔运动的始作俑者是毛泽东。这个运动的形成有一个过程。

“文化大革命”是从意识形态开始的。按照“文化大革命”发动者的最初设想和意图：“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大破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者。五四以来孔子成了中国传统的旧思想、旧文化的代名词。所以批孔是“文化大革命”题中应有之义。有的红卫兵在极左思潮的鼓动下，在破“四旧”时曾想要砸孔庙、毁孔府。

1966年12月，毛泽东在同一位波兰外宾谈话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消除孔夫子在各方面的影响。针对当时西方资产阶级反对文化大革命这一点，毛泽东说：让他们发愁吧！要抓住整个阶级斗争和还未完成的反封建主义的斗争。孔夫子的影响在大学文科，如哲学、历史、美术、法律等方面存在着。他们灌输帝王将相思想，资产阶级思想。这些，都同孔夫子影响联系着。要在教育战线进行革命。但当时的中心任务是斗“走资派”，“夺权”，无暇顾及两千多年前的孔老先生。在以后，虽然也有文章提到批孔，但未成气候。

1969年5月1日晚，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谈到批孔。几天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社论《五四运动五十周年》中写进了批孔内容，其中说：“多年以来，打倒孔家店还是保护孔家店的问题，一直在进行激烈的斗争。”社论把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诬蔑为“大肆宣扬孔孟之道”，“为孔家店招魂”。但此后也没有发表有份量的批孔文章。

1973年5月的一天，江青看望毛泽东，见毛泽东那里放着大字本的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毛泽东给了江青一本，并说：“我的目的是为了批判用的。”他还把自己写的一首诗念给江青听：“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十批判书》是郭沫若在抗日战争时期研究先秦诸子的论文集。郭沫若在自己书中表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他推崇孔子，认为孔子是“一位注重实际的主张人文主义的人”。孔子的基本立场是“顺应当时的社会变革的潮流的”，“站在代表人民利益方面的”，“很想积极地利用文化的力量来增进人民的幸福。”他承认，他“有点袒护孔子”。他在崇孔的同时抑墨，认为墨子在

公家腐败、私家前进的时代，“同情公室而反对私门。”郭沫若的书出来后，在学术界引起争论。他的好友杜国庠，好墨学，担心郭沫若这样做“会替旧势力张目”。郭沫若却另有看法，认为不会的，他是本着实事求是精神写的。针对当时有人“歌颂嬴政，有意阿世”这一点，他在书中对秦始皇进行多方面的批判，对“焚书坑儒”进行了抨击。故有人认为郭沫若对秦王的批评是针对蒋介石而发的。

柳宗元（773～819），唐朝的政治家、文学家、哲学家。柳宗元政治上主张革新，哲学上是唯物主义，诗文清新、精细、富有哲理。毛泽东很爱柳文。他曾逐字逐句阅读了章士钊撰写的《柳文指要》的书稿，提出修改意见（该书“文化大革命”前完成初稿，1971年在毛泽东支持下出版）。柳宗元的《封建论》，肯定秦始皇废除分封，设置郡、县，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历史功绩，肯定唐承秦制的政治制度，反对割据，反对分裂，反对倒退。

毛泽东的四句诗，批评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肯定柳宗元的《封建论》。毛泽东为什么想起看《十批判书》，而且还把郭沫若与柳宗元的《封建论》联系起来？这是一个谜。

1973年5月20日到31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议题是为召开中共“十大”作准备。在会上，毛泽东讲：我们的同志不要光抓生产，要注意路线，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据江青在批孔运动时讲，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批孔。但毛泽东究竟讲了些什么，江青没有说。

7月4日，毛泽东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批评周恩来主管的外交部，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搞修正。”在谈话中，毛泽东讲：郭沫若在《十批判书》里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沫若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的。毛泽东赞成郭沫若的中国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他提出，不能大骂秦始皇。他认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

8月3日，毛泽东看到《人民日报》情况汇报2253号登有杨荣国的《孔子——顽固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杨荣国是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搞中国哲学史的。杨荣国是反孔的，这点，毛泽东早知道。他找杨文看后批示：杨文颇好。

8月5日，毛泽东叫江青去。据江青在一次讲话中说：毛泽东同她讲了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说：法家主张中央集权，郡县制，在历史上一般说是向前进的，是厚今薄古的，而儒家呢？他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是厚古薄今的，开倒车的。毛泽东还说：郭沫若对待秦始皇、孔子的态度和林彪一样。毛泽东还让江青记下他写的一首《读（封建论）——呈郭老》的诗。诗云：“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之事待商量。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与郭沫若是至交，两个互相敬仰，诗作多有唱和。也许正因为交谊甚笃，所以毛泽东对《十批判书》的批评也就直言而严厉。这种批评，纯属学术问题，是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不同见解，并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要公开批郭沫若。事实上，毛泽东是反对公开点名批郭沫若及《十批判书》的。谢静宜在1974年1月25日大会上讲，他们向毛主席汇报时讲到北京大学冯友兰也写了批孔文章，毛主席立即要他们取来给他。毛主席看得很仔细，连标点都注意了。当听到冯友兰的文章要在北京大学学报和报上发表时，毛

主席说：那里面可是指了郭沫若的名字，别批郭老啊！在这次会上，江青也讲：对郭老，主席是肯定的多，郭老对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有很大的功劳，郭老的功勋是很大的，这点同志们应该知道。

毛泽东不赞成《十批判书》的观点，不赞成孔子是代表进步势力的观点并非始于1973年。远的不说，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全体会上，他当着郭沫若的面讲了他对孔子、对《十批判书》的看法。他说：广东的杨荣国是反孔夫子的，拥护孔夫子的在座的有郭老、我看范（文澜）老你基本上也是学孔夫子的，你的那个书（注：指《中国通史简编》）上还有孔夫子的相，冯友兰也是学孔夫子的。我这个人有偏向，不学孔夫子，不赞成说孔夫子是新兴阶级的代表人物，他是代表奴隶主的。我同郭沫若在这点上不那么对，你那个《十批判书》，我不赞成。紧接着，毛泽东又谈到，人家说老子是唯物论，我不赞成。天津有个×××，说老子是唯心论。他的这些话是在谈到要注意政策，对冯友兰、翦伯赞这样的教授要给出路时顺便说的。他说这些话并非要批孔，更无批郭老、范老之意。

1973年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杨荣国的《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这是“批林批孔”运动的重头文章。毛泽东提出：南方已有文章，北方怎么办。于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即“梁效”）等写作班子陆续成立。毛泽东虽提出批孔，但直到中共“十大”（1973年8月24日至28日）时，他并没有把它作为批林的一部分，当成批林的深入，更没有要兴师动众，号召全党全民批孔。我这样讲的理由是：中共“十大”文件贯彻了毛泽东提出的要抓大事，抓路线，要重视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意图，但“十大”文件中没有一字提到“批孔”。再者，王洪文在1975年5月检查中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初期我对批林批孔同贯彻十大精神对立起来，因此，我对批林批孔是不理解的。”王洪文的检讨从另一方面证明，直到“十大”，毛泽东还没有显露出要把批孔当作政治运动搞。

1973年9月23日，毛泽东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了中国，统一了文字，修筑了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国，采用集权制，由中央派人到各地，几年一换，不搞世袭。

在清查林彪反革命集团过程中，发现林彪、叶群在1969年10月至1970年元旦的三个月里，连续书写四条“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的条幅。林彪还从中国历史上寻找反革命阴谋活动的策略。孔子讲：“小不忍则乱大谋。”林彪常常“忍耐”告诫自己，“不要为一区区小人、区区小事而耽误自己的终身大事。”林彪采用“韬晦”之计掩饰自己的野心。迟群、谢静宜在向毛泽东汇报时谈到林彪也有孔孟之道的言论，毛泽东说：“噢，凡是反动的阶级，主张历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毛泽东要他们搞一个林彪有那些孔孟言论或者类似孔孟语言的材料。开始，他们只搞了个两三百页材料，送毛泽东一份，同时也送江青一份。江青从毛泽东的读书、谈话中感到毛泽东对批孔有兴趣，便想从中做文章。江青认为，材

---

1964年，全国政协委员七大会。闭会那天，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同与会者照相。照相间，毛泽东对冯友兰说：“对于孔子，你和郭沫若是一派。”见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卷，第151页。

料不多，要重新搞。于是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从林彪的笔记、手书题词、摘录的卡片及公开的言论中选编成了《林彪与孔孟之道》，该材料把林彪一伙言论与孔孟之道相对照，以揭露林彪一伙“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

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示：“同意转发”。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通知说：“这个材料，对于继续深入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由此看来，毛泽东想通过批孔，进一步揭露林彪的思想根源、林彪的极右实质以及批判社会上存在的所谓“右倾思潮”，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毛泽东发动全国人民搞批孔，也与他过分夸大意识形态作用有关系。

江青一伙想在批林批孔的旗号下达到自己篡党夺权的目的。第一，江青利用批孔，到处写信、送材料，把自己打扮成批林批孔的领导，组织者，以捞取政治资本。这一点，毛泽东有所察觉，批评说：“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第二，打着批孔的旗帜，批“现代大儒”、批“宰相”、批“周公”，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同时又捧吕后，武则天，为江青当女皇造舆论。江青一伙在1月25日会上，突然提出反“走后门”，三箭齐发，目的在于打击老同志。毛泽东发现后在2月15日批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杂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他认为，领导干部“走后门”，送子女参军、入学等问题，群众有意见。应当加以纠正。但这个问题牵涉到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需要具体分析，慎重对待。第三，他们打着批林批孔旗帜，组织所谓“理论队伍”，培植自己的党羽和势力，为他们篡党夺权造舆论。1974年是批林批孔年，也可以说是江青的野心急剧膨胀的上一年。正是出于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她才在四届人大前公开向党夺权，要“组阁”，当后台老板，但毛泽东不同意，遭到破灭。

江青一伙搞批孔，是一场政治阴谋。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评价毛泽东的批孔。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第一，毛泽东对孔子、秦始皇的评介既是一个学术问题，又是一个政治问题。孔子、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有其特殊地位的人物，对他们历来就有不同的评价。一般说来，进步的，革新的思想家、政治家多数反对孔子，推崇秦始皇；保守的思想家、政治家多数赞成孔子，反对秦始皇。毛泽东在1973年对孔子、秦始皇主要是着眼于从政治上评价，政治评价压过学术评价。毛泽东搞批孔，是出于反“右倾”、反“保守”、反“复辟”和坚持“文化大革命”政治需要。到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他还说：“要批孔。有些人不知道孔子的情况，可读冯友兰的《论孔丘》、冯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比冯友兰的好，还可看郭沫若《十批判书》中崇儒反法部分。”

第二，毛泽东对孔子、秦始皇的评价包含着对林彪攻击的回答。林彪攻击毛泽东是“当代秦始皇”，这并不是林彪的发明，早已有之，而且也早就受到毛泽东的批驳。1958年5月8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讲到“厚今薄古”时说，“秦始皇是厚古薄今的专家。”林彪插话：“秦始皇焚书坑

儒”。毛泽东紧接着驳斥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生，我们坑得比他多。我们在镇反中镇压了几十万反革命。我看有四万六千个知识分子坑掉了。我跟民主人士辩过，你骂我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的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毛泽东对秦始皇作了具体历史的分析，肯定秦始皇“焚书坑儒”的革命性，肯定秦始皇在统一中国上的历史功绩，为秦始皇辩护。但由此不能得出毛泽东全面肯定秦始皇，他对秦始皇残酷剥削、压迫农民是否定的。在这方面，他肯定的是秦王朝的对立面陈胜、吴广。1975年正当有人大捧秦始皇，不准人们讲秦始皇的缺点时，在毛泽东身边为毛泽东读书的芦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员）问他：对秦始皇到底怎么看？他指出：“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要一分为二。秦始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作用要肯定，但他在统一六国后，丧失了进取性的方面，志得意满，耽于佚乐，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到处游走，消磨岁月，无聊得很。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抗秦的暴政，其中就包括秦始皇，完全是正义的。这次战争掀开了我国封建社会中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的序幕，在历史上有很大的意义。”毛泽东的这些说法同他以往的评价是一致的。

第三，维护国家的统一。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表明他是打着行“仁政”的法西斯分子。他企图建立“父传子”的林家法西斯王朝。不过，毛泽东对秦始皇的辩护也包含有对“文化大革命”中过火行动的辩护。从林彪事件中，他深深感到党内矛盾很大，弄不好发生分裂。也许正是出于这种忧虑他赞扬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绩，肯定仰宗元的《封建论》，提出“莫从子厚返文王”。

第四，毛泽东认为，政治上，孔子是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是保守的。这种评价同他以往的看法是一致的。在学问上，毛泽东认为“孔学名高实秕糠”，这就同他以往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政治上否定孔子的同时，承认孔子在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他在1938年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共产党人应当批判地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珍贵遗产。他在抗大的多次讲话中针对有的人不安心于教育工作这一点说：孔子是个教员，要学习孔子当教员；孔子是圣人，几千年只此一人。1939年2月，他在致张闻天的信中在批评孔子的观念论和形而上学的同时，指出了孔子思想中合理的、积极的一面。他尤其肯定孔子在教育上的功绩。1943年，他针对一部分人认为孔孟之道是中国文化不良传统的观点，指出：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毛泽东在自己的著作中有批评孔子的地方，但更多地是汲取了孔子思想中有价值的东西。如，他提出共产党人要学孔夫子的“不耻下问”、“每事问”、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等。孔子说过：“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毛泽东觉得孔子说的在理，他给自己的两个女儿取名为李敏和李讷。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在政治上继续批评孔子，认为孔子杀少正卯，有些恶霸作风，法西斯味道，不民主。不过，建国后，他同样承认孔子在学术上的地位。1956年，他在音乐工作者谈话时称孔子是教育家、音乐家。1956年，他在《水调歌头·游泳》的词中直接填进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

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毛泽东同志八十五诞辰纪念文选》人民出版社  
在离开延安、辗转陕北时，毛泽东化名李得胜，故女儿也随叫姓李。

1957~1958年，毛泽东在不少讲话讲到孔子是有学问的。在“八大”二次会上，他讲：自古以来，很多学者、发明家，在开始创立新学派时，都是年轻的，学问比较少，被人看不起，被压迫。他列举了中外许多人，其中讲到孔子。他说：孔夫子在青年时也没有什么地位，当过吹鼓手，在人家办丧事时给人家喊礼，后来教书。他虽然做过官，在鲁国当司法部长，也是短期的。他当过管钱的小官，相当于我们农业社的会计，但学了很多本领。颜渊是孔子的弟子，算二等圣人，他死时才32岁。还是在1958年，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讲到“有实无名”时说：一个人学问很高，如孔子、耶稣、释迦牟尼，谁也没有给他们按博士头衔，并不妨碍他们行博士之实。孔子是后来汉朝董仲舒捧起来的，以后不大灵了。到了唐朝又好一点，特别是宋朝朱熹以后，圣人就定了。到了明清两代才升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之位”，到了五四运动，又下降了，吃不开了。我们共产党人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承认他的历史地位，但不承认什么圣人不圣人。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话上批评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时，肯定了孔子的教育思想。他说：“现在课程太多，教育的办法是摧残人材，推残青年。我们丢了孔夫子的主流。他只有六门：礼、乐、射、御、书、数。”又说：“孔夫子的传统不要丢。”

很明显，毛泽东在1973年的“孔学名高实秕糠”的说法同他以往一贯的看法是相矛盾的。这种说法，实际上对孔子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

总起来看，毛泽东提出批孔是为了进一步批林，批右倾，清除孔夫子在各方面的影响，是为了反对复古、倒退，为了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为了“继续革命”。所以，他领导的批孔运动是错误的，应予以否定。至于他对孔子的评价，作为一家之言继续可以争鸣，可以赞同，也可以反对。我认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前对孔子的评价比较恰当。“孔学名高实秕糠”一语明显不符合历史实际。

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批孔做文章还没有完，便又利用《水浒》做文章了。1975年8月，他们为了摆脱挨批判的被动局面，便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掀起了一个评《水浒》的运动，再次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及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

评《水浒》的事是怎样起来的？

1975年8月13日，在毛泽东身边读书的芦荻向毛泽东请教如何评价《三国演义》、《红楼梦》和《水浒》等几部古典小说。毛泽东先谈了《三国演义》和《红楼梦》。关于《水浒》，学术界的基本评价，向来是很高的，甚至有的说，这是一部千古不朽的农民运动的史诗。到了1974年，《北京日报》到北大中文系约写一篇批判《水浒》的文章时，却透露说，《水浒》只是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由于不是正式消息，对这话理解不一，学术界在讨论时分歧很大。这篇文章没有发表。后又传说，毛主席有一个讲话，其中提到《水浒》。因此，当谈到《水浒》时，芦荻就顺便向毛泽东请教了这件事。毛泽东说，那两句话是他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讲的。接着芦荻又问：既然如此，那么《水浒》一书的好处在哪里？应当怎样读它？毛泽东谈了自己的看法，芦荻奉命根据毛泽东当时手书的原文和谈话记录作了整理。整理后毛泽东的谈话全文如下：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

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毛泽东在讲《水浒》时，谈笑风生，和蔼幽默，就该书的主导的政治倾向，反复举例，进行细致分析。芦荻认为：毛主席的评《水浒》，完全是对《水浒》这部小说讲的，并没有别的意思。1975年9月，她离开中南海前，给毛泽东医疗组的同志讲了怎样理解毛泽东评《水浒》的课。在讲课中，她特意说明：现在有人说党内有投降派，要抓现代的投降派，毛主席完全没有这个意思。

第二天，即8月14日，毛泽东关于《水浒》谈话记录稿到了姚文元手里。姚文元立即写信给毛泽东，说：关于《水浒》的评论“很重要”，“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姚文元在信中提出：将毛泽东的谈话和他的信，“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学大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姚文元的信将毛泽东的评论直接与现实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与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联系起来了。毛泽东阅信后批示：“同意”。

毛泽东的谈话讲的是如何评论《水浒》，这也是一个学术问题，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毛泽东读了姚文元的信后便认同了，这就是姚文元反过来影响毛泽东。在姚文元的影响下，毛泽东同意了姚文元的要求，在全国开展评论《水浒》。毛泽东最初评论《水浒》是一个纯学术问题，但到他同意批转姚文元的信，在报刊上开展评《水浒》时，已不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了。不过毛泽东同意开展评《水浒》仍然是一般意义上的、反修防修的政治思想教育，而不是想要再打倒一些老干部。

江青反革命集团却另有打算。他们把毛泽东的“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之外”，歪曲为“宋江架空晁盖”，说这是毛泽东谈话的“要害”。1975年9月，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大寨召开。江青在大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及其他的讲话、谈话中说：评《水浒》，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历史，是对当代有意义的大事。“《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搞

投降，批《水浒》就是要大家知道我们党内就有投降派。”“评《水浒》要联系实际，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毛主席呀？我看是有的。”江青明目张胆地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架空毛主席”，搞修正主义，是投降派。江青无理要求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主持会议的领导同志识破了江青的阴谋，及时报告了党中央。毛泽东知道后愤怒地斥责江青的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明确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但是，江青反革命集团攻击、诬蔑周恩来和邓小平的阴谋活动不仅没有停止，反而越发嚣张。江青继续在做“女皇梦”。

周恩来知道江青等人一直对他进行攻击、诬蔑。对此，周恩来忍辱负重，内心十分痛苦。1975年7月1日，他同泰国总理克立·巴莫签署完中泰建交公报后，一部分工作人员趁摄影记者还在，要求总理同他们合影，周恩来答应了，但说：“照可以照，但将来可不要在我的脸上打××”。9月，周恩来病情急转直下。9月20日，医生不得不对他再次进行手术。手术前，他或许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便要来了自己于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用自己已经发抖了的手签上自己的名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年、九、二十。”在进入手术室时，他大声说：“我是忠于党的！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周恩来的这些话，是对江青一伙的诬蔑、攻击的强烈抗议，也反映了他对在身后可能遭到诽谤和攻击的担忧。

### 三、理论遗嘱与再批资产阶级法权

全国四届人大召开前后，毛泽东一方面苦心安排人事，重新重用邓小平，甚至考虑邓小平接班；另一方面继续从理论上思索如何“防修”“反修”。

1974年12月26日，在他八十一岁生日那天，毛泽东同周恩来来商谈完全国四届人大人事安排之后，还在一起研究了理论问题。周恩来在谈话后将毛泽东的意见整理成书面文字，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只改了几个字，如在林彪后面加上“一类”二字。毛泽东的“理论问题指示”全文如下：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再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成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注：毛主席在1974年10月20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过，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周恩来在传达毛泽东的理论问题指示时说：要学习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第五章。列宁在这里指出，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时期内，不仅还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还要学习“九大”政治报告第一部分那里引用列宁的话、主席的话。周恩来的这些话，除“主席的话”外，很可能反映了毛泽东的思想。1975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说：两种可能，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我们现在还是两种可能。我们现在正遇到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的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保护资产阶级的不平等，保护在平等口号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我们现在就是这样，还要多少年还是这样，然后才能到共产主义。

到了1975年底，毛泽东又指出：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制，不管你人多，人少。他还指出，一部分老干部，对批资产阶级法权有反感，思想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

周恩来整理的毛泽东的“理论问题指示”不足四百字，但同毛泽东在此前后的其他谈话联系起来看，这简短的话集中反映了他在生命最后一段时间里所思考的理论问题。这些“理论问题指示”可以看成是毛泽东的理论遗嘱。这时毛泽东的身体状况还好。他在长沙岳麓山住的三个月里，曾五次下山到省游泳馆游泳，每次半小时，上下游泳池扶梯都是自己走的，平时走路也平衡。在1975年，毛泽东的记忆力仍极好。这方面有两件事可以作证：

一件是：1975年春，广安门医院的一位眼科大夫参加会诊。毛泽东得知这位医生叫唐由之后说：“这个名字好，你的父亲一定是读书人。他可能读过鲁迅先生的诗，为你取了“由之”的名字。接着，他背诵了鲁迅当年悼念杨铨的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令在场的专家们惊叹不已。

另一件是：1975年5月29日，芦荻去中南海为毛泽东读书。在芦荻见面道过姓名后，毛泽东说：“你大概喜欢秋天吧！”芦荻一时不知所对。毛泽东爽朗地笑道：“你为什么叫芦荻？会背刘禹锡写的《西塞山怀古》这首诗吗？”因为诗的最后一句含有“芦荻”二字，故毛泽东发此问。芦荻把这首诗背了一遍，接着毛泽东也铿锵有力地吟诵了这首诗：“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芦荻回忆说：一次她背诵李商隐的一首诗，背错了一字，主席立即让她停下，进行纠正。芦荻说：主席有惊人的记忆力，不仅能背诵诗歌，连小说、散文也能大段大段背下来。一次为了注释江淹《恨赋》中的一个“溢”字，主席就把“西厢记”中的原文背了一大段。

这说明，毛泽东在谈理论问题时身体尚好，脑子清楚，将“理论问题指示”看成是他的理论遗嘱是完全可以的。

“理论问题指示”的中心点，仍是如何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主要是涉及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在思索，

“林彪一类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的原因，思索社会主义社会里产生修正主义的经济因素或经济根源，以及如何防止产生修正主义。

如本书第二章所说：在 1958 年，毛泽东为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提出破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在纠正共产风以后，这一问题暂时搁置起来了。他强调社会主义社会仍然要保留商品生产。1962 年，他在修改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在七千人大会上所作报告时增加了这样一段话：“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这两个原则，是在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决不能不严格地遵守的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原则。”这是经过了共产风、平均主义的沉痛教训后而得出的正确结论。但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他思想又起了变化，赞扬供给制，把任何的物质奖励都视为修正主义。1967 年“五一节”时，他在谈到我们一定不要脱离群众时说：我们党在 49 年、50 年、51 年这三年当中，群众是拥护我们的，是尊重我们的，因为当时是艰苦朴素的，吃小米，住帐篷，有饱满的革命热情，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后来搞薪金制，群众就不欢迎我们了。又说：薪金制我是不赞成的，学习苏联那一套我也是不赞成的。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把它改过来。他的这些话是在参加庆祝五一节活动过程中说的，是非正式的，后来并没有去实行。不过，他的那些话很能反映了他的思想倾向。在中共“九大”，他把注重利润，搞奖金，搞物质刺激，都看成是修正主义。他赞成“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不赞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的口号。他又回忆起战争年代的艰苦生活。他说：“经过战争，有很大的牺牲。老人存下的就不多了，那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多少年我们都是没有啥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叫三钱油，二钱盐，一斤半米。这就了不起了。至于菜，大军所过，那里能搞到？就吃辣椒。现在进了城，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这些地方了；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他依然十分怀念供给制。不过，经过 1958 年的教训，他不再会重犯刮“共产风”的错误。

“理论问题指示”是毛泽东以往“左”的错误思想的继续和发展，第一，他不仅把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中体现的等量劳动与等量劳动相交换的资产阶级式的权利误解为资本主义性质的，而且进而把社会主义社会的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看成“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抹杀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同资本主义按资本分配的质的不同，抹杀了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在性质上不同。毛泽东承认：“所有制变更了。”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毛泽东以前也这样认为），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它决定分配、交换。所有制不同，分配、交换也就不同。他一方面承认“所有制变更”，另一方面又讲分配，交换同“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这是明显的矛盾，讲不通。第二，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制度、货币交换、八级工资制同修正主义上台联系，这实际上是把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按劳分配看成是产生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经济条件。正因为如此，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在毛泽东的指示发表后写文章公开宣传，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按劳分配是产生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经济基础、土壤和温床。

有鉴于 1958 年的教训，毛泽东没有提出要“破除”或“取消”这些法权，而认为在现今条件下，不能立即取消，“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加以限制”。至于如何限制，他本人也没具体说明。从“文化大革命”所施行的政策和当时报刊的宣传看，不外是这样一些：

在分配领域中强调政治挂帅，缩小工资级别的差别，取消奖金和实物奖励，取消记件工资制；在流通、交换方面，只承认国家的统一计划，否认市场调节的作用，取消自由市场，等等。其结果是按劳分配原则遭破坏，平均主义盛行，商品流通不畅，严重挫伤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严重阻碍生产的发展。他这次谈资产阶级法权同1958年还有一点不同，上一次是为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而这一次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出修正主义。他两次谈资产阶级法权，错误性质是同一的，表现的形式则不同。

毛泽东的“理论问题指示”还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是引列宁的关于“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的话。列宁的这话，毛泽东常引用。1963年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建议引了这话。1966年5月，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引了列宁的话，并讲：主席说要经常温习、宣传列宁的这话。“九大”政治报告中也引了它。1970年12月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说：“至于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发展，那当然是要发展的，现在还在发展。”富裕中农，“他们每日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这是列宁的话，不是我们创造的。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农民这么多啊。”他在1975年底，又讲到列宁的话。这说明，列宁的这一语录对毛泽东影响很深。不过，他将列宁的这一语录教条化了。列宁讲的小生产是在十月革命以后，无产阶级权还不很巩固，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还未基本完成之前的小生产者。这样的小生产如列宁所说会经常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成后，情况起了很大变化。农民已由个体的劳动者变成了集体劳动者，是新型的社会主义农民。合作化后的农民无疑仍然保留有私有心理和习惯，无疑其中也会有极少人搞资本主义活动，分泌出资本主义，但这同合作化前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他没有看到这种不同，夸大了社会主义社会里农民中存在的落后面。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农村大批资本主义，这实际上是对农民不放心的一种表现。

第二，毛泽东进一步扩大了列宁的话。他说，不仅小生产是这样，而且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也有这种情况，就是说也会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在现今的社会条件下，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在党员中，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确实还产生某些腐败现象和蜕化变质分子，也确实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的照牌，而实际上比旧社会的资本家还厉害。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否认这一点，看不到这一点，是极其有害的。毛泽东一直警惕注意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但他过分夸大了这一点。正是由于夸大了这些阴暗面，他认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今后革命的主要对象是不断清除党内“走资派”。

总之，从“理论问题指示”中我们可看出，毛泽东在生命的最后还在思考如何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如何反修防修的问题。他最为关注的是三点：（一）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亦即是从经济基础上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问题；（二）小生产者问题，亦即是教育农民问题；（三）党内问题，如何防止党内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我以为，毛泽东的“理论问题指示”可以看成是他“继续革命理论”的最后完成，关于“反修”“防修”的最后思考。

毛泽东的“理论问题指示”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不符合中国社会主义的实际，应当加以否定。但在否定它时我们又必须看到其中确有合理的一面。它提出了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第一，他把按劳分配、商品制度、货币交换看成是产生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经济条件，这是错误的。但他看到了商品生产、货币交换的消极面，这有合理因素。社会主义的实践告诉我们：限制商品生产、取消商品生产、轻视货币交换的作用，都是不行的。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货币交换。社会主义的实践又告诉我们：在现今的国际条件下，在现有的生产力基础上和现在政治思想状况下，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必然存在着消极面，它会产生商品拜物教、金钱拜物教，会产生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过程中曾出的某些现象，如商品生产者为了追求利润，可以不择手段，损害国家、集体、劳动者和消费者的利益，会产生无政府状况，会有人投机倒把，行贿受贿，贪污腐化，也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如不加以限制，这些消极东西就会泛滥成灾。倘若因为由于这些消极东西出现，就又批商品生产，限制商品交换，那就大错特错了。现在的问题是在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同时，要总结经验，采用经济、行政、法律、政治思想教育等多种手段来限制它的消极作用。

第二，他指出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会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可以说，从 1956 年以来，他十分警惕党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会不会形成一个脱离群众的“贵族阶层”问题，担心党和国家领导机关内出问题。他的这种担心不是毫无道理的。他的错误在于过分夸大了黑暗面，又错误地采用了“大民主”的方式。中国革命胜利已有 40 多年了，如何防止共产党内和无产阶级政权机关工作人员中的腐化，依然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现在很清楚，社会主义国家出问题，主要是共产党自身出了问题。毛泽东看到这一点是有历史的远见的。

第三，他夸大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农民的落后面，把合作化前的个体农民和合作化后的集体农民混为一谈，这是错误的。但也应看到，社会主义的农业仍然有两重性，教育、组织、引导农民仍然是一大问题。

第四，他指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性。毛泽东的“理论问题指示”是错误的，但他自认为是坚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他悲剧之所在。不过，他提出要弄清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否则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论点是令人深思的。

#### 四、“文化大革命”“三七”开与再次批邓

人事安排和理论问题，是毛泽东同时向周恩来交待的两件大事。

当时听过传达的人，谁也没有觉察出这两件事，存在着难以统一的矛盾。“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邓小平被定为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副司令，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而现在，邓小平复出了，而且不是一般的复出，毛泽东把党（中共中央副主席）、政（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大权全面交给他，让他代理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对邓小平的这种安排，

不啻是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搞邓搞错了。这就不能不涉及到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毛泽东对邓小平这种安排最后必然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这种安排实质上是对自己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一种否定。但另一方面，毛泽东又坚持原来的一套“继续革命理论”，继续让张春桥、姚文元一类人主管意识形态，写文章，造舆论。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

这两件事无法统一，只能二方吃掉另一方。

江青一伙在利用全国四届人大“组阁”夺权失败后并不甘心。他们一方面利用毛泽东要他们写文章之机，继续大肆鼓吹极左理论，另一方面，他们又别有用心地提出批经验主义。他们鼓吹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企图借批经验主义，再次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打倒一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领导同志。毛泽东似乎洞悉了他们的阴谋。1975年4月23日，毛泽东在姚文元送的新华社《关于报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我党真正懂得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一种不懂马列的表现，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这一批示给“四人帮”批经验主义以当头一棒，在当时起了好作用。毛泽东对党内理论状况的估计，也是符合实际的，确实党内真正懂得马列的不多。

他提出要以多年时间学马列，也是对的。不过，毛泽东批示一开头的几句话却令人费解。他把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都包括在修正主义里，这就把修正主义、经验主义、教条主义的概念弄得模糊不清。从今天的眼光看：那时党内修正主义并不是主要危险，而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确实严重存在着。在对马列理论（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理解上有教条主义的毛病，而在实际的工作中，在领导方法、工作方法上则表现为经验主义。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一次批评“四人帮”，批评他们只反经验主义，不反教条主义。毛泽东说：“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打。”“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他提出，“不要看低教条主义”。在这次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四人帮”宗派反党活动，警告他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他严肃地向政治局委员讲：“四人帮”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在会上，毛泽东把周恩来拉坐在自己的右边，把叶剑英拉坐在自己的左边，对“四人帮”说，你们为什么老和他们过不去，你们批他们，要犯错误。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5月27日和6月3日，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等人进行批评。“四人帮”被迫作检讨。江青在6月28日给毛泽东及在京政治局委员的检讨中说：“我在4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过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上一时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认为，会议基本上开的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江青的检讨是假的。1976年3月2日，江青在讲话中大骂邓小平，大骂政治局会议对她的批评、帮助，说从4月底斗她到6月。政治局对江青的批评，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称赞。毛泽东说，这个会开得好呀！就是要斗她一斗，她是从来不接受批评的。在毛泽东和中

央政治局其他成员的批评下，“四人帮”的气焰暂时有所收敛。

毛泽东在批评“四人帮”的同时，也在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某些“左”的错误。

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关于贺诚任职请示报告上指示：“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傅连璋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

7月2日，毛泽东指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先养起来，并治病。”根据这一指示精神，有一批老同志出狱治病或分配工作。

7月初，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时提出，应调整文艺政策：现在“样板戏太少，而稍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

7月14日，他又说：“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脱离群众。”他还以受到恩格斯批判的杜林为例指出：“《反杜林论》，柏林大学撤了杜林的职，恩格斯不高兴了，争论是争论么？为什么撤职？杜林这个人活了八十多岁，名誉不好。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林彪不跑，我们也不会杀他，批是要批的。”

1975年4月，“四人帮”一伙对反映大庆石油会战，表现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电影《创业》，罗列十大罪名（如“给刘少奇、薄一波之流涂脂抹粉”、“写活着的真人真事”、“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表现较差”等），将影片一棍子打死。《创业》编剧张天民上诉毛泽东。7月25日，毛泽东指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这一指示，又给江青一伙当头一棒。江青为此十分恼火，暴跳三丈。这年9月，她在山西大寨，对张天民说：“娃娃，你告了老娘一个刁状，老娘今天要教训你！”寥寥数语，自画了一幅泼妇的丑像。

10月16日，毛泽东在《学部知识分子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反映》上批示：“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在对待人的问题上，他还引用了汉朝东方朔的“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话教育大家，对人要求不可过高。

毛泽东的上述指示、谈话，是在纠“左”，无疑是正确的。按照毛泽东的精神，邓小平在主持工作后召开了解决交通、工业、农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全国的形势明显好转。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是对“文化大革命”中“左”的错误纠正。不过，他还是在利用毛泽东的指示下进行的。他在一次讲话中把毛泽东的“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作为当前各项工作的“总纲”，认为“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邓小平这样做，是为了强调“安定团结”的重要和突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一种修正。

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最初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进行的，但在实行过程中，又超出了毛泽东所允许的限度。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必然受到“四人帮”

及各部门各地区造反起家人的反对与不满，因为各部门、各地区在整顿中整了一批造反起家的人。

1975年下半年，毛泽东的身体情况越来越差，行动已经很困难，他已无法出席政治局会议。但党和国家的大事又非他点头认可不可。于是需要有一个联络员，做毛泽东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系人。谁来当联络员，事关重大。因为此时的毛泽东几乎与外界隔离，他只能根据送来的有限材料和汇报作出判断。联络员向他送什么材料，汇报什么情况直接影响到毛泽东的思想。谁当联络员？结果毛远新被选中了。毛远新是毛泽东的胞弟毛泽民的儿子，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文化大革命”中成了造反派，当上了沈阳军区副政委、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是“四人帮”在辽宁的“死党”。由于血缘关系，毛泽东自然是相信自己的侄子。毛远新自9月当上联络员后，便在毛泽东的耳边吹风，攻击邓小平。他向毛泽东汇报说：“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毛泽东知道，“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有人反对，“文化大革命”得罪了许多人。所以他在一些重要会议上提出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的问题。当听说有股否定文化大革命风时，自然会引起他的神经紧张。对毛泽东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不能否定的，因为否定“文化大革命”就等于否定他自己最后十年。毛泽东相信了毛远新的意见。

正在这时，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两次（8月13日、10月7日）写信给毛泽东（由邓小平转呈），告迟群、谢静宜。迟群原是中央警卫部队的宣传科副科长，谢静宜原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机要员，“文化大革命”中被毛泽东派到新华印刷厂支“左”，后又到清华、北大主持工作。刘冰等人的信主要揭发迟群、谢静宜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和生活作风上的严重问题；揭露迟群在党的“十大”和全国四届人大以后，由于没有当上中央委员和教育部长，多次大哭大闹，不接电话，不看文件，不工作，喝酒，睡大觉，装风卖傻，深夜一人到校外马路上，野地里乱窜等丑恶行为，揭露他们毫无党的观念，搞一言堂，家长制的恶劣作风和任人唯亲、封官许愿、违反党的干部政策及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等方面的问题，请求中央派人解决。信的内容并没有涉及学校“教育革命”和整个“文化大革命”。迟群、谢静宜是毛泽东派出的，也是得到毛泽东信赖的。毛泽东没有作任何调查，就断定：“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小平偏袒刘冰”，并认为，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指示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大学开展“大辩论”，反击所谓的“右倾翻案风”。这种“反击”很快遍及全国。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不得不中断。毛泽东认为，邓小平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这当然是不允许的。由于毛泽东受毛远新汇报的影响，邓小平向毛泽东再三解释，提出自己的看法，都没有用。其实在那时，邓小平只是在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左”的错误，恢复过去的好的作风、好的政策和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在主观上并无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案的意思。毛泽东偏向江青一伙一边，再次批邓。

11月下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11月26日向全党发了打招呼要点。第二年，3月3日，中共中央又将毛泽东从

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多次谈话整理成《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发给全党。

毛泽东的谈话是在毛远新的汇报过程中所发表的意见，是由毛远新整理成的，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主义社会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1949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搞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问题看不清楚？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的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么？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

（二）“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就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一百年以后还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們要革命呢。”

（三）“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对文化大革命的总的看法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则不好。”

不要轻视老同志。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人受了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群众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

（四）“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蒯大富、聂元梓搞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对一些老同志要打招呼，要帮助，不然他们会犯新的错误。”

（五）“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他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

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做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不应一棍子打死。”

此外，毛泽东谈话还涉及到资产阶级法权（这点前面已引过）、教育革命、知识分子与工人划等号、建议读点哲学和读点鲁迅等方面内容。

毛泽东谈话的内容虽多，但中心很突出：维护“文化大革命”，不许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从理论上讲，毛泽东的谈话并没有提出新的东西，不过是在重复以往一贯的思想。

评判一件事、一个人，不能只看他的主观愿望，而主要是看他的行动，客观的社会实践效果。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是为了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与1958年的大跃进一样，

主观愿望是美好的。毛泽东自认为，“文化大革命”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坚持社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大课题，是一个伟大创举。在他看来，如果否定“文化大革命”，不以阶级斗争为纲，就会重犯斯大林错误，重蹈苏联变修复辟的老路。他认为，他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是把气发到大多数群众身上，站到群众的对立面，“翻案不得人心。”正因为如此，他虽然承认“文化大革命”有缺点，“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虽然承认现在要研究的是不足的方面，但总的来说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不能否定。在他的头脑中，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是有关坚持革命不革命的大问题，有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不能含糊所以他不顾一年前讲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再次批邓。

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而且是两件中的最重要的一件。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实际上也是对他最后十年的评价。他虽然讲对自己要一分为二，“三七”开（他对“文化大革命”“三七”开，也包含有对自己最后十年的“三七”开），但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不可能由他自己来纠正，只能在他去世之后由他的后继者去纠正。

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如何评价？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一结论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是正确的。

“文化大革命”严重地破坏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的不幸。“文化大革命”在经济、政治、思想、科学、文化等造成的恶果是异常严重的。“文化大革命”应当坚决予以否定。但这种否定，不应当是形而上学的否定，而应当是有分析的、辩证的否定。《决议》正确指出：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的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应当否定。但不能由此否定毛泽

东在“文化大革命”所做的一切。《决议》指出：毛泽东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列著作；他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同时，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同志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反革命集团作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他在维护国家的安全、独立、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等方面作出了贡献。《决议》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能召开并且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国务院人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重要事实都同毛泽东同志的巨大作用分不开。《决议》的这种分析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有的人在揭露、批判“文化大革命”时，在揭露、批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时，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说得一团漆黑，一无是处，有的甚至描写得比旧中国还黑暗、可怕，有的人把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描绘成权术家，迫害狂，这是完全错误的。

否定一切，最后必然否定自己。这是历史辩证法。对“文化大革命”应当否定，不容丝毫的犹豫。但这种否定应是辩证的，而不是形而上学的。

## 五、临终遗言与新接班人华国锋

1976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在1965年写的词两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第一首词写于五月，其云：“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第二首词写于秋，其云：“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郎。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为什么在此时发表这两首词？《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回答了这一问题。社论一开头就说：“这两篇光辉作品，以高度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形象，描绘了国内外‘天地翻覆’，‘旧貌变新颜’的大好形势，歌颂了革命人民‘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英雄气概，揭示了马列主义必胜，修正主义必败的历史规律。毛主席这两首词的公开发表，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对全国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但是，那时的形势并非“到处莺歌燕舞”，而是“寒气袭人”，“怆然涕下。”

1976年，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灾难年。

1月8日，周恩来病逝。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讣告评价了他的一生：“周恩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是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周恩来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周恩来同志对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对建设和发展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对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对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对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胜利，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对加强国际革命力量的团结，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和尊敬。周恩来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是坚持继续革命的一生。”周恩来的逝世，全国人民无限悲痛。天安门广场日日夜夜汇集着悼念总理的人群，密密层层的花圈陈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1月11日，首都百万群众，佩着黑纱、白花，自动聚集在十里长街两旁，洒泪向人民的好总理告别。1月15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隆重举行追悼会，由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致悼词，称颂周恩来的光辉一生。

周恩来是毛泽东的老战友，几十年患难与共，风雨同舟。周恩来一直辅助着毛泽东，对毛泽东忠心耿耿。周恩来有杰出的组织才能和卓越的领导才能。周恩来的逝世，无疑是对毛泽东的一个沉重的打击。毛泽东的身体已每况愈下。从1975年10月起，毛泽东讲话已吐字不清，只有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的张玉凤才能听懂。因此，每当他同其他领导人谈话时，张玉凤就得在场，学说一遍。到了毛泽东发音极不清楚时，张玉凤只能从毛泽东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摩，然后获得毛泽东点头认可。当毛泽东的语言障碍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时，他只好用笔图写他的所愿了。此时的毛泽东已无法行动。所以周恩来的追悼大会他也无法参加。到了1976年春节，毛泽东不仅失去了“衣来伸手”之力，就是“饭来张口”吞咽也十分艰难了。尽管如此，他仍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领导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大国，还在思考党和国家的大事。他的每一句话，每一指示，依然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左右党和国家前进的方向。

由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已无法主持国务院工作。1976年1月21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时谈到，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华国锋等提出国务院请主席确定一个主要负责同志牵头，他们做具体工作。四届人大时有副总理十二人，依次排名是：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毛泽东再三考虑选中了华国锋。他对毛远新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1月28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毛泽东的这一决策，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华国锋，1921年生，中国共产党的同龄人，山西交城人，1938年上山参加抗日游击队。1946年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解放战争中随大军南下。1949年8月任中共湘阴县委书记，1952年调任湘潭县委书记，成了毛泽东家乡人民的父母官。1954年任湘潭地委书记。在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时，华国锋写了《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三篇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要知道，毛泽东一直很关心家乡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他对家乡人民父母官的注意是很自然的。1955年10月，华国锋

应邀参加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并在会上介绍了湘潭地区合作化运动的经验。不久，华国锋升为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1959年庐山会议后升为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1963年10月，与李瑞山一起带领湖南干部到广东参观，写了《关于参观广东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得到毛泽东的称赞。毛泽东为报告写了一个很长的批语，教育全党要一分为二地对待自己的工作，克服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思想。1968年4月，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华国锋任革委会副主任。1969年4月被选为中共“九大”中央委员，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中谈及湖南时说：“湖南省的人物也出来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在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人。”1972年调来北京，任公安部部长。1973年5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由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与王洪文、吴德一起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参与中央领导工作。中共“十大”，选为政治局委员。四届人大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华国锋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升上的。他从省委书记调到中央，属正常的升迁，故没有引起人们多大的注意。他为人忠厚老实、作风正派。对党，对毛泽东忠心一片，听话，有一定的领导能力。他既是“三八”式的老干部，又是“文化大革命”中新上升的人物。毛泽东说过：华国锋“厚重少文”，又说他“办事不蠢”，交代要宣传华国锋，让全国逐步认识华国锋。六时半，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出面发表广播讲话，声言近几天来，“极少数别有用心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九时半，出动一万名民兵、三千名警察和五个营的卫戍部队，带着木棍、封锁了天安门广场，对留在广场的群众进行驱赶，还逮捕了一些人。4月6日凌晨，部分在京政治局委员听取北京市委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汇报”，认为群众的行动是“反革命暴乱性质”，并决定继续组织三万名民兵集中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待命，派出九个营的卫戍部队在市区内随时机动。会议要北京市委将天安门事件写成材料通报全国。毛远新向毛泽东报告了会议决定。毛泽东表示同意。

4月7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根据汇报，毛泽东表示：据此解除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上待三中全会审议批准。并说：由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好。性质变了。他还提出：华国锋任总理。这天下午，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政治局讨论以上指示的执行情况，请示晚上广播中共中央两个决议的问题。毛泽东说：华国锋还要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并写在决议上。设党的第一副主席在中共的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的唯一的次。毛泽东的目的很清楚，让华国锋接他的班。“四人帮”为把天安门事件说成是“反革命事件”，使出了浑身的解数，但毛泽东还是不信任他们。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两项决议：

一、“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决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二、“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邓小平因天安门事件再次被打倒。

“四人帮”为了平息全国人民的愤怒，要求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解放军表态，举行游行以庆祝他们的胜利，北京市还开大会，大张旗鼓地表彰在“粉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斗争中立功的集体和个人。同时，又在群众中搞清查，鼓励“检举”、“揭发”、迫“后台”。“四人帮”将天安门事件与邓小平联系起来，说邓小平是后台。

天安门事件是群众对周恩来的悼念活动，是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抗议和声讨。天安门事件并不是有领导、有组织的，而是群众出于自己亲身的感受、体验而发出的一种自发的活动，真实地表达了首都人民以及全国人民的心愿。

作为接班人，华国锋忠实地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维护文化大革命。华国锋在1976年2月25日召开的由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同志参加的打招呼会上讲：“毛主席说，错了的，中央负责。政治局认为，主要是邓小平同志负责。”“注意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运动“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四人帮”却另有打算。他们利用毛泽东的错误指示，进一步提出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鼓吹党内存在着一个资产阶级，妄图再次打倒一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同时，他们又利用手中的舆论工具，影射、攻击华国锋，说华国锋也是搞“右倾翻案风”的，搞修正主义的。

毛泽东知道，他的温和、忠厚、老实的接班人华国锋在中央的根底不牢固。1976年4月30日，毛泽东接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华国锋陪同接见。那时，华国锋虽是接班人，也不容易见到毛泽东。1979年1月4日，陈云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会上的讲话中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我们党出现了很不正常的情况。到了1975年冬，来了个联络员，一个娃娃。毛主席的意见由他传达，政治局开会由他向毛主席汇报。叶剑英同志对我讲过，那时像他那样党中央的副主席见不到毛主席。去年12月10日，我曾问过华国锋同志，你那时能不能见到毛主席？他说，见不到，只能在接见外宾时讲几句话。”看来，这是实情。华国锋在接见后向毛泽东汇报了全国形势，认为总的大好，有几个省不太好，毛泽东听完汇报后亲笔写了三条指示：一是“慢慢来，不要招（着）急。”二是“照过去方针办。”三是“你办事，我放心”。这三条可以说是毛泽东留给接班人的锦囊妙计，也算是一种政治遗嘱。

第一条是他一生，尤其是建国以后二十多年经验的总结。民主革命时期，三次“左”倾，不懂得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搞得很急，结果把根据地搞光了。建国以后。在建设上，他也想急，搞大跃、人民公社，结果欲速而不达。文化大革命中，他原计划两个五个月就可以结束，不料迟迟难以结束。他希望“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希望“安定团结”，但毫无结果，党内矛盾重重。他感到急了不行，“慢慢来，不要招（着）急”，这可以说是经验之谈，是最高概括。

第二条是希望华国锋能把他的事业坚持下去，不要人亡政息。他自认为，他的那一套，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代表广大群众利益的。这反映了他对自己晚年错误无认识。

第三条表示对华国锋的信任，也是为了巩固华国锋的地位，也反映了他对身后之事仍不放心。一怕江青闹事，二怕“右派”翻天。前两条华国锋向

政治局作了传达，而第三条却没有讲。这一条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公布。因为，这一条，在毛泽东在世时由他来公布是欠妥的，会招致人们的非议。

灾祸接踵而来。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这又是一个打击。7月28日，河北唐山发生强烈地震，并波及天津、北京。瞬间，整个唐山毁灭，高楼大厦化为废墟，死亡24·2万多人，重伤16·4万多人，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严重损失。重病中的毛泽东听了地震情况汇报后流泪不止。为了安全起见，他只好住进帐篷。唐山大地震给本来已极度衰老虚弱的毛泽东一个猛力打击。但在最后的时刻，他还在思虑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思虑他身后之事。一次，他对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四个担任常务看护的政治局委员交待后事：人生七十古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毛泽东的这一番话至少包含了三方面的意思：一是对自己一生的评价；二是希望下一代完成未竟的两件事，完成国家的最后统一（从话中可看出，他希望和平统一，不赞成动武）和结束“文化大革命”；三是对未来前途的担忧。

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一天正好是他领导秋收起义的日子，一代伟人与世长辞。消息传出，举世震动，日月失色，神州同悲，五岳垂泪，举国痛哀。许多人失声痛哭，许多人寝食不安。全国所有的厂矿企业、人民公社、人民军队连队、学校、机关都设吊唁的灵堂，悼念自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9月18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追悼大会，华国锋致悼词，高度称颂领袖一生的千秋功业，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泽东的遗志：“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将毛泽东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毛泽东的存在是江青一伙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最大障碍。现在毛泽东不在了，邓小平打倒了，华国锋立足未稳，江青一伙认为，这是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好时机。他们在治丧期间就进行种种阴谋活动。9月10日，他们盗用中共中央办公厅名义，通知全国各地，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他们请示汇报，妄图切断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联系，由他们发号施令，指挥全国。华国锋得知后大为吃惊，当即问叶剑英，叶剑英说不知道。他们决定以中央名义通知各地，澄清是非，并明确告之，发生重大问题，应向华国锋请示。“四人帮”指使一些人向江青写“效忠信”，呈“劝进表”，要江青当党的主席。他们影射华国锋搞修正主义。他们企图利用久已准备的第二武装在上海搞反革命武装暴乱。王洪文以为大权即将在握，10月2日拍好了准备上台的“标准像”。

正当“四人帮”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反革命篡权活动时，华国锋联络和依靠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人也在谋划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追悼会

后第三天，“9月21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认为同他们的斗争不可避免，并请李先念代表他去找叶剑英，请叶剑英考虑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解决为好。9月24日，李先念到叶剑英住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同他研究此事。”在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周密的谋划、组织下，1976年10月6日晚7时至8时，在中南海分别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进行“隔离审查”。据传江青听到宣布她被“隔离审查”的决定时立即躺在地板上，声泪俱下嘶叫：“主席尸骨未寒……。”但有谁能同情这位作恶多端的“灾星”呢？她身边的服务员以向她吐唾沫，扔纸团相送行。这也可见这位“女皇”人品之次。

10月6日晚10时至第二天早晨五时，在京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在玉泉山叶剑英住地开会，一致赞同对江青反党集团所采取的果断行动。会议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依靠老同志、依靠军队，不放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巧妙机智而果断地解决了“四人帮”问题，完成了毛泽东生前想做而始终未做的事。

10月8日，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作出“关于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同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这两个决定，今天看来做得过于匆忙，但在当时的情况看有其理由。有人对建立毛主席纪念堂提出非议。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1956年4月27日毛泽东提议所有的人身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泽东起草了倡议书，并签了第一名。所以邓小平讲，“建立毛主席纪念堂，应该说，那是违反毛主席自己的意愿的。”但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在复杂的党内的斗争中，在毛泽东逝世后，谁提出不保留遗体，谁就会遭到对立面的反对而垮台。保留遗体的事不是在粉碎“四人帮”后才决定的。而是在治丧时（甚至更早）就定了的。所以邓小平又说：建立纪念堂这些事“都是为了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建纪念堂是不妥的。建了，要把它改掉，同样也是不妥的。邓小平表示：我们没有改掉纪念堂的想法。

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在华国锋的领导下，中央政治局果断地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消除了内乱的祸根，深得人心。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从内心深处欢呼这一历史性的胜利。

## 六、巨人逝世的国际反响

毛泽东不仅是属于中国的，而且也是属于世界的。毛泽东的逝世震撼了全球，从太平洋、印度洋到大西洋，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到欧洲、北美洲、大洋洲，不同肤色、不同民族、不同国籍、不同阶层的人民，都对毛泽东的逝世表示深切的悲痛和悼念。许多国家的政府及其领导人，许多友好的政党、团体及其领导人，许多著名人士，纷纷发出唁电、唁函，发表声明、谈话、文章。许多国家的政府把毛泽东的逝世当作国哀，决定举行悼念活动。

---

《李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90版，第157条注释。

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09页。

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09页。

三十多个国家宣布全国下半旗志哀，其中四个国家下半旗的志哀期达 9 天。许多会议，一国的或国际的，临时中断了既定的议程，进行悼念活动。许多电台、电视台、报刊连续地、突出地和大量地报导我国和世界各国哀悼毛泽东的活动，发表和转播大量赞扬毛泽东和介绍毛泽东的革命事迹的评论和文章。一些进步的政党、团体、友好人士还组织各界群众举行集会、游行等悼念活动。如 9 月 11 日，巴黎一万多工人、农民、学生、教师、妇女和其他各界群众，从“共和国广场”出发，游行至巴黎公社社员墙前，然后进行追悼仪式。世界各国人民对毛泽东悼念活动的规模之大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在追悼毛泽东的会上的讲话中说：“从世界各国政府领导人的声明中可以看到他在国际舞台上的伟大形象。他的英名不仅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而且也将永远活在全世界人民的心中。”班达拉奈克夫人的这番话是很有代表性的。

为了说明毛泽东在国际上的影响，下面精选一点悼念他的声明、谈话和评论，这些材料除个别取自《人民日报》外，其余全部摘自新华通讯社编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举世悼念毛泽东主席》一书。

中国原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人民取得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胜利。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积极支持亚、非、拉广大地区第三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和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毛泽东的心是同第三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心相通的。因此，毛泽东在第三世界中赢得了崇高的荣誉和敬仰，他的逝世在第三世界反应最为强烈。

朝鲜劳动党中央和朝鲜政府在关于毛主席逝世的联合决定中说：“毛泽东同志是在为获得世界被压迫人民的自由和解放、争取反帝革命斗争中建树了不朽业绩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卓越领导人之一。毛泽东同志的逝世不仅对中国人民，而且对朝鲜人民和世界一切革命人民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在毛泽东同志逝世的时候，朝鲜人民沉浸在深深的悲痛之中”。（《举世悼念毛泽东主席》第 3 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明页码）

巴基斯坦总理布托的声明说：“像毛泽东那样的人物，在一个世纪里，也许一千年里只能产生一位。”“毫无疑问，毛泽东主席是巨人中的巨人。他使历史显得渺小。他的强有力的影响在全世界亿万男女的心中留下了印记。毛泽东是革命家的儿子，是革命的精髓，确实是革命的旋律和传奇，是震动世界的出色的新秩序的最高缔造者。”“毛泽东没有死，他永垂不朽，他的思想将继续指导各国人民和各民族的命运，一直到太阳永远不再升起。如果仅仅是从中国的范围来衡量他的划时代的功绩，那将有损于对这位非凡人物的纪念。当然他为中国及八亿人民做了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毛泽东也是一位崇高的世界领袖，他对当代局势发展的贡献是没有人可以比拟的。”“毛泽东的名字将永远是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伟大而正义的事业，是人类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的光辉象征，是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胜利的标志。”（第 30 页）

《印度时报》的社论称毛泽东是改变了世界力量对比的人，除了甘地和列宁，本世纪没有哪个人像毛泽东那样对如此多的人的生活留下印记。”“毛泽东又有独创性，又有胆略。在他之前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领导人想到建立一支在农村内外活动的农民军；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缔造者，没有其他当政

的共产党领导人想到带头对党的机器开刀来纠正官僚特权阶层所犯的错误。”“毛泽东主义的战略战术影响了包括越南在内的许多国家的革命者。”（第 225 页）

在非洲，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的声明说：“毛主席是那些用自己的斗争和思想推动他们的人民和第三世界人民的事业的领导人当中特别杰出者。他的原则和他的斗争将始终是指导全世界自由的人们的明灯。”（第 40 页）

埃塞俄比亚临时军政府的声明说：“毛主席的思想还激励着埃塞俄比亚的被压迫群众在进行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毛主席在他的一生中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到当代世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中。埃塞俄比亚人广泛阅读毛主席的著作，特别是毛主席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启发了像埃塞俄比亚这样的国家制订了革命的纲领。”“毛主席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教导和他的战斗热忱将永远像明星一样，指导着正在进行斗争的世界被压迫群众前进。”（第 60～61 页）

马里《发展报》的题为《毛主席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文说：“事实上，当代世界上许多民族主义战士通过学习毛泽东的关于人民战争的论点和著作才发现马列主义的。正因为如此，他才被看作既是中国革命的导师，同时又是世界革命的导师”（第 275 页）

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说：“你们完全知道，我不是共产党人，但是有非常伟大的共产党人。我敬仰列宁。我认为，在政治上，两千多年来，列宁和毛泽东是最伟大的革命家。”（第 44 页）

加蓬总统邦戈的声明说：“他（毛）的确是一位伟人，他不仅是中国政治的化身，而且我相信，他也是第三世界政治的化身。”（第 65 页）

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斗争委员会的声明说：“这位杰出的思想家的著作。特别是他关于人民战争的著作——也即是在反对内外反动派的斗争中所积累的、经受了英雄的中国人民检验的长期经验的成果——无可争辩地使毛泽东成为劳动阶级的伟大的领导者和被压迫人民力争解放和进步而斗争的高瞻远瞩的战略家。因此，毛泽东以其坚韧不拔的革命家的形象，应当受到全世界的崇敬和赞扬。”（第 46 页）

毛泽东的影响也遍及到印度洋中的非洲岛国毛里求斯。该国总理西沃萨古尔·拉姆古兰说：“毛泽东主席是一位具有不仅给中国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光辉的超人天赋人物。毛泽东是国际性的人物。他的著作不仅是中国的遗产，而且是全世界的遗产。”（第 68 页）这个国家的反对派领导人加埃唐·杜瓦尔则说：“由于中国人口众多，毛泽东作为政治家、思想家和活动家，影响了人类。因而自从耶稣基督以来，没有哪一个人像他这样影响过人类。”（第 69 页）

毛泽东自力更生的思想对取得民族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有着重大影响。阿尔及利亚的《非洲革命周刊》在悼念毛泽东时发表题为《毛泽东给第三世界树立的榜样，自力更生》的社论。社论末尾说：

“阿尔及利亚人民在严格尊重自己特点的同时，也要首先把自力更生这个哲学原则作为自己的原则。”（第 263 页）

毛泽东的影响来到了拉丁美洲。墨西哥总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说：“毛主席由于对人类作出了贡献，已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位伟人。”（第 70 页）墨西哥的《国民报》社论《毛泽东——中国人民和第三世界的伟大导师》说：

毛泽东“理解发展中国家的迫切要求和希望”，“对于墨西哥和第三世界来说，本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毛泽东是穷国人民的伟大朋友和全世界人类的导师。”（第 323 页）

委内瑞拉外长埃斯科瓦尔·萨洛姆说：“没有毛主席的形象，就写不出二十世纪的历史”。“每个国家、每个人，不论对毛泽东思想持什么观点和立场，都不能否认它的意义和重要性。”（第 75 页）

哥伦比亚革命独立工人运动发表的公报说：“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革命的灯塔”，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公报要求“全体党员应该努力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共产主义理论遗产，他的无产阶级立场，唯物主义的观点和辩证法。学习方法要灵活，即紧密联系哥伦比亚历史和具体情况，联系我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公报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开展一个宣传、研究和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要组织集会、会议、经验交流、讨论和展览会等。全党要集中力量完成这个任务，要从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中产生出更多优秀的哥伦比亚革命战士。”（第 81 页）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执行局主席、牙买加代表赫拉托·温特说：“很难描述人们在获悉伟大的历史缔造者逝世时的感情。”“现代中国的缔造者和国父、具有伟大思想、行动谨慎、目标坚定的人物、历史学家、哲学家和诗人毛泽东，是本世纪的巨人中的最后一位巨人，是不仅为他自己的人民而且为全世界人民向未来打开了门窗的世界性人物。”（第 180 页）

联合国非殖民化委员会主席、坦桑尼亚代表萨利姆说：“毛主席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他的一生和他的著作具有世界范围的重要性。他的著作，特别是《论持久战》这本书，鼓舞着所有正在为外国统治下获得解放和独立而斗争的民族。”“这位伟大的世界领袖的逝世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全世界都将深深感到悲痛，不结盟国家尤其如此。”（第 181 页）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社会主义的中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改变了世界政治形势的格局。西方国家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报刊也高度评价毛泽东对当代世界的影响。

美国总统福特在唁电中说：“在任何时代成为历史伟人的人是很少的。毛主席是其中的一位。他的领导是几十年来改造中国的决定性因素，他的著作给人类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的确是我们时代的一位杰出人物”。国务卿基辛格说：“毛主席是改变世界事态进程的一位历史性人物。他对他的国家的现在和未来有着巨大的影响。”（第 169 页）

法国总统德斯坦说：“由于毛泽东主席的逝世，人类思想的一座灯塔熄灭了。”（第 106 页）

英国首相卡拉汉的唁电说：“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中国的疆界，无疑他将作为世界闻名的伟大政治家而被人们所缅怀。”首相办公室的声明又说：“中国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就是他的无与伦比的成就的纪念碑。”

意大利社会党主席南尼说：“毛主席的逝世震动了人类，毛主席屹立于本世纪最崇高的领导人之中，是本世纪最伟大的领导人，他比一切伟大的革命领袖还高一筹。”“毛泽东的思想像列宁的思想一样，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理论发展中占有它的地位。”（第 114 页）

西德外长根舍说：“毛泽东作为本世纪一位杰出的政治家的地位是确定不移的。毛泽东的事业和人格是中国人民历史的一个决定性时代的标志。在他的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得到了尊敬和承认。”基督教民主联盟

领导人科尔说：“毛泽东是一位历史性的人物，他不仅缔造了共产党中国，而且对本世纪的意识形态有相当大的影响。”（第104页）

瑞典首相帕尔梅的唁电说：“毛泽东主席的重要作用不仅限于中国。他的思想已对全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当代的一位伟大政治领袖逝世了，但他的思想将永存。”

日本社会党前委员会会长佐佐木更三说：“毛泽东主席不仅是中国的伟大领袖，而且是世界的伟大领袖。他不仅对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对全世界影响都是极大的。”（第15页）

美国《新闻周刊》的题为《最后一位巨人》的评论说：当毛泽东主席逝世时，“可以这么说，他的一生使他的国家和整个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评价对他比对当前任何其他世界领袖更符合事实。”“毛泽东能够单枪匹马地影响历史的进程，当代没有什么其他世界性人物能和他相匹敌。他给马克思主义留下了他自己的不可磨灭的印记”（第432页）

加拿大《多伦多明星报》社论《改变世界的人》说：“毛泽东是一位革命的巨人，他的业绩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二十世纪的面貌。”“毛泽东的思想和成就对亚洲和其他各洲的穷人无疑也有极大的影响。中国的样板无形中对其许多地方的哲理和政策都有影响。”（第412页）

毛泽东是伟大的统帅、军事理论家。在毛泽东逝世之际，芬兰尤·帕基宁少校发表《毛泽东的军事遗产》，文章说：“毛泽东在战争问题上所作的贡献如同列宁在帝国主义问题上和马克思在资本主义问题上所作的贡献一样。他科学地探索了战争的规律。毛泽东的著作《论持久战》已成为永恒不朽的杰作。”文章认为，除了毛泽东以外，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对游击战争的经验“富有逻辑性地、详细地加以系统化。”毛泽东关于游击战争的理论“甚至为第三世界没有受过教育的群众也可能掌握。”文章说：印度支那战争和阿尔及利亚战争，是“毛泽东战略天才的一个证明”（第397页～398页）

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世界上党员数量最多的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对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毛泽东逝世之际，赞成、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政党、组织、团体和个人自然热烈称颂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他们称颂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当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和指针，是反对修正主义的灯塔。他们称颂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解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社会主义国家防修反修的大问题，称颂毛泽东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这方面的材料简直太多了。这里不一一列举了，仅举两个材料。

一个是南斯拉夫总统、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铁托的唁电。在一段时间，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曾错误地批判了铁托和南共联盟。毛泽东在晚年对铁托的看法有改变，称颂铁托像“铁一样硬”，并希望会见铁托。当时中国共产党和南共联盟的关系还未恢复，铁托以总统的名义发来的唁电是这样评价毛泽东的：“杰出的革命家，中国人民的领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主席把他的整个一生献给了争取现代中国的自由、独立、创建和发展的斗争。”几十年来一直领导着伟大的国家和人民。“毛泽东主席的逝世使中国人民失去了最杰出的领袖，如果没有他，现代中国是难以想象的。”“他的逝世不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

民，而且对整个进步人类都是不可弥补的损失。人们将永远记得他的形象和业绩。”铁托的这种评价表明他确确实实是一位心地坦荡、心胸广阔而无任何成见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要知道，我们在批判铁托时诸如“叛徒”、“走狗”、“法西斯”等什么难听的话都说了。正因为如此，铁托的评价更显得客观而公正些。

另一个是二十二个组织在伦敦举行追悼毛泽东大会的决议，这个决议较长，为节省篇幅仅摘录其中几段：

“毛主席不仅是八亿中国人民的，而且也是国际无产阶级、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汲取了国际无产阶级运动、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斗争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解决了武装夺取政权、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在社会主义社会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

“我们的亲爱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与我们长辞了。但是他给我们留下了伟大的丰富遗产——他的学说，毛泽东思想！”

“我们向毛主席宣誓：我们将尽我们的一切力量来建立这样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

“我们向毛主席宣誓：我们一定要进行斗争，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这二十二个组织是：非洲人全国委员会（津巴布韦）、美国印第安人运动、争取菲律宾自由国际委员会、艺术家争取民主组织、共产主义工人协会、孟加拉国解放阵线、孟加拉国工人联合会伦敦分会、班纳图书和工艺品公司、柯橡华大夫纪念委员会、欧洲厄立特里亚人解放协会（英国分会）、东伦敦马列主义者协会、大不列颠印度工人联合会、旅英孟加拉马列主义者联盟、巴基斯坦社会主义者协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邮递员大会、争取西班牙共和协会、阿根廷革命共产党、世界埃塞俄比亚学生联合会（英国分会）、英国共产主义者联盟（马列）、共产主义团结协会（马列）、工人民主——中国之友。这二十二个组织反映了面的广泛性。由此可见毛泽东在世界革命人民中影响的一斑。

上述资料仅仅是《举世悼念毛泽东主席》一书的极少的一点，该书共 617 页，而且各国政府、友好政党、进步组织和团体发的唁电、唁函均未收入（因为《人民日报》发表了）。上述各种评论是否恰当，这是可以讨论的。许多评论无疑受到当时我国国内对毛泽东过高评价的影响，以至把毛泽东晚年的一些明显失误也视为“功绩”。但从上述评论中有一点同样是确定无疑的：毛泽东的影响超出了中国，毛泽东不仅属于中国，而且是属于整个世界的，毛泽东对世界历史的进程发生了巨大影响。从当时的世界各国的报导看，对毛泽东的悼念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出现这种情况，一是与整个世界形势发展有关，二是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有关。毛泽东代表了中国。毛泽东对世界历史进程发生巨大的作用和影响，实质上反映了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在世界历史进步中的作用日益增大。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是中华民族的光荣。

毛泽东逝世后不久，出现了一个国际性的“非毛”运动。这是不足为怪的。“非毛”并不能抹杀毛泽东对世界的影响。正当“非毛”运动甚嚣尘上的时候，1980年5月4日，来我国访问的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在向毛泽东敬献花圈的缎带上写着：“向为世界人民进步作出无可估量贡献的毛泽东主席致敬。”1981年，另一位非洲总统在访问我国时同我国领导人讲：马克思列宁的著作那么多，我们实在看不了，看不懂，也很难用。我们能搞成功就得益于《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四卷。

随着对毛泽东颂扬的降温，世界各国对毛泽东的研究也有所减弱，但这种研究并没有消失，而是持续地进行着。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可参见拙作《国外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情况简述》一文（载于《毛泽东思想在当代》一书，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

毛泽东去世了。毛泽东在世界的影响就消失了吗？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在悼念毛泽东时说的一番话对我们也许有启发。他说“毛泽东是一位使中国摆脱经济苦难并使之成为有巨大影响的世界政治因素的历史人物。他的去世，使一个以他为主要特征的时代结束了。对一部分人来说，他是希望。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他是思想政治上永远的挑战。两种情况将继续下去。”（第104页）

## 结 语

### 毛泽东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始

随着毛泽东的逝世，毛泽东时代结束了。从 1935 年的遵义会议算起，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四十多年。从 1945 年的中共“七大”算起，毛泽东思想正式规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有三十年。因此，毛泽东时代不会因毛泽东逝世而一下子结束，这需要一个过程。

华国锋依靠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果断而机智地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但新旧时期的转变也不是一下了可以实现的，需要有一个过程。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华国锋忠实地执行毛泽东的“照过去方针办”的遗嘱。1976 年 10 月 26 日，华国锋对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说：当前，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免不说。随着揭发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深入，不可避免要涉及到“文化大革命”，涉及到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怎么办？作为毛泽东的继承人的华国锋存着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因此对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不做具体的科学分析，继续采取一味维护的态度。1977 年 2 月 7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即“两个凡是”）。这篇社论所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是根据华国锋的讲话写的，反映了华国锋的思想，它的实质是要把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延续下去。不过，在党内老同志的推动下，华国锋还是平心静气地改正了“文化大革命”的某些错误。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恢复邓小平的职务。8 月，中共“十一”大召开。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报告，总结同“四人帮”的斗争，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重申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党的根本任务。叶剑英作了修改党章的报告，邓小平致闭幕词。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由于受历史条件和限制，由于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也由于受“两个凡是”的束缚，大会继续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中共“十一大”的路线是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路线。

在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盛行的年代，要起来纠正毛泽东的错误，实现向新的历史时期的转折，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它既需要理论上的坚定和政治上的勇气，又需要方式方法上的稳妥可靠。“两个凡是”的方针表明华国锋不能担当完成拨乱反正、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新历史时期的任务。这一历史任务落到了再次恢复工作的邓小平身上。

“文化大革命”中两次被打倒的经历使邓小平深知，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必须纠正，继续沿着毛泽东晚年错误老路走下去，中国没有希望。但他的整个经历同样使他深知：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对毛泽东不能全盘否定，谁全盘否定，谁就成为中国人民的罪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不能丢，丢了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他决定用毛泽东的正确思想来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用毛泽东一贯倡导的

“实事求是”（邓小平称之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作为破除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思想武器。1977年4月10日，他在给党中央的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进而又指出：“两个凡是”不行，要用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来对待毛泽东，对待毛泽东的言论。他推倒1971年的经毛泽东圈阅同意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否定所谓“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路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教育战线上的拨乱反正，打破了凡是毛泽东说过的或肯定过的、圈阅过的不能改的迷信，由此推动各条战线进行全面的拨乱反正。1978年5月，报刊上开展了“真理标准的讨论”，促进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使广大干部和群众从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错误口号，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解决了从1956年以来一直未能解决好的党的工作重心转移问题。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毛泽东时代结束和进入全面改革新时代开始的重要标志。

所谓“毛泽东时代的结束”主要是指停止执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认真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毛泽东时代的结束”决非是全盘否定毛泽东，更非搞“非毛化”。事实上，实事求是地纠正毛泽东的错误才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才是真正高举毛泽东的旗帜，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搞“两个凡是”，只是形式上的高举，实际上以教条主义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违背、损害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说：“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因此，毛泽东时代的结束同坚持、发展毛泽东思想并不矛盾。毛泽东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始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实现的。

在批评、纠正毛泽东“左”的错误过程中，出现了右的倾向。有极少数人要全盘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进而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中国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邓小平在着重批评主要的“左”的思想僵化倾向的同时，也严肃批评了来自右的干扰。1979年3月30日，他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提出了“四个坚持”：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过程中，邓小平

---

邓小平：《致中共中央的信》，引自《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6页。

邓小平：《“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64、255、271、266页。

在许多谈话中反复讲：“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一条。”“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对于毛泽东的错误，“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根据邓小平的意见，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的全部革命活动和革命思想作出全面的评价。至今看来，决议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的，恰如其分的。

毛泽东说过：“不要总是认为只有自己才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前进的。无产阶级的大人物，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是都逝世了吗？世界革命还是前进。”毛泽东逝世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前进。他的后继者邓小平改正了他的失误，坚持和发展了他的正确思想，将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这一事实从另一方面说明：中国共产党虽然犯了像“文化大革命”那样大的错误，但她毕竟是一全久经考验了的党，而这一点又是同毛泽东分不开的。

毛泽东时代结束了。但毛泽东的影响依然存在，他留下的极其丰富的珍贵的遗产是永存的。人们将在新的条件下一一次又一次的研究它，解释它，赋予它新的含义，作出新的评价，并从中汲取所需要的东西。对毛泽东的研究，尤其是对晚年毛泽东的研究，永远是一个富有魅力的课题。后 记

本书所论述的主题与我国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密切的关联，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正因为它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因而随之也就带有特殊的敏感性。或许在有的人看来，本书对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肯定过多，肯定了不该肯定的东西，“左”了；而在另一些人看来，本书对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又否定过多，否定了不该否定的东西，右了。出现了不同的评论是正常的，是好事，有助于研究向深入发展。倘若本书真能引起不同意见的争论，这是笔者所希求的。因为如毛泽东所言：“笔墨官司，有比无好。”

写书难，出书也不易。本书得以出版是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王德有、常汝先、王占军三位为本书的编审付出了辛劳。默明哲、李祖锡两位友人为本书的修改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在此，谨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和以上诸同志表示诚挚的谢意。

许全兴

---

邓小平：《对起草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的意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64、255、271、266页。

邓小平：《对起草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的意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64、255、271、266页。

邓小平：《对起草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的意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64、255、271、266页。

